中国妓女生活史

武舟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为失三从泣泪频，
此身何用处人伦。
虽然日逐笙歌乐，
常羡荆钗与布裙。

——徐月英《叹环》

中国妓女生活史

武舟著

052515

湖南文艺出版社

女子学院 0073335

中国妓女生活史

武舟著
责任编辑：马小驹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
199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3.5　插页：1
字数：273,000　印数：1—5,000

ISBN7—5404—0571—6
I·462　定　价：4.50元

序

这几年，一种研究人类文化(广义的)的热潮在我国兴起，研究者的观点和角度是各不相同的，其中虽不免有任意涂抹历史的胡言乱语，但也出现了一批内容充实、有理论深度的富于开拓性的著作，在有关宗教学和中国宗教文化史的研究方面似乎成果更多，而有关我国风俗史、婚姻史、妇女生活史等方面的研究则成系统的著作似乎较少。武舟同志的这部《中国妓女生活史》直接论述的虽只是其中较小的一个方面，而且似乎是人类文化历史传统中很不光彩的一面，我觉得却是很值得注意和重视的。

妓女或娼妓是世界各国的历史上都有的，只是由于各国的历史条件不同，其产生的迟早和形成、发展的具体途径不相同，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不尽同。就我国而言，正如本书所论证的，它是由帝王宫廷中的女乐、贵族官僚家庭中的声妓和供军士工商冶游为女闾、营妓演变而来的。因而我国古代的妓女有一部分实际上是歌舞演员或兼擅歌舞技艺的人，后来还兼演戏曲，只是她们的社会地位不能与现代的歌舞戏曲演员相比而已。这一部分是我国古代妓女中的精华，她们中有些人甚至可以说是当时杰出的表演艺术家，对我国古代的文化艺术做出过贡献。当然，我国古代的妓女也有专供男性作为发泄性欲的工具的，

就是那些擅长歌舞技艺的妓女也常不免要向官僚、贵族、地主呈身甚至卖淫。而且越到后来，特别是清初废除官妓以后，私娼多不娴技艺，而成了专业的卖淫者。中国妓女这种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显然是同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相联系的，也与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有一定的联系。以清代而论，私妓不再兼擅歌舞技艺，除了因为士大夫格于政令，不敢公然征歌逐舞之外，还因为一般士大夫的文化娱乐已主要在戏曲，同时各种曲艺形式也有重要的发展，而其演员又大抵为男性（少数地方戏班和少数贵族家庭豢养的小戏班是例外），有了这样的分工，妓女就不必兼擅歌舞等技艺了。尽管如此，清代士大夫狎昵"优伶"（包括男性）的事还是不少的，及至现代某些戏曲女演员还有被诱逼为军阀、官僚和黑社会头目呈身的。就是说，她们还被这些人看得同娼妓相近。这又从另一角度反映出中国的表演艺术受封建文化传统的影响的严重。因此，我们可以说，不了解中国的妓女生活史，也就不可能了解中国的文艺史。

妓女的发展尤其与社会制度和城市的发展有密切联系。一部妓女生活史固然可以说是一部男性奴役女性的历史，但是，男性对女性的奴役，从历史来看，实际上又是伴随着阶级压迫而产生发展的，妓女的形成更明显地带着阶级压迫的性质，而其盛衰与集散则以都市的盛衰为转移。本书所描绘的中国妓女生活变迁史和大陆解放初期所取得的消灭娼妓的巨大成就即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不过，妓女的出现和存在又较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阶级压迫、剥削制度本身更为复杂，它还同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城乡差别、男女文化教养的差别及其在公共事业

中的地位差别等因素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如果不消灭这些差别或对这些差别所引起的问题作恰当的处置（包括用法律、政策、教育等手段加以调节、控御），则娼妓还是难以彻底消灭的。此外，外来的影响和旧意识的存在，也不可忽视。我国近些年来，暗娼活动又有蔓延之势，即是这些因素和影响未能得到妥善的控御所造成的，本书作者强调要综合治理，我认为很值得注意。

研究中国的娼妓制度和妓女生活史不始于本书的作者，三十年代初王书奴就曾写过一本《中国娼妓史》，其开创之功是不可埋没的，今天也仍有参考价值。但正如王氏自己所说，他写该书时，"行箧中参考书籍很少，内容总觉得不十分充实，错误漏略，当然不免"。（这话虽带有谦虚的成份，然所见书不很多因而不免疏漏却是事实。）本书作者在王氏的基础上更加广为搜集材料，并用新的眼光加以审视，因而在一些方面超过了前人。撮其大要，我以为有下列几点：

1.从具体史料出发，辨证了中西妓女起源的不同，驳正了中国娼妓始于宗教性的巫娼之说。

2.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把隋唐五代至明清时期的妓女分为官妓（包括宫妓、地方官妓、市妓）、家妓、私妓三部分加以论述，以较充足的材料揭示其性质、作用和生活的区别及其在不同时期的演变，使读者既对中国古代妓女中的不同种类有更清晰的了解，又对中国古代妓女的历史变化有完整的认识。

3.对中国近现代妓女生活及废娼、限娼的斗争作了较详细的论述，揭露了曾国藩等官僚们的伪道学面孔，总结了太平天国及大陆解放后废娼的历史经验，这是王书注意不够或未能注

意与不可能论及的。

4.全书贯串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并特别注意妓女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力图通过妓女生活这个侧面揭示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发展同妓女这一特殊社会阶层的关联，给研究中国社会史和文化史（特别是文学、艺术史）的人提供了一些可贵的资料和值得重视的见解。

上面这几点，尤其是第三、第四点，我觉得是本书的突出特色，也是本书的主要价值所在。

现在，妓女的存在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社会问题。如果说，从历史上看，妓女的存在尚有其必然性，某些妓女还对文化的发展做出过贡献的话，到现代，妓女则已成了腐蚀社会的毒瘤。特别是由于艾滋病的蔓延同妓女有密切关系（尽管不是唯一的原因），这个问题现在已不只是关系到妇女的解放、妇女的人格尊严和人类的社会道德、社会风尚的重要问题，而且成了威胁人类生命的严重问题。在资本主义世界，这个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社会主义制度则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条件，也有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历史经验。但是，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有了基本条件决不等于有了充分的条件，更不等于娼妓可自行消失。在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还很不完善而国际资本主义的影响还相当大的情况下，孳生娼妓的土壤在较长的时期内还会存在，我们必须持久而深入地与之进行斗争。从这个角度说，本书又不仅可供研究中国社会、文化史者参考，而且为研究现实问题的人们所当注意了。

马积高

1990.1.29.

目　录

第一编
妓女的产生与发展
（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第一章　妓女的起源与发展……（1）

1·1　女乐、倡优：供天子诸侯宫中娱乐的妓女

1·2　侍姬、声妓：供官僚贵族家中玩乐的妓女

1·3　女闾、营妓：供工商军民冶游的妓女

1·4　巫娼、宗教卖淫：中西妓女起源比较

第二章　早期妓女生活概况……（43）

2·1　妓女的来源

2·2　妓女的条件与职责

2·3　妓女的地位与待遇

2·4　妓女的归宿

第二编
妓女的鼎盛与控抑
（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时期）

第三章　官妓史叙论（上）……（77）
3·1　官妓与教坊制度的演变
3·2　地方官妓的兴盛与控抑
3·3　市妓的发展与兴盛
3·4　历代乐籍制度及其对妓女的贱视

第四章　官妓史叙论（下）……（136）
4·1　官妓的职能及其生活方式
4·2　花榜的盛行与《嫖经》的出现
4·3　官妓同狎客、官府、龟鸨之间的关系
4·4　官妓的理想和人格追求

第五章　家妓史叙论……（185）
5·1　历代家妓发展概述
5·2　家妓的角色内涵
5·3　家妓的命运遭际
5·4　家妓的生活态度

第六章　私妓史叙论……（228）
6·1　官妓时代的私妓概述

6·2 清中叶私妓发展盛况
6·3 私妓出卖声色的原因及其归宿
6·4 私妓经营活动的主要特征

第三编
妓女的复兴与消亡
（近代现代当代）

第七章 近、现代妓女的复兴与蜕变……（275）
7·1 天朝的禁娼与清末的弛娼
7·2 公娼制度与现代废娼运动
7·3 近、现代妓院的形式类别与经营管理
7·4 近、现代妓女生活面面观

第八章 娼妓的取缔与残余……（346）
8·1 解放初期大陆娼妓的取缔
8·2 解放初期对妓女的改造与安置
8·3 当代台、港地区的娼妓
8·4 近十年来大陆暗娼的活动和扫除暗娼的斗争

后 记 ……（420）

第一章

妓女的起源与发展

1·1 女乐、倡优：供天子诸侯宫中娱乐的妓女

妓女是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产生的，她的历史几乎同人类文明一样悠久。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两性关系实行群婚制，那时的妇女是无所谓贞女、妓女之分的。随着人类的进化和社会的发展，人类两性关系从群婚制逐步发展为专偶制（即一夫一妻制，中国的特权阶层实为一夫多妻制）。与此同时，母权制也逐步为父权制所替代，原始公有制也逐步为私有制所替代。于是，男人开始加强了对女人的统治和奴役，他们（奴隶主）一方面要求自己的妻子固守贞操，一方面自己又可任意占有女奴隶。从这时起，妓女的历史也就开始了。因此，我们可以说，妓女最早起源于奴隶娼妓。在中国，这个时代当从夏、商开始。最早的妓女就是为满足奴隶主（天子是最大的奴隶主）的娱乐需要而产生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女奴隶都能够充当他们（尤

其是天子诸侯）的妓女的，她们必须是姿色超群、擅长歌舞伎艺的女子。因此，有籍可查的中国最早的妓女是供天子诸侯宫中娱乐的女乐、倡优。后世把这类女性称为宫妓。这不仅可以从语源学的角度探测到其个中奥秘，而且还可以依据诸多零星史料勾画出一个大致的发展轮廓。

“妓女”又称“娼女”，也可合称为“娼妓”。在古代，“妓”字与“伎”字通，“娼”字与“倡”字通。魏人张揖《埤苍》释“妓”为“美女”，隋代陆法言的《切韵》则说：“妓，女乐也。”后代的字典辞书如《正字通》、《康熙字典》、《辞源》等都释“妓”为“女乐”。可见妓女的确起源于“女乐”。所谓“女乐”，实即歌舞女艺人，她们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姿容美，擅长音乐舞蹈。而所谓“倡优”，也是指从事歌舞等伎艺的艺人，宋代丁度在《集韵》中说：“倡，乐也。”明人《正字通》解释得更明白：“倡，倡优女乐。”概而言之，“女乐”和“倡优”都可称为“倡”，不过，“倡优”在古代既可由女子充当，也可由男子充当。顺便插一句，与“倡优”相类似的艺人，古代还有“俳”与“伶”，“俳”最早是指以歌舞作谐戏的艺人，后来把杂剧演员也称为“俳”，或称“俳优”；“伶”最早是指乐人或乐官，后来把戏剧演员也称为“伶”，或称“优伶”。笔者本书所论作为妓女的倡优（包括俳优与优伶），仅指其中的女性而言。

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中国从夏朝就开始进入了奴隶社会。但由于古书记载和考古发掘的资料不多，我们至今对于夏朝的历史与文化还知之甚少，至于夏代奴隶娼妓状况就更加茫昧难知了。后世娼家奉三皇时代的洪涯妓为始祖，这正如道教

徒奉老子为始祖一样，显然不过是一种虚拟的托古正名罢了。不过，古人在谴责昏君荒淫误国时所提到的夏桀拥有众多的女乐、倡优，倒是可信的：

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鼜鼓于端门，乐闻于三衢。（《管子·轻重甲》）

昔桀女乐宠嬖，文绣衣裳。故伊尹高逝滂海，而女乐终废其国。（《盐铁论》）

夏桀既弃礼义，求倡优侏儒狎徒，为奇伟之戏者，聚之于旁，遣烂漫之乐。（《列女传》）

夏桀是夏朝的末代君主，古人把夏桀灭亡的原因归罪于女乐、倡优，这固然是出于一种女人祸水论的偏见，但同时也透露出女乐、倡优是风流享乐的渊薮，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可以令君主沉迷香泽而荒废政事。中国的君主因袭制度向来是重视效法祖宗例规的，夏桀拥有女乐、倡优达三万之多，只不过是由于在他手中断送了夏朝而受到谴责时才得以披露，那么，在他之前的夏朝历代君主也或多或少拥有女乐、倡优，则是可想而知的。

殷商时代，不仅天子拥有女乐、倡优，即使诸侯，乃至奴隶主贵族也拥有女乐。1950年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发掘出一座商代奴隶主贵族大墓，在椁室西侧，就发现有女性骨架二十四具。据有关专家研究，这二十四名殉葬的女性都是墓主生前的女乐。① 尤其是商纣王，在赏玩女乐、倡优时更表现出一种暴

①参见郭和钧《1950年春季殷墟发掘报告》。

虐的本性与变态的心理。他不满足于自己宫中的女乐、倡优，便随意发动战争去劫掠诸侯的女乐以肆其淫威，甚至设酒池肉林，命男女艺人裸体追逐嬉戏于其间，他一边饮酒，一边观赏，通宵达旦，乐此不疲。①

至西周、春秋、战国时代，正是礼教开始形成的时期。大约产生于西周的《周易》中已开始有了"家人利女贞"、"恒其德贞妇人吉"之类的理论表述。与此同时或稍后，象"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何，匪媒不得"，"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亲"之类的观念也开始渗入当时的两性生活。而最系统地阐述礼教观念并被作为儒家经典的《礼记》，虽然直至汉代才独立成书，但它的思想来源颇早，其中有不少内容在先秦时就已广为人知。由此说明，这个时期的统治者已经注意到了贞操问题，并开始运用礼教观念来约束人们的两性关系。然而，这种约束只是针对普通人民尤其是妇女而言，而对于统治阶级尤其是帝王诸侯来说，礼法则允许他们多妻与狎妓。据《礼记·昏义》说："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

①此段论述主要依据如下三条材料：《史记·殷本纪》曰："(纣)好酒淫乐，……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音。……大乐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刘向《说苑》卷二十曰："纣为鹿台糟丘，酒池肉林，宫墙文画，雕琢刻镂，锦绣被堂，金玉珍玮，妇女优倡，钟鼓管弦，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国亡，为天下戮。"王嘉《拾遗记》卷二曰："纣之昏乱，欲讨诸侯，……使飞簏等惑所近之国，侯服之内，使烽燧相续。纣登台以望火之所在，乃兴师往伐其国，杀其君，囚其民，收其女乐，肆其淫嬉。"

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但统治者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在享有多妻特权的同时，还占有众多的歌舞女艺人任其玩乐。尤其是在春秋战国的动乱年代，诸侯僭越礼制，广罗女乐倡优，嗜玩声色歌舞，已蔚成风气。例如楚庄王初即位时，“淫于声色，左手拥秦姬，右手抱越女”①；齐景公当政时是“左为倡，右为优”②；魏王饮宴时有“楚姬舞于前，吴姝歌于后，越女鼓瑟于左，秦娥泛筝于右”；③吴王夫差的后宫中竟有“宫妓数千人”。④

当时，由于这种嗜好声色歌舞的风气在上层社会生活领域中广泛弥漫，便使女乐倡优在成为统治阶级最高级娱乐工具的同时，往往也成为外交活动和人际关系中的政治工具。

女乐倡优主要是以她们的伎艺和色相来娱人。她们的歌舞表演除了供统治者自己娱乐以外，还常常作为庆典活动和接待宾客时的一种隆重的礼仪。这种礼仪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尤其是在接待外宾时，女乐倡优的素质如何，歌舞表演的规模、内容、水平如何，不仅关系到主客双方的尊严，而且可能会影响到该次外交活动的进展。这从著名的“齐鲁夹谷之会”中，可以窥见其个中奥秘。公元前500年，孔子随同鲁定公应齐景公之约，到齐鲁交界的夹谷会盟。齐景公首先命歌舞艺人表演“夷狄之乐”以抖擞威风，孔子提出抗议，齐景公才撤去这种歌舞，但接着又换上一队优倡侏儒来表演所谓的“宫中之乐”，以辱鲁君。孔子气愤地冲上去阻止了这种表演，并命令随行的

①《吴越春秋》卷一。　②《晏子春秋》。　③黄宪《天禄阁外史》卷四。　④任昉《述异记》。

大司马行法，把这些优倡侏儒抓来杀掉了。表演什么内容的歌舞，倡优侏儒是无权决定的，可怜前是他（她）们被作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送上祭坛时，还不知道原因何在。①

女乐倡优的聪明才智、艺术修养以及生理素质，都是出类拔萃的，但她们的地位却与奴隶无异，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她们的主人既可以自己随心所欲地享用她们，也可以任意将她们转送他人。因而，在外交活动与人际交往中，她们往往被作为一种高级礼品而任人相互赠送。诸侯与诸侯之间，君与臣之间，为了达到求和、施恩等目的，也多以赠送女乐为尚。例如，公元前562年，晋悼公兴师伐郑，郑国立即派人赠送女乐十六人及其他礼品贿赂晋侯以求和，晋侯受礼后又以女乐八人赐给功臣魏绛作为奖赏。②

作为娱乐工具和高级礼品的女乐倡优，既然具有如此大的诱惑力和功能，于是一些有野心的政治家，在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活动中，还把她们作为推行政治阴谋的工具使用。为了图谋对方，他们往往首先制造出一种两国友好的假象，接着便以赠送女乐而暗设陷阱，借以达到使对方骄矜失警、斗志麻痹，乃至沉迷声色、荒废政事的目的。据史载，春秋时晋献公想吞并虞虢，就曾赠送女乐六人给虞公，以惑其心而乱其政；③齐景公担心鲁国强盛起来于己不利，就挑选了八十名能歌善舞的美女送到鲁国城南高门外请求鲁君接受，鲁哀公开始有些犹

①《史记·孔子世家》。②参见《国语·晋语七》和《左传·襄公十一年》。③《韩非子·内储说下》。

豫，后来在贵族季桓子的怂恿之下终于接受了，以致"三日不听政"。① 更为典型的一个例子是，秦穆公为了吞没西戎，一方面针对戎王地处僻陋，未闻中国之声的情况，特意赠送女乐十六人去腐蚀他；一方面向戎王请求，把西戎朝臣中唯一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由余留在秦国。戎王见其女乐而悦之，不仅乐意接受了女乐，而且同意了秦国的请求。从此以后，他便设酒张饮，日以听乐，终岁不理朝政，以致国内政治混乱，牛马半死。然后秦国兴兵攻其不备，终于使戎王身死国灭。② 因此，韩非曾痛心疾首地说："耽于女乐，不顾国政，亡国之祸也。"③ 当然，女人并非祸水，女乐也未必能亡国，但一个君主如果耽于女乐，不顾国政，则无疑是一种昏庸失德、胸无大志的表现。而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可以择君而仕的时代，于是，在一些想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如韩非以及在他之前的由余、孔子等人看来，一个君主是否"耽于女乐"是衡量该君主能否称雄的试金石，因而也是他们择君而仕的重要条件之一。所以，当戎王耽于女乐，终岁淫纵时，从秦国回到西戎的由余，在屡次向戎王进谏不听之后，就离开西戎而投奔了秦国。④ 当鲁哀公耽于女乐，怠于政事时，孔子在力谏不听之后，便离开了鲁国前往楚国。⑤

自从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天下之后，随着专制制度和礼教观念的不断完善与强化，中国人的两性关系被挤压得进一步倾斜与变形，中国妇女所遭受的卑视与压迫也进一步加深。统

①《史记·孔子世家》。②参见《韩非子·十过》和《韩诗外传》卷九。③《韩非子·十过》。④同②。⑤同①。

治者一边用妇德贞操的素布把一部分妇女束裹起来，一边又逼着另一部分妇女脱光衣裙，任其卖玩。于是，在中国专制社会的母体内，孕育出一个礼教与娼妓并行的社会怪胎。

秦汉时代是礼教得以发展与完善的时期。这不仅从理论上由于有刘向的《列女传》、班昭的《女诫》的产生以及《礼记》的独立成书而加以倡导，而且在实行时统治者还采取了行政、法律的措施。如秦始皇就曾在泰山、会稽等地刻石提倡贞节，禁止淫佚，① 并为褒奖巴清寡妇而修筑女怀清台以劝导贞节。② 西汉宣帝也效法秦始皇，于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诏赐贞妇顺女帛。③ 东汉安帝也曾于"元初六年(119)二月，诏赐贞妇有节义谷十斛，甄表门闾，旌显厥行"。④ 但与此同时，统治者自己却仍然占有大量的女乐、倡优，供他们享乐。

秦朝推行以郡县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废除了分封制，不立王侯。然而秦始皇本人的荒淫奢侈却是惊人的。他不仅把从六国掠来的上万名宫人、女乐据为己有，而且还大修宫室供她们居住表演，计有"关中离宫三百所，关外四百所，皆有钟磬、帷帐、妇人倡优"，共达"数巨万人，钟鼓之乐，流漫无

①秦始皇泰山刻石曰："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又会稽刻石曰："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洁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女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　②《史记·货殖列传》："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也，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③《汉书·宣帝纪》。　④《后汉书·安帝本纪》。

穷”。①

汉代虽然又实行了同姓宗室封王、文武功臣封侯的分封制，但这时的诸王侯的政治权利受到了皇帝的严格控制（尤其是在公元前154年发生吴楚七国叛乱之后），他们并不能象春秋战国时的诸侯那样为所欲为。因此，关于汉以后诸王侯拥有妓女的概况，我们拟在第二节中论及。本节只着重论述历代君主所拥有妓女的基本情况。

西汉历朝皇帝，不管荒淫风流与否，其后宫的美人和女乐人数都相当可观，有时甚至多达数千人。这些宫妓的主要职责是为皇帝表演歌舞伎艺。至于向皇帝献身，虽然每个女子都有可能获得这种机会，但由于人数太多，即使轮流召幸，其频度也是极低的，只有极少数受宠者才能经常与皇帝发生性关系，甚至有的宫娥、女乐终身也未承“恩泽”。历朝之所以收纳如此众多的美人、女乐入宫，并且把它作为一种制度来实行，除了供皇帝在宫中享乐以外，还可以代表和体现天子的特权与尊严。如汉武帝就是一个好大喜功而又风流放荡的皇帝，他不仅在宫中收纳了数千名宫娥、女乐，经常“作俳优，舞郑女”，②而且还于公元前112年专门设立了一个乐府机构，收罗歌舞艺人八百余人，以表演俗乐俗舞，供其娱乐。昭帝、宣帝也都效法武帝，还把后宫美女置于园陵游乐。元帝即位后，嫌后宫女子年长色衰，当即下令刷选天下美女入宫，并让画工一一为之摹画形貌，以便他每晚依据画图择其美者召幸。至成帝、哀帝时

①参见《说苑》卷二十和《史记》卷六。　②《汉书·东方朔传》。

代，由于上行下效，淫侈之风大炽，使两汉政权濒临崩溃。于是，成帝在公元前9年下令对臣僚贵族的奢侈淫纵行为加以节制。公元前7年，成帝逝世，哀帝即位后又罢撤了乐府机构。但成帝与哀帝的荒淫纵欲仍然一如既往。

东汉从初年开始，后宫中除皇后、贵人之外，置美人、宫人和采女三类。而所谓采女，就是定期从民间采择而来的十三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的美女。因此，东汉历朝宫妓的数量与规模，不亚于西汉，晚期尤甚。如桓帝时“多内幸，博采宫女至五六千人”。①在东汉历朝皇帝中，以汉末灵帝最为淫纵。据《后汉书·吕强传》载，灵帝后宫中仅采女就有数千人。灵帝喜好胡乐胡舞，经常令宫妓在西园表演。为了追求新的刺激，有时他还别出心裁地变换花样和宫妓们一起游戏玩乐。有一次，他命令采女在西园中装扮成客舍主人，他自己身着商贾服装，来到客舍中，与主人一边饮宴，一边调情。灵帝还在西园中修筑了一座裸游馆，每至盛夏，他就来到裸游馆避暑，命令十四至十八岁的宫女，脱光上衣，只穿一条裤衩下池游泳，他一边饮酒，一边欣赏，或者自己也下池去和宫女们一起裸浴。

魏晋南北朝时代，由于长期处于分裂与动乱状态之中（仅在西晋时有短暂统一），人们在领悟到岁月蹉跎，人生短暂的同时，普遍滋生了一种及时行乐的心理。加之一些方士和道教徒所倡导的房中术在这时已广为流传，（实际上从汉武帝时起就已开始修习房中术了。）如曹魏时的甘始、左慈，东西晋之际的葛洪等都是颇精于房中术的。他们宣扬所谓“采阴补阳”可以延年

①《后汉书·桓帝邓皇后传》。

益寿的理论，有的人还提倡御女“多多益善”，甚至被夸张到可以“一夜御十女”，这就更进一步助长了统治者的荒淫与纵欲。

曹操既是一位文武双全的政治家，又是一位女乐倡优的嗜好者和房中术的信奉者。他在面对无限的宇宙时，常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慨叹的同时，更歌罗列倡优在侧，常喜以达夕”，①及时行乐，并特地修筑铜雀台供他的嫔妾、女乐、倡优居住和表演。甚至他在临死前还遗令她们于每月的初一和十五日上午，在铜雀台上对着他的陵墓表演歌舞。②他还曾把当时著名的方士如甘始、左慈等招至邺都，“问其术而行之”，③其施行的对象无疑是宫娥、女乐等。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以及孙子曹睿等都爱好清商乐，而清商乐的表演者全是女乐。曹丕为帝时便专门设立了一个女乐机构名为“清商署”，至曹睿时，“清商署”继续保留，后宫美女也增至数千人。齐王芳每逢见到各亲属大臣的美丽女子，就要把她们留下来，安置在清商署。④西蜀后主刘禅，被曹魏俘虏后软禁在洛阳时，由于有蜀妓供他赏玩，他竟然嘻笑自若，乐不思蜀。⑤东吴末主孙皓的后宫中也是佳丽聚集。他偏安江南，日夜沉迷于声色歌舞之中，甚至在侍他父亲孙休事时，他也借祭神的名义观赏倡妓昼夜歌舞娱乐。⑥

西晋武帝司马炎也是一个声色之徒。他将曹魏时设立的女

---

①《魏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②参见陆机《吊魏武帝文》和《乐府诗集》卷三十一。③《后汉书·方术列传》。④《魏志·齐王芳纪》。⑤《三国志·蜀后主传》注引《汉晋春秋》。⑥《建康实录》卷四。

乐机构“清商署”继续保留着，后宫本来已有众多美女，他还于公元273年下诏采择公卿以下家庭的女子，以备六宫，并下令，选美之事尚未完毕时，禁止天下嫁娶。① 过了八年，他在平吴之后，又“诏选孙皓伎妾五千人入宫”。自此以后，武帝后宫佳丽将近万人，以致他每日幸御宫女时，常常坐上羊车，任凭羊的兴趣来决定寝所。于是，一些宫女为求宠幸，便把竹叶插在门前，将盐水泼在地上，以诱羊车。②

西晋王朝灭亡后，历史又进入战乱与分裂状态。

在北方，无论是十六国时期的历代君主，还是北魏、北周时期的历代帝王，多是一些享乐大王。后赵石虎就是十六国时期最凶暴最荒淫的君主之一。他在邺中大造宫室，掠夺民间十三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的女子三万多人，置入宫内，任其玩乐。他还经常举行礼乐大会，让数百个女伎，穿上饰有珠玑的舞衣载歌载舞。③ 前秦苻生甚至荒唐无耻到“使宫人与男子裸交于殿前，引群臣临而观之”④ 的地步。苻坚破邺后令王猛镇守，封王猛为清河郡侯，不仅赐以高级宅第，而且“加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人，中妓三十八人”。⑤ 公元405年，南燕慕容超即帝位后，为从前秦姚兴处赎回被俘的妻子与母亲，除以千金相赎外，还赠送太乐伎一百二十人。⑥ 北魏宣武帝元恪拥有大量的宫人、

---

①《晋书·武元杨皇后传》。 ②《晋书·胡贵嫔传》。 ③《邺中记》。 ④⑤《十六国春秋·前秦录》。 ⑥《十六国春秋·南燕录》。

女乐尚不满足，以至臣下将狎玩过的妓女献给他，他也乐意接纳。①

在南方，东晋及南朝宋齐梁陈的历代帝王，虽然偏安于江南一隅，却仍多纵情于声色歌舞。如刘宋前废帝刘子业竟“使妇人裸身相逐”，以供其观赏。明帝刘彧逼夺大臣到抃爱妓陈玉珠，到抃怀怨，他就把到抃逮捕关进监狱。②齐武帝萧赜的后宫达万人。梁武帝萧衍不仅后宫拥有《吴声》、《西曲》女乐各一部，而且还亲自创制《襄阳蹋铜蹄》、《上云乐》和《江南弄》等歌舞曲，让女乐们表演歌唱。梁简文帝曾写过《听夜妓》、《春夜看妓》等诗，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享乐生活。至于陈后主陈叔宝与贵妃、美人、文学侍臣共赋艳诗，造作歌曲，选美女千人演唱《玉树后庭花》之类的歌舞，直至为隋所灭，则是众所周知的史事。

总之，从夏商时代起，女乐倡优这种供男人赏玩的色艺之花，首先在宫廷的醴醍土壤上滋生以后，中国妓女的历史就真正开始了。此后尽管历史风云多变，王朝更替莫测，但在历代统治者的培植和特权制度的保护下，中国妓女一直以一种病态的方式疯狂地生长着，并且与历史同步发展，不断地从宫廷蔓延出来。

①《魏书·薛真度传》。②《南史·到抃传》。③《玉台新咏》卷七。

1·2 侍姬、声妓：供官僚贵族家中玩乐的妓女

既然历代君主都是一些享乐大王，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特权在宫中收纳大量的美人、女乐、倡优供其赏玩；那么，在他们统治之下的官僚贵族，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士大夫富豪，便也理所当然地仿效君主，在家中蓄养一定数量的美女或歌舞女艺人供其享乐。这些女性往往都负有色身与献伎的双重使命，因而史书多称她们为侍姬、爱妾、声妓、歌姬、舞姬，也有称为美人、女乐、倡伎的，我们不妨把这类女性统称为家妓。

家妓同样起源于女奴隶，她的发展也大致与宫妓同步。甚至有些臣僚的部分家妓就是来源于宫廷女乐，例如最早见于史籍记载的家妓，就是晋悼公于公元前562年赐给魏绛的八名女乐。不过，对于秦以前一般官僚贵族蓄养家妓的情况，由于史籍疏于记载，我们现在已不甚明瞭，而关于春秋战国时诸侯王拥有妓女的情况，（考虑到这些诸侯实际上都是南面称君，各自为政，与汉晋以后分封的诸王侯有所不同，）我们已在第一节中作了论述，故本节拟着重论述汉以后家妓发展的情况。

在两汉三国时，官僚贵族蓄养家妓，已经蔚成风气。据《汉书·贡禹传》载，西汉时“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这里所说的“妾”和“歌者”实际上都是指

家妓。古代统治阶级虽然实行的是多妻制度，但无论是谁，妻子只有一个，妾也根据特权等级各有规定。"诸侯一取九女，象九州，一妻八妾。卿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① 上述有的诸侯拥有妻妾至数百人，例如汉武帝时的武安侯田蚡，就是一个"后房妇女以百数"② 的代表，即使除去特权许可的一妻八妾，余下的作为家妓，仍然要以百来计算。这种淫侈之风，至西汉末年成帝时愈演愈甚，公卿列侯，亲属近臣之家，大多仿效皇帝，"设钟鼓，备女乐"。③ 如张禹蓄妓不仅供自己娱乐，而且还让他的弟子分享。有一次，他带学生戴崇进入后堂，一边饮酒，一边让"妇女相对，优人管弦，铿锵极乐，昏夜乃罢"。④ 甚至有的豪门外戚，竟嚣张到敢于"与人主争女乐"。⑤ 外戚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兄弟五人，曾于同日封侯，世称五侯。五侯之间，争为奢侈，"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⑥ 互相攀比，纵欲享乐。成帝逝世后，陵墓尚未建成，王根就"聘取故掖庭女乐五官殷严、王飞君等，置酒歌舞"。⑦

东汉后期，外戚与宦官争相专权，政治腐败，淫侈之风更有增无已。如汉桓帝时，外戚梁冀把持朝政达十多年。在此期间，梁冀利用职权，"大起第舍"，"广开园囿"，并掠取良家女子数千人，作为家妓、奴婢供其役使。每当春秋暇日，他乘车出

---

①蔡邕《独断》。 ②《汉书·田蚡传》。 ③《汉书·武帝纪》。
④《汉书·张禹传》。 ⑤《汉书·礼乐志》。 ⑥《汉书·元后传》。
⑦《汉书·元后传》。

游，都有成群结队的倡伎紧随车后，鸣钟吹管，歌酣竟路。① 公元159年，桓帝与宦官单超、左悺、具瑗、徐璜、唐衡合谋，诛杀了梁氏满门老少，单超等五人也于同日封侯，从此后政权又落入宦官手中。五侯专权后，除单超早死外，其他四侯的穷奢极欲与梁冀相比，也毫不逊色，尤其荒唐的是，他们作为刑余之人的宦官，也"多取良人美人，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② 汉灵帝时，大将军窦武也曾"多取掖庭宫人作乐饮宴，旬月之间，赏财亿计"。③ 在当时，不仅王侯将相、外戚宦官广蓄歌伎，一些士大夫也加以仿效。如安帝时的通儒马融，教育的学生数以千计，但他"不拘儒者之节，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④，真称得上是风流浪漫了。即使一些商贾贩夫，地主富豪，在享乐上也向上流社会看齐，因而，他们往往也是"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⑤

东汉末年至三国纷争的动乱时期，官僚贵族限于流徙不便和财力不足，蓄养家妓的规模要逊于西汉。但在当时社会普遍追求及时行乐的时风中也不乏极端纵欲的例子。如有一次曹魏与蜀汉交战，都护曹洪奉曹操之命打退马超的进攻后，便置酒召集众将官庆功。酒会上，曹洪命令他的家妓穿上一种透明的"罗縠之衣"，踏鼓表演；满座将官见了都大笑喝采，只有杨阜一人出来责备曹洪不该"于广座中裸女人形体"。⑥ 至魏末，

---

①《后汉书·梁冀传》。 ②《后汉书·单超传》。 ③《后汉书·陈蕃传》。 ④《后汉书·马融传》。 ⑤《后汉书·仲长统传》。 ⑥《三国志·杨阜传》。

出现了曹爽、何晏等一群纵欲主义者，他们蓄妓的规模与淫侈的程度，并不亚于两汉的官僚贵族。据《三国志·曹爽传》载，大将军曹爽奉明帝遗命辅佐曹芳时，本来已经是“妻妾盈后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将吏师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为伎乐。诈作诏书，发才人五十七人送邺台，使先帝婕妤教习为技。擅取太乐乐器，武库禁兵，作窟室，绮疏四周，数与（何）晏等会其中，纵酒作乐”。直到公元250年司马懿发动政变，才惊醒曹爽、何晏等人的风流梦。不久，曹魏政权也为司马氏政权所替代。

至两晋南北朝时期，受各代君主纵欲享乐的影响，“宠臣群下，亦从风而靡；王侯将相，歌妓填室；鸿商巨贾，舞女成群。竞相夸大，玄有争夺，如恐不及，莫为禁令”。① 因而使家妓的发展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盛况。这首先表现在，家妓不仅是官僚贵族纵欲享乐的工具，而且成了他们竞奢斗侈的财宝。甚至在某些人的眼中，一个人蓄养家妓的数量与规模，正是他有权势、有地位、有钱财的一种象征。因此，这一时期的官僚贵族，蓄养家妓数量在十人以上以至成百上千的已是司空见惯。根据史籍记载，试略举数例如下：

朝代	官僚贵族姓名及蓄妓数量	资料出处
两晋	梅陶，家庭侈靡，声妓纷葩。	《晋书·钟雅传》
	陶侃，媵妾数十。	《晋书·陶侃传》
	桓玄，后房妓妾数十。	《世说新语》注引《续晋阳秋》
	石崇，侍人美艳者数千。	王嘉《拾遗记》

① 《太平御览》引裴子野《宋略》。

续表

朝代		官僚贵族姓名及蓄妓数量	资料出处
北朝	北魏	元禧，姬妾数十。	《魏书·咸阳王禧传》
		高聪，有妓十余人。	《魏书·高聪传》
		夏道迁，妓妾十余。	《北史·夏侯道迁传》
		薛真度，有女妓数十人。	《魏书·薛真度传》
		元邕，妓女五百。	《洛阳伽蓝记》卷三
		元琛，妓女三百人。	《洛阳伽蓝记》卷四
	北周	李迁哲，妾媵有百数。	《周书·李迁哲传》
南朝	宋	沈勃，妓女数十。	《宋书·沈演之传》
		杜骥，女妓数十人。	《宋书·杜骥传》
		阮佃夫，女妓数十。	《南史·阮佃夫传》
		沈庆之，妓妾数十人。	《宋书·沈庆之传》
	齐	萧嶷，妓妾千余人。	《南史·萧嶷传》
		张瓌，妓妾盈房。	《南史·张瓌传》
	梁	鱼弘，侍妾百余人。	《梁书·鱼弘传》
		曹景宗，妓妾至数百。	《南史·曹景宗传》
		徐君倩，侍妾数十。	《南史·徐君倩传》
		夏侯夔，后房妓妾，亦有百数。	《梁书·夏侯夔传》
		夏侯亶，有妓妾十余人。	《梁书·夏侯亶传》
	陈	章昭达，每饮食，必盛设女伎杂乐	《南史·章昭达传》

这些官僚贵族蓄养的家妓大多伎艺精妙，姿色出众，她们既要表演歌舞伎艺，也要侍寝献身。妓女怀孕后，家长有时也会给她们正名为“妾”，当然也有不怀孕生子就给予“妾”的头衔的。由于历代官僚贵族蓄妓颇多，加之那时人们还不懂得避孕，因而他们家中难免会不断有妓女生儿产女，例如北周李迁哲有上百名妓妾，共生了六十九个儿女，他甚至无法记住这些儿女的名字，于是只好随身带着一本花名册以便查认。①

家妓表演歌舞伎艺，除了供家长自己娱乐之外，还要招待他们的上级、同僚、友人乃至部下。因此，这些官僚贵族不仅广蓄家妓，而且还着意让她们“佩金翠，曳罗绮”，盛妆打扮，与其说是为了取悦于宾客，毋宁说是为了显示主人的富贵。在穷奢极欲、竞豪斗侈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对方确有超群出众的美妓名娼，他们往往还会不择手段地去争夺抢掠，如阮佃夫家中蓄养妓女数十，穿戴的都是金玉锦绣，其华贵和新奇胜过宫妓，以致他为家妓“每制一衣，每造一物，京邑莫不法效”。一次广州刺史何恢请阮饮宴，阮一眼看中了何恢的家妓张耀华，就多次向何恢索求。但何恢因宠爱张妓而拒绝转让。他说：“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阮佃夫恼羞成怒，便找了一个借口罢了何恢的官。②

何恢为了保护自己的爱妓张耀华，失去的不过是一顶乌纱帽，而早在他之前的石崇为了保护自己的爱妓绿珠，竟然丢了自己的老命。石崇是西晋的大豪富，他曾与王恺斗富，尽管王

①《周书·李迁哲传》。　②见《南史·阮佃夫传》和《何恢传》。

愧有晋武帝支持也无法取胜。①石崇家中侍姬上千，她们衣服首饰的华贵和歌舞表演的排场都是骇人听闻的。石崇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显示他的富有，因此，他的家妓中也就难免会有人成为他争豪斗侈的牺牲品。例如有一次石崇在家中举行宴会时命美人劝酒，凡客人饮酒不尽者，即斩美人。王敦为激怒石崇，每当美人向他劝酒时故意不饮，石崇一气之下，竟在酒席上连续杀了三个行酒美人。②石崇在众多的家妓中最受宠爱的只有翔风和绿珠，而在翔风年至三十色衰失宠之后，绿珠便成了石崇最心爱的宝贝。因此，当孙秀借赵王司马伦的权势来索取绿珠时，石崇竟以“绿珠吾所爱，不可得也”的回答拒绝了使者。然而富有毕竟敌不过强权，孙秀鼓动司马伦立即派兵相向，绿珠被迫跳楼自杀，石崇也终遭斩首弃市之运。③

在当时的官僚贵族中，仅就蓄妓的数量与华侈而言，石崇的确是首屈一指的，后来可与之相比的还有北魏的元雍和元琛。据《洛阳伽蓝记》记载，高阳王元雍拥有“僮仆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罗衣从风。自汉晋以来，诸王豪侈所未有也。出则鸣驺御道，文物成行，铙吹发响，笳声哀转；入则歌姬舞女，繁竹吹笙，丝管迭奏，连宵尽日”。他最宠爱的家妓是修容与艳姿，修容能为绿水歌，艳姿善么凤舞，在当时声闻遐迩。河间王元琛效石崇、王恺故事，也与元雍争豪竞侈。他大兴楼馆园囿，蓄养妓女三百人，并经常大会宗室，“陈女乐及诸名马”，借以炫耀他的豪富。他甚至说：“不恨我不见石

①《世说新语·汰侈》。 ②《世说新语·汰侈》。 ③《晋书》卷三十三。

崇，恨石崇不见我。”

官僚贵族无节制地广蓄家妓，纵欲享乐，这无疑会影响到国家的政治。因此，北魏宣武帝曾下令严立制度，节制放荡。南朝萧齐时甚至规定“未登黄门郎不得蓄女妓”，王诩和阴玄智因资历不够而蓄妓，便被“免官，禁锢十年”。① 尽管这种制度对下层官僚蓄妓有所节制，但在同时也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中上层官僚贵族蓄妓的特权，实际上是罚下而劝上，从而助长了蓄妓之风的盛行。

其次，两晋南北朝家妓发展之盛，还表现在这时的文人士大夫把妓女作为放浪形骸、品赏风貌、自命风流的对象。在他们的心目中，蓄妓赏妓的生活方式，不仅仅是为了享乐，而且被视为一种审美的境界。因此，在两晋时期，一些“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② 也很少有人非议。至梁陈时，由于男子经常沉迷于女人的美色之中，其审美时尚也女性化了，许多男子竟然也“熏衣剃面，傅粉施朱”。③ 受这种时风的影响，一些文人士子，不管家境状况如何，也追求仿效这种生活方式，如刘宋时范晔的家境并不宽裕，“母亡住单巷，唯有一厨，盛樵采，子弟冬无被，叔父单布衣”，但他却仍要赶时髦，蓄家妓，并让妓妾盛妆打扮。④

随着文人士子与妓女关系的密切发展，妓女也终于通过文人士子的彩笔而进入了文学的殿堂，（梁陈宫体诗中所有表现宫妓生活的作品也属此类）甚至有些文学素养好的妓女，如南

①《南史·王宴传》。 ②《晋书·五行志》。 ③《颜氏家训·勉学篇》。 ④《宋书·范晔传》。

齐苏小小(但苏小小不属家妓，而应为私妓)，受文人的影响，也开始挥毫作诗。于是，经过长期孕育的中国妓女文学（包括文人创作的以妓女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和妓女创作的作品），终于在这时正式诞生了。与此同时，由于这些文人与妓女的风流韵事以及妓女文学的广泛流传，又反过来为官僚贵族、文人士子风流自赏、及时行乐的思潮推波助澜，从而促进了妓女的发展。如西晋石崇与爱妓翔风、绿珠的风流故事，就被东晋王嘉、南朝宋刘义庆先后写入了《拾遗记》、《世说新语》等书，还有不少诗人如庾肩吾也为之作诗咏叹。过了数百年以后，乐史还为之作了一篇名为《绿珠传》的小说。东晋谢安在东山蓄妓，每出游，必以女妓从。① 更被当时与后世传为佳话。此外，还有许多文学家诸如沈约、谢朓、丘巨源、王僧孺、柳恽、何逊、刘孝绰、戴嵩、沈君攸、邓铿、阴铿、江总、刘删、萧琳、萧放、庾信等都写过反映妓女生活的诗作。这些诗中所歌咏、所表现的妓女，有的是他们自己的家妓，有的是同僚、友人或上司的家妓，也有的是皇帝的宫妓，甚至还有一些是早已成为历史的妓女，如曹操的铜雀台妓，自西晋陆机作《吊魏武帝文》之后，南北朝时期乃至唐代，都有许多诗人写作过感咏铜雀台妓的诗歌。

① 参见《晋书·谢安传》和《世说新语·识鉴》。

1.3 女闾、营妓：供工商军民冶游的妓女

如前一、二节所述，宫妓与家妓都如同私有财产一样，隶属于某个男人所支配、所专用。尽管她们有可能中途易主而侍，宫妓可能被赐给功臣，家妓可能被转送他人或被他人劫夺，但同她们发生性关系的男人在一定时期内基本上是固定的，其中有些女子即使向君主或家主献身的机会很多，也不允许与其他男人发生性关系。由于历代宫妓和家妓数人数众多，而整个社会的男女比例又大致是相等的，这就必然会导致社会上有许多男子娶不到妻子而成为旷夫，加之随着手工业、商业的逐渐活跃和城市经济的初步发展以及由于政治的、文化的、军事的原因，社会上还有许多工商业者、游士和军人在远离家乡之后，也处于性饥饿状态。于是为适应社会各阶层人士（包括旷夫、军人、游士、商人、手工业者和市民等）性欲需求的妓女也相应产生了。不过，由于这类妓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商品经济得以初步发展之后的产物，甚至她们本身就是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而进入交换市场的，因而她们产生的时代比宫妓、家妓要晚得多。她们之中也许不乏能歌善舞者，但多以卖淫为主，其营业方式主要有官营与私营两种。

所谓官营方式，就是由官府开设并经营的卖淫业。中国最早的官营妓院是春秋时齐国宰相管仲于公元前七世纪中期开设

的，这就是《战国策·东周策》中所说的“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韩非子·说难》也说：“昔者桓公宫中二市，妇闾三百。”可见齐桓公时已开始设女闾是可信的，只不过在数量多少上说法不一而已。市即指对外开放的宫市，女闾或妇闾本意是指妓女居住卖笑的馆所，相当于后世的妓院，这里是借指集中在女闾中的妓女。据褚人获《坚瓠续集》卷一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三百，征其夜合之资，以资国用，此即教坊花粉钱之始也。”意思是说，管仲开设女闾的目的是为了征税以富国。与此相类似的措施后来在西域的龟兹、于阗等国也常见。据《十三州志》载：“葱岭以东，人好淫僻，故龟兹、于阗置女市以收钱。”《魏书·龟兹传》也说龟兹“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钱以入官。”由此可以印证，褚人获关于管仲把花粉钱作为一项富国的经济措施来施行的说法是言之有理的。

不过，除征税之外，管仲设女闾还有更重要的政治意图，那就是由于当时统治阶级占有了大量女性之后，使社会上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使人们正常从事生产劳动，管仲一方面劝说齐桓公放出一批宫女嫁给社会上的单身男子，一方面开市设女闾，以解决社会上众多的旷夫和工商市民的性饥饿问题。齐桓公本是一位风流好色的君主，但出于政治的需要，他还是听从管仲的意见外放了一批宫女嫁给民间男子，并且对管仲开市设女闾也予以支持，甚至自己为追求新奇与刺激也到女闾去冶游。《韩非子·外储》中所说的桓公“被发而御妇人，日游于市”，即指此事。战国时燕太子丹，为了招揽人才，吸引游士，特地挑选了一批美貌女子安置在旅馆

中，每有宾客相过，就派这些美女招待、侍宿。① 这类女馆与管仲所设的女闾是一脉相承的，都属于官营妓院，只不过燕国女馆的服务对象侧重于过往游士罢了。

女闾这种官营妓院体制发展到汉武帝时，又分立出一种营妓制度。② 所谓营妓，就是为适应军士中无妻室者的性欲需求而安置在军营妓院中的妓女。实际上，这种专为军士服务的妓女早在春秋末年就出现了，越王勾践为了报仇雪耻，在经过了长期准备之后，终于打响灭吴的战斗。但由于历时已久，而战斗又不可能立即结束，越军中许多军士因思念妻室而情绪低落，越王勾践便从后方把一些犯有罪过的寡妇送到前方军营，供军士冶游，于是士气高涨，终于消灭了吴国。③ 不过，越王勾践当时让寡妇为军士提供性服务，还是一种临时性的应急措施，并未成为一种制度。汉武帝是一个好大喜功而又风流多情的皇帝，他即位后曾经花了十年时间，出动数十万军队，与匈奴进行了十多次战争，终于打败了匈奴的多次进攻，最后把匈奴残余部队赶到沙漠以北，远离了西汉边境。他在此时创设营妓制度，固然首先是为了适应军事斗争的需要，借此稳定军心，鼓舞士气。但同时也体现了他风流多情的性格，由己及人，他考虑到长期征战中军士的性欲要求之后，才创设了营妓制度。营妓多由女乐、寡妇、官奴婢、女俘及罪犯妻女来充当，其中除女乐和少数擅长歌舞伎艺的奴婢（或称为乐舞奴婢）能够提供献伎与呈身的

①《汉书·地理志》。 ②《万物原始》曰："至汉武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见《汉武外史》。" ③参见《越绝书》、《吴越春秋》。

双重服务以外，其他都只能给军士侍宿。或者更准确地说，她们主要是给军营中各级将官和部分士兵(如立功受奖者)侍宿，至于普通士兵,能够观看妓女的歌舞表演，就已经荣幸之至了。自汉武帝之后，营妓制度曾为数代君主所沿袭,历唐宋而不衰。

所谓私营方式，是指一些女子为生活所迫或其他目的而向多个男子卖淫的方式，这些女子相当于后世的私妓。中国私营妓女最早出现的时代当在官营妓女产生的同时或稍后，但其具体情况由于史籍失载已不可知。我们依据类似的史事来推测，可能在公元前六世纪已有私营卖淫业出现。如据《左传》记载，春秋时陈国有名寡妇叫夏姬，住在株林，她的丈夫夏御叔死后，陈灵公就让她的儿子夏征舒袭了大夫职。夏姬的美貌在当时是远近皆知的，而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三人又都与夏姬有私情。于是每当夏征舒离家上朝之后，他们君臣三人便经常轮流乘车到株林去同夏姬幽会。夏姬还把自己贴身的内衣分别给他们每人送了一件。谁知君臣三人竟无耻到穿着夏姬的内衣去上朝，并且在朝廷上互相戏谈夏姬的风情和夏征舒是谁的种子。大臣洩冶看不过眼，便当场劝谏他们君臣三人不应在朝廷上宣淫，要他们都把汗衫收起来。陈灵公因此怀恨在心，就纵容孔宁、仪行父杀死了洩冶。夏征舒知道后觉得受到了侮辱，又伺机泄愤，一气之下杀死了陈灵公。这样一来，夏征舒便犯了弑君之罪，于是楚国便以此为借口而兴兵讨伐，不仅消灭了陈国,杀死了夏征舒,而且还抢走了夏姬。夏姬来到楚国以后，楚庄王和子反也都想据为己有，申公巫臣便别有用心地说夏姬是不祥之人，劝他们要吸取陈国君臣的教训，才先后使得楚王

与子反罢了此念。接着楚王便把夏姬赐给了连尹襄老。襄老不久战死，他的儿子又占有了夏姬。申公巫臣一直对夏姬馋涎欲滴，最后设立计谋，终于从襄老的儿子手中夺得夏姬，并且带着夏姬一起叛离楚国，投奔了晋国。夏姬与陈楚君臣的关系，应属私通而非卖淫，但她在同一时期内与众男子杂交的行为方式，实与后代私妓相似。陈楚两国这么多君臣为夏姬所倾倒，乃至如痴如狂，这说明当时人们对淫于夏姬一事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那么，在夏姬所处的春秋时代，私营卖淫业已活跃于都市中，也是可能的。

从现有史料来看，到汉代，私妓业已出现，则是无疑的。她们之中有些艺术素养较好的妓女，不仅为工商军民提供性服务，而且还主动到一些王侯卿士、富豪贵族之家去送身送伎，上门服务。有的因得到主人宠爱而被收纳为家妓。甚至有的妓女经人介绍或转赠，还可以进入皇宫成为宫妓。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又载中山地区因地薄人众，许多女子为生活所迫，也携带乐器，四方奔走，"游媚权贵，入后宫，遍诸侯"。李延年和他的妹妹，本来都是中山地区出身的倡伎，由于李延年入宫后在汉武帝面前唱了一首歌颂他妹妹美貌的歌，汉武帝便把他妹妹招入宫中，封为李夫人。①

受皇帝和官僚贵族淫纵之风的影响，上流社会中也有一些

①《汉书》卷九十七。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不甘示弱、不甘寂寞的女子，她们想尽千方百计，千着人尽可夫、行同娼妓的勾当，甚至还有一些太后、皇后和公主也是如此。她们本身虽然不是娼妓，但她们的淫纵行为对于当时社会的影响甚大，这对于私妓的出现，无疑起到了间接的诱导作用，我们不妨也列举几个例子作为参考。如秦始皇的母亲，先与吕不韦淫乱，但还不满足，吕不韦便为她找到一个阳物硕大名叫嫪毐的男人，让他拔去须眉，冒充宦者而得侍太后。“太后私与通，绝爱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诈卜当避时，徙宫居雍。……生子二人，皆匿之”。① 赵飞燕本是阳阿公主的一名舞姬，成帝见而幸之，收她入宫为婕妤，后立为皇后。她入宫不久，便向成帝推荐，把她妹妹也召入宫中。后来赵飞燕失宠，想生个儿子以重新获得成帝的欢心，于是“便开一室，自左右侍婢以外莫得至者，上亦不得至焉，以辇车载轻薄少年，为女子服，入后宫日以十数，与之淫通，无时休息，有疲怠者‘辄差代之”。② 赵飞燕每日与男子性交的人数与次数之多，恐怕后世专以卖淫为业的娼妓也难以比拟。西晋惠帝时的贾皇后也是一位淫荡女性，据《晋书·惠贾皇后传》记载：

> 惠帝即位，立为皇后。……后遂荒淫放恣，与太医令陈据等乱彰内外。洛南有盗尉部小吏，端丽美容止，既给厮役，忽有非常衣服，众咸疑其窃盗，尉嫌而辨之。贾后疏亲欲求盗物，往听对辞。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妪，说家

①《史记·吕不韦列传》。　②《西京杂记》卷二。

有疾病，师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厌之，欲暂相烦，必有重报。于是随去，上车下帷，纳篦箱中。行可十余里，过六七门限，开箱篦，忽见楼阙好屋。问此是何处，云是天上，即以香汤见浴，好衣美食将入，见一妇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后有疵。见留数夕，共寝欢宴，临出赠此众物。”听者闻其形状，知是贾后，惭笑而去，尉亦解意。时他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爱之，得全而出。

贾后为追求刺激，看中谁美就拉谁共寝求欢，但又担心走漏风声会有损皇后声誉，便残酷地将伴寝男子害死以灭口，洛南小吏入而复出，是因为他的端丽美容深为皇后所爱不忍害之才幸免于难。刘宋时山阴公主不仅不甘寂寞，淫恣由己，而且敢于开诚布公地向男人挑战。一天，她对前废帝刘子业说：“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而妾惟驸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为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赐给鼓吹乐一部，加剑班二十人。并允许她陪同帝兄接见朝臣，有一次公主因看中吏部郎褚渊貌美，就向刘子业请求允许让褚渊为她侍寝，帝许之。“渊侍主十日，备见逼迫，誓死不回，遂得免。”①

当然，象赵飞燕、贾皇后和山阴公主这种肆无忌惮的滥交行为，仍然只是形式上类似娼妓，而在实质上却同于嫖客。因而她们和夏姬一样，也不能称为私妓。但通过对这类现象的分

①《宋书·前废帝纪》。

析，则可窥见当时社会淫纵风习之一斑，因而从汉代以来才会有许多赵女郑姬、中山美女四方奔走，主动卖身卖艺。至六朝时，江南一带私妓已比较活跃，这从《玉台新咏》和《乐府诗集》中保存下来的诗歌中可以窥其端倪，试举数例如下：

夜来冒霜雪，晨去履风波。虽得叙微情，奈侬身苦何？（《夜度娘》）

鸡亭故人去，九里新人还。送一却迎两，无有暂时闲。（《浔阳乐》）

生长石城下，开窗对城楼，城中诸少年，出入见侬投。（《石城乐》）

朝发襄阳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诸女儿，花艳惊郎目。（《襄阳乐》）

这些女子有的是倚门迎客，有的则是送身上门，她们为了生存不得不送一迎两或冒风履雪，从“奈侬身苦何”的感叹中已经透露出当时私妓生活的悲惨凄凉。六朝私妓中我们现在知道姓名的名妓只有二位，一位是刘宋时的姚玉京，一位是南齐苏小小。姚玉京从小随母为娼，颇有艳名，后来嫁给一位名叫卫敬渝的小吏。南齐苏小小成为名妓，不仅仅因为她色艺兼优，还由于她会挥毫作诗，现存的《苏小小歌》，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出自妓女之手的诗歌，其诗曰：“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这正是她作为私妓的生活写照，当时出入于私妓之门的男子，除了上面诗中所说的“城

中诸少年”之外，当主要是商人。据释宝月《估客乐》二诗说：

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拔侬头上钗，与郎资路用。有信数寄书，无信心相忆。莫作瓶落井，一去无消息。

大艑珂峨头，何处发扬州。借问艑上郎，见侬所欢不？初发扬州时，船出平津泊。五两如竹林，何处相寻博。

从诗中女子的口气中可以看出她们是妓女，她们所送和所问的郎当是一位商人无疑。当然，留宿娼家的也有上流社会人士，例如据梁简文帝《乌栖曲》曰：

青牛丹毂七香车，可怜今夜宿娼家。娼家高树乌欲栖，罗帷翠被任君低。

既然皇帝也宿娼家，那么官僚贵族中自然也多有乐于此道者，不过，他们往往是招妓上门侍宿，所以上引诗中那位夜度娘才夜来晨去。

南朝沈约有一首《早行逢故人车中为赠》诗曰：“残朱犹暧暧，余粉尚霏霏。昨宵何处宿，今晨拂露归？”诗中所写的这位女子显然是一位送身上门的私妓，昨晚出门陪人过夜，今晨踩着露水归来，无疑是为了避人耳目。但沈约既然称她为故人，看来，他俩之间也曾有过浪漫的交往。

根据现存史籍来看，自春秋至南北朝时期，虽然已经产生了面向社会各阶层人士服务的商业性卖淫业，但由于这个历史

时期，商业经济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市民队伍尚未形成规模，都市文化发展缓慢，因而这时的商业性卖淫现象还不普遍，也缺少连续性，并未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它的发展尚有待于城市经济、文化发展繁荣的时代到来。

1·4 巫娼、宗教卖淫：中西妓女起源比较

最早对中国妓女做系统研究的，是王书奴先生。他曾于半个多世纪以前在其所编著的《中国娼妓史》一书中断定，中国娼妓起源于殷商的女巫，并且把那个时代称为“巫娼时代”。[①]此后不少论者便信以为真，人云亦云。但实际上，这个结论几乎是在没有一条切实可信的材料的情况下，通过类比推理所得出的，其真实性就不能不令人怀疑了。

巫作为人和神之间的使者，早在原始时代就出现了。这类使者男女都可以充当，女的叫巫，男的叫觋。他们的职责是装扮成神，且歌且舞，既代人向神秉告世俗的意愿，又代神向人传达神明的意旨。至夏商时代，这种原始宗教的祭祀活动仍然盛行不衰。王氏的立论正是从女巫善歌舞同后世娼妓相似这一点出发的，但他却忽略了后世女子为娼的根本原因并非为善歌舞，而是为经济或政治所迫。而夏商的巫则是一种官职，与史

①王书奴《中国娼妓史》于1934年11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笔者本书所引王书奴语均据1988年2月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影印本。

官并列。“记人事曰史，事鬼神曰巫。古人主祭祀，教鬼神，故史巫二职并重于时。”① 作为巫者，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当时都是有较高地位的人；那么，女巫自不必靠卖淫来生存，更何况古人本是崇拜鬼神才迷信巫术的，一般男子又岂敢去亵渎鬼神的使者呢？退一步说，进入一夫一妻制社会以后，女巫即使有婚姻（关于夏商时代女巫的婚姻状况已茫昧难知，姑且作此假设）之外的性行为，也与后世娼妓以卖淫来求生存性质不同。

王氏之论，不仅在出发点上存在偏误，而且他在论证时全凭采用“以彼例此”、“以后证前”、“以西类中”的类比推理也是不可靠的，甚至他在做类比论证时所使用的有些论据也是站不住脚的。试驳述如下：

所谓“以彼例此”，是指王氏拿楚辞中描写的女巫来类比殷商女巫。他说：“楚既有如此妙丽女巫，以彼例此，殷代女巫之艳绝人寰，可以想象。所以殷代之有巫娼，已成为不可磨灭的事实。”首先，他为说明楚国女巫为娼所采用的论据是不可靠的。他摘引了屈原《九歌》中的三段歌辞以及王国维对这三段歌辞的解释，前二段用以说明楚巫的“衣服之丽”和“歌舞之盛”，可以撇开不谈，后一段是《少司命》中的四句：

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①江琼《读子卮言》。

王国维理解为“乘风载云之词，生别新知之语，荒淫之意也。”且不说王国维的解释是在《九歌》中寻求所谓讽谕意义，有牵强附会之嫌，即使承认其中写的神人间的恋情是所谓“荒淫之意”，那被恋的女方也不一定是女巫；即使是女巫，也与卖淫为娼性质迥异。① 其次，历史发展到周代以后，便出现了史盛而巫衰的趋势，所以《礼记·表记》说：“周人尊礼尚施，事鬼神而远之。”至孔子则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江琼在《读子卮言》中说得更明白：“迄于后世，知识日增，知鬼神之事渺茫无凭，不如人事之为重，于是史盛而巫衰，一切官职均已以史为之，寖假以史而夺巫之席，而巫则或以妇女充之。是仅以巫为治病求福之用，不足与史相颉颃。洎于周末，巫之道亦几乎息矣。”巫至春秋战国时代，其政治、经济地位已一跌千丈，那么，即使王书奴先生能够举出楚国女巫为娼的证据，也不能据此类比推断殷商女巫必定为娼。

王氏所谓“以后证前”，也与“以彼例此”的方法一样，不仅不能证明妓女起源于巫娼，而且他在“以后证前”时所使用的材料与他所要论证的观点也是不统一的。他先叙列了后世苗俗的跳月会和峒溪的浪花歌会，接着又举出《诗经》中所写的郑国溱洧之会和《史记》中所载的齐国州闾之会，而实际上这些材料所记录的都是有关民间青年男女恋爱的一种风俗，与当代的青年团、妇联或婚姻介绍所为未婚青年所主办的舞会等

①关于《少司命》一篇的性质，说者纷纭，莫衷一是，这里不加论列，只就其内容大体言之。

活动差不多。尽管在这样的活动中，有些女性可能会因一见钟情等原因当晚就献身于某个男子，但她们既不是女巫，更不是娼妓，与殷商巫娼之说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依据这些材料又怎么能够“以后证前”呢？

所谓“以西类中”，是指王氏根据西方有一类妓女是起源于宗教卖淫的历史事实，便依此类推，认定中国妓女也必定起源于最早从事宗教活动的女巫。当然，他在行文时，这一论证是放在最前面的，为了便于我在对他的观点提出质疑的同时，也比较分析一下中西妓女的起源，故特地移后讨论。

根据历史学家和宗教史专家的研究，许多古老的民族和国家在从野蛮社会跨入文明社会的进程中，一般都产生过一种带有巫术色彩的原始宗教，它往往是由自然崇拜、图腾崇拜与灵魂崇拜，渐而发展为多神与统一至上神的崇拜。在这一点上，地处地中海沿岸的一些文明古国如巴比伦、亚述、古埃及、古希腊等都是如此，地处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国也是如此。但是并非所有产生过巫术一类原始宗教的文明古国就必定会产生宗教卖淫，例如古埃及的妓女就不是起源于宗教卖淫，而是起源于女奴。所以，希腊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说：“埃及人又第一个在宗教上作出规定，在神殿的区域内不得与妇人交媾，而在交媾后如不沐浴，也不得进入神殿的区域之内。”有了这个前提，就不致使人误以为中国殷商时代因为有女巫就必定有宗教卖淫。

这里，我们有必要先介绍一下西方宗教卖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巴比伦等古国初民看来，神跟人一样，不但需要饮食，

而且需要声色。因此，人们在崇拜神的活动中，除了向神敬献酒食牺牲和表演歌舞伎艺之外，还要向神献身。苏联著名学者约·阿·克雷维列夫在《宗教史》一书中写道："信徒想要跟神接近，这种愿望在古代宗教中专门表现为神娼的卖淫，表现为由于崇拜而引起的性欲狂。在巴比伦的神庙里，有大量的辅祭女巫供职。她们的职务相当繁复，而大都要在性欲上为朝拜者服务。这被视为一种圣礼，卖淫一词在这里是名符其实的，因为女巫的服务得到支持，收入归神庙所有。"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还谈到巴比伦宗教献身的另一种形式："这就是生在那里的每一个妇女在她的一生之中必须有一次到阿普洛狄铁的神殿的圣域内去坐在那里，并在那里和一个不相识的男子交媾。……这里总是有大群来来往往的妇女。在妇女中间，四面八方都有用绳子拦出来的通路，而不相识的人们便沿着这些通路行走来作他们的选择。一经选好了位子的妇女在一个不相识的人把一只钱币抛向她的膝头并和她在神殿外面交媾之前，她是不能离开自己的位置的。……妇女对这件事是不能拒绝的，否则便违反了神的律条。因为一旦用这样的方式抛出去的钱币便是神圣的了。当她和他交媾完毕，因而在女神面前完成了任务以后，她便回家去……因此，那些硕长的美貌妇女很快便可以回去，但是那些丑陋的必须要等很长的一个时候才能够履行神圣的规定。有些人不得不在神殿的圣域内等上三、四年。"

这种规定和行为，在当时是极为神圣的，无论是神娼与朝拜者性交，还是女信徒向陌生男子卖淫，"作为圣礼的性行为是互相以神为对象的。性行为的目的就是要跟神相结合。施特

恩堡把性交仪式叫做跟神结婚。如果某个神庙里有一批神娼供职，那就认为这个神跟地上的帝王一样，拥有一群妃嫔姬妾。信徒觉得，他在跟神性交时，使神得到快感，从而博得他的欢心。这一来，就完成了崇拜的一项重要任务”。① 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巴比伦等古国有一类神风流浪漫，追求性的快乐；二是那些神娼与信徒的性行为是为了让神得到快感和让神庙增加收入，而不是为了自己。

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和习俗，巴比伦的这种宗教式献身，过了近千年之后还在古希腊城邦流行。据希罗多德《历史》记载，在希波战争前后，希腊及其周围地区还有女性去神庙献身一次的风气。阿普洛狄铁神庙中的女祭司，一般专营卖淫，有的纯属宗教献身，有的则收费献给神庙。

关于巴比伦与古希腊等古国有一类神风流好色，以及女祭司、女信徒的宗教式献身的事实，不仅有可靠的史籍如希罗多德的《历史》和《圣经》中的《旧约全书》记载下来，而且还反映在他们的建筑、神话和文学艺术之中。例如，在古代巴比伦城中就曾建有一座巨塔，高高供奉着神与祭司性交的偶象。② 在古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就是一位风流天神，尽管他拥有七个妻子和一大群形形色色的天神女子，却仍不满足，他还经常到外面去寻花觅柳，著名美女海伦就是他的风流行为的“果实”，后来由于海伦，而引发了著名的特洛伊战争。著名女神阿普洛

①苏联约·阿·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王先睿等译。 ②参见潘绥铭《神秘的圣火》，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狄铁也是宙斯同女神狄俄涅生下的女儿，她原是掌管性交之神，后来又兼任爱神与美神。她的女祭司都住在神庙里，以卖淫来替女神服役。至罗马帝国时代，人们把阿普洛狄铁与原来的农业女神维纳斯融合在一起而称为维纳斯，使她不但是爱神和美神，更是民族之母、婚姻保护神和妓女保护神。妻子们在四月一日庆祝维纳斯节，妓女们则在四月二十三日庆祝。至于西方文学艺术中表现神的风流韵事和宗教卖淫的习俗，我们从西方最早的作品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戏剧中都可找到例证，恕不一一胪列。

那么中国的情况如何呢？首先，中国虽然存在过一类近似于巴比伦、古希腊女祭司的女巫，但在中国的历史和宗教典籍中找不到一条关于殷商女巫卖淫的材料。王书奴唯一的依据是伪古文《尚书·伊训》中的一段话："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训于蒙士。"姑且不说《伊训》篇是否可靠，即使从这段话的本义看，也根本找不到女巫为娼的蛛丝马迹。《书经集注》曰："巫风者，常歌常舞，若巫觋然也。"可见所谓巫风是指一种沉醉于歌舞的时风，如巫觋祭祀时且歌且舞一样。况且，《伊训》篇是把巫风、淫风、乱风并为三风而提，从而可证所谓巫风并无淫乱之意，所谓女巫为娼，"百僚狎昵巫娼"，更是无从说起。

其次，中国虽然也象巴比伦、古希腊一样有许多神话传说

流播后世，但是中国古代的神在性方面大都持身严谨，即使是正当的私生活，在神话传说中也表现得简约、朦胧、轻描淡写。中国至殷商时代也已产生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天神——上帝（或称天帝），它虽然神力最大，权威最高，但其形象非常抽象，人们并不知道它是否有七情六欲。中国也有一批女神，如羲和、女娲、西王母、嫦娥等，关于她们的故事与职责多是与生育、长寿有关。也有涉及婚姻的，如“月老”被尊为主管男女婚姻之神，女娲也有人把她尊为媒神，但她们自己并不追求性的快乐。在众神中，最风流的当推河神冯夷、射神羿和巫山神女瑶姬。冯夷落水溺死，天帝封他为河伯。河伯本有雒嫔宓妃为妻，却每年还要从民间娶一个童女为妾，否则他就要大兴水祸，淹没田土人畜。① 射神羿不仅纵情于田猎、酒浆，而且还曾用箭射伤了河伯的左目，抢占了他的妻子宓妃。② 瑶姬本是炎帝的女儿，死后葬于巫山之阳，“楚怀王游于高唐，昼寝，梦见与神遇，自称是巫山之女，王因幸之。遂为置观于巫山之南，号为朝云。后至襄王，复游高唐”。③ 河伯、羿和瑶姬的风流韵事已带有追求性快乐的色彩，但他们并不要求女巫或信徒为之献身。

再次，在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中，虽然不乏描写男女性爱的作品如《诗经》、《楚辞》等，但却找不到一篇有描写殷商女巫卖淫为娼生活的作品。

由以上论述可知，王书奴先生关于中国妓女起源于殷商女

①《史记·滑稽列传》。 ②《楚辞·天问》。 ③宋玉《高唐赋》注引《襄阳耆旧传》。

巫之说，仅仅是一种猜测，他所大肆渲染的巫娼时代，也不过是建立在猜测基础之上的一种虚拟罢了，在历史上是根本不存在的。

当然，话得说回来，尽管中国古代历史上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巫娼时代，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妓女的起源与西方就毫无共通之处。因为西方妓女的起源也是多元的，除了上述一类是起源于宗教卖淫之外，还有一类妓女也是起源于奴隶娼妓。大约从公元前八世纪起，希腊人开始向海外殖民，外族女俘虏就不断地被带回希腊，一些男子把她们作为奴隶买回家中服役，并随时可以占有、享用她们。公元前六世纪，梭伦在雅典创立了第一所国家经营的公共妓院，妓女多是由女奴隶充当的，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筹集战争经费。此后，公共娼妓制不仅在希腊各地迅速发展，而且由于男性自由民的喜好等原因，使一些妓女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尤其是其中有一类色艺超群的称为“黑特拉”的高级妓女，许多男性自由民和一些有身份的贵族男子都把她们当作宝贵的商品来狂热崇拜，甚至亚历山大也蓄养了高级妓女泰依斯等。在当时，希腊社会并不把妓女看作罪恶，男子嫖妓不仅无人责备，甚至被作为一种乐事和美德，所以古希腊雄辩家德谟斯特尼斯曾说：“男人们拥有黑特拉是为了浪漫的爱情享受，拥有女奴是为了日常随时可用，而拥有与自己同一社会阶层（自由民）的妻子，则是为了生孩子和充当忠实的家内主妇。”① 这与中国古代妓女起源于女奴隶以及皇帝收纳宫妓、官僚贵族蓄养家妓、管仲设女闾等形式，大体上是相通的。

①转引自潘绥铭《神秘的圣火》第208页。

最后，笔者还想补充说明一点，中国妓女的起源虽然与原始宗教没有关联，但中国妓女的发展却与后世的宗教有一定的联系。从总的倾向上来说，中国的宗教对男女两性关系多持抑制态度，但在特定的领域或特定的历史时期也持宽容态度。如中国的佛教，对男女关系本来是持禁欲态度的，但僧尼纵欲之事，见于记载的也不少。晚明时期，更有和尚娶妻蓄妾狎妓的，他们宣称什么“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公然纵欲享乐。这可能是受了晚明纵欲时风的影响，但他们的口号和行为又反过来为晚明的纵欲思潮推波助澜，从而使晚明市妓的发展达到巅峰状态。中国道教的主旨是追求养生、长寿，飞升成仙是最高境界。然而道教徒却极力倡导房中术，① 实际上为男人蓄妾嫖妓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进一步助长了统治阶级的纵欲享乐，同时也就促进了妓女的发展。另外，后世的宗教寺庙往往成了一部分妓女的归宿之地，而身在寺庙中的女尼、女冠，在获得衣食暖饱之后仍然有性的需求，她们或与众和尚、道士在寺庙中为云为雨，或穿街过市，走村入户，投入世俗男子的怀抱，其行为实与娼妓无异。既然如此，后世女巫有淫乱行为甚至卖淫为娼也就不足为据了。例如《晋书·夏统传》就记载了女巫章丹、陈珠二人在夏统家祭祀先人时，与夏统的从兄弟等人“纵奢淫之行，乱男女之礼，破贞高之节”的个案，但这时的女巫只不过是一些从事医术和迷信活动的女子，其地位与百姓

① 房中术实际上在汉代就已有方士倡导，魏晋以后道教徒也倡此道。

差不多，与殷商时代巫史二官并重于世相比，已有天壤之别。况且，章丹、陈珠的淫纵行为并非出于宗教热情，不是为了娱神，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因此，仅凭援引后世女巫淫乱和卖淫为娼的事例，是不能证明中国妓女起源于殷商女巫的，更不能据此而虚拟出一个所谓的“巫娼时代”。

第 二 章

早期妓女生活概况

2·1 妓女的来源

如上所述，中国妓女的产生与发展，可谓源远流长。中国妓女的类型、层次及其相应的数量与规模也反映出她们在性服务上的等级色彩。那么，她们是由哪些女子来充当的呢？由于妓女的动机不同、狎客的地位不同、狎妓的方式不同，以及其他方面如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原因不同，便使得妓女的来源也颇为复杂。简单地说，她们主要来源于社会上的三个阶层。

首先，早期妓女中的多数是来源于女奴隶以及近似奴隶的女俘、罪犯妻子、故倡等。这些女子社会地位极低，没有人身自由，她们大多是被迫充作妓女的。

尽管历史学家对于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划分有所谓西周封建说、春秋战国之交封建说、魏晋封建说等分歧，但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上仍然存在奴隶这个阶层则是确定无疑

的。奴隶中的男子主要从事生产劳动，女子则主要充当奴婢，从事服务性工作。在宫廷或官府服役的称官奴婢，在私人家中服役的称私奴婢。夏商时代是奴隶制形成与发展的时期，奴隶的主要来源是战争中的俘虏。甲骨文中已有许多关于“俘人”、“获羌”的记载，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作为生产奴隶，因工种的不同而分别称为“众”、“众人”、“羌”、“多羌”（以上为从事农业的奴隶）、“工”（从事手工业的奴隶）、“刍”、“羌刍”、“牧”（以上为从事畜牧业的奴隶）等，还有一类在帝王宫廷中或奴隶主家中服役，被称为“臣”、“妾”、“婢”、“奚”、“仆”等，他们中有多数是女奴。中国最早的妓女例如夏桀王、商纣王所占有的女乐、倡优就是由她们中的佼佼者来充当的。西周、春秋、战国时代，奴隶制开始由盛转衰，随着农民和工商自由民的逐渐增多，奴隶在全社会中的比例也逐渐下降，但奴隶（尤其是从事服务性工作的奴婢）的绝对数量仍然相当可观。如周朝天子宫中就拥有女春、女槁、女饎、女酒、女浆、女笾、女醢、女府、女史等奴婢近千人。① 春秋战国时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② 如春秋时齐襄公有“九妃六嫔，陈妾数千”，③ 卫国大夫公良桓子家中“妇女衣文绣者数百人”，④ 赵国平原君家中的婢妾也是以百数。⑤ 这时的奴隶，一部分仍然来源于战俘；⑥ 一部分是将男女罪犯及其家属罚作奴隶；⑦

①参见《周礼》中《地官》、《天官》等篇。 ②《墨子·辞过篇》。③《管子·小匡篇》。 ④《墨子·贵义》。 ⑤《史记·平原君列传》。⑥参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⑦参见《吕氏春秋·精通篇》。

一部分是世袭奴隶，尤其是象工妾、女乐、娼优这类具有一定技艺修养而专供贵族享乐的女奴，多为奴隶的子孙充当；还有一部分则是来源于破产的农民或城市自由民。在这个时期，奴隶已有一种称为“丹书”的奴籍。① 奴隶如果立了功，也可以焚烧“丹书”，免除奴隶身份，甚至还可以赎免自己的家属。②

至秦汉时代，仍有不少的官奴婢与私奴婢存在。尽管刘邦曾于公元前202年下令，凡由于饥饿而自卖为奴婢的，可以免为庶人，但在景帝时仍有三万官奴婢为之养马。③ 武帝时奴婢更多，他还下令，凡向国家交纳奴婢的可以终身免除徭役，④各级官府也都有相当数量的奴婢，有的多达几千人。成帝时“诸官奴十万余人”。⑤ 王莽新政时“没入为官奴婢，……以十万数”。⑥ 至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为了收买民心，先后六次下令释放奴婢，官奴婢的数量才逐渐减少。汉代官奴婢主要是来源于罪犯及其家属和奴产子，他们较少从事生产劳动，而主要充当宫廷或官府侍役。关于汉代官奴婢的服役情形，清人俞正燮根据《汉旧仪》等史籍综合说：“给使、尚书、侍中，皆使官婢。宫殿中宦者署、郎署，皆官奴婢。其法：给尚书郎女侍史二人，皆选端正者从直，女侍史直止车门执香炉烧熏，从入台，护衣，事同妓妾而无常夫。”⑦ 至于汉代的私奴婢，其总数至少也有十余万人，私奴婢的占有者主要是官僚贵族、商贾地主

①参见《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②参见《云梦秦简释文》（二）。载《文物》1976年第7期。 ③参见翦伯赞《秦汉史》。 ④《汉书·食货志》。 ⑤《汉书·贡禹传》。 ⑥《汉书·王莽传》。 ⑦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二。

等。如西汉时张良有家僮三百余人，陆贾有奴婢百人，金王孙有奴婢三百人，卓王孙有僮客八百人，程郑有奴婢数百人，张安世有家僮七百人，栾大、王商及王氏五侯等各拥有私奴婢上千人。对于这种私人广蓄奴婢的风气，西汉末年哀帝曾拟议加以限制："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① 但至东汉时蓄养私奴婢超过二百乃至上千者仍不乏其人，如窦融祖孙奴婢以千数，马防兄弟奴婢各千人以上，清河孝王刘庆奴婢三百人，东平宪王刘苍奴婢五百人，济南安王刘康奴婢多至一千四百人，而梁冀"取良人悉为奴婢至数千人，名曰自卖人"。汉代私奴婢的主要来源是贫穷人民的子女（包括自卖与掠卖）和奴产子，还有一个来源便是皇帝赏赐的官奴婢。当然，私奴婢被没入官或被献纳入官也是官奴婢的来源之一。汉代的私奴婢也较少从事生产劳动，他们主要是作为官僚贵族、商贾地主的娱乐工具和供家庭服役而存在。他们之中的女子除了一部分要做一些家内劳动以外，其他则多被打扮起来，填乎绮室，列乎深堂，或专供侍寝，或既献身也歌舞。如《汉书·杨恽传》中所说的"奴婢歌者数人"，显然都是杨恽的家妓。

魏晋南北时期仍有奴隶制的残余遗留下来，所谓"耕当问奴，织当问婢"，② 就是指的这种情况，如三国时蜀国糜竺有"僮客万人"，李严有"奴婢宾客百数十人"，西晋石崇"苍头八百余人"，王戎"家僮数百"，荀晞"奴婢近千人"，东

①《汉书·食货志》。　②《宋书·沈庆之传》。

晋陶侃“家僮千余”，陶淡“僮客百数”，刁逵“奴婢数千人”；南朝刘宋时刘义康“私置僮部（僮仆、部曲）六千余人”，沈庆之“奴僮千计”，谢混“僮仆千人”；萧梁时裴之横“僮属数百人”；北魏元禧“奴婢千数”，元雍“僮仆六千”；北齐时私奴婢仍然甚多。直至北周武帝于公元577年下诏释放官私奴婢以后，奴婢数量才有所减少，但奴隶制的残余仍然或多或少地遗留于唐宋元明清各代。

另外，这个时期所设立的乐户、营户，其身份也近似乎奴隶。乐户是指女乐、倡优等歌舞艺人的户籍，他们被认为身份低贱，不属于良民。乐户中的女子就是妓女。乐户的来源主要是世袭乐户和没籍为乐户两种。《魏书·刑法志》曰：“诸强盗杀人者，首从皆斩，妻子同籍，配为乐户。其不杀人及赃不满五匹，魁首斩，从者死，妻子亦为乐户。”凡乐户“皆用赤纸为籍，其卷以铅为轴”，一旦沦为乐户，就得世代相袭。这类乐家子弟在汉代称为“故倡”，如李延年和他的妹妹就是故倡出身。营户是指十六国、东晋、南北朝时期各国在战争中所俘虏、所征服的民户，他们被配置各地，归军队管辖，其身份低于平民，没有人身自由，男子从事生产劳动，产品充作军队给养，女子则在军中服役，如刘宋后废帝刘昱常“与右卫翼辇营女子私通”；① 齐郁林王萧昭业在西州时，“每夜辄开后堂，与诸不逞小人，至营署中淫宴”。② 这些营户女子的生涯，几乎与汉代营妓差不多。北朝还设立了一种杂户，其中包

①《宋书·后废帝纪》。　②《南史·齐郁林王纪》。

括隶户、营户等，他们的女子也经常分派服役，如据《北齐书·后主纪》载："武平七年二月，括杂户女年二十以下、十四以上未嫁者，悉集省。隐匿者，家长处死刑。"

其次，早期妓女中的一部分是来源于平民之家的妻子或寡妇。这些女子虽然社会地位不高，但都享有人身自由。她们中有的是由于经济的或政治的原因而被迫为妓，有的则是为追求华侈享乐而自愿献身的。例如秦始皇曾发女子无夫家者一万五千人输入尉佗军中服役，① 魏明帝"录夺士女前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既听以生口自赎，又简选有姿色者，纳之后庭"。② 这些女子的呈身服役，则皆为政治逼迫所致。而《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载的赵女郑姬，都是平民女子，她们为奔富厚而不辞远近，不择老少，则完全是自愿追求华侈享乐了。还有历朝人数众多的宫女（宫妓也是宫女的一部分），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从平民女子中选出而纳入宫中的。据《后汉书·后纪》载："汉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择视可否，乃用登御。"自汉以后，从民间选良家女子入宫已成为一种制度。这些入选的良家女子，既有自愿者，也有被迫者。如汉元帝选美时，竟有许多人贿赂中大夫以求入选，这些女子当是自愿者无疑。又何皇后，"家本屠者"，不在被选之列，靠金帛贿赂才得以入宫。③ 但其中也有

①《史记·淮南衡山列传》。②《三国志·明帝纪》注引《魏略》。③《后汉书·何皇后传》。

许多女子是被迫入宫的。如薛灵云本是常山贫家女子，一旦被魏文帝选中，“灵云闻别父母，觇覘累日，泪上沾衣，至升车就路之时，以玉唾壶承泪，壶则红色，既发常山，及至京师，壶中泪凝如血”。① 又胡芳于晋武帝泰始九年被选入宫时，竟“下殿号泣”，左右止之曰：“陛下闻声！”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② 尽管薛灵云、胡芳后来都被封为贵人，很受宠爱，但她们在入宫时也与许多普通宫女一样，的确是不情愿的。

再次，早期妓女中还有一部分是来源于贵族女子。这主要是就宫妓而言。作为官僚贵族，如果能把女儿送入宫中求得皇帝的宠幸，那么，整个家族便可以攀着这根裙带往上爬。如东汉梁竦一家四代中就有四位女子入宫，其中两位女子做了章帝的贵人，两位女子分别成为了顺帝、桓帝的皇后，梁氏家族不仅被升官赐爵，而且后来控制朝政达几十年。这类女子当然是自愿入宫的。但并不是每一位贵族女子入宫后都能获得皇帝的宠爱，如魏废帝曹芳“每见九亲妇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清商”，③ 清商是指由女乐组成的清商署，这些贵族女子充其量不过做女乐罢了。因而有些贵族女子并不情愿入宫。如晋武帝司马炎曾明确下诏要选公卿以下子女入宫，公元273年秋冬“采择卿校诸葛冲等女五十余人，入朝简选，又取小将吏女数十人，母子号哭于宫中，声闻于外”。④ 其中包括司徒李胤、镇军大将军胡

①《拾遗记》卷七。　②《晋书·胡贵嫔传》。　③《魏志·齐王芳纪》。　④《晋书·五行志》。

奋、廷尉诸葛冲、太仆臧叔、侍中冯荪、秘书郎左思及其他官僚贵族的女儿，还有司、冀、兖、豫四州三千石将吏家的女儿。选美的诏书下达后，“名家盛族子女，多败衣瘁貌以避之”。① 从不少名家盛族女子避之唯恐不及的心态看来，那些入选的贵族女子中也有不少是被迫入宫的，所以才有“母子号哭于宫中，声闻于外”的场面出现。当然，以上所提到的贵族女子入宫之后，只有被齐王芳所看中而留在清商署的女子可以确称为宫妓，其他女子则都只能以宫娥概之。她们中有的可能会被封为皇后、妃子、贵人而并不一定会充当宫妓，但仅就入宫时的心态而言，无论以后是宫妓，还是贵人，都是一致的。因此，通过分析这类贵人入宫时的心态，也有助于我们把握宫妓入宫时的心态与情境。

2·2 妓女的条件与职责

中国的等级制度几乎是无孔不入的，以致生活在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无不烙上深深的印痕。本来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中国妓女，也由于狎妓者的地位与需求不同，而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中就初步形成了高级妓女、一般妓女和低级妓女的等级区分，因而与此相适应的妓女的条件与职责便也各不相同。

所谓高级妓女，是指那些色艺超群、风度迷人的名妓，史

①《晋书·武元皇后传》。

籍上所记载的女乐、倡优、歌舞姬人大多属于这个等级。她们除了天生丽质以外，往往还受过良好的文化教养和严格的艺术训练。当然，这种文化教养和艺术训练有的是在充当妓女之前就已经在家中亲友或老师的指教下业满功成，待价而沽了，一旦有机会获得风流重色而又知音识才的皇帝或官僚贵族的赏识，她们便有可能一举成名，如汉武帝时的李夫人等就是这种情况。但对于她们学习歌舞的情况，史籍失载，我们不妨举西汉歌舞姬王翁须的经历为例：

翁须八、九岁时，寄居广望节侯子刘仲卿宅，仲卿谓乃始（翁须父）曰："予我翁须，自养长之。"媪（翁须母）为翁须作缣单衣，送仲卿家。仲卿教翁须歌舞，往来归取冬夏衣。居四五岁，翁须来言："邯郸贾长儿求歌舞者，仲卿欲以我与之。"媪即与翁须逃走，之平乡。仲卿载乃始共求媪，媪惶急，将翁须归，曰："儿居君家，非受一钱也，奈何欲予它人？"仲卿诈曰："不也。"后数日，翁须乘长儿车马过门，呼曰："我果见行，当之柳宿。"媪与乃始之柳宿，见翁须相对涕泣，谓曰："我欲为汝自言。"翁须曰："母置之，何家不可以居？自言无益也。"媪与乃始还求钱用，随逐至中上卢奴，见翁须与歌舞等比五人同处，媪与翁须共宿。明日，乃始留视翁须，媪还求钱，欲随至邯郸。媪归，粟买未具，乃始来归曰："翁须已去，我无钱用随也。"……"太子舍人侯明从长安来求歌舞者，请翁须等五人。长儿使递（歌舞教师）送至

长安，皆入太子家。（《汉书》卷九十七）

王翁须后来虽然被宣帝追谥为悼后（翁须是宣帝生母），但她入宫时不过是作为一名歌舞姬被买进太子之家的。从翁须学艺生涯来看，培训一个歌舞妓最好是从幼年开始，并且必须在艺师的指导之下经过多年的学习、训练，才能学有所成。

还有一类高级妓女的文化教养和艺术训练则是在成为一般妓女之后才补修深造的，尔后随着伎艺的提高才逐渐成名。如汉代的赵飞燕，起初本为长安宫人，后来被赐给阳阿公主充作歌舞姬时才严格进行歌舞训练。她最擅长的一种著名的“禹步”舞，就是在这时才掌握的。汉成帝微行至阳阿公主家，观看了赵飞燕的歌舞表演，非常喜欢，便把她召入宫中，倍施宠爱。还有的则是在成为家妓之后由家长亲自指导训练、补修深造的，这可举石崇训练翔风等妓女为例：

石季伦爱婢名翔风，魏末于胡中得之，年始十岁，使房内养之。至十五，无有比其容貌，特以姿态见美。妙别玉声，巧观金色。……崇常择美姿容相类者十人，装饰衣服大小一等，使忽视不相分别，常侍于侧。使翔风调玉以付工人，为倒龙之珮，紫金为凤冠之钗，言刻玉为倒龙之势，铸金钗象凤凰之冠，结袖绕檀而舞，昼夜相接，谓之“恒舞”。欲有所召，不呼姓名，悉听珮声，视钗色，玉声轻者居前，金色艳者居后，以为行次而进也。使数十人各含异香，行而语笑，则口气从风而飏。又屑沉水之香，如尘末，布象

床上，使所爱者践之，无迹者赐以真珠百琲，有迹者节其饮食，令身轻弱。故闺中相戏曰："尔非细骨轻躯，那得百琲珍珠。"（王嘉《拾遗记》卷九）

翔风等从十来岁就开始在石崇的亲自指导下学习歌舞，石崇为了提高众妓女的伎艺水平，一方面加强她们的基本功训练，一方面也重视她们的身材、舞姿的修炼，并且是通过重奖的刺激来促进和实现的。

早期高级妓女的艺术表演以歌舞为主。先秦女乐主要在一些礼仪活动中表演雅乐舞，有时在适当的场合也可以表演带有民间色彩的郑声郑舞。至汉魏六朝，则以表演俗乐舞为主，如西汉傅毅的《舞赋》就很生动细致地描写了当时宫廷夜宴的大型歌舞表演，开场是十六名女乐表演歌唱：

于是，郑女出进，二八徐侍，姣服极丽，妙媚致态。貌嫽妙以妖蛊兮，红颜晔其扬华，眉连娟以增绕兮，目流睇而横波。珠翠的皪而照耀兮，华褂飞髾而杂纤罗。顾形影自整装，顺微风挥若芳。动朱唇纡清扬，亢音高歌为乐之方。歌曰：……

这是夜宴歌舞的第一个节目。紧接着为女子独舞和女子群舞：

于是蹑节鼓陈，舒意自广。游心无限，远思长想。其始兴也，若俯若仰，若来若往，雍容惆怅，不可为象。其

少进也，若翔若行，若竦若倾，兀动赴度，指顾应声。罗衣从风，长袖交横，骆驿飞散，飒遝合并。翩翾燕居，拉揸鹘惊。绰约闲靡，机迅体轻，资绝伦之妙态，怀惵素之洁清。修仪操以显志兮，独驰思乎杳冥，在山峨峨，在水汤汤，与志迁化，容不虚生。明诗表指，喷息激昂，气若浮云，志若秋霜。观者增叹，诸工莫当。（以上描写一位女子的独舞。）于是合场递进，接次而俟。坿材角妙，夸容乃理。轶态横出，瑰姿诡起。眄般鼓则腾清眸，吐哇咬则发皓齿。摘齐行列，经营切儗。仿佛神动，回翔竦峙。击不致策，蹈不顿趾，翼尔悠往，暗复辄已。及至回身还入，迫于急节，浮腾累跪，跗蹋摩跌，纤形赴远，潍似摧折，纤縠蛾飞，纷森若绝。超逾鸟集，纵驰磕砢。蝯蛇蚺袅，云转飘翥，体如游龙，袖如素蜺，黎收而拜，曲度完毕。迁延微笑，退复次列。观者称丽，莫不怡悦。（以上描写一队女子的群舞。）

这个歌舞节目全部由女妓来表演，先合唱，次独舞，后群舞。从傅毅的描写和观者称丽增叹莫不怡悦的情景来看，汉代女妓的歌舞表演艺术已经具有了较高的水平。

除了表演歌舞以外，汉魏六朝时期的妓女还经常参加角抵百戏的演出活动。张衡的《二京赋》最早详细地描写了角抵百戏表演的情景：

大驾幸乎平乐，张甲乙而袭翠被，攒珍宝之玩好，纷瑰

丽以奢靡，临迥望之广场，程角抵之妙戏。乌获扛鼎，都卢寻橦，冲狭燕濯，胸突钻锋。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华岳峨峨，冈峦参差。神木灵草，朱实离离。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篪。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蜒蛇；洪涯立而指麾，被羽毛之襳襹。度曲未终，云起雪飞，初若飘飘，后遂霏霏，复陆重阁，转石成雷。霹雳激而增响，磅礴象乎天威。巨兽百寻，是为蔓延。神山崔巍，欻从背见，熊虎升而拏攫，猿狖超而高援。怪兽陆梁，大雀踆踆。白象行孕，垂鼻辚囷。海鳞变而成龙，状蜿蜒以蝹蝹。含利陁陁，化为仙车。骊驾四鹿，芝盖九葩。蟾蜍与龟，水人弄蛇。奇幻倏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云雾杳冥。画地成川，流渭通泾。东海黄公，赤刀粤祝，冀厌白虎，卒不能救，狭邪作蛊，于是不售。尔乃建戏车，树修旃，倀僮程材，上下翩翻，突作投而跟绖，譬隕绝而复联。百马同辔，骋足并驰。檀末之伎，态不可弥。弯弓射夫西羌，又顾发乎鲜卑。

这是一个有皇帝参加观看的盛大演出活动。集各种伎艺同台表演，内容非常丰富，如杂技方面，有扛鼎、寻橦、冲圈、燕跃、跳丸、走索、吞刀，吐火、倀童等；幻术方面有画地成川、漱水成雾、吞刀吐火、易貌分形等，优戏（即角抵戏）有《东海黄公》等，歌舞表演有《总会仙唱》等，参加演出的有女妓，也有男优。通过张衡的描写，我们今天读了还能够想象到当时杂技艺术的高超和演出场面的惊险豪华。

在早期妓女的歌舞、百戏表演过程中，还有一部分女妓专门负责伴奏，例如魏王饮宴时既有“楚姬舞于前，吴姝歌于后”，也有“越女鼓瑟于左，秦娥泛筝于右”。① 尤其是汉武帝时张骞从西域引进“胡乐”以后，还出现了许多擅长于某种乐器的女妓，诸如箜篌妓、琵琶妓、鼓吹妓等，例如东汉刘康家中就有一名“鼓吹妓女宋闰”，② 在当时颇为有名。有的女妓还多才多艺，既善吹弹，又能歌舞。例如北魏女妓徐月华，“善弹箜篌，能为《明妃出塞》之歌”。有一次，“徐鼓箜篌而歌，哀声入云，行路听者，俄而成市”。③ 《玉台新咏》中有不少描写女妓生活的诗，真实而形象地纪录了她们吹弹歌唱时的情景。

早期高级妓女献伎的对象主要是皇帝、官僚贵族、军队将领和富豪名士等。表演的地点主要是在宫廷、富贵大宅和城市妓院。军市或军营中或也有之，例如夏侯惇征孙权有功，曹操曾赐给他“妓乐名娼”，于军中享用。④ 北魏元琛任秦州刺史时，“诸羌外叛，屡讨之不降，琛令朝云假为贫妪，吹篪而乞，诸羌闻之，悉皆流涕，迭相谓曰：何为弃坟井在山谷为寇也？即相率归降。秦民语曰：快马健儿不如老妪吹篪”。⑤ 朝云即元琛征讨诸羌时的随军女妓。南朝萧梁时章昭达奉命出征途中，“每饮食，必盛设女伎杂乐，备羌胡之声，音律姿容，

①黄尧《天禄阁外史》卷四。　②《后汉书·济南安王康传》。③《洛阳伽蓝记》卷三。　④《三国志·魏志》。　⑤《洛阳伽蓝记》卷四。

并一时之妙，虽临敌而弗之废也”。① 由是可证，军营中也有高级妓女，不过这类名娼美妓，只是军队将领的专用品，实际上与家妓的性质差不多，并非任何军士皆可狎玩。

高级妓女虽然一般都具有呈身献伎的双重职责，但在宫妓与家妓之中，由于她们是众女共侍一男，因而除了少数受宠的妓女能够经常尽到双重服务的职责以外，还有不少妓女则是以表演歌舞和侍宴为主，侍寝的机会并不很多。于是，从事歌舞伎艺的表演活动，实际成为了高级妓女的日常事务，献身对于她们来说并不是一种侮辱和痛苦，相反倒是一种求之不得的荣幸和恩宠。她们每日苦心经营歌舞活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讨得主子的欢心。因为只有讨得了主子的欢心，她们才有可能获得机会向主子献身，甚至还有可能被晋升为主子的妻妾（或妃子、贵人）。即使不能摆脱妓女生涯，她们心中隐藏在欢乐之后的悲哀，也并不是在与主子的性活动中那种被支配、被玩弄的耻辱，而是一种唯恐日后被冷落、被抛弃的忧郁。

至于分布在城市妓院中的高级妓女，则最能充分地履行双重服务的职责。她们的呈身献伎一般不是为了获取某个男子的欢心，而是以一种开放的姿态面向社会，从而成为众多男人追求的明星。六朝时颇负盛名的姚玉京、苏小小大概就是这样的明星。尤其是苏小小，不仅她的风流韵事不断为后世文人所咏叹，而且她唯一的一首小诗：“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② 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由妓女

①《南史·章昭达传》。　②《玉台新咏》卷十《钱塘苏小小歌》。

创作的诗歌，为后世的诗妓导夫先路。唐宋以后此类妓女较多。

所谓一般妓女，是指那些虽颇有姿色，风度可人却伎艺稍逊或不善歌舞的妓女。她们往往是凭着美貌的资本而开始妓女生涯的。尽管她们在成为妓女之后也可能受过一定的艺术训练，但由于年龄稍长、身体发育已经成型，或缺少艺术天赋，所以她们于歌舞伎艺不可能有很高的造诣，至多只能加入群舞或合唱队伍以壮声威。因此，在宫妓中，这类妓女往往被称为宫女、宫娥、美人、采女等，她们在更多的意义上是作为一种装饰品、奢侈品而置入宫中。在大型的礼仪与歌舞活动中，她们只能作为群体进入皇帝的视野。即使帝王宫中有轮流侍宿的规定，她们与皇帝性交的频率也是极低的。《后汉书·郎凯传》中说："今宫人侍御，动以千计，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郁积之声，上感皇天。"就是这类怨女的生活写照。在家妓中，一般妓女往往被称为侍婢、侍妾，如果与之并列的家妓在数十人之内，她们还是能够尽到双重服务的职责的；不善歌舞者，也能得侍枕席。但有些官僚贵族之家，妓女成百上千，实际上他们也不过是把家妓作为装饰品与奢侈品向社会显示和炫耀其权势与富有罢了。不管他们如何贪色纵欲，并让家妓鱼贯而入，一般妓女性服务的机会也是很少的。在城市妓院和军市中，一般妓女则最能受到一般军官、工商业者、游士、市民的喜爱，这些男子追求的是美貌、刺激，急需解决的是性饥饿问题。对于歌舞伎艺，他们不会苛求，甚至根本不懂；加之他们的经济状况，也不允许问津于高级妓女，于是，一般妓女便因正好投合了这批人数众多的嫖客的胃口而门庭若市，生意兴隆。

所谓低级妓女，是指那些专以性行为满足男人需求的妓女。她们的必要条件是年龄适宜，身体健康，至于容貌、教养和艺术素质，都没有什么特殊要求。这类妓女人数较多，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军士和市民。服务的社区，除了在城市妓院中有一部分以外，其他主要分布在军市和军营。她们在城市妓院和军市中卖淫一般都是收费的，收入归官府或军队所得。但军营中的妓女主要是随军服务，妓女除了提供性服务以外，还要做一些诸如补军衣之类的服务工作，其卖身是否收费已不可知。由于历代战争频繁，军士人数众多，对这类妓女的需求量较大，因而她们往往是由民间寡妇和女奴、女俘、罪犯妻女来充当的。一般说来，她们并非自愿从军，而是由官府强制输入军中。她们实际上成为了一台台医治性饥饿的人肉机器，军队将领命令她们呈身，她们就只能绝对服从，根本没有拒绝的权力或选择对象的自由，否则就会遭到残酷的处罚。如汉武帝时，李陵受命带兵东征，军队刚刚开出关东，随军数名女子，是由强盗的妻子沦作营妓的，她们因不愿向军士献身，便躲蔽在车子中不肯出来，后来被李陵搜出，用宝剑把她们一一杀掉了。①

2·3 妓女的地位与待遇

中国的妓女不仅最早起源于奴隶，而且作为整体，她们后

①《汉书·李陵传》。

来也一直是男性整体的奴隶。无论是宫妓、家妓，还是女闾营妓，都是为适应男人的需要而产生和存在的。她们作为“人”的地位、权利和尊严都已被男权社会剥夺殆尽，她们只是作为一种娱乐工具、一种商品或者是一种高级装饰品、奢侈品而流通于男权世界，任凭男人买卖、支配和使用。男人就是她们的上帝和主人，为男人服务就是她们人生的全部意义。因而在古代中国，妓女没有成为神的圣徒，而仅仅充当了男人的祭品。当她们把自己的肉体作为牺牲奉献给男人们，而男人们也俨然象神一样来享用她们的时候，她们作为妓女的价值才得以实现。

然而，作为女人，不管男人如何压迫和剥夺，她们毕竟还有一件宝贵的东西属于自己，并且永远不可能被男人所剥夺，这便是她们作为女性的“性”——性机能与性魅力。这对于男人来说，永远都是一种诱惑和吸引。因而，作为个体，妓女又一直是男人追求和欣赏的对象，甚至是男权世界争夺的对象。男人可以利用手中的特权（政治特权或经济特权）占有她们、享用她们，甚至凌辱鞭笞她们，但一般不戕害她们、冻死她们、饿死她们。象李陵那样杀妓女的并不多。恰恰相反，一些男人为了享乐和尊严，还不得不以优厚的待遇来供养她们、装饰她们。于是，男人对于妓女的这种既压迫又追求、既卑视又欣赏的心态，决定了妓女的社会地位与生活待遇的不一致。

从社会地位来说，妓女属于“贱民”一类，低于平民，近似于奴隶。她们没有独立的户籍，或隶属于宫廷、官府、军营，或附籍于侍主，一代为倡，累世相袭。她们和奴隶一样，除了极少数人有可能放良为民（如宫女外放、侍主恩赐等）以外，

一般都没有人身自由。当然，尽管有的妓女出身于奴隶，有的是罚良为妓，但她们的政治待遇和社会地位，实际上要略高于奴隶。例如，奴隶主为防止奴隶逃跑，便将奴隶文身黥面，甚至直到汉代还实行这种惩罚："罪人妻子没为奴婢黥面，奴婢祖先有罚，虽过百代，仍然黥面供官。"① 但作为妓女，是决不会受这种惩罚的。又如，奴隶都要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权力；而妓女则一般都不从事体力劳动，还可受到一定的文化教育和艺术训练。就受教育而言，即使良民女子也莫可望其项背，唯有贵族女子方可比拟。如果仅以才、艺作标准，那么，古代有一部分妓女实可称为中国女性中的精神贵族。因此，中国妓女的社会地位虽然受贱视，但也只能说是近似于奴隶。

不过，宫妓的政治待遇和社会地位还稍带有一点特殊性，尤其是汉以后的宫妓，有一部分是选自于平民和贵族女子。在古人看来，她们被选入宫侍候皇帝，本来就带有"神圣"的意味，而决无"卑贱"的歧视。如果一旦受到皇帝的宠爱，她们就有可能青云直上，被封为妃嫔乃至于皇后。但这样的幸运者毕竟是凤毛麟角，况且她们一旦封号之后，就不再是宫妓而成了贵族。而其他成千上万的宫妓却常年闭锁深宫，毫无人身自由，过着一种病态的生活。在至高无上的皇帝眼中，她们也仍不过是一群奴隶、一群美丽的雌物罢了。皇帝不仅随时可以玩弄她们、侮辱她们，（如汉灵帝命宫女裸浴，前秦苻生"使宫

①《三国志·毛玠传》注引《汉律》。

人与男子裸交于殿前”，刘宋前废帝使宫女裸身相逐。）而且随时可以把她们赏赐给功臣、亲属，（如东汉明帝永平六年特赐刘苍“宫人奴婢五百人”，①北周武帝于建德五年，出齐宫中“宫女二千人，班赐将士”。②）或者把她们从宫中放出配给百姓为妻，（如齐桓公曾以宫女出嫁于民，③曹操的宫人卢女，后来放出嫁为尹更生之妻。④）甚至还可以把她们杀掉。（如“魏武帝有一妓，声最清高，而情性酷恶，欲杀则爱其才，欲置则不堪。于是选百人，一时俱教。少时果有一人声及之，便杀恶性者。”⑤）由是可知，宫妓虽然在古人眼中不被视为“贱民”，并且有一部分宫妓外放下嫁于民者实同良民无异，但深锁宫中的大部分宫妓，在没有人身自由这一点上仍然近似于奴隶。

在古代中国的女性中，真正能够把社会规定的性别角色，生物造就的性别角色与个人的自我性别认同这三者统一起来的，大多当是妓女（仅指那些自愿献身的妓女）。男权社会正是出于对妓女的性机能、性魅力的需求，才规定她们充当完全彻底的纯性女子，而不是做圣母式的无性女子或木兰式的异化女子。但怎样才能使妓女本人也认同这种性别角色呢？男人们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条是硬性措施，把妓女排斥在社会之外，身份降在良民之下，这就使她们失去了做圣母式的贤妻、节妇、烈女的希望；另一条是软性措施，把妓女拥放在怀抱之内，给以较优厚的生活待遇（或经济待遇），使妓女能够心安理得地享受现

①《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 ②《周书·武帝纪》。 ③《韩非子·外储》。 ④崔豹《古今注》。 ⑤《世说新语·忿狷》。

时的华侈(或温饱)与快乐，而不去奢望那虚无飘渺的、本来就无权获得的妇德妇名。于是，男人运用经济杠杆与政治大棒，软硬兼施，终于使这一类妓女认同了自己的角色：近乎奴隶身份的妓女享受着近乎贵族的（或高于中等水平的）物质待遇。她们的这种不平衡心理正是通过自己的服务性活动才求得平衡的。

弄清了男人与妓女之间的这种奥秘，我们再来考察妓女的生活待遇，就不会为之困惑和吃惊了。

比较起来，早期妓女中生活最为奢华的当然要首推宫妓。且不说她们所居住的宫室及其布置是如何镶金嵌银，雕栏玉砌，仅就其饮食与服饰而言，不啻奴隶，即使良民女子，与之相比，都成天壤之别。夏桀王的三万女乐，都是“文绣衣裳”，商纣王的女乐倡优皆佩“金玉珍玮”，齐襄公的上千名宫女“食必粱肉，衣必文绣”，赵平原君的数百名宫妓皆“被绮縠、余粱肉”，秦始皇的数巨万妇女倡优是“酒食珍味，盘错于前，衣服轻暖，舆马文饰”，东汉宫中“采女数千，食肉衣绮，脂油粉黛，不可赀计”。后赵石虎，宫人数千，“悉服饰金银熠熠”。……而普通老百姓则往往是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所以，历代不少忧国忧民之士，常在奏疏中批评宫女的华侈生活而为民请命。①

家妓的生活也多是非常奢侈华贵的。正如汉桓宽《盐铁论》中所描写的那样：“贵人之家，中山素女抚流徵于堂上，鸣鼓巴俞交作于堂下，妇披罗纨，婢妾曳绡纻。”如东汉五侯的家

①参见《后汉书》中的《陈蕃传》和《吕强传》。

妓“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① 西晋石崇成百上千名家妓，“皆蕴兰麝，被罗縠”、“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② 北魏元雍“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罗衣从风”；③ 元禧姬妾数十，“衣被锦绣，车乘鲜丽”；④ 元琛还专为妓女“造迎风馆于后园，窗户之上，列钱青锁，玉凤衔铃，金龙吐珮，素柰朱李枝条入檐，妓女楼上坐而摘食”。⑤ 刘宋阮佃夫，“女妓数十，艺貌冠绝当时，金玉锦绣之饰，宫掖不逮也。每制一衣，造一物，都下莫不法效焉”。⑥ 萧梁徐君倩“侍妾数十，皆佩金翠，曳罗绮，服玩悉以金银”。⑦ 鱼弘“侍妾百余人，不胜金翠，服玩车马，皆穷一时之绝”。⑧

至于女闾、营妓的营业方式和生活待遇，已不可详知。不过，我们至少可以推断，她们卖淫的收入（姑且假设营妓也是收费的）必定高出从事于普通劳动的女子若干倍，即使这些花粉钱的大部分要缴纳给官府或军队，但管理者为了让妓女保持充沛的精神和动人的魅力以广泛吸引嫖客，也必定会供给她们高级的饮食和服饰。

既然男人嗜好妓女，而一些妓女也心甘情愿提供性服务，那么，在这种双方自愿的性活动中，男人和妓女的关系怎样？或者说，纯粹作为女性的妓女在男人心目中的地位如何？也许，当今国人中有不少人会认定男人和妓女的性活动只是一项经济交易，他们之间的关系纯粹是一种买卖关系。但实际上，事情

---

①《后汉书·单超传》。 ②《晋书·石崇传》。 ③《洛阳伽蓝记》卷三。 ④《魏书·咸阳王禧传》。 ⑤《洛阳伽蓝记》卷四。 ⑥《南史·阮佃夫传》。 ⑦《南史·徐君倩传》。 ⑧《梁书·鱼弘传》。

并不如此简单。他们中除了一部分人（尤其是以计时计次成交的女闾、营妓同她们的狎客）之间的确只是一种买卖关系之外，还有一部分人之间则注入了一定的情感因素——这不仅指皇帝与宫妓之间、家长与家妓之间注入了君臣情感或主仆情感，而且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她们之间还可能会注入性爱的内涵。（即使在以计时计次成交的女闾、营妓同她们的嫖客之间，也仍然存在这种可能性。）

为了把这个问题阐述清楚，我们有必要先分析一下古代男人的性心理状态和性行为趋向。在古代中国，有一句流行的口头禅："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指私通行为，古代男人似乎也乐为此事，但却为礼教所不容。娶妻当然是天经地义的，然而对于妻子的选择，并非出于男子的意愿，而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① 纳妾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当事人的喜好，所谓"妻不如妾"，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的。但纳妾是有条件限制的，况且无论娶妻纳妾，其首要目的都是为了生殖："卿大夫一妻二妾者何？尊贤重继嗣也。士一妻一妾何？下卿大夫礼也"。② 妻子无后，便当娶妾，"其妻无子而不娶妾，斯则自绝，无以血食祖父，请科不孝之罪"。③ 而蓄妓狎妓，则完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②《白虎通·嫁娶》。③《后魏律考》。

全出于男子的意愿，几乎不受限制，可以随心所欲。这样一来，不仅娶妻纳妾不如狎妓，而且连偷情也不如狎妓这样自由。于是，妓女便成了古代某些男子追求性快乐的主要对象。这是就男人的心理意向而言。从女性方面来说，不仅妓女所具有的才情色艺为许多男人的妻妾所不及，从而使妓女和男人（狎客）的性活动更富有诗意情调和浪漫色彩；而且她们完全是作为纯粹的女人出现在男人面前，而不必象男人的妻妾那样因顾忌伦理纲常而时时克制自己，以免负上淫荡的名声。因而在与男人的性活动中，妓女比起男人的妻妾更容易进入女性的角色，从而才有可能升华为被爱的对象。

当然，这种带有情感因素甚至爱情因素的性活动，在女闾、营妓同她们的嫖客之间毕竟不多，但在宫妓与皇帝之间，家妓与侍主之间却不乏其例。作为宫妓，她们一进入皇宫，通常就会从心灵深处升起一种庄严感、神圣感，并且自认为从此就成为了皇帝的臣子。当宫妓向皇帝呈身献伎的时候，她们决不可能象从事一项买卖交易那样轻松平淡，而是带着一种诚挚的敬仰和一种受宠若惊的感激来以最优的奉献向皇帝效忠报恩。如果某位宫女的奉献深深打动了皇帝的感情，俘虏了皇帝的爱心，那么，皇帝就可能会沉醉于她的怀抱，从滥情走向专一，并且还可能会恩宠并施，把她从妓女的地位提升为贵族。如秦始皇的母亲就是一名邯郸妓女，秦庄襄王子楚从吕不韦手中把她娶进宫中，立为夫人。汉武帝的李夫人，曹魏武帝卞皇后（曹操妻，曹丕母），东晋安德陈太后等也都是由妓女的身份而升为贵族的。

作为家妓，她们与奴婢一样，是被家长作为私有财产而买入家中的，当然也可以随意卖出或送人。如曹魏时曹璋就曾以一名妓女向人换了一匹名为白鹘的马。①但家妓无须象奴婢一样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可以享受优厚的生活待遇，因而家长与家妓之间，既是一种主仆关系，又是一种供养关系。家妓在侍主家中的地位大致同侍主的妾与婢差不多。因此，家妓除了被称为侍姬、声妓之外，也可称为侍妾、爱妾、侍婢、爱婢，如曹璋以家妓向人换马时说"予有美妾可换"，《玉台新咏》中《和人以妾换马》一诗所说的妾都实指家妓。又据《魏书·高聪传》载："聪有妓十余人，有子无子，皆注籍为妾，以悦其情。"这就告诉我们，家妓生了儿子，升为妾是理所当然的，而无子的家妓也以妾来登记户籍，则是家长的一种恩赐了。那么，家妓在侍主家中的地位，严格地说当在妾与婢之间。但从性爱的角度而言，家长与家妓的关系多是非常融洽和富于浪漫情调的，象西晋石崇宁肯丢掉性命也不肯将绿珠拱手送人，绿珠宁肯以死殉情也不愿委身他人，刘宋时何恢宁肯丢掉乌纱帽也不愿放弃张耀华，则显然是由于爱情的力量才战胜了权势的胁迫。

①《玉台新咏》卷七注引李冗《独异志》。

2·4 妓女的归宿

萧梁时刘遵有一首《应令咏舞》诗曰："倡女多艳色，入选尽华年。"柳恽也在《度关山》一诗中写道："少长倡家女，……本以容见知。"刘、柳二诗在欣赏妓女美貌的同时，实际上还道出了妓女人生的一大奥秘——容美色艳是妓女的生命价值，青春年华是妓女的黄金时代。然而，不管那位妓女的容貌风姿如何倾国倾城，也不管那位妓女生活待遇如何高级华侈，她们在无情的岁月面前都无法使自己青春不老，红颜永驻。她们吸引和征服男人的魅力，只可能在极有限的豆蔻年华中发生效应，一旦年长色衰，她们就难免被男人们所疏远、冷落、弃置和遗忘。所谓"红颜女子多薄命"，"人老珠黄不值钱"，正是妓女命运的真实写照。那么，当妓女们在歌舞欢笑中耗尽了黄金岁月之后，她们的归宿何在？她们的余生将如何度过？

概括地说，早期妓女的归宿，大致有四种情况：

第一种归宿：从良为妻妾。这是妓女生涯的最佳结局。这样不仅可以使她们今后的生活有所依托，而且还可以使她们摆脱低贱的妓女身份而成为良民（甚至成为贵族），从此能够过上比较正常的生活，因而这种归宿便成为了大多数妓女的最高理想和追求、竞争的目标。当然，她们想要获得成功，除了与自身的天赋、素质和主观努力密切相关外，主要取决于男人（主人或狎客）的好恶和恩赐。由于男人(主人或狎客)的地位和具

体的环境不同，所以即使获得这种成功的妓女也有层次优劣之分。

最优者是在色艺皆佳的年华中就因受到男人的宠爱而晋升为贵族，如李夫人、赵飞燕等。当然，她们从妓女晋升为贵族时，皇帝所欣赏的主要是她们的美貌，所以李夫人说："我以容貌之好，得从微贱受幸于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而恩绝。上所以拳拳顾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① 而且她们升为贵族之后的地位是否稳固，还往往取决于她们是否生有儿子以及她们的儿子能否继位做皇帝。如秦时邯郸姬（秦始皇之母），曹魏卞皇后（曹丕之母），东晋安德陈太后（安、泰二帝母）等都是母以子贵，由于她们的儿子都做了皇帝，她们的地位才算真正稳固。而赵飞燕虽被成帝立为皇后，却因无子，在平帝即位后便被废为庶人，最后只好以自杀告终。

稍次者是配给良民或官吏为妻。这类幸运者主要是宫妓、女闾、营妓等，家妓则很少有这种可能。如齐桓公微服私访民间，发现有许多男子旷室无妻，便和管仲商议，从宫中放出一部分"未常御"的宫妓，嫁给民间的男子为妻。② 魏武帝有一名宫妓名卢女者，擅鼓琴，后来被"放出嫁为尹更生之妻"。③《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中说："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这位荡子大概是一位商人或游士。刘宋时的名妓姚玉京，后来从良嫁给襄州小吏卫敬瑜，夫妻关系融洽，卫敬瑜溺水而死后，

①《汉书·孝武李夫人传》。 ②《韩非子·外储》。 ③崔豹《古今注》。

玉京仍尽为妇之道，为丈夫守志，侍养公婆。

再次者是被男人纳为妾或晋升为妾。这类幸运者在女闾、营妓中或也有之，但以家妓居多。家妓晋升为妾，往往是得益于生了儿子。如北周李迁哲家妓上百人，凡姬人之有子者，皆纳为妾，还分给她们单独的房舍居住，并“各有僮仆侍婢奄阁守之”。① 后魏高聪有十余名家妓，他为了让她们能高兴，便不管有子无子，皆注籍为妾。② 北魏元雍有名妓女徐月华，在元雍死后，她被嫁“与卫将军原士康为侧室”。由于徐月华“善弹箜篌，能为明妃出塞之歌，”“哀声入云，行路听者，俄而成市”，因而还颇受原士康宠爱。③

第二种归宿：色衰被弃置。年长色衰，这是每个妓女最为恐惧担忧而又无法逃避的厄难。作为城市妓院和军市的妓女，当她们面对“门前冷落鞍马稀”的残酷现实，无疑只好退休另谋生路了。但作为宫妓，本人并无退休或嫁人的自由，一旦失宠便往往被作为一个个褪色的花瓶而弃置深宫，幽禁终生。刘孝威所作的一首《怨》诗，表现的正是宫女失宠后的凄凉与哀伤：

退宠辞金屋，见遣斥甘泉。枕席秋风起，房栊明月悬。烛避窗中影，香回炉上烟。丹庭斜草径，素壁点苔钱。歌起蒲生曲，乐奏下山弦。新声昔广宴，余杯今自传。王嫱向

①《周书·李迁哲传》。　②《魏书·高聪传》。　③《洛阳伽蓝记》卷三。

绝漠，宗女入祁连。雁书犹未返，角马无归年。昭台省膳御，曾扳无弃捐。后薪随复积，前鱼谁复怜。（《玉台新咏》卷八）

这些被冷落、被弃置的宫妓只能寄希望于外放出宫，否则就只能怀怨而死于宫中。家妓年长色衰后，则不仅仅是被弃置深宅，而且多要退居奴婢地位，或者被卖掉，或在家内从事服务性工作。如石崇的家妓上千人，其中以翔风容貌最佳，因而最受宠爱。石崇尝语之曰："吾百年之后，当指白日，以汝为殉。"翔风答曰："生爱死离，不如无爱，妾得为殉，身其何朽！"真乃两情缱绻，信誓旦旦。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及翔风年三十，妙年者争嫉之，或者云：'胡女（翔风为胡人）不可为群。'竟相排毁。石崇受谮润之言，即退翔风为房老，使主群少，乃怀怨而作五言诗曰：'春华谁不美，卒伤秋落时。突烟还自低，鄙退岂所期！桂芳徒自蠹，失爱在娥眉。坐见芳时歇，憔悴空自嗤！'"① 翔风作为石崇最宠爱的家妓也没有逃脱被遗弃的命运，那么，作为一般的家妓，年长色衰后被弃置，被遗忘，则是司空见惯的了。尤其是翔风在失意后所作的怀怨诗中，责备的竟不是石崇的负心薄倖，而只是妙龄妓女的妒嫉潜毁，就更显得可悲了。

第三种归宿：直接作为牺牲。我们前文中所说的妓女是男人的祭品，还是就比喻意义而言。但早期妓女中的确还有一部

① 《拾遗记》卷九。

分妓女，不仅向男人献伎献身，而且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她们或者是被男人任意杀戮，如曹操有一名妓女色艺超群，但曹操嫌她性格不好，后来把她杀掉了。① 西晋王恺有一次请王敦等人来家中做客，命女妓吹笛，吹笛妓女略有小忘，就被王恺打死。② 石崇每次邀请客人来家中饮宴，必命美妓斟酒，客人中如有饮酒不尽者，便立即将劝酒美人斩首。她们还没有享受完豆蔻年华的风流快乐，就成了男人的刀下鬼。③尤其残酷的是，有些皇帝和贵族做了鬼也风流贪色，他们死后还要逼迫妓女殉葬，据《墨子·节葬》说："今王公大人为之葬埋，……舆马女乐皆具。"可见，以女乐殉葬，在春秋战国时期还蔚然成风。甚至这种惨无人道的遗风直至汉代犹存，如据《汉书·赵敬肃王传》说："（赵缪王元）病，先令，令能为乐奴婢从死，迫胁自杀者凡十六人。"或者是逼迫妓女终生为死者守陵作乐，如汉惠帝死葬安陵，就曾迁徙关东倡优乐人五千户以为陵户。④曹操临死前还立下遗嘱，命令他的歌舞妓人在他死后都要住在铜雀台上，于每月初一和十五日上午，对着他的坟墓而歌舞。⑤这些倡优、歌舞妓，虽然能够活着为死人歌舞，但毫无自由，实与死殉的妓女无异。后代不少诗人，同情这些不幸的歌舞妓人的悲惨遭遇，写下了许多以"铜雀台妓"为题的诗歌，如萧梁时刘孝绰《铜雀妓》曰：

---

①《世说新语·忿狷》。 ②《世说新语·汰侈》注引《王丞相德音记》。 ③《世说新语·汰侈》。 ④《汉书·惠帝纪》。 ⑤参见陆机《吊魏武帝文》和《乐府诗集》卷三十一。

雀台三五日，弦吹似佳期。况复西陵晚，松风吹缦帷。
危弦断复续，妾心伤此时。谁言留客袂，遂掩望陵悲。

第四种归宿：出家为尼姑女冠。佛教自两汉传入中国，至南北朝大盛，佛寺遍布山林，寺院不仅收纳大量男子为僧，而且还剃度不少女子为尼。与此同时，道教也逐步形成体系，至南北朝时期已有较大影响，女子也可入道为冠。当了尼姑女冠，生活也就有了保障，因而出家为尼姑女冠也成了不少妓女的归宿。

萧梁时荀济曾上书梁武帝说："僧尼不耕不偶，病民费财，……设乐以诱愚小，俳优以招远会。"可见当时的僧尼是不从事劳动的，并且经常举行宗教性歌舞活动，既娱神也娱人。于是，本来擅长歌舞的妓女们出家后专业对口，自然会受到欢迎。敦煌千佛洞（唐）445窟壁画《弥勒经变》中所描绘的王室伎妃剃度图，就反映了早期妓女出家为尼的历史真实。画上有一大群伎妃被圈在布帐中等待剃度，有二伎正在剃发，另有二伎已经剃完正跪地上向佛礼拜。剃度是一种隆重的宗教仪式，剃度之后，她们就算正式出家了，出家之后，她们除了礼佛诵经之外，仍然要参加歌舞伎艺的表演活动。如据《洛阳伽蓝记》卷一载：

景乐寺，……六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寥亮，谐妙入神。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观者，以为至天堂。……召诸音乐，逞伎寺内，奇禽怪兽，舞抃

殿庭，飞空幻惑，世所未睹。异端奇求，总萃其中。剥驴投井，植枣种瓜，须臾之间皆得食。士女观者，目乱睛迷。

在北朝，一些著名尼寺都是皇帝或王公贵族所立，因而出家为尼的也多是宫妓与家妓，例如：

瑶光寺，世宗宣武皇帝所立。……讲堂尼房五百余间……椒房嫔御，学道之所，掖庭美人，并在其中。亦有名族处女，性爱道场，落发辞亲，来依此寺。屏珍丽之饰，服修道之衣，投心八正，归诚一乘。（《洛阳伽蓝记》卷一）

其中的掖庭美人当包括宫妓。家妓出家为尼姑女冠的在北魏也为数不少，如元雍有五百名妓女，元雍死后，“诸妓悉令入道”。家妓本是官僚贵族的私有财产，为什么他们在临死前，不将妓女出卖，而令她们出家呢？这从高聪的心态和行为可以略知其端倪。高聪有妓十余人，“及病，欲不适他人，并令烧指吞炭，出家为尼”。① 烧指吞炭，是为了毁坏妓女的手指与嗓子，使她们不能继续操琴唱歌。显而易见，高聪命令家妓出家的根本意图，不是为了给她们安排今后的生活，而是要求她们为他坚守贞操，不让他人来占有和玩赏他的专用品。然而，这些妓女出家为尼姑女冠之后，并非个个坐怀不乱，如北魏宣武帝永平

①《北史·高聪传》。

三年（510），尔朱龙攻入洛阳，当时就有数十名长得英俊的骑兵进入瑶光寺，与由宫妓出家的尼姑奸宿，此后有人讥讽此事说："洛阳男儿急作髻，瑶光寺尼夺作婿。"① 北魏王文同曾在巡察河北诸郡时对寺院进行检查，"裸僧尼验有淫状，非童男女者数千人"。② 萧梁时郭祖深也曾上书说："都下佛寺五百余所，僧尼十余万，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蓄养女，僧尼多非法，养女服罗纨。"③ 这些身入佛门仍然同和尚性交乃至生子的尼姑中，大概也有不少是由妓女出家的。

①《洛阳伽蓝记》卷一。 ②《北史·酷吏传》。 ③《南史·循吏传》。

第二编

妓女的鼎盛与控抑

（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时期）

第 三 章

官妓史叙论（上）

3·1 宫妓与教坊制度的演变

广义的官妓是指所有编入乐籍的妓女，她们由各级官府直接或间接经营管理，依据她们的活动社区和服务对象，大致可以分为宫妓、地方官妓（包括营妓）和市妓三大类。本节拟论述宫妓发展概况。

所谓宫妓，是专指在皇宫内服务的女妓，主要供皇帝享乐，同时也为政府和社会服务。宫妓的历史最为悠久，这在第一章第一节已有详细论述。宫妓发展至隋唐以后的最大变化是皇宫增设了教坊机构，将宫妓的数量规模和活动方式进一步制度化，从而使宫妓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关于国家设立乐舞机构，早在秦代就已置“奉常”，汉更名为“太常”，至北齐才叫“太常寺”。太常是一个总机构，从西汉起，又在它下面分设管理雅乐舞的机构为“太乐署”（东汉时曾名“太乐予署”）。管理俗乐舞的机构，在西汉时有“乐

府”，东汉时有“黄门鼓吹署”，曹魏至两晋又有“清商署”。女乐、倡优当然只能够进入俗乐舞机构，因为雅乐舞例如祭祀活动是不允许“卑者之子”参与表演的。公元581年，隋文帝即位后，也依前代之法，设太常寺，下面也分设太乐署、清商署、鼓吹署等，但他却把北周、北齐时代遗留下来的散乐艺人遣散归乡了，直到公元589年灭陈，才吸收了一部分南朝的乐舞艺人归入太常寺清商署管理。隋炀帝杀死父兄夺得帝位后，罢撤了清商署等机构，把他所喜爱的散乐百戏归入太常寺管理。大业二年（606），突厥染干来朝，隋炀帝为夸耀富强，广招全国各地的散乐百戏艺人，大集洛阳，于西苑积翠池畔举行盛大规模的表演，竟使突厥染干惊骇不已。“自是皆于太常教习。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伎人皆衣绵绣缯绎，其歌舞者多为妇人，……殆三万人”。①大业三年(607)十月，炀帝“敕河南诸郡送一艺户，陪东都三十余家，置十二坊于洛水南以处之”。②至大业六年（610），“帝乃大括魏、齐、周、陈乐人子弟，悉配太常，并于关中为坊置之。其数益多前代”。③这当是设教坊乐舞制度之始。所谓教坊，它的初始意义即为教习乐舞之所，后来才有明确分工，成为与太常寺并列的一个机构。④

隋炀帝始设教坊，不仅有利于他广纳歌舞艺人，而且有利于提高伎艺水平，从而成为他纵情声色的风流薮泽。后世无名氏

①《隋书·音乐志》。　②《资治通鉴》卷一八〇。　③《隋书·音乐志》。　④参见任半塘《教坊记笺订》。

《迷楼记》中说隋炀帝沉迷女色，特地修筑一座迷楼，“诏选后宫良家妇女数千，以居楼中，每一幸，有经月不出”，后有大夫何稠进御童女车和任意车，作为狎玩宫女的辅助工具，又有方士进春药，使他能“日夕御女数十人”，此虽为小说家言，却也不全是子虚乌有。据《资治通鉴》卷一八〇载，炀帝曾于洛阳西郊修建了一座周围二百里的西苑，苑内掘海修渠，沿渠又建十六院供宫妓居住，“十六院竞以肴羞精丽相高，求市恩宠。上好以月夜从宫女数千骑游西苑，作《清夜游》曲，于马上奏之。”这正是隋炀帝设立教坊的目的所在。

唐代初年，皇宫乐舞制度大多依照隋制，总机构仍为太常寺，下设太乐署、鼓吹署等，并把隋宫的乐舞艺人一并接纳进宫，以致太乐署也吸收了许多散乐艺人和“音声人”（即乐舞艺人），属于俗乐舞系统的散乐百戏，也由太常寺一并掌管。武德元年（618），唐高祖为举行建国庆典，命太常寺举行盛大的歌舞百戏表演，太常寺因刚刚建立，百废待举，演出前只好向民间借了五百多套妇女服装，“以充散乐之服”。①

教坊制度也在武德年间开始实行。先是置于宫中，故名“内教坊”，按习雅乐，由太监充使。武则天如意元年（692），改名为“云韶府”，中宗时又恢复称“教坊”。

在开元二年（714）以前，唐代雅俗之乐皆隶太常，教坊虽以中官充使，但仍归太常寺统一管理。唐玄宗即位后，认为太常寺是礼乐之司，不应典倡优杂乐，便于开元二年将太常与教坊实行分司管理，各负其责，从而使教坊机构大为扩展。他除了

①《唐会要》卷三四。

在宫中蓬莱宫侧设置内教坊之外，又于宫外延政坊、光宅坊分别增设左、右教坊，左多工舞，右多善歌。还于东京（洛阳）明义坊两侧也附设左、右教坊。并且规定教坊不再属太常寺领导，而直属宫廷，由宫廷派宦官充当教坊使。自此，太常寺专掌礼仪祭祀乐舞，只容男工，没有女乐；教坊则专掌俗乐舞、俳优、杂伎等娱乐性表演活动，男女兼用，女乐居多。教坊的规模也已大于太常，仅举玄宗时的长安内外教坊为例，容纳的男女艺人就曾达一万一千四百零九人。① 内教坊是专为宫廷服务的，他们的演出活动直接听命于皇帝。内教坊的女子都色艺兼优，是宫妓中的佼佼者，她们都居住在宫内的宜春院，能够经常在皇帝面前承应，颇受皇帝宠爱，故称之为“前头人”。设在宫外的教坊，除了为宫廷服务外，还为贵族阶层服务，如善歌舞的教坊妓张少娘和庞三娘就曾分别应邀出外表演。②

唐玄宗是一个嗜爱声色歌舞的风流皇帝。他并不满足于教坊提供的声色之乐，还在宫中专为自己设立了一个叫做梨园的乐舞机构，主要教授和演奏法曲，其乐工舞人都是从坐部伎和宫女中挑选出来的优秀者。宫中梨园的规模也相当大，男子有三百人，住在禁苑的梨园，女子也有数百人，住在宫中的宜春北院。此外，长安还有个梨园别教院，隶属太常寺，也传习法曲。东京(洛阳)也相应设立了一个梨园，有一千五百人，专门表演“俗乐”，宫廷排演大型节目时，往往会从东京梨园挑选一些人补入教坊，这些梨园中的女子，和教坊女艺人一样，都可称为宫妓。在中国历史上，唐玄宗的宫妓人数之多和他本人的风

①任半塘《教坊记笺订》。　②崔令钦《教坊记》。

流贪色之极，当推千古第一。杜甫说："先帝侍女八千人。"①白居易则说："后宫佳丽三千人。"②实际上，这两种说法都嫌保守，据《新唐书》记载，开元天宝中的宫女多达四万人。无怪乎古今许多历史学家在总结安史之乱的历史教训时，总是要归咎于唐玄宗荒淫误国。

安史之乱以后，国力由盛而衰，宫廷已无力供养如此庞大的皇家乐团，只好逐渐裁减乐舞艺人的数量与规模。至大历十四年(779)，代宗下令解散了梨园，③梨园所司之乐，改属教坊。贞元二十一年(805)三月，顺宗又裁减教坊，"放后宫及教坊女妓六百人"出宫。④元和五年(810)六月，宪宗又下令裁减教坊乐官衣粮。⑤

当然，与此同时，统治者仍然会不断征选年轻美貌的女子入宫，如据《旧唐书·李绛传》记载，元和七年，"教坊忽称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别第妓人，京师囂然"。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宪宗下令把内教坊迁到宫外的延政里，这可能是出于经济拮据的考虑，一方面允许教坊向社会卖艺作为补贴，一方面又可随时为宫廷召用。因为皇帝本人毕竟抛舍不下这份风流享乐，所以在第二年三月，穆宗即位后，"赐内教坊钱万缗，以备行幸"。⑥敬宗对教坊妓女更是兴趣盎然，他总共只做了三年多时光的皇帝，却分别于长庆四年(824)、宝历二年(826)多次游幸教坊，并赐钱物若干，甚至还在宣和殿亲自接见"内人亲属一

①杜甫《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行》。　②白居易《长恨歌》。　③《唐会要》卷三四。　④《新唐书·顺宗纪》。　⑤《唐会要》卷三四。⑥《资治通鉴》卷二四三。

千二百人，并于教坊赐食，各颁锦绮”。[1] 这个时期（指中晚唐），教坊表演的内容和服务对象已有所变化和扩展，象角抵一类群众喜爱的伎艺也在宫中上演了，隶属教坊的男女艺人（尤其是女妓）出宫表演或侍宴已屡见不鲜，甚至“京兆府司每年重阳、上巳宴游，及大臣出领藩镇，皆须求雇教坊音声以申宴饯”。

五代十国各宫廷乐舞制度多承唐制。不过，由于战争动乱和立国时间短暂，其乐舞机构和宫妓的规模都比唐代小得多，有的还很不完善。比较起来，乐舞机构规模稍大、宫妓数量颇众的当推前蜀、后唐、南唐等。前蜀宫中的教坊机构已具相当规模，蜀王建有一首《宫词》说：“青楼小妇研裙长，总被抄名入教坊。春设殿前多队舞，朋头各自请衣裳。”可见教坊常表演队舞，并且还常从宫外妓院中搜选妓女入宫参加表演。王建的儿子王衍即位后，纵情声色，宫中美女成群。他自己曾创作并导演过《折红莲队舞》，布景用各色彩绸，置山造海，几可乱真，又用彩绸扎成两支船，船下装用轱辘使其转动，船上载女妓二百二十人，随着彩船从“山洞”中徐徐驶出，周游“大海”时，女妓们一边歌唱，一边表演撑船、采莲等各种舞蹈动作。王衍对此舞甚为得意，还曾用它来招待外宾。[3]后唐庄宗灭前蜀时，不少将领把王衍的宫妓掳归己有，如郭崇韬就曾抢夺“王衍爱妓六十”。[4]后唐宫中也设有教坊，并经常以教坊妓乐招待宾客，如公元927年8月，昭宗曾“宣禁中女伎及教坊乐”招待秦王从荣，与之饮宴至晚。同年9月9日应圣节，昭宗

①《旧唐书·敬宗纪》。 ②《唐会要》卷三五。 ③《儒林公议》卷下。 ④《旧五代史·郭崇韬传》。

又“宣教坊伎宴乐”四方诸侯，第二年应圣节，又“宣教坊乐及左右厢百戏以宴乐”百官。① 南唐据险占领富饶的江南之地达三十九年，其宫廷乐舞制度都极力仿效唐代，尤其是后主李煜多才多艺而又纵情声色，他即位后曾“大展教坊，广开第宅”，② 终日与妃嫔宫妓一起填词作乐，以致他在被虏辞国时，“教坊犹奏别离歌”。③

北宋的宫廷乐舞制度也多袭唐制。虽然其教坊的规模远不能与开元天宝时期相比，但宫妓的数量仍然相当可观，宫妓表演的内容也有了新的发展。她们主要表演“队舞”，宫中计有“菩萨蛮队”、“感化乐队”、“抛球乐队”、“佳人剪牡丹队”、“拂霓裳队”、“采莲队”、“凤迎乐队”、“菩萨献香花队”、“采云仙队”、“打球乐队”等十个女弟子队，在一个节目中同场演出的女妓多达一百五十三人。宫廷的这种盛大“队舞”往往是在皇帝生日或其他喜庆日子，于宴会上与百戏、杂剧等伎艺连台演出。皇帝（如太宗、仁宗）甚至还亲自制曲，以赐教坊。宋初“教坊本隶宣徽院”，设有教坊使、副使、判官、都色长、色长、高班、大小都知等职经营，至仁宗天圣五年（1027），改由二名宦官钤辖。北宋的教坊乐工女妓，除了为宫廷服务以外，也可应邀为宗室贵族服务，但神宗变法时曾一度“罢宗室正任以上借教坊乐人”。④

北宋皇帝仅除了拥有一定数量的教坊妓女以外，也象历代皇帝一样纳有大量宫女供其娱乐，如宋仁宗时仅前后外放的宫

①参见《册府元龟》卷一一四、卷二、卷七。 ②《通鉴长编》。③李煜《破阵子》。 ④《宋史·乐志》。

女就有五百人。哲宗刚成年，太皇太后就挑选世家女百余人入宫。徽宗更是风流重色，且不说他微服私狎李师师的荒唐行为，仅他即位后外放出宫的宫女就达二千四百七十六人。甚至还让臣僚贵族分享他的艳福，如正和二年(1112)四月，徽宗召蔡京入内苑赐宴，辅臣亲王皆得与会，就曾命令四百名女乐表演歌舞，以致群臣终宴尽醉。

南宋建炎初蠲省教坊，绍兴十四年(1144)复置，仅乐工就有四百六十人，仍以宦官充钤辖。绍兴三十一年(1161)高宗又下诏“教坊即日蠲罢，各令自便”。① 此后南宋宫廷不设教坊，凡皇帝寿诞和其他喜庆日子以及接待外宾，要举行乐舞活动一律采取临时雇请的方法，凡用乐，须提前两旬从临安府点集衙前乐人，衙前乐人不够，再雇请市井艺妓，先把她们集中在修内司教乐所排练一段时间，以便届时从奉御前供应。② 南宋宫廷用乐采取临时“和雇”、蠲省教坊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经济拮据，“绍兴和议”后，南宋向金称臣，每年要向金贡献大量银绢，宫中已无力供养教坊如此庞大的皇家乐团了；一方面则由于当时都市文化繁荣，临安的民间乐舞艺术大有压倒教坊的优势，因而统治者也乐于欣赏。

蒙古统治者在中原建立元朝之后，宫廷乐舞制度也多仿效汉制，除设太常礼仪院(属下没有女妓)以外，又置教坊、仪凤二司，主要掌管乐工艺人，供奉宴享娱乐等事。教坊司始设于中统二年(1261)，仪凤司始设于至元二十年(1283)，二司最初

①《宋史·乐志》。 ②参见《宋史·乐志》“教坊”条和吴自牧《梦粱录》“妓乐”条。

隶宣徽院，后来都改归礼部统辖，凡女妓主要集中在教坊司，而乐工则多集中在仪凤司。元代教坊司女妓也主要表演"队舞"等其他乐舞，其规模和形式与宋代差不多，但在内容上往往渗入了较浓的宗教色彩，在风格上则带有蒙古民族的特征。如《说法队》所表现的就是僧道合一的宗教思想，这与元代统治者崇信佛教和道教密切相关。又如元顺帝时以宫妓三圣奴、妙乐奴、文殊奴等十六人所表演的著名的《十六天魔舞》，①表现的也是佛教(密宗一派)的思想内容。据《元史·哈麻传》载，西蕃僧人伽璘真善演揲儿法(即房中术)，秃鲁帖木儿将伽璘真推荐给元顺帝，帝习而喜之，"乃诏以西天僧为司徒，西蕃僧为大元国师。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谓之供养。于是帝日从事于其法，广取女妇，惟淫戏是乐。又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八郎者，帝诸弟，与其所谓倚纳者，皆在帝前，相与亵狎，甚至男女裸处，……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丑声秽行，著闻于外"。可见，当时的宫妓，不仅要表演歌舞，而且还要充作君臣和僧徒们施行房中术的工具。

与唐宋相比，元代宫妓似乎命运更苦，更受歧视。宫中规定，"娼家出入，止服皂褙子，不得乘车坐马"。② 她们多是少女时代进入宫中，年过三十美色衰褪之后就要被遣放出宫。③但有时宫中举行盛大表演时，还临时到京师各行院中去搜刮妓女入宫承应。由于宫妓所过的那种病态生活，实际上比市妓更

①《元史·顺帝纪》。②《元史·舆服志》。③万石《退宫人引》曰："……少年十五二十岁，中宫教得步步齐。春罗夜剪绣花帖，阶前夜舞高婆丽。……舞困楼阑过三十，内家别选娥眉入。"

为凄若，因此，一些行院“道有教坊散乐，拘刷烟月班头”，众妓女便千方百计躲藏逃避。①

明代仍设太常寺(明初称太常司)与教坊司，都听命于礼部。太常寺也有乐舞生，但无女妓，乐生由道童充任，舞生选军民俊秀子弟。教坊司掌乐舞承应，设大使、副使、和声郎(后改为奉銮)、左右韶乐、左右司乐，皆以乐工为之，其乐舞艺人则多为女妓。

凡大朝贺、大宴飨，教坊司按仪制表演中和韶乐、大乐、大舞、百戏、队舞等，皇帝进膳时，“皆用乐府、小令、杂剧为娱戏”，《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至今还保存着明代教坊编演的二十一本杂剧的目录。在每年皇帝亲耕、皇后亲蚕的活动中，教坊司也要奏乐。弘治初年，孝宗亲耕时，教坊司以杂剧承应，间出狎语，当即被都御史马文升厉色斥去，可见杂剧只能在皇帝进膳或娱乐时演出。“正德三年，武宗谕内钟鼓司康能曰：‘庆成大宴，华夷臣工所观瞻，宜举大乐，迩者音乐废缺，无以重朝庭。’礼部乃请选三院乐工年壮者，严督肄之，仍移各省司取艺精者赴京供应。顾所隶益猥杂，筋斗百戏之类日益盛于禁廷。既而河间等府奉诏送乐户，居之新宅。乐工既得幸，时时言居外者不宜独逸，乃复移各省司所送技精者于教坊。于是乘传续食者又数百人，俳优之势大张。”“嘉靖元年，御史汪珊请屏绝玩好，令教坊司毋得以新声巧技进。世宗嘉纳之”。②由此可知，在嘉靖元年之前，教坊司在宫中除必须表演一部分

①参见《全元散曲》下册第1281页《般涉调·耍孩儿·拘刷行院》。
②《明史·乐志》。

雅乐以外，主要是表演俗乐、百戏、杂剧等民间伎艺。

清初承袭明制，宫廷分设太常、教坊二部。太常乐员例用道士，教坊则由各省乐户挑选入京充补。凡朝会宴享喜庆需要用乐，皆由教坊司承应。顺治八年，清世祖下令宫中停止使用女乐，一律改用太监替代。但只过了四年，在顺治十二年宫中又改用女乐。直至顺治十六年，清世祖下令再度裁革女乐后，宫内教坊司才没有了女妓。以后只从各省召募精通音乐的男子来充当教坊司乐人，不过由于教坊司名声不好，民间乐人深以为耻，往往召募不应。于是，在雍正七年，改教坊司为和声署。①

从隋炀帝作俑，至清初废止，教坊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延续了一千余年，其间只有南宋曾一度蠲省，但与南宋对峙的金朝当时仍然设置了教坊。为什么古代宫廷教坊制度能够延续达千余年之久呢？其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教坊作为高质量的中央乐团之一，它在国家和宫廷所举行的有关礼仪活动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第二，教坊作为一个主要容纳女乐的机构，它可以源源不断地向皇宫提供色艺兼优的宫妓，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皇帝的声色享乐之需。第三，教坊作为一个主要表演俗乐舞的艺术团体，它可以源源不断地向宫廷输入新兴的、富于生命力并作了加工提高的民间伎艺，从而有利于皇帝和其他官僚贵族（包括皇族的女子）能够随时欣赏各种通俗艺术和及时从中了解民俗民情。从妓女发展史的角度而言，教坊制度的延续实施，对于历代宫妓的发展及其伎艺水平的提高，无疑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就人权主义观点来看，教坊无疑也是一

①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五五、卷一七四。

个罪恶的渊薮。教坊制度的延续实施，实际上就是罪恶的延续作孽。因此，清初裁革教坊女乐乃至最后废除教坊制度，对于中国女性的逐步解放，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宫妓历史的终结。因为产生宫妓的根源并不在于教坊制度，而在于帝王的特权制度。清初虽然革除了教坊女乐，但作为皇权尊严体现与象征的三宫六院仍然存在于清朝历代皇宫之中，数以千计的宫女所共有的唯一职责，不过是向皇帝提供声色服务罢了。她们中的善伎艺者除了极少数人被晋升为贵族以外，其他女子仍然充当着宫妓的角色。因此，从理论上说，宫妓历史的终结尚有待于帝王特权制度的废除。不过，根据清末的特殊情况，我们也可以说，宫妓的历史延续到咸丰时代就基本上终止了，此后慈禧执政，三宫六院也就名存实亡了。

3·2 地方官妓的兴盛与控抑

官妓的起源虽然可以追溯到春秋齐国管仲所设的女闾和汉武帝所设的营妓，但她的发展和兴盛当在历史进入唐代以后。

唐代不仅是一个思想比较解放的时代，而且是一个性观念比较开放、个性自由比较发展的时代，甚至汉魏以来被方士、道教徒弄得非常玄乎神秘的房中术，这时也已广泛流行。唐代几部重要的医学著作，如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甄权的《古今录验》、王焘的《外台秘要》等，都有较大的篇幅论述房中术，乃至白行简这样的文人官僚都曾写过《天地阴阳

交欢大乐赋》这种专门描写性行为的文章，由此也可以窥见唐代性文化比较开明之一斑。因而从宫廷到都市，从贵族到民间，不仅男子可以纳妾狎妓，寡妇也可以改适他人；至于公主偷情、士子私恋的风流韵事也屡见不鲜；甚至有的宫女也因耐不住寂寞而托红叶或军衣向宫外男子寄诗求爱。专为各地方官府和军镇服务的官妓就是在唐代这样一个浪漫的时代发展兴盛的。古代史籍中往往把各地方政府或军镇所经营的妓女直接称为官妓，也可根据官府建制相应称为州妓、府妓、郡妓等，为便于与前文已经论述的宫妓和后文将要论及的市妓加以区分，笔者将专为各地方官府和军镇服务的妓女概称为地方官妓。

唐代地方官妓在初唐、盛唐尚呈发展趋势。据《唐会要》卷三三载："旧制之内，散乐一千人，其数各系诸州多少，轮次随月当番(值班)，……贞观二十三年十月，诏诸州散乐，太常上者，留二百人，余并放还。"联系武德元年(618)"太常官司于人间借裙襦五百余具，以充散乐之服"①一事可知。散乐艺人多为女妓，那么，唐初三十余年间（自武德元年至贞观二十三年计有三十二年）从各州抽调进宫的散乐艺人，当然也多是女妓。这种以诸州散乐轮次随月当番的措施，一方面说明唐初的宫廷乐舞机构还不十分庞大，但另一方面又说明唐初各地方官府不仅设有官妓，而且已具有一定的数量规模和艺术水平，否则便难以履行进宫当番的职责。又据崔颢《得体歌》诗序："天宝初，韦坚为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于长安城东浐水傍穿广运潭，以通吴会数十郡舟楫。先是民间戏唱得体歌，及新潭成，

①《唐会要》卷三四。

陕县尉崔成甫乃翻此调为得宝歌，集两县官伎女子唱之。”可见，盛唐时地方官妓已经比较普及，连县政府的官妓都可随时召来举行歌会。

至中晚唐时期，地方官妓则已出现兴盛局面。据《唐会要》卷三五载：宝历二年(826)九月，京兆尹刘栖楚奏：“伏见诸道方镇，下至州县军镇，皆置音乐，以为欢娱，岂惟夸盛军戎，实因接待宾旅。伏以府司每年重阳、上巳两度宴游，及大臣出领藩镇，皆须求雇教坊音声，以申宴饯。今请自于当己钱中，每年方圆三二十千，以充前件乐人衣粮，伏请不令教坊收管，所冀公私永便。从之。”从这份奏章可知，当时诸道方镇、府司、州县军镇，都设有官妓。每逢节日宴游、迎送官员、接待宾客，都要分派妓女表演歌舞、侍宴承应。刘栖楚请奏的原因是，京城是由京兆府管辖的，当时宫廷教坊为解决经济拮据的困难，已开外雇之业，因而把就近京兆府司的乐舞活动也收管了。京兆府一方面要向教坊支付服务费，一方面仍要供养本府乐人，故向皇帝上书，请改令自图。由于全国各级地方官府和军镇都如此，所以敬宗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

唐代各级地方官府和军镇都设有乐营，专门萃集和经管官妓(包括营妓)，管理乐营的头目，往往被称为营将或乐营将或营使。这些妓女的户籍都附编于所在的官府或军镇，称为乐籍。她们的职责是专门为所在的官府或军镇服务，不仅表演歌舞伎艺，而且还要侍寝献身。于是，地方官妓中的佼佼者往往成了行政或军事长官的专用品，有的甚至还因此而怀孕生子。①

①《南部新书》曰：“张榻尚牧晋州，外贮营妓，生子曰仁龟。”

由于唐代性文化比较开明，对于官吏宿娼，不仅没有法纪约束和舆论非议，而且往往被视作一种风流倜傥的浪漫人格为人们所艳羡和仿效。尤其是开元、天宝间唐玄宗设教坊、置梨园、统四万宫妓作乐以及他和杨玉环的风流韵事流播朝野之后，文人士子这些盛世的骄子，在心理上不是排斥而是羡慕李隆基的这种生活方式，因而他们更加潇洒自如地走进秦楼楚馆，拜倒在石榴裙下，沉醉于温柔之乡。安史之乱不仅使盛唐的繁荣遭到了破坏，同时也使士子官僚的心理发生了倾斜。他们力图再造盛世，但又深知复兴之不易，因而便更珍惜现实人生，迫不及待地及时行乐，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正是这种生活的写照。

恩格斯说：“在雅典的全盛时期，则广泛盛行至少是受国家保护的卖淫，超群出众的希腊妇女，正是在这种卖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她们由于才智和艺术趣味而高出古希腊罗马时代妇女的一般水平之上。”①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唐代的官妓也正是这样一些才智和艺术趣味高出一般妇女水平之上的女性。她们不仅姿色出众，伎艺超群，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大多能够歌唱诗词，有的甚至还能挥毫作诗。于是，那些奉命赴任的官僚，无论是刚刚考取进士而步入仕途的得意士子，还是刚刚离开京都而外放贬谪的失意官员，他们在风情绰约、仪态万方的妓女面前都深深地陶醉了。诗与歌舞的艺术感染，性与情感的张力释放，使士子官员和妓女的心理距离靠近了。妓女不仅成了善解人意的可人，而且给诗人播下了情种，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送来了灵感，甚至自己也走进了诗歌的国度，成为了诗人歌咏的对象：

行摇云髻花钿节，应似霓裳趁管弦。艳动舞裙深似火，愁凝歌黛欲生烟。有风纵道能回雪，无人何由忽吐莲。疑是两般心未决，雨中神女月中仙。（白居易《醉后题李、马二妓》）

一字一声一颗珠，转喉疑是击珊瑚。听时坐部音中有，唱后樱花叶里无。汉浦蔑闻虚解佩，临邛焉用枉当垆。谁人得向青楼宿，便是仙郎不是夫。（薛能《赠歌者》）

诗人不仅把妓女当成了神女，而且感觉到自己也成了仙郎，这样一来，本来是风波险恶的宦海生涯，也变得富有诗意了，并且这种诗意的生活通过诗人的笔和妓女的歌喉不断地传唱出来，最后汇入了唐诗的泱泱大国。

在五代十国的混战时期，由于各国存在的久暂不一，各种建制也不一定完善，但官妓制度仍然延续实行，官吏狎妓的风习也一如唐代。如当时著名妓女转转和侯小帅，就分别是后唐和后晋的官妓。 又据陶穀《清异录》记载，后周柴守礼与诸友经常轮流招妓设乐，聚会嬉游，谓之“鼎社”，“洛下多妙妓，守礼日点十名，以片纸书姓字，押字大如掌，使人持呼之。被遣者诣府尹出纸呈示，尹从旁签字，妓见纸画时，争到买唤子，号曰‘鼎

①转转事参见《旧五代史·马郁传》。侯小帅事参见《宋史·王景传》。

社’”。这些妓女都是府妓，必须经过府尹同意才能外出侍宴。由于柴守礼当时身为皇父，府尹趋之唯恐不及，所以他连问都不问就签字放行了。北汉的官妓也不少，例如至“广运六年，北汉奉表请降，献官妓百余人于宋，以赐将校”。

在论述宋代地方官妓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讨论一下唐宋营妓与地方官妓之间的关系。关于“营妓”的含义，新版《辞海》认为是“古代军中官妓，唐宋时始有这种名称”。黄现璠《唐代社会概略》一书进一步认为营妓是专供军士娱乐者，是官妓中专门的一种。但从目前所见史籍来看，唐宋间称作营妓的有一部分与军队及其将领关系密切，有一部分则与军营无关或并不局限于军营中活动，并且唐与宋之间的情形似乎也并不一致。笔者认为，造成唐宋间官妓与营妓称名混淆的主要原因有二点。

一是唐宋间各地方官府或军镇往往都设有“营署”或“乐营”来集居官妓女子，以便于平时训练和随时传唤，负责管理众妓女的头目一般称为乐营将或乐营使，也可称为乐将、营将等，所辖妓女除径直称为官妓之外，也可称为“乐营子女”、“乐营妓人”等，正因为如此，有时也把地方官妓称作“营妓”或“营籍”妓。例如：

> 池州杜少府造、亳州韦中丞仕符，二君皆以长年，精求释道。乐营子女，厚给衣粮，任其外住，若有宴饮，方一召来，柳际花间，任为娱乐。谯中举子张鲁封，为诗谒其宾佐，兼寄大梁李尚书，诗曰：“杜叟学仙轻惠质，韦

①《十国春秋》。

公事佛畏青蛾。乐营却是闲人管，两地风情日渐多。”（《云溪友议》卷下）

太常乐人，今因罪谪入营署。习艺伶官，前代以来，转相承袭。（《唐大诏令集》卷八一）

韩晋公镇浙西，戎昱为部内刺史。郡有酒妓，善歌，色也媚妙，昱情属甚厚。浙西乐将闻其能，白晋公，召置籍中。昱不敢留，饯于湖上，为歌词以赠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词。”既至。韩为开筵，自持杯，命歌送之。遂唱戎词。曲既终，韩问曰：“戎使君于汝寄情邪？”悚然起立曰：“然。”言随泪下。韩令更衣待命，席上为之忧危。韩召乐将责曰：“戎使君名士，留情郡妓，何故不知而召置之，成余之过。”乃笞之，命与妓百缣，即时归之。（孟棨《本事诗》）

这是唐代官妓居住在“乐营”或“营署”和妓女可称“乐营子女”、头目可称“乐将”的例证。宋代基本上沿袭了唐代的惯例，试看同一件事的两种说法：

苏子瞻倅杭日，府僚高会湖中，群妓毕集，惟秀兰不至，营将督之。良久乃来。诘其故，答因午浴倦眠，忽闻扣门声，起视，乃营将催督也，整妆趋命，不觉稍迟。（《本事词》卷上）

苏子瞻守钱塘，有官妓秀兰天性黠慧，善于应对。湖中有宴会，群妓毕至，惟秀兰不来。遣人督之，须臾方至。子瞻问其故，具以发结沐浴，不觉困睡，忽有人叩门声，

急起而问之，乃乐营将催督之。（杨湜《古今词话》）

这个例子，不仅证明了营将就是乐营将，而且也表明宋代地方官妓集居之地同唐代一样都称为乐营，那么，人们将地方官府的乐营妓女简称为营妓或营籍妓，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称营妓的比较常见，无须再举例说明，称营籍妓的也不乏其人，试于唐宋各举一例如下：

唐尚书李曜罢歙州，与吴园交代，有佐酒录事名媚川，聪明敏慧，李颇留意，而已纳营籍妓韶光。（《太平广记》卷二五二）

绍兴庚午岁，台州黄岩营籍有谢姓妓，与杨生情好甚笃，为其姬所制，不遂其愿，乃相约投江。（《本事词》卷下）

至于营籍妓即是营妓几乎是无须论证的，我们只需举韶光的另一种记载即可说明这一点：

媚川，歙州酒录事。尚书李曜守歙颇留意，而已纳营妓韶光。罢州日，与吴园交代，托令存恤，临发共饮，不胜离情。（《南部新书》）

由此可见，营妓即是各地方官府所设乐营中的妓女，或者更简单而又更确切地说，营妓是地方官妓的一种别称。

二是受传统称名的影响，人们往往习惯于称各地方军镇的官妓为营妓。营妓始设于汉武帝时代，当初的确是在军营中活动，为军士服务。①在这种传统称名的影响下，唐人自然而然就会把营妓和军营联系起来，因而把军中官妓称为营妓的现象在唐代也较为常见。例如：

初，李晟尝将神策军戍成都。及还，以营妓高洪自随。西川节度使张延赏怒，追求还之，由是有隙。（《资治通鉴》卷二三二）

杨汝士尚书镇东川，其子知温及第，汝士开家宴相贺，营妓咸集。汝士命人与红绫一匹，诗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国将军又不贫。一曲高歌红一匹，两头娘子谢夫人"。（《北里志》）

罗虬登科，从事坊州，有营妓小字红儿，先为郡将所嬖，人不敢近。虬亦悦之，郡将不能容，虬弃官去，然于红儿犹不能忘也。拟诸美物，作《比红儿》诗百首。（《闻见后录》）

张禓尚牧晋州，外贮营妓，生子曰仁龟。（《南部新书·丁》）

从以上四例看，占有或役使营妓的分别为将军、节度使、镇帅、郡将、州牧等，他们都是掌有军权或兼掌军事、行政大权的长官。唐代最著名的妓女薛涛也是营妓，她十五岁时就被镇将韦

①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三节以及第25页注释②。

皋召令侍酒赋诗，因入乐籍，韦皋很赏识她，特以校书郎奏请，虽然由于“护军未及应”而罢，但“薛校书”之名，已远近流传了。自韦皋镇蜀至李德裕入川，凡历十一镇，薛涛皆出入于幕府，并以诗受知于时。当时著名文人士大夫如元稹、白居易、令狐楚、张祜、刘禹锡、裴度、牛僧孺、严绶等，皆乐于与她来往唱和。就薛涛的经历来看，在军镇服役的营妓，虽然主要在军营中活动，但经过军镇长官同意，也可与其他人士往来叙情。

另外，唐代军镇的官妓时兴称作营妓，还当与兵制的演变有关。初唐沿袭隋朝的府兵制，将帅还难以专兵跋扈。自高宗、武后以降，府兵制已渐破坏，募兵制代兴。睿宗时开始设节度使，统领个别边防地方的军事、行政、财政大权，玄宗时又有所发展，从而造成了方镇权力的无限膨胀，并直接导致了安史之乱的发生。安史之乱虽然很快就平息了，但方镇割据的局势从中唐一直延续到晚唐乃至五代。这些方镇将官重权在握，专横跋扈，纵酒狎妓，势所必然，更何况朝廷还允许诸道方镇和州县军镇皆置妓乐呢？① 于是军镇中的营妓在中晚唐得以发展兴盛便是势所必然的了。这就是营妓之名在初唐、盛唐极为少见而在中晚唐至五代时有所见的根本原因。

宋太祖建国以后鉴于中晚唐五代藩镇割据、武人跋扈的危害，逐渐解除了节度使掌管的兵权、财权和司法权，并在同时建立了新的行政制度和兵役制度。宋代地方政区主要是州、县两级，长官称为知州、知县；（后来在州上设路）重要地方设府，与州平行，长官称知府；州、府又设通判，与知州、知府协理，起

①参见《唐会要》卷三五刘栖楚奏章，已见前引。

监察牵制作用。宋代兵制，大致可分为禁军、厢军、乡兵三种。

禁军属于正规军队，直接由中央控制和指挥，一部分驻守京师，一部分戍守边防，三年轮换一次，史称更戍法。与中央禁军有关的乐团只有钧容直，它始建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是从军队中选拔擅长音乐的兵士组成，在皇帝出外游玩时，扈从奏乐，后来并入教坊。① 就笔者目前所见材料而言，驻扎在京师的中央禁军并未设乐营以处女妓，有时非用不可，也须去雇请开封府与临安府衙前乐人或市井艺妓，如南宋绍兴年间中央军驻跸在杭州时，"殿岩杨和王因军士多西北人，是以城内外创立瓦舍，招集妓乐，以为军卒暇日娱戏之地"。②这是一种临时性措施，因为靖康之乱后，北方中原已经沦陷，来自西北的军士难免思亲想家，所以，杨和王特为军卒招集妓女娱戏，以求稳定军心。谢桃坊《宋代歌妓考略》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 宋代中央禁军有官妓隶军籍，宋人魏泰《东轩笔录》卷四记苏舜钦在进奏院值节日招馆阁同舍合乐会宴，"酒酣，命去优伶，却吏史，而更召两军女妓"；又李元纲《厚德录》记"李和文都尉好士，一日召从官，呼左右军官妓置会夜舞"。这都可见，军中官妓不称营妓。③

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因为魏泰、李元纲这里所说的"两军女

①《渑水燕谈录》卷八："太平兴国中，择军中善乐者名三引龙直，游幸，骑而导驾，后曰钧容直，取钧天之义。"　②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　③见《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4辑。

妓”、“左右军官妓”，并不是中央禁军的官妓，而是开封府衙前乐营中的女妓。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了大量关于左右军艺人(有男有女)表演的活动，并且在卷九明确地说：“第三盏左右军百戏入场，一时呈拽。所谓左右军，乃京师坊市两厢也，非诸军之军。”耐得翁在《都城纪胜》中“瓦舍众妓”条下也说：“百戏，在京师时，各名左右军，并是开封府衙前乐营。”中央禁军在必要时也可能会雇请左右军女妓表演，但与“军中官妓不称营妓”毫无关联。

厢军和乡兵都属于地方军队，由地方长官如知州或知府兼掌。厢军是诸州(府)的镇兵，主要供地方行政上役使。乡兵选于户籍或应募，使之团结训练，主要用于在所防守。由于宋代一直有外扰内乱，政局不稳，因而州府一级所掌管的地方军队，也具有一定的规模。而县级政府一般不掌军事，只有少数备有戍兵的县令兼领兵马钤辖。宋代州(府)、县两级地方政府都承唐制而设有乐营以处乐人妓女，但隶属州、府乐营的妓女，既要为官府服务，也要为军队服务，因此，宋代州、府一级的地方官妓被称为营妓的比比皆是，而县级地方官妓被称为营妓的却并不常见。试择数例列表介绍如下：

营妓活动	资料出处
1.宿州营妓张温卿，色艺冠时，……沈子山为狱掾，最留情焉。	叶申芗《本事词》卷上
2.林希子中，知润州日，子瞻自杭内召，过郡，子中留宴，席间，营妓出牒……。	同上
3.秦少游在蔡州，眷营妓陶心儿。	同上

续表：

营妓的活动	资料出处
4.张文潜初为许州幕官，喜营妓刘淑奴。	叶申芗《本事词》卷上
5.美成在姑苏日，与营妓岳七楚云相恋。	同　上
6.陈诜登第后，授岳州教职，与营妓江柳狎。	同上书，卷下
7.洪景卢守会稽日，营妓惠英歌其自制《减兰》以侑觞。	同　上
8.张先为京兆通判时，“作碧牡丹词，令营妓歌之”。	杨湜《古今词话》
9.豫州守当涂，作诗曰：“欧倩腰支柳一涡，大梅权作小梅歌……”欧、梅，当涂营妓也。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七
10.(王介甫过扬州，)刘原父作守，以州郡礼邀之，遂留方营妓列庭下。	赵德麟《侯鲭录》卷三
11.宣城守吕士隆，好缘微罪杖营妓。	同上书卷八
12.子瞻通判钱塘……营妓呈状词，以年乞出籍从良。	王銍之《渑水燕谈录》卷十
13.徐州有营妓马盼者，甚慧丽，东坡守徐日，甚喜之。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三
14.(平江太守郑德象)问 营妓之妍丑于师厚，师厚以王薏、赵芷对。	吕居仁《轩渠录》
15.唐宋间，郡守新到，营妓皆出境而迎。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六

上表中所列营妓都隶属州、府一级地方官府，与她们往来唱和甚至相狎相恋的男子，大多是所在官府的官僚，也有一部分是过往的文人或官僚，不过，营妓同他们交往都是在得到本州(府)长官同意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些妓女，由于负有为官府和军营服务的双重职责，因而既可以称为官妓，也可以称为营妓。例如第九例和第十一例中所说的同一妓女，在另外的书中就被称

作官妓。① 这也说明，宋代的营妓就是地方官妓，但由于她们有时也为军营服务，所以仍可称为营妓。从现有史籍来看，宋代记载营妓活动的资料远远多于唐代，其原因大致有二，首先是宋代凡州府一级负有既为官府服务也为军队服务双重责任的乐营妓女都可称为营妓，因而其绝对数字可能多于唐代。其次，宋代兼掌地方军权的州、府长官都是由朝廷所派文官充任的，他们常常把自己与营妓交往的活动写入诗词或文章、笔记之中，因而见于记载的营妓，宋代比唐代多得多。

从总体上说，宋代地方官妓在唐代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但由于理学渐炽，吏议渐严，大约从北宋仁宗时就开始对官吏狎妓有所限制，并继而采用行政处罚手段，对官吏宿娼行为加以控抑。试于北宋、南宋各举一例如下：

> 宋时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熙宁中，祖无择知杭州，坐与官妓薛希涛通，为王安石所执，希涛榜笞至死，不肯承伏。（《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一引《委巷丛谈》）
>
> 天台营妓严蕊，……色艺冠一时。……唐与正守台日，酒边尝命赋红白桃花……与正赏之双缣。……其后，朱晦庵以使节行部至台，欲摭与正之罪，遂指其尝与蕊为滥，系狱月余。蕊虽备受棰楚，而一语不及唐，然犹不免受杖，移

①欧、梅又称官妓事见吴曾《能改斋词话》卷二。吕士隆所笞营妓又称官妓事见魏泰《临汉隐居诗话》。

籍绍兴。且复就越置狱鞫之，久不得其情。狱吏因好言诱之曰："汝何不早认，亦不过杖罪，况已经断罪，不重科，何为受之辛苦邪？"蕊答曰："身为贱妓，纵是与太守有滥，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汙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其辞既坚，于是再痛杖之，仍系于狱。两月之间，一再受杖，委顿几死。（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

薛希涛与严蕊都是宁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愿出卖情人，才终于使祖无择、唐与正免遭处分。当然，官吏与官妓私通，只要做得秘密而不被中央发现，也可逍遥法外。如张安道守成都时，与官妓陈凤仪私通有时，两情甚洽，并给陈写过许多情书。过了几年后，张升任尚书，恐人摘其隐私，便委托姻亲王仲仪致书陈凤仪，把所有情书交王仲仪一并烧掉，才消除心头隐忧。① 但总有因疏误不秘而被中央发现并查实的，那就难免要受到一定的处分了。例如，刘涣知并州，因与营妓有私而谪为磁州通判；②蒋堂知益州，因私官妓而迁河中府；③ 苏舜钦提举进奏院，因召两军女妓置会为人所发，竟被削籍为民。④ 熙宁年间，"两浙路张靓、王庭圭、潘良器等，因阅兵赴妓乐筵席侵夜，皆黜责"。⑤这种行政处罚制度实行以后，尽管还是有许多官吏，尤其是一些文人士大夫如苏轼等，仍然我行我素，不以为然，但总的说来，这对于宋代地方官妓的发展，无疑起到了一

①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一。 ②《宋史·刘涣传》。 ③《宋史·蒋堂传》。 ④魏泰《东轩笔录》卷四。 ⑤同④卷十一。

定的控抑作用。

由于宋制一方面规定地方官妓向官府提供的服务只限于歌舞佐酒，而不准侍寝献身，一方面却又允许她们面向城市为文人、商人、市民等提供声色服务以自养，如柳永在未做官时每过一地都照例眠花宿柳，从而促使地方官妓逐步与市妓融合，至元代，地方官妓与市妓就基本上合二而一了。

元代地方机构的设置依次为行省、路、府、州、县，地方各级官府治下和京师都有入籍妓女，也都可称为官妓，但元代官妓的管理和服务方式已有所变化。

首先，全国官妓实行统一注籍，分级管理，所有乐人的户籍都要报教坊司备案，京师官妓直接由教坊司派宦官钤辖，地方官妓则由各地方官府管理。据《元史·刑法志》："诸倡妓之家，辄买良人为倡，而有司不审，滥给公据，税务无凭，辄与印税，并严禁之，违者痛绳之。"可见元代已有花捐制度。凡女子入籍为娼，必须纳税，并且要经有司审核后发给执照（公据），方可营业。妓女纳税，也必须发给凭证，以便清查。正因为如此，元代对妓女实行统一注籍发照。唐宋官妓落籍从良，只须官府长官同意即可，元代则还须报请教坊司同意。这样，既可保持乐籍人数的稳定性，从而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又有利于限制地方官僚随意准良为娼或准娼从良。

其次，在经营方式上采用义务制和买卖制，实行多元服务。所谓义务制，是指官妓必须无条件地应召到官府"当番承应"，也叫"应官身"。京师官妓当番承应有二种方式，一是进宫参加大的庆典活动，表演歌舞伎艺；二是接待外宾："每当外国

专使来到京都，并负有关系大汗利益的使命，照例由皇家招待。为了对外客表示盛情的款待，特别命令总管给使节团的每一个人每夜送去一个高等妓女，每夜换一个人。妓女们也把这种差役看成是自己对皇帝应尽的义务，所以不收取任何报酬。”①地方官妓的当番承应，则与宋代一样，只限于歌舞佐酒，不准向官僚献身。“应官身”是官妓第一位的职责，凡官府需要妓女当番，必须随叫随到，违者或怠慢者都要受罚。由于各地官妓都有等次之分，所以实际上经常应官身的总是那些色艺超群的高级妓女，元杂剧中多处写到的上厅名妓、上厅行首，就是这类女子。常被召去应官身的妓女，虽然会因此而名声远播，但这种服务是不付报酬或付酬极低，加之有时还难免会因疏误而受责，所以她们对于应官身并不热心，甚至充满怨尤，如谢天香就说：“咱会弹唱的，日日官身；不会弹唱的，到得些自在。我怨那礼案里几个令史，他们都是我的掌命司，先将那不会弹不会唱的除了名字，早知道则做过哑猱儿。”②

所谓买卖制，则是指官妓向所在城市的文人、商人、市民等卖艺卖身。这成为她们衣食之费的主要来源，其性质与市妓毫无二致。但也不许向在职官僚卖身，违者一经朝廷发现，其处罚比宋代更重。《元史·刑法志》曰：

> 诸职官频入茶酒市肆及娼优之家者，断罪罢职。……诸职官与倡优之妻奸，因娶为妾者，杖七十七，罢职不叙。

①《马可·波罗游记》第十一章。　②关汉卿《谢天香》。

当然，正是因为元代官僚宿娼狎妓和娶娼为妾的现象当时较为普遍，才采取法律的手段来严加控抑的。如正元十五年(1278)，中书省派官员到各路视察时，就发现有许多“官豪势要富户之家，舍不痛资财，买不厚之乐，强将应有成名善歌舞能装扮年少堪以承应妇人，暗地捏合媒证，娶为妻妾”。① 至大四年(1311)八月也发现并处罚了辛洽恩强娶乐人做媳妇一事。② 《至治条例》中还详细记载了一桩职官宿娼的个案：

> 至治元年(1321)四月　日，福建宣尉司奉江浙行台扎付：近据建康路申教坊司，乐户张成状告江宁县魏县尉同上元县张县尉，延祐六年正月初九日，各官将引弓手周二等，将成女张姣姣并男妇奔子，叫同于应家楼上饮酒讴唱罢，各官将姣姣等奸宿一夜，与成中统钞二定二十两。……俱系命官，污滥不法。合准江浙行省所拟，各笞四十七下，比例，解见(现)任，别求行仕，标附过名。外据张成已首钞两，准拟没官。③

魏居仁、张义二位县尉只因与张姣姣等奸宿一夜，就被笞四十七下，革职不叙，可见元代对于官僚宿娼处分甚严。

元代地方官妓与市妓的合而为一和元代对于职官宿娼的严厉惩处，不仅抑制了地方官妓的发展，而且使她们日益失去了原有的个性，从而逐渐走向被市妓所同化、所替代的道路。当历史进入明代以后，地方官妓终于由于政府的禁止和革除而结

①②《元典章》卷十八。　③引自《沈刻元典章》。

束了她们的风流使命。

关于明代禁止与革除地方官妓的具体时间，尚有争论，主要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明太祖时就革除了，如王琦在《寓圃杂记》卷一说："唐宋间，皆有官妓祇候，仕宦者被其牵制，往往害政，虽正人君子亦多惑焉。至胜国时，愈无耻矣，我太祖尽革去之。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虽遇赦，终身弗叙，其风遂绝。"第二种意见则认为至宣德初年才开始禁革，这是谢肇淛的观点，① 侯甸则明确指出是顾佐奏请皇帝革除的，② 时间恰好也是在宣德前后。不过，侯甸等人说明初有官妓，往往是列举明太祖于金陵聚宝门外建十六楼以处官妓为例，那么，第二种意见认为宣德间所革除的并不是地方官妓，而是十六楼等国营妓院。据刘辰《国初事迹》载，明太祖初建这些商业性质的国营妓院时曾经下令："禁文武官及舍人不许入院，止容商贾出入院内。"有名叫做马合谋的官员到富乐院宿娼，事情败露后，朱元璋对他进行了严厉惩处。由此可见，所谓富乐院或十六楼的妓女，虽然是由官府经营的，但实质上是为商人、市民服务的，应该称为市妓。

综上所述，在性文化比较开明的唐代得以发展兴盛的地方官妓，固然给文人士大夫的仕宦生涯带来了浪漫的情调和诗意

①谢肇淛《五杂俎》卷八。　② 侯甸《西樵野记》曰："国初于京师尝建馆十六楼于聚宝门外，以宿商贾。时虽法度严密，然有官妓，诸司每朝退，相率饮于妓楼，咏歌侑酒，以谋斯须之欢，以朝无禁令故也。厥后浸至淫放，解带盘薄，牙牌累累悬于窗楅，奔日喧呶，政多废弛。于是中丞顾公佐始奏革之。故挟妓宿娼者有律耳。"

的欢乐，但同时也不断地麻醉或腐蚀着文人士大夫的意志与灵魂，因而随着宋代理学的兴起，性观念逐渐趋向保守，统治者便首先采取法律手段对地方官僚的宿娼行为加以控抑，同时通过经济措施不断促使地方官妓向市妓转化。至明初程朱理学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地方官妓的被禁止、被革除则成为了一种历史的必然。以后我们根本找不到象“唐宋间，郡守新到，营妓皆出境而迎”①的场面，也难以发现象宋元时代妓女经常应官身的情景。至于缙绅豪富之家或也有时唤妓至家歌舞佐酒，那是要付报酬的，这种服务也不叫应官身，而叫妓女出局，这些妓女也不是地方官妓，而是市妓，甚至整个明代都可称为市妓主宰花坛的时代。

3·3 市妓的发展与兴盛

所谓市妓，是指入籍的市井妓女，她们公开活跃于各繁华城镇，主要向文人、商人、市民等各阶层人士提供声色服务，但有时也要为官府服务。

市妓是伴随着都市文化的发展而产生的。隋以前虽然已经有了市妓的萌芽，但由于都市文化发展缓慢，因而市妓的影响并不很大。当历史进入唐代（尤其是中唐）以后，社会的经济结构逐渐发生了变化，商业的发达使得城市经济日趋繁荣。一个新的阶层——市民阶层正在勃兴，一种与农耕文化不同的新

①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六。

文化——都市文化开始形成。在这种新的文化气息的感召之下，美丽的妓女终于从皇宫深宅和贵族大院中走了出来，开始成群结队地出现在城镇各阶层人士面前。她们的轻歌曼舞，她们的仪态风情，不能不令那些多情的文人、多钱的商人和多闲的市民销魂荡魄，神晕目转。于是，她们自己和她们所居住的歌楼酒馆，迅速成为都市娱乐生活的中心，从而使得刚刚形成的都市文化日益绚烂多姿：

> 俱邀侠客芙蓉剑，共宿娼家桃李蹊。娼家日暮紫罗裙，清歌一啭口氛氲。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骑似云。……罗襦宝带为君解，燕歌赵舞为君开。

这是初唐诗人卢照邻的名作《长安古意》中的一段，表面上叙写的是汉代的题材，实际上正是当时长安生活的缩影。尽管诗中那些共宿娼家的男子还多是贵族与侠客，但表现出来的精神却较多地体现了市民的情调："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这又何尝不是市民阶层所欣赏的人生态度呢？另外，骆宾王的《帝京篇》、乔知之的《倡女行》等诗作也反映了当时娼家的生活。由此可见，市妓在初唐时已经比较活跃；至盛唐，则已初具规模。据《开元天宝遗事》载：

> 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牋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

长安富家子刘逸、李闲、卫旷，家世巨豪，而好接待四方之士。……每至暑伏中，各于林亭内植画桂，以锦绮结为凉棚，设坐具，召长安名妓间坐，递相延请，为避暑之会。时人无不爱羡也。

可见，开元天宝年间，平安坊就成了长安的风流薮泽，妓女营业服务已有居馆迎客和应召出局两种方式。

中晚唐市妓已有较大发展，不仅长安的市妓非常活跃，其他繁华城市如洛阳、太原、襄阳、扬州等也颇有艳名。长安市妓集中居住于平康里一带，妓女在自由竞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定的等级格局，最拔尖的高级妓女住南曲，稍次而优秀者住中曲，最差的卑屑妓女住北曲。妓女籍属教坊，经济上、行动上受假母控制和支配，营业服务时则由“都知”分管诸妓，追逐匀齐。而所谓“都知”，则是从曲内妓女中挑选最优者来充当的。妓女为嫖客服务的方式主要是佐酒与献身，有时也表演歌舞伎艺，甚至经过假母同意后，还可陪伴嫖客在城内游玩，或参加都市的大型集会。侍宴佐酒时，每一席往往由一名妓女充当席纠（或曰酒纠、录事）监行酒令。充当席纠的妓女，必须要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和敏捷的口才，方能使狎饮者满意，因而席纠多由高级妓女来充当。当时，京师召妓侍宴的风气颇为盛行，“凡朝士宴聚，须假诸曹署行牒，然后能致于他处，惟新进士设筵顾吏，故便可行牒，追其所赠之资，则倍于常数”。① 原因之一是，每次进士试后都由皇帝在曲江宴请进士，有的妓

①孙棨《北里志序》。

女被唤去侍宴作乐，亲眼目睹过进士的风采和受宠的情景，加之妓女大多倾慕进士的风流才情，故一招即到。原因之二是，新进士尚待封官，还没有所属的官署，故可直接行牒。

除长安之外，当时扬州市妓也已名扬海内。据于邺《扬州梦记》说："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杜牧在扬州担任书记时，常常出没其间而无虚夕。他的上司牛僧孺出于关心，暗地派人易服跟踪，充当保镖，达数年之久。后来杜牧写诗感旧曰："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情。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张祜也作《纵游淮南》诗曰："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他这里所说的"神仙"，就是指妓女。

五代都市经济遭到破坏，市妓又多被搜罗到那些占地为王的军阀身边。有些城镇如成都、南京等，由于经历战争骚扰较少，经济仍然比较繁荣，所以仍有市妓活跃其间，但已不如中晚唐之势，也无什么新的特色，故略而不论。

宋太祖统一全国后，城市经济迅速复兴，市民队伍进一步扩大，都市生活也更加丰富多彩，尤其是宋代的首都比唐代的首都更具有商业个性，更富于市民情调。唐代长安是城中分坊的建筑格局，不仅四周有围墙护城，而且城内每一坊也有墙有门。全城除广大的皇城外，共一百零八坊，另有东西两个市集作为商业中心。而市妓却全部集中在平康坊，并且每至日暮即鼓响，全城开始夜禁，城门和坊门一关闭，市内的夜生活就受

到了限制。北宋初年的汴京，也有坊的设置；但到庆历以后，坊制逐渐废弛；至熙宁年间就名存实亡了。此后北宋的汴京和南宋的临安，不但没有夜禁，而且“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① 妓女不仅遍布城内外东西南北，而且可以通宵灯红酒绿，浅酌低唱。这就使宋代的市妓在中晚唐格局规模的基础上得以疯狂的发展，并增添了新的内容和特色。

首先，宋代出现了大量的勾栏妓。据《东京梦华录》载，至北宋崇宁、大观年间，瓦舍几乎已遍布汴京东西南北四域，瓦舍规模最大的，有大小勾栏棚五十余座，可以容纳数千人。瓦舍勾栏中的主要演员，多是妓女，如“小唱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孙三四等”、“嘌唱弟子张七七、王京奴、左小四、安娘、毛团等”，几乎不可胜数。市民观众，与其说是来看杂剧歌舞等伎艺，不如说是来看妓女演员，故“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南宋临安的瓦舍勾栏比北宋汴京更多，据吴自牧《梦粱录》统计，临安城内外共有十七处瓦舍，而周密在《武林旧事》中则点出了二十三处，每处瓦舍中都有若干座勾栏，其中以“北瓦内勾栏十三座最盛”。瓦舍勾栏中上演的技艺名目繁多，诸如小说、讲史、小唱、诸宫调、合生、武艺、杂技、各种傀儡戏、影戏、杂剧、说笑话、猜谜语、舞蹈、滑稽表演等等。其中的女艺人都称为勾栏妓，她们色艺兼优，魅力夺人，不仅使市民、文人为之倾倒，甚至连拥有三宫六院的宋徽宗也被李师师的魅力所征服，使他不顾帝王之尊，微服

①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私访，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勾栏妓主要是向市民观众卖艺，有时也要卖身。

其次，宋代酒楼、歌馆的妓女空前发达。为有利于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宋代自太宗起就开始实行了官卖酒制度，后来至神宗时又开“设法卖酒”之风。所谓“设法卖酒”，起先是分派妓女坐于酒肆弹唱作乐，以诱使人们买酒和饮酒。但由于慕妓女艳名而来的饮者猛增，竟至斗殴，政府又只好派军士来弹压，以维护正常的卖酒秩序。直到人们对于妓女卖酒习以为常，不再起哄之后，才取消军士弹压之制。这些妓女大多都是平康市妓，由官府轮流分派而来，“凡官设法卖酒者，以次分番供应，如遇并番，一月止一二日也”。① 至南宋时，其花样又有翻新，每年春秋新酒上市开卖时，各酒库特命众妓女乘骑着彩，招摇过市，迎送酒样。每库妓女多达数十人，饮客登楼，则可以名牌点唤侑樽，谓之“点花牌”。②

当然，宋代堪称市妓正宗而又人数众多的，还是那些挂牌营业的平康妓女，她们在专设的妓院歌馆中，公开向各阶层人士提供声色服务。其妓院格局与营业方式，大致与《北里志》中记载的唐代平康三曲差不多，妓女大体上也分为三等，最优秀的妓女往往被称为上厅行首、都行首、行首等。但妓院歌馆的布局比唐代更为合理，妓女的服务方式也比唐代更具市民意味。周密《武林旧事》“歌馆”条下，对杭州市妓的分布和生活方式作了详细描述，特引如下：

---

①《醉翁谈录》丁集卷一《序平康巷陌诸曲》。　②参见《武林旧事》、《梦粱录》。

平康诸坊，如上下抱剑营、漆器墙、沙皮巷、清河坊、融和坊、新街、太平坊、巾子巷、狮子巷、后市街、荐桥，皆群花所居之地。外此，诸处茶肆，清乐茶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连三茶坊、连二茶坊，及金波桥等两河，以至瓦市，各有等差。莫不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凡初登门，则有提瓶献茗者，虽杯茶亦犒数千，谓之“点花茶”。登楼甫饮一杯，则先与数贯，谓之“支酒”。然后呼唤提卖，随意置宴。赶趁、祇应、扑卖者，亦皆纷至，浮费颇多。或欲更招他妓，则虽对街，亦呼肩舆而至，谓之“过街轿”。前辈如赛观音、孟家蝉、吴怜儿等甚多，皆以色艺冠一时，家甚华侈。近世目击者，惟唐安安最号富盛。凡酒器、沙锣、冰盆、火箱、妆合之类，悉以金银为之。帐幔茵褥，多用锦绮。器玩珍奇，它物称是。下此虽力不逮者，亦竞鲜华，盖自酒器、首饰、被卧、衣服之属，各有赁者。故凡佳客之至，则供具为之一新，非习于游者不察也。

南宋的杭州，简直成了一个金钱与色情的广交会。唐安安不仅是众所瞩目的花王，而且成了娼妓阶层的贵族，以至于理宗也把她呼入禁内，爱而幸之。① 目睹此情此景，难怪林升会写诗感叹说：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

①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

直把杭州作汴州。（《题临安邸》）

再次，宋代市妓中的高级妓女也继承了唐代妓女的传统，她们仍然喜爱文士，倾慕才情，尤其是对一些风流倜傥的诗人、词人情深意长。试以柳永与众名妓的关系为例：

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皆其为人出入所寓不常。耆卿一日经由丰条(乐)楼前。是楼在城中繁华之地，设法卖酒，群妓分番，忽闻楼上有呼“柳七官人”之声，仰视之，乃甲(角)妓张师师。师师要俏而聪敏，酷喜填词和曲。与师师密。及柳登楼，师师责之曰：“数时何往？略不过奴行，君之费用，吾家恣君所需，妾之房卧，因君罄矣！岂意今日得见君面，不成恶人情去，且为填一词去。”柳曰：“往事休论。”师师乃令量酒，具花笺，供笔毕。柳方拭花笺，忽闻有人登楼声。柳藏纸于怀，乃见刘香香至前，言曰：“柳官人，也有相见。为丈夫岂得有此负心！当时费用，今忍复言。怀中所藏，吾知花笺矣。若为词，妾之贱名，幸收置其中。”柳笑出笺，方凝思间，又有人登楼之声。柳视之，乃故人钱安安。安安叙别，顾问柳曰：“得非填词？”柳曰：“正谈你两姐姐所苦，令我作词。”安安笑曰：“幸不我弃。”柳乃举笔，一挥乃至。三妓私喜：“仰官人有我，先书我名矣。”乃书就一句：“师师生得艳冶，”香香、安安皆

不乐，欲掣其纸。柳再书（第二句）云："香香于我情多，"安安又嗔柳曰："先我矣！"挼其纸，忿然而去。柳遂笑而复书（第三句）云："安安那更久比和，四个打成一个。（过片）幸自苍皇未款，新词写处多磨，几回扯了又重挼，奸字中心着我。"（曲名西江月）三妓乃同开宴款柳。（《醉翁谈录》丙集卷二）

柳永走到哪儿，哪儿就有妓女追求他，接纳他，不仅不要他付钱，而且还送钱给他，恣其所需。所以柳永曾由衷地写道："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①据此可见宋代市妓与文人关系之一斑。但由于宋代已有禁止职官宿娼的律令，因而与妓女关系密切的文人，多为举人、太学生，或刚刚考上进士而尚未授官者。据周密说，当时太学生于学舍宴集，必点一名妓女来侍宴佐酒。他们只要写一份帖子，写明时间地点和所请妓女的花名，她们都会准时赴会。②太学生也可经常到酒楼歌馆去宿娼，以致各酒库的"名娼皆深藏邃阁，未易招呼。……往往皆学舍士夫所据，他人未易登也"。③另外，士子赴殿试唱名之后举行宴会时，宋代妓女也仍象唐代一样与会侍宴作乐。④

元代不仅市妓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地方官妓的商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因此，从妓女生活史的角度来说，元代已经

①柳永《鹤冲天》词。　②周密《癸辛杂识》。　③周密《武林旧事》卷六。　④吴自牧《梦粱录》卷三。

进入了地方官妓与市妓逐渐融合的时代。元代市妓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活跃于各城市瓦舍中的勾栏妓。她们多是杂剧演员、歌星、舞星等，主要靠卖艺挣钱，有时也以色侍人。夏庭芝《青楼集》中所收录的一百多名妓女，多是元代勾栏妓中的出类拔萃者。他说："我朝混一区宇，殆将百年。天下歌舞之妓，何啻亿万，而色艺表表在人耳目者，固不多也。"① 可见元代勾栏妓兴旺发达之盛况。由于她们表演的杂剧和歌唱的散曲是当时最受人激赏的艺术形式，因而，她们的活动并不限于京师，而是遍布全国各繁华城镇："内而京师，外而郡邑，皆有所谓勾栏者，辟优萃而隶乐，观者挥金与之。"② 这是南宋所不能比拟的。

一类是活跃于各城镇妓院、酒馆的平康妓。尽管她们之中也不乏色艺兼优者，能以歌舞佐酒，声色并进，但大多主要是以色相来吸引嫖客，靠卖笑、卖身挣钱。《马可·波罗游记》就记载了当时这类妓女活动的情形：

> 新都城和旧都（均指大都）近郊公开卖淫的娼妓达二万五千余人。每一百个和每一千个妓女，各有一个特别指派的宦官监督，而这些官员又受总管管辖。（第十一章）
>
> 那些以卖淫为生的妇女，除暗娼人不知道以外，不许在城内开业，全部限制在郊区。……那里有二万五千名娼妓，无数商人和其他旅客为朝廷所吸引，不断地来来往往，

①②夏庭芝《青楼集志》。

络绎不绝。娼妓数目这样庞大，还不够满足这样大量商人和其他旅客的需要。（第二十二章）

这是北京市妓的情况。马可波罗后来到南方旅游考察时，发现杭州市妓比北京也毫不逊色。他说：

在其他街上有妓女，人数之多，简直使我不便冒昧报告出来。她们麇集在方形市场附近——这是妓女们平时居住的地方——而且，在城里的每个角落，都有她们寄迹的行踪。她们浓装艳服，香气袭人，住在陈设华丽的住所，还有许多女仆，跟随左右。这种女人，拉客的手段十分高明，献媚卖俏，施展出千媚百态，去迎合各种嫖客的心理。游客们只要一亲芳泽，就会陷入她们的迷魂阵中，弄得如痴如醉，销魂荡魄，听凭摆布，流连忘返。他们沉湎于眠花宿柳的温柔之中，真有乐不思蜀之叹。但一回到他们自己家里，他们总说自己曾经游过杭州，或者说游过天堂，并且希望有朝一日，能重登这种人间仙境。（第七十六章）

明代废除了地方官妓，开始真正进入了由市妓主宰花界的时代，尤其是明中叶以后受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市妓的发展达到了历史上的巅峰状态。

尽管在程朱理学居于专制统治地位的明前期所推行的是一种锢性文化观，尽管政府在革除官妓的同时也严格地禁止职官

狎妓宿娼，但商业经济的活跃和都市生活的骚动，仍然呼唤着妓女的投入，刺激着卖淫业的发展。刘辰《国初事迹》所说的明太祖立富乐院于乾道桥，余怀《板桥杂记》所提到的明初建十六楼，就纯粹是一种商业手段，目的是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所以，太祖一方面让妓女、娼夫居住其中，专门派礼房吏王迪管领；一方面又“禁文武官及舍人不许入院，止容商贾出入院内”。后来因故失火，烧毁了这座风流院，朱元璋虽然在一怒之下对院内男子妇人处以重罪，但他还是不愿放弃这个一本万利的人肉市场，复移武定桥等处重建楼院（即余怀所说的十六楼），又搜罗各地妓女入院继续营业。这实际上是一批由国家直接经营管理的妓院，比宋代的“设法卖酒”制度走得更远，它已不是以售色来辅助经商，而是赤裸裸地把妇女当作商品来拍卖。据余怀《板桥杂记》说：“洪武初年建十六楼，以处官妓，淡烟、轻粉、重译、来宾，称一时韵事。自时厥后，或废或存，迨至三百年之久。而古迹寖湮，所存者惟南市、珠市及旧院而已。”所谓南市、珠市及旧院，就是指明太祖所建十六楼中有三座至明末尚存。其他一些楼院之所以废而不存，除了有自然坍塌者外，可能是由于永乐十九年(1421)朱棣迁都北京后，对十六楼卖淫业由直接经营改为间接（收税）管理所致。

事实上，明代市妓管理的主要方式，都是由政府实行宏观控制，通过注籍收税来间接管理。南京与北京都设教坊司钤辖，其他城镇则由各地方官府钤辖，而具体经营则是由鸨母或龟奴自主，妓女由龟鸨直接控制和支配，龟鸨向政府负责（注籍纳税）。

例如洪武年间“驸马都尉欧阳某，偶挟四妓饮酒”，① 宣德年间周子敬所恋河南妓女刘盼春，② 景泰天顺年间与杨俊甚密的京师娼女高三，③ 成化间金陵妓杨玉香和林奴儿，④ 弘治、正德间陕西盩厔县妓女王兰卿，⑤ 以及康海罢职回陕西后“尝生日邀名妓百人，为百年会”⑥ ……这些女子都是市妓。从上述信手拈来的例子中就可看出，明前期各地都有市妓。同时也说明，在统治者推行锢性文化的明前期，市妓虽然失去了（或很少有）职官身份的狎客，但市民的追花逐柳，商人的豪爽使钱，足可使她们门庭若市，生意兴隆。

商人和市民在不惜金钱追求快乐、刺激的同时也养育了妓女，而妓女和以冶游为中心的都市生活又反过来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经济的繁荣，至嘉万年间，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幼芽终于在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城市开始生长。这种历史发展的新信息，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便是在批判程朱理学、反对传统束缚和谴责专制弊政的趋向中，迎来了人性解放思潮的兴起。这时，哲学家大肆鼓吹遂性遂欲，追求个性解放；文学家也高声呼喊贵生主情，号召人们为情而生、为情而死；广大市民则一呼百应，更加珍惜现实人生，及时行乐，终于使得整个社会从锢性走向遂性，从制欲走向纵欲。于是，同纵欲的要求联系最密切的妓女阶层在这时便迅速顺应时

①冯梦龙《情史·情芽类》。 ②朱有燉《刘盼春香囊怨·小引》。③王琦《寓圃杂记》卷一。 ④杨玉香事见《情史·情灵类》。林奴儿事据《列朝诗集小传》引《金陵琐事》。 ⑤梅禹金《青泥莲花记》卷六。⑥《列朝诗集小传》丙集。

代的潮流而得以疯狂的发展。先看几条材料：

今时（指万历时）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它穷州僻邑，在在有之。终日倚门卖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两京教坊，官收其税，谓之脂粉钱。隶郡县者则为乐户，听使令而已。（谢肇淛《五杂俎》卷八）

——这是就全国各地娼妓之盛况而大体言之。

燕赵佳人，颜美如玉。盖自古艳之。矧帝都建鼎，于今为盛。而南人风致，又复袭染熏陶，其艳宜惊天下无疑。万历丁酉庚子间，其妖冶已极。（《燕都妓品·叙》）

近世风俗淫靡，男女无耻。皇城外娼肆林立，笙歌杂遝。（《梅圃余谈》）

——这是就北京娼妓之盛况而言之。

广陵二十四桥风月，邗沟尚存其意。……巷故九，凡周旋折旋于巷之左右前后者什百之。巷口狭而肠曲，寸寸节节有精房密户，名妓、歪妓杂处之。名妓匿不见人，非向导莫得入。歪妓多可五六百人，每日傍晚，膏沫薰烧，出巷口，倚徙盘礴于茶馆酒肆之前，谓之“站关”。（张

俗《陶庵梦忆》卷四）

——这是就扬州市妓之盛况而言之。

而明代娼妓最盛之城当推南京。钱谦益在《金陵社夕诗序》中说："陪京佳丽，仕宦者夸为仙都，游谈者据为乐土。"并接着对南京的娼妓和冶游的情况分为四个时期作了概括描述。他认为，弘正之间，为"风流孔长"时期，嘉靖中年始盛，万历初年再盛，万历末则极盛也。余怀的《板桥杂记》则详细记叙了南京妓院的格局规模和冶游盛况。南京妓女分为三等，分布于南京、珠市和旧院三个区域："南市者，卑屑妓所居；珠市间有殊色；若旧院则南曲名姬、上厅行首皆在焉。""妓家分别门户，争妍献媚，斗胜夸奇。凌晨则卵酒淫淫，兰汤艳艳，衣香一园。亭午乃兰花茉莉，沉水甲煎，馨闻数里。入夜而拆笛挡筝，梨园搬演，声彻九霄。"著名妓女顾媚、董小宛、郑妥娘、李贞丽、卞赛、王月、李香君等，都曾在秦淮河边各领风骚三五年。

清军入关，中原板荡，各主要城市的秦楼楚馆也相继遭到破坏。直到清朝政局稳定，城市经济逐步恢复正常秩序之后，四处躲藏的妓女才又逐渐汇入城镇，重操旧业。例如顺治年间仅苏州城就曾两度开设花榜，品定高下，① 可见苏州市妓已恢复旧观。至康熙年间，则各城镇的市妓都已比较活跃，如朱彝尊所狎代州妓白狗，汤西厓所悦江阴妓红娘子，与赵执信情密的天津妓蕊枝、玉素、珍珠、金钱等，都是康熙年间声闻遐迩的名

①徐珂《清稗类钞》第十一册《娼妓类》。

妓。[1] 但总的说来，清初市妓已远不如晚明之盛。至清世宗即位于雍正元年下令废除乐籍制度时（后文还将详细论述，此处从略），市妓也随之结束了她的历史使命。遗憾的是雍正皇帝所制定的对于逼良为娼和自愿为娼者均依律治罪的制度，并未彻底地、长期地贯彻下去，因而许多市妓并没有真正地改业为良，只不过从公开卖淫变为暗地为娼罢了。此后的中国妓女史，开始进入了私妓主宰花坛的时代。

3·4 历代乐籍制度及其对妓女的贱视

乐籍制度是从古代罪犯家属没籍为奴和奴隶世袭制度发展而来的。汉代已有的所谓"故倡"，实即后代所说的世袭乐户。北魏则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凡罪犯的妻子没籍为乐户。[2] 但直至隋代以后，乐籍制度才得以延续实施，历经唐宋元明而不改，一直到清代雍正元年才被革除。

隋文帝统一全国后，北齐、北周和南朝梁、陈的乐工，都为隋所有。开皇初年，文帝将他们遣放为百姓。炀帝即位后，矜奢好乐，御史大夫裴蕴"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齐、梁、陈乐家子弟，皆为乐户。其六品已下至于民庶，有善音乐及倡优百戏者，皆直太常。是后，异技淫声，咸萃乐府，皆置博士弟子，递相教传，增益乐人至三万余"。[3] 将前代乐工子弟及善

①徐珂《清稗类钞》第十一册《娼妓类》。 ②《魏书·刑法志》已见前引。 ③《隋书·裴蕴传》。

歌舞伎艺者收编为乐户，这是隋代乐户的一个重要来源。其中有些乐人子弟即使在改朝换代之际已经立功升官，但官在六品以下者，仍须隶属太常乐籍，仅此就可睹乐籍制度的弊端之一斑。隋代乐户还有一个来源，那就是将罪犯之家有音乐技能者配没为乐户，如万宝常就是因为父亲万大通犯罪伏诛而被配没为乐户的，① 司马消难则是自己犯了死罪由于皇帝特殊赦免而配为乐户的。②

作为一个阶层的法律地位往往是他们的社会身份最准确的表现。可惜隋律没有传留下来，关于隋代乐户的社会地位已不能准确获知。但唐律是沿袭隋律的，并且在唐初的有关文献中也偶有涉及隋代乐籍制度的。因此，我们下文将要考察的唐代乐籍制度及乐户的社会地位，也可以作为隋代乐户身份的一个参照。

据《新唐书·礼乐志》载："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所谓唐之盛时，当指玄宗开元、天宝时期无疑，但从开元二年起，太常与教坊已实行分司管理，这里所说的数万人，是仅指籍属太常及鼓吹署的音声人，还是包括籍属教坊的音声人，尚有待考证。不过，至少可以肯定，各地方官府和军镇所管辖的乐工、女妓是未计在内的。据《明皇杂录》中的一条材料：唐玄宗在洛阳命三百里内县令刺史率其声乐前来汇演时，仅河内郡守就率有乐工数百人赴会。由此推算，当时全国乐工、女妓的总数至少有十万之巨。

①《隋书·万宝常传》。　②《资治通鉴》卷一七七。

唐代如此众多的乐工、女妓，其来源不外三个：一是乐户的世袭，既包括前代遗留下来的乐户，也包括本朝新增的乐户，一旦入籍，子孙相承，累世不改。二是从罪犯之家没籍的官奴婢中选择有伎艺者充当。据《旧唐书·职官志》说："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凡初被没有伎艺者，各从其能而配诸司，妇人工巧者入于掖庭。"例如咸通十三年(872)五月"决杀殷裕，籍没其家。殷裕妻崔氏，音声人郑羽客、王燕客、婢微娘、红子等九人，配入掖庭"。① 又据《通典》卷一四六说："国家每岁阅司农户(即官奴婢)，容仪端正者归太乐，与前代乐户总名音声人。历代滋多，至有万数。"可见从官奴婢中选择优秀者入乐籍，是唐代每岁必行的例常制度。三是各地方官僚从贫困农民中掠买善伎艺者向朝廷进献。据《册府元龟》卷一六八《帝王部》"却贡献"条记载："元和元年八月，韩全义之子进女乐八人，并入见，帝……遂不受。……六年四月，以张茂昭妓乐女子四十七人归之。……十四年六月己酉，韩弘进女乐十人，命还赐之。癸丑，又进女妓二十人，命放还本道。……文宗以宝历二年十一月即位，是月，凤翔府、淮南进女乐二十四人，放还本道。"虽然都是皇帝归还女妓的事例，但据此可以知道当时进献女妓之风盛行。

凡隶属乐籍的男女老少，在社会生活中都受贱视。唐高祖曾于武德四年(621)九月二十九日下诏曰："太常乐人，本因罪谴，没入官者，艺比伶官。前代以来，转相承袭。或有衣冠继绪，公卿子孙，一沾此色，累世不改。婚姻绝于士庶，名籍异

①《旧唐书·懿宗纪》。

于编甿，大耻深疵，良可矜愍。其大乐鼓吹诸旧乐人，年月已久，时代迁移，宜并蠲除，一同民例。但音律之伎，积学所成，传授之人，不可顿阙，仍令依旧本司上下。若已经仕宦，先入班流，勿更追补，各从品秩。自武德元年配充乐户者，不在此例。”① 这份诏令只准许前代部分乐人落籍从良，实际上不过是唐高祖建国初年用以收买人心、安定政局的一种手段罢了。如果我们把这份诏令与《唐律疏议》结合对看，则可以知道唐代乐户的社会地位状况。

首先，乐户的社会身份大致与工户、官户、杂户和部曲差不多，都属于“贱民”阶层，近于奴婢。所谓“名籍异于编甿”，就是由于乐工、女妓的社会身份在良民之下，因而他们没有独立的户口。为便于管理和役使，他们的户籍一部分附编在中央，隶属于太常或教坊（开元二年前都隶属太常，开元二年始，太常与教坊分司管理，各有钤辖），一部分附编在地方，隶属于各地官府或军镇。他们的人身自由受着特殊法律的束缚，无论男女，一旦入籍，累世不改。如有诈去乐户名籍者，一经发现，要判二年徒刑。② 但宫中有时外放的乐工、女妓，则可“除附”为民。如贞元二十一年（805）三月，顺宗“出掖庭教坊女乐六百人于九仙门，召其亲族归之”。③ 又开成二年（837）三月，文宗“出音声女妓四十八人，令归家”。④ 附籍于各地方官府或军镇的乐人女妓，经过行政长官或军事长官批准也可以落籍从

①《唐会要》卷三四。又，《唐大诏令集》卷八一也引此诏，但时间作武德二年八月诏，诏文的内容与此同，惟文字略有差异。 ②《唐律疏议·诈伪门》。 ③《旧唐书·顺宗纪》。 ④《旧唐书·文宗纪》。

良。若未去籍，“虽移乡，从本色”。[①] 如杜牧于“太和三年佐故吏部沈公江西幕，好好年十三，始以善歌舞来乐籍中。后一岁，公移镇宣城，复置于宣城乐籍”。[②]

其次，在婚姻关系上，乐户要“依令当色为婚，若异色相娶，律无罪名，并当违令，既乖本色，亦合正之”。这就是说，乐户男子只能娶乐户女子为妻，乐户女子也只能同乐户男子结婚，如《教坊记》中记载的苏五奴娶张四娘为妻，就是当色为婚。否则，便是异色相娶，那就违背了律令，必须离异改正。但《唐律疏议》卷一三又说：“太常音声人，依令婚同百姓，其有杂作婚姻者，并准良人。”这可能是指那些本是良民出身的音声人，尽管已入乐籍，但她们本人及其父母并未犯罪，因而允许她们婚同百姓。地方官府和军镇管辖之下的妓女要嫁给良人为妻妾，必须经过行政或军事长官批准，先落籍从良，然后才能嫁给良人。

乐籍制度在五代时期仍然在各国延续实施，但多袭唐制，没有什么变化，加之历时不久，故略而不论。

宋代乐籍制度大抵继承唐制而又有所发展。

第一，宋代入籍艺人的数量与规模足可与唐代媲美，但其结构比例已与唐代不同。唐代宫廷艺人多至数万（开元、天宝间仅宫妓就有四万），其盛况空前绝后；地方官妓（包括营妓）次之；市妓始兴，规模又次之。而宋代数量与规模最大的却是市妓，尤其是北宋的汴京和南宋的临安，简直成了市妓的世界；其次是地方官妓（包括营妓），但因宋代开始禁止职官宿娼，使

①《唐律疏议》卷八。　②杜牧《张好好诗序》。　③《唐律疏议》卷一三。

地方官妓的职能开始逐渐向市妓转化；再次是宫廷艺人，北宋尚有一定规模，不仅教坊中萃集了一定数量的“四方技艺之精者”，① 而且还另设有钧容直，可以配合教坊为皇帝与朝廷服务，后来并入教坊。至南宋绍兴末，因经费紧张，索性把教坊也蠲罢了，宫内用乐，则主要“和雇”临安府衙前乐人，衙前乐人不足时再呼市妓充之，令修内司教习所提前两旬教习排练，以能届时从奉御前供应。

第二，宋代乐户、妓女的来源及其户籍管理基本上是沿袭唐代，但在某些方面又稍异其制。首先，关于乐户的世袭制，宋代与唐代一脉相承。据《文献通考》说：“宋朝循旧制，教坊凡四部。其后平荆南得乐工三十三人，平西川得一百三十九人，平江南得一十六人，平太原得一十九人，余藩臣所贡者八十三人，又太宗藩邸有七十一人。由是四方技艺之精者，皆在籍中。”这是就附籍于宫廷的乐人而言。其他附籍于各地方官府或军营的乐户、艺人，也是如此，一旦入籍，世代相袭。乐户如果被放遣为良民，乐户女子如果被良人娶纳为妻妾，均须经过官府批准落籍免贱之后方可。其次，宋代也有罚良为娼制度，据《宋史·刑法志》：“妇人应配，则以妻窑务或军营致远务卒之无家者，著为法。”意即以罪犯之妻女，配给军中之无妻者侍寝。“于是军伍掠妇女，诬为盗眷，官司录罪孥及于良家妇之候理者，固有宋第一秕政，二圣北狩，始议革除”。② 但宋代以罪犯妻女配没为掖庭女妓者，似较少见。再次，宋代买良为娼现象十分普遍，这一点是唐代所远不及的。对于城市

①《文献通考》。　②徐大焯《烬余录》。

妓院买良为娼，宋代统治者不仅不加禁止，而且政府大力推行“设法卖酒”制度，等于是提倡以售色辅助经商，这就导致民间女子自卖或被掠卖为娼的现象大量产生，至南宋时还出现了专门经营买卖娼妓的“牙侩”。因而买良为娼实际成了宋代市妓的主要来源。甚至地方官妓中也有买卖良家女子入籍者，如谭意歌本为英州良家女子，因父母早丧而寄养于长沙张文家，后被官妓丁婉卿看中，便以重价买入乐籍。①

第三，宋代乐户、妓女的社会地位与唐制一脉相承。据《宋刑统》卷二十八曰：“诸丁夫杂匠在役，及工、乐、杂户亡者，太常音声人亦同，一日笞三十，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则知宋代乐户、太常音声人的社会身份仍与工户、杂户一样，都属于“贱民”阶层，毫无人身自由可言，如果逃离职守，将被判处三年徒刑。关于乐户、太常音声人的婚姻权利，《宋刑统》是一字不差地照抄《唐律疏议》。② 但宋代妓女落籍从良，后嫁给官员文人为妾的现象比较常见，甚至还有嫁给士大夫为妻最后被封为命妇的，如《鹤林玉露》中说：“韩蘄王（世忠）之夫人，京口娼也。”据说，韩世忠有四名妻妾分别被封为白氏秦国夫人、梁氏杨国夫人、茅氏秦国夫人、周氏蘄国夫人。其中梁氏茅氏和周氏都是妓女出身。③ 另外，宋代已开始对乐工、妓女的服饰加以限制，以作为卑贱身份的标志。据《宋史·舆服志》：“端拱二年，诏……不系官伶人，只许服皂、白衣，

①秦醇《谭意歌传》。 ②《宋刑统》卷十四〔议曰〕：“其工乐杂户、官户，依令当色为婚。若异色相娶者，律无罪名，并当违令，既乖本色，亦合正之。太常音声人，依令婚同百姓，其有杂作婚姻者，并准良人。” ③《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五引《挥麈三录》、《茶香室续抄》。

铁、角带，不得服紫。”又北宋末年，丁谓奏曰：“衣服之制，尤不可缓。今闾阎之卑，倡优之贱，男子服带犀玉，妇人涂饰金珠，尚多僭侈，未合古制。臣恐礼官所议，止正大典，未遑及此。伏愿明诏有司，严令法度，酌古便今，以义起礼，俾闾阎之卑，不得与尊者同荣，倡优之贱，不得与贵者并丽。”

元代乐籍艺人也藉藉可观，据马可·波罗说，京师娼妓就有二万五千余人，这个数字并不包括宫内乐工、女妓。元代宫廷艺人的规模，虽不可与唐代伦比，却要大于宋代。例如，仅在每年二月十五日举行的祓除不祥、导迎福祉的宗教活动中，有一次教坊司和仪凤司就曾出动一千零二十四名乐工、妓女随仪仗队周游皇城内外。① 除京师之外，其他各地方城镇的乐人、妓女，也要多于宋代。据夏庭芝《青楼集志》说：“内而京师，外而郡邑，……天下歌舞之妓，何啻亿万。”当是夸张之词，但我们仍然可以肯定，元代乐籍艺人的总数较之唐宋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元代乐人、妓女的主要来源，首先也是乐户的世袭，包括蒙古族本有的和从西夏、金、南宋收编的，② 据《元史·刑

①《元史·祭祀志》“国俗旧礼”条曰：自世祖至元七年始，“每岁二月十五日于大殿启建白伞盖。佛事用诸色仪仗社直迎引伞盖，周游皇城内外云，……教坊司、云和署掌大乐鼓、板杖鼓、筚篥、龙笛、琵琶、箏、箜篌七色。凡四百人。兴和署掌妓女杂扮队戏一百五十人，祥和署掌杂把戏男女一百五十人，仪凤司掌汉人、回回、河西三色细乐，每色各三队，凡三百二十四人。……珠玉金绣，装束奇巧，首尾排列三十余里。”《元史·礼乐志》曰：“太祖初年以河西高智旭言，征西夏旧乐。太宗十一年十一月，宣圣十一代孙衍圣公元措来朝，言于帝曰：‘今礼乐散失，燕京、南京等处，亡金太常故臣及礼册乐器多存者，乞降收录。’于是降旨令各处管民官和有亡金知礼乐旧人，可并其家庭从徙东平，令元措领之，于本路税课所给其食。”又曰：“而大享宗亲锡宴大臣，犹用本俗之礼为多，其乐则自太祖征用旧乐于西夏，太宗征金太常遗乐于燕京。”

法志》："诸倡妓之家，所生男女，每季不过次月十日，会其数以上于中书省，有未生堕其胎，已生辄残其命者，禁之。"这是用以保证乐户世袭制的法律措施。其次是买良为娼，尤其是元初灭南宋后，许多官吏军民，先掠娶江南良家女子，玩厌之后又卖入娼家。这种现象在至元十五年(1278)才开始下令禁止，① 罚良为娼者也有之，但不很多。再次是选择民女入宫，如忽必烈每隔两年或不到两年，就要派使臣到弘吉剌省，挑选一百或一百以上的最美丽的妙龄女子入宫。②

元代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汉人南人的社会地位本来就低，而乐人、娼妓又多为汉人南人充当，因而他们倍受贱视。首先，他们的社会身份贱同奴婢，如至元五年智真杀死娼女海棠，刑部就是拟照杀他人奴婢量刑。③ 其次，元代更强调乐人、妓女当色为婚。至元十五年(1278)，忽必烈曾下旨，规定了"乐人嫁女体例"，只许"乐人内匹聘"。④ 至大四年(1311)八月，武宗又下旨："今后乐人只教嫁乐人，咱每根底近行的人，并官人每，其余的人每，若娶乐人做媳妇呵，要了罪过，听离了者。"⑤ 当然，妓女如在落籍从良之后嫁人，则又另当别论。但元代对这类女性也开始贱视，宋代官员娶从良妓女为妻妾尚可受封，而元代则规定："应封妻者，止封正妻一人。……或系再醮、倡优、婢妾，并不许申请。"⑥ 再次，元代在服饰上对乐人，

①《元史·世祖纪》：至元十五年春，"禁官吏军民卖所娶江南良家子女为娼者，卖、买者两罪之，官没其直，人复为良"。 ②《马可·波罗游记》第八章。 ③《元典章》卷四十二。 ④⑤《元典章》卷十八。 ⑥《元史·选举志》。

妓女加以贱视已经制度化。《元工部律令》规定："乐人每，娼妓每，卖酒的每，金面钹钏等物，不得穿着。"延祐元年(1314)，仁宗定服色等第："娼家出入，止服皂褙子，不得乘车坐马。"①至元五年(1339)，顺帝又下令："禁倡优盛服，许男子裹青巾，妇女服紫衣，不许戴笠乘马。"②

明代虽然革除了地方官妓，但她们并未被除附从良，只不过是从地方官妓转为市妓罢了。她们的户籍和其他市妓一样，仍然附属于各地方官府，并须向官府缴纳税金。以后，各地方官府即使在重大节日庆典活动中需要用乐，也只集乐户男工演奏，不再召唤女妓，南北两京市妓，则由教坊司派专使直接钤管收税，以补内廷费用之不足，"不但有司，乃至礼部堂司，出入供需，或令教坊人役治具以从"。③因而明代市妓比宋元更甚。至于明代附籍于宫廷的乐人、妓女，主要隶属于太常寺（乐生与舞生）和教坊司（乐工与妓女），其规模虽已不可与市妓相提并论，但宫廷艺人的绝对数字也不甚小，例如，英宗即位后，仅一次就"放教坊司乐工三千八百余人"。④那么，宫廷保留下来的乐工还有多少？太常寺的乐舞生有多少？教坊司的妓女又有多少？据此推测，明代宫中男女艺人最盛时当已过万。此外，明代宗室诸王国内尚有大量乐户，明太祖拨赐给各王私人役使的仅二十七户，其他乐户女子，则仍与市妓同例，如山西大同，"简王所封，乐户较他藩多数倍，会(指万历间)在花籍者尚二千人，京师城内外，不隶三院者，大抵皆大同籍中溢

①《元史·舆服志》。②《元史·顺帝纪》、《元典章》卷二十九。③于慎行《穀山笔麈》卷三。④《明会要》卷二十一。

出流寓”。①

明代乐籍艺人的主要来源也不外乐户世袭、罚良为娼、买良为娼、采择民女入宫等几种，但在具体做法上，明代似乎更加惨无人道。首先，明初不仅收括元末乐人、妓女为乐户，而且把大量俘虏也沦为乐户：“凡蒙古部落子孙流窜中国者，令所在编入户籍，其在京省谓之乐户，在州邑谓之丐户。”② 所谓丐户，实与乐户无异，其女子也以卖淫为业。③ 其次，明代罚良为娼的女子多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朱元璋死后，因长子朱标早死，便传位于皇太孙朱允炆，年号“建文”。朱元璋第四子朱棣不服，发动靖难之变，夺得帝位后，“悉指忠臣为奸党，甚至加族诛、掘冢，妻女发浣衣局、教坊司”。④ 凡建文帝所信任的臣将如齐泰、黄子澄、方孝孺、铁铉等，都被诛杀乃至灭族，齐泰的妻子及外甥媳妇、黄子澄的妹妹等四个妇人、方孝孺的女儿、铁铉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都被没入教坊司为娼。⑤ 直至仁宗即位，这些无辜女子才被“悉宥为民，还其田土”。⑥ 再次，明律虽然禁止“买良为娼”，⑦ 但至明中叶以后，法令已成一纸具文，不仅买卖良女为娼的现象大量产生，而且还出现了许多专门经营娼妓买卖的牙婆驵侩。他们不仅可以带领妓院

---

①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②《三风十愆记·色荒》。 ③祝允明《猥谈》：“奉化有所谓丐户，俗谓之大贫，聚处城外，自为匹偶，良人不与接婚，官给衣粮，而本不甚窘赤。妇女稍妆泽，业枕席，其始皆宦家，十八家亦以罪杀其人而籍其牝，官谷之，而征其淫贿，以迄今也。金陵教坊，称十八家亦然。” ④《明史·刑法志》。 ⑤邓之诚《骨董琐记》卷六。 ⑥《续文献通考》卷十四。 ⑦《唐明律合编》卷二十六。

老板到民间各家各户去象挑选牲口一样挑选女子，而且常常低价买进童女加以训练装扮后再以高价卖给妓院，如当时颇为走俏的所谓“扬州瘦马”，就往往被一些女人贩子居为奇货。① 当然，在成交过程中，买主和牙婆都是以买妾称之，但不排斥其中有些人是借买妾之名，行买娼之实。

明代乐户的法律地位与工户同列，仍为“贱民”，但在服刑时，如果乐户女子犯了徒流罪，明律允许她们以金钱赎罪，只被决杖一百，不必流放拘役。② 在婚姻关系上，明律也强调乐人当色为婚，“凡官吏娶乐人为妻妾者，杖六十，并离异。若官员子孙娶者，罪亦如之，附过，候荫袭之日降一等，于边远叙用。其在洪武元年已前娶者勿论”。“民人娶乐人为妻，问不应；为妾勿论。乐人乃教坊司妓者，若流娼亦照 此例”。③ 所谓“为妾勿论”，当然是指落籍妓女而言。另外，明代对乐人、妓女在服饰上加以贱视的制度更为严格。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分别规定了宫中女乐冠服和教坊司冠服。例如：“教坊司乐艺，青卍字顶巾，系红绿褡膊。乐妓，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民妻同。……教坊司伶人，常服绿色巾，以别士庶之服。乐人皆戴鼓吹冠，不用锦绦，惟红褡膊，服色不拘红绿。教坊司妇人，不许戴冠，穿褙子。乐人衣服、止用明绿、桃红、玉色、水红、茶褐色。”④刘辰《国初事迹》也记载了类似的规定：

---

①谢肇淛《五杂俎》。 ②《唐明律合编》卷三“工乐户及妇女犯罪”条：“凡工匠乐户犯流罪者，三流并决杖一百，留住拘役四年。……其妇人犯罪，应决杖者，奸罪去衣受刑，余罪单衣决罚。免刺字。若犯徒流罪，决杖一百，余罪以赎。” ③《唐明律合编》卷十四。 ④《明史·舆服志》。

“太子立富乐院于乾道桥，男子令戴绿头巾，腰系褡膊，足穿带毛猪皮鞋，不许街道中走，止于道边左右行，或令作匠穿甲。妓妇戴皂冠，身穿皂褙子，出入不许穿华丽衣服。”洪武十五年(1382)，又定王府乐工冠服；正德元年(1506)，还禁止倡优等贱人服用貂裘。① 如果有人违反禁令，将受到严厉惩处，例如有一次明太祖“赐(傅)友德宴，命叶国珍陪饮，拔与朝妓十余人，太祖令内宫觇视。后国珍令妓脱去皂帽鞋子，穿华丽衣服混坐。太祖怒，令壮丁拘执叶国珍与妓妇连锁于马坊，妓妇剃去鼻尖。国珍称说：‘死则死，何得与贱人同锁？’太祖曰：‘尔不遵我分别贵贱，故以此等贱人辱之。’鞭讫数十。发瓜州做壩夫。”②

清初不仅保留了乐籍制度，而且由于大量良家女子在战乱中展转流落娼家，致使全国乐人、娼妓的总数仍然相当可观。待政局基本稳定之后，清世祖开始总结晚明纵欲乱国的历史教训，而试图对妓女的数量规模和活动范围加以限制。于是，他首先从宫廷做起，于顺治八年(1651)下旨，教坊司停止使用女乐，改用太监替代。③ 紧接着于顺治九年又下令“禁良为娼，以丧乱后良家子女被掠，展转流落乐籍。世祖特有是命，其误落于娼家者，许平价赎归”，④ 但在顺治十二年，宫中仍改用女乐四十八名，直至顺治十六年(1659)再度裁革女乐，教坊司不用女乐才成为定制。⑤

另外，地方官妓虽然在明代早被革除了，但清初又有死灰

①《明史·舆服志》。 ②刘辰《国初事迹》。 ③《清朝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四。 ④陈尚古《簪云楼杂记》。 ⑤《清朝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四。

复燃之势，例如王士稹于顺治末年出任扬州推官时，就发现官僚举行迎春会时，以妓骑导，并宴以侑酒。① 至康熙初年，直省府州县拜迎芒神土牛活动时，尚有提取伶人娼妇作乐的现象发生，所以，清圣祖于康熙十二年(1673)又重申律令，严行禁止。② 并在同时，严禁“官吏宿娼”和“买良为娼”。③

世祖、圣祖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对于清初妓女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控制作用，但大量的市妓仍然充斥于都市的大街小巷，引诱青少年，腐蚀人心，败坏风俗。所以清世宗即位后进一步采取断然措施，于雍正元年(1723)下令废除乐籍制度：“各省乐户皆令确查削籍，改业为良。若土豪地棍仍前逼勒及自甘污贱者，依律治罪。”④ 与此同时或稍后，浙江的所谓惰民，徽州府的所谓伴当，宁国府的所谓世仆，苏州府的所谓丐户，广东的所谓蜑户等贱民，也“俱令削除其籍，与编氓同列”。⑤ 从隋朝开始，延续实施了一千一百多年的乐籍制度，终于在清代雍正元年被废除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尽管此后娼妓现象仍然未能真正消灭，但雍正皇帝第一次从制度上把沦为贱民阶层的乐人、妓女解放为良民，使她们在法律地位上不再遭受贱视，其功绩是值得肯定的。

---

①王士稹《香祖笔记》。 ②《雍正会典》。 ③《钦定大清律例》。 ④《清朝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四。 ⑤《皇朝通志·食货略》。

第 四 章

官妓史叙论（下）

4·1 官妓的职能及其生活方式

就现代人权主义观点而言，中国古代的乐籍制度无疑是一种罪恶的制度，因为它对于人的尊严（尤其是女性的尊严）的践踏已臻无以复加的地步，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是适应封建社会的文化与政治的需要而产生的，因而它的存在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首先，由于乐人、妓女是一个不从事生产的消费阶层，乐籍制度的实施基本上可以从宏观上把全国的乐人、妓女控制在一个常数之内，从而有利于社会机器按正常的秩序运行。其次，由于乐人、妓女主要从事音乐、舞蹈、戏剧等艺术活动，乐籍制度的实施有利于艺术队伍的稳定和艺术水平的提高，从而使他(她）们能够更好地为各级政府和各阶层人士服务。再次，由于官妓的姿容、才情和艺术趣味大多高出同时代妇女的一般水平之上，故她们的性服务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而乐籍制度的实施，则一方面可以满足各阶层男人寻求性快乐的

需要，一方面又可以使政府通过征税来增加财政收入。正因为如此，乐籍制度才得以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实施达一千多年之久。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古代官妓的职能及其生活方式较之现代娼妓，既有不同之处，又有相通之处。

所谓不同之处，是指古代官妓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职业艺人，她们的主要职能是从事音乐、舞蹈、曲艺、杂技、戏剧等伎艺活动，性服务则因所处的具体环境不同而有多有少，但这毕竟只是她们的次要职能，并且这种行为往往带有一定的浪漫色彩。所谓相通之处，是指官妓中有一部分女子同现代娼妓相似，她们的主要职能是以色事人，性服务是她们谋生的主要手段或唯一手段，尽管在她们的性服务过程中有时也伴随着一些弹唱活动(指在妓院为取悦于嫖客而弹琴唱歌)，但实际上这不过是她们借以创造浪漫气氛和增强女性魅力的辅助手段罢了。因而，这种弹唱活动，相对于她们的妓女生涯来说，仍然只是一种次要职能。由于主要职能不同，这两类妓女的生活方式便也有所不同，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姑且把前者称为艺妓，后者称为色妓。从唐代起，文人士大夫聚会饮筵，时兴招妓女做席纠（或称酒纠）行令佐酒，或以歌舞侍宴，人们常把这类妓女称为饮妓或酒妓，实际上她们多是由艺妓兼充，或是由色妓中的姣姣者为之。因而，从主要职能上说，归结到底，官妓只有艺妓和色妓两类。

由于古代色妓的生活方式与现代娼妓大致相似，我们在后文还将详细论述，故本节拟侧重于论述艺妓的生活方式，关于色妓的生活方式，只在与艺妓的对比中作简略的论述。

艺妓活动的社区比色妓广阔得多。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府、军营到城镇街巷，到处都有艺妓的踪迹。她们几乎包括了历代官妓的全部和地方官妓的绝大部分，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市妓如勾栏妓、歌馆女伶、上厅行首等也是艺妓。从宋代开始，在各城镇中曾出现过一批角妓，她们都是以技艺优胜而著名的，如宋代的张赛赛、李师师，① 元代的连枝秀、汪怜怜② 等都曾被人称为角妓。据徐珂《清稗类钞》说："盖古有角妓，以艺相角胜为优劣。"《元曲释词》也说："妓女之以技艺著名者曰角妓。"由此可知，所谓角妓，就是在伎艺角争中获胜的艺妓明星。而色妓的活动社区，相对来说要狭窄一些，她们大多都是各城镇平康妓院中的中下等妓女。色妓在唐代入籍妓女中所占比例较小，宋元时代得以逐渐发展，至明中叶以后才流于泛滥，但仍不足以与艺妓抗衡。

艺妓的素质要优于色妓。色妓只要容貌出众，风情迷人，凡美丽的女子都可充当。而艺妓则要求色艺兼优，缺乏艺术天赋和艺术修养的女子是不能充当艺妓的。由于艺妓和色妓的素质要求不同，因而她们的来源也有所不同。艺妓的来源不外三种：第一种是世袭乐户的女子，她们命中注定了此生只能做妓女，因而从小就跟随父母学习伎艺，受过良好的艺术教养，这是艺妓的主要来源。第二种是罪犯妻女，她们是从籍没入官的女子中选择出来的善伎艺者，一般置于教坊司，入选者多为贵族之家的妻女，都受过一定的艺术训练。如《教坊记》中说：

①张赛赛事见《醉翁谈录》壬集卷二。李师师称角妓事，见《水浒传》七十二回。 ②《青楼集》。

“云韶谓之宫人，盖贱隶也。”当属此类。第三种是良家美女，她们为妓的原因各有不同，其中大部分是被选送入宫或选入官府乐营后开始教习歌舞的，也有自幼就被父母所卖或被他人掠卖入娼家而学习歌舞伎艺的，如宋代袁州娼女冯妍，年十岁，姿貌出于流辈，且善于歌舞，她本是谢氏良家女子，五岁时为母所卖，经过长期的培养与训练，才能歌善舞的。① 这类被卖入娼家的良家女子要么是童女，要么是艺术素养较高者，才能成为艺妓，否则只能充当色妓罢了。色妓主要来源于买良为娼，这些自卖或掠卖为娼的平民少女与少妇，一般都没有受过艺术教养，娼家即便让她们一边接客，一边学习歌舞等伎艺，大多在艺术上也不会有什么发展前途。此外，有些色妓（或鸨母）的亲生女儿，如果缺乏艺术天赋或艺术教养，也成为色妓的一个来源。

由于色妓和艺妓的素质和主要职能的不同，决定了二者的活动方式的不同。艺妓主要从事艺术活动，具体说来有三项：

一是艺术训练，包括培训基本技巧和排练新的节目，这是她们进行艺术准备的过程。无论是宫妓、地方官妓，还是市井艺妓，都必须经常进行艺术训练。作为皇家乐团中的宫妓来说，她们享有最优越的艺术条件。宫内教坊司首先就是一个教习乐舞的机构，虽然教坊使多由宦官出任，但教官却多由乐工充当，这就保证了宫妓能够受到最好的艺术教育和最严格的艺术训练。唐代开元天宝年间，唐玄宗还另设梨园，甚至亲自指挥排练，数

①《夷坚志支丁》卷四。

百人中如果有人唱错了一个音，他都能发觉并予以纠正，因而所有男女艺人都被称为“皇帝梨园弟子”或“皇帝弟子”。至于地方官妓以及市井艺妓，平时必须进行艺术训练，也是不言而喻的。

二是艺术表演，这是她们的艺术创造得以实现的过程，也是她们艺术生命大放光彩的过程。宫妓的演出活动是非常频繁的，除了祭祀活动不用女乐以外，凡大朝贺、大宴享、节日庆典、皇帝登基与改元、册封皇后与贵妃、帝后生日、接待外宾或少数民族首领、甚至有些宗教活动，大多都要招集宫妓举行不同规模、不同内容的演出活动。皇帝平时兴之所至，也可以随时招宫妓表演。如唐代宫廷盛行《霓裳羽衣》舞蹈，常有几百名宫妓参加表演。北宋宫中盛行的队舞，登场的女妓有时多达一百五十三人。各地方官府与军镇也常在节日庆典等大的礼仪活动中，招集官妓举行类似的歌舞表演。唐宋间，每任军事行政长官新到，地方官妓（包括营妓）都要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甚至妓女还要出境迎接，离任之后也可以书札往返。① 另外，皇帝有时还召集地方官妓，举行汇演，同时也有教坊司妓女参加，如唐玄宗、宋太宗就曾先后在洛阳、开封举行过这种大型的汇演活动。这对于艺术的交流与提高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市井艺妓的演出活动虽然在唐代就比较活跃，但还不足以与宫妓或地方官妓抗衡。从宋代起，各大都市出现大量的瓦舍、勾栏和歌馆之后，她们的演出活动才日益繁盛，影响也日益扩大。这种表演不仅满足了市民的娱乐需要，培养了市民的思想情操和艺

①《西湖游览志余》卷六。

术趣味，而且使各种民间伎艺如歌舞戏、滑稽戏、说话、唱赚、诸宫调等得以广泛传播和不断发展，尤其是使中国戏曲终于从萌芽走向成熟，并且开创了中国戏曲史上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先后繁荣的两个黄金时代，其功绩之大是宫妓和地方官妓不可比拟的。

三是歌舞侍宴。这是贵族阶层和文人士大夫欣赏艺术的一种高雅而奢侈的形式，同时也是艺妓传播艺术的一种途径。皇帝在进膳时或皇帝于宫中赐宴功臣、贵宾或宗室、外戚，命令宫妓表演歌舞等伎艺，实为例常节目。唐代教坊司妓女除了在宫内服役外，也可以外雇到京兆府为公筵表演歌舞，有时还可以应邀前往京中贵族之家为私宴表演各种伎艺。如教坊妓女张四娘，有姿色，善歌舞，能弄《踏谣娘》，就常有人邀请她去侍宴表演。① 地方官妓以歌舞侍宴的活动更为普遍，凡官员们聚饮或招待过往宾客，随时都可以传唤她们来当番承应，宋元时称为唤官身。此外，地方官妓也可应邀参加私人宴会，如唐代杨汝士因儿子及第开家宴庆贺，便招集众营妓表演歌舞，还给每位妓女赠送了一匹红绫，他的所谓“一曲高歌绫一匹”的诗句，即为此事而作。② 市井艺妓以歌舞侍宴多出入于私人府第，但有时也会受到邀请而赴公宴承应。如北宋政和年间，汴都勾栏名妓李师师、崔念月就常受到晁冲之等文士的邀请而以歌舞为之侑席。③ 南宋“如府第富户，多于邪街等处，择其能讴妓女，顾倩祇应，或官府公筵及三学斋会，缙绅同年会、乡会，

①《教坊记》。 ②《北里志》。 ③《墨庄漫录》卷八。

皆官差诸库角妓祇直”，[1] 无论是公筵，还是私筵，妓女根据主人或客人的兴趣，有时也表演舞蹈或其他伎艺，但最为流行的是歌唱，歌唱的内容，在唐代多为诗，在宋代多为词，在元代则多为曲。由此可见，妓女对于文学的发展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至少可以说，她们对于唐诗、宋词和元曲的广泛传播都曾起过重要作用。

艺妓既然大多数都是色艺兼优的女子，那么，毫无疑义，对于男人来说，她们更富于性的魅力。但由于艺妓并不以性服务作为主要的或唯一的谋生手段，加之有一部分艺妓要受到政府或丈夫的管束，因而她们的性活动方式也与色妓大不相同。

就宫妓而言，尽管她们是由宫廷供给衣食，其生活水平几可与贵族比拟，尽管她们都有着向皇帝献身的可能性，但由于后宫美女如云，具体轮到每名宫妓侍寝的机会是极少的。因此，对于宫妓来说，她们决不会认为被皇帝占有是一种侮辱，而恰恰相反，她们所感受到的是一种莫大的恩宠与荣幸。她们最大的痛苦是常年闭锁深宫，性欲得不到满足，历代不少的宫怨诗，反映的正是她们被幽闭、被冷落、被弃置的愁怨。不过，籍属教坊的宫妓在性活动方面似乎要自由一些，她们不仅可以和乐工结婚，而且还可以献身他人。如唐代教坊司妓女裴大娘嫁给侯氏为妻后，还常与赵解愁私通。[2] 张四娘嫁给苏五奴为妻，由于她经常应邀外出表演《踏谣娘》，人们便呼苏五奴为“踏妻者”，[3] 大概是因为张四娘在外向人献伎时也有献身的风流韵事吧。

---

①《梦粱录》卷二十。　②③《教坊记》。

就地方官妓（包括营妓）而言，她们的性活动比宫妓要自由得多。在唐代，地方官妓都有向军事、行政长官献身的义务，她们中的出类拔萃者往往被第一二把手所独占，有的官将之间还会为某位名妓争风吃醋，如李晟与张延赏就因争夺成都营妓高洪而发生矛盾，① 韦保衡与李甲也因争夺四川一名官妓而闹得不快。② 当然，也有官员以官妓送人情的，有的贵宾过境，可派官妓侍寝，如有朋友看中某位官妓，也可借给他狎玩。例如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就曾让元稹把杭州歌妓商玲珑邀往越州，狎玩了一个多月才归还。③ 唐代地方官妓是官给衣粮，她们向官员献身是一种义务，一般是不收费的，但有时官员也会赠给她们一些钱物，以博取她们的欢心。如元稹招商玲珑，就是以“重金邀去”。唐代军事、行政长官的这种风流特权，固然带有浪漫色彩，但对于官将的腐蚀极大，弊端无穷，因而从宋代起，开始禁止职官宿娼，凡各级军事行政长官，只允许招地方官妓以歌舞佐酒，都不得私侍枕席，如有违者，职官与妓女都将受到严厉惩处。但官妓却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向尚未任职或已经罢职的文人名士（包括新举人、新进士、太学生等）献身，如南宋时唐与正在天台郡为守时，豪士谢元卿夙慕营妓严蕊艳名，于天台郡七夕宴会上见而心醉，遂“留其家半载方去”，后来朱熹将严蕊系狱，多次拷打，却只追究她与太守的私情，对她与谢元卿的风流行为并不提及。④

市井艺妓的性活动就较为复杂了。一般说来，勾栏妓的卖

①《资治通鉴》卷二三二。 ②《玉泉子》。 ③《尧山堂外纪》。 ④《本事词》卷下。

艺收入是相当可观的，加之她们中有许多是有丈夫的，往往是和丈夫一起组成家庭班子卖艺，因而她们并不经常向他人提供性服务。试以《青楼集》中一百多个妓女为例，其中不包括从良嫁人，而仅指嫁与乐人或教坊司官员为妻者，计有牛四姐、宋六嫂、瑶池景、贾岛春、国玉第、蛮婆儿、赛帘秀、天锡秀、郭次香、韩兽头、赵偏惜、朱锦绣、杨买奴、赵真真、西夏秀、李娇儿、张奔儿、赛天香、赵梅哥、和当当、顾山山、喜温柔、刘婆惜、事事宜、帘前秀、燕山景、燕山秀、李定奴等二十八人，她们一般都可以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当然，如果有权大位高者属意于某位妓女，尽管有丈夫，她也乐意提供性服务，如李娇儿本为王德名之妻，因她姿容姝丽，意度闲雅，花旦杂剧特妙，所以江浙附马丞相常眷之。李生辰，相君致贺礼，遇公燕，则遣以马腰截，当时歌馆艺人，皆以为盛事。但也有丈夫吃醋，不允许妻子以身事人的，如刘婆惜嫁乐人李四之后，又“与抚州常推官之子三舍者交好，苦其夫间阻，一日偕宵遁，事觉，决杖”。至于其他尚未嫁人的勾栏妓、歌馆艺妓、上厅行首等，尽管她们的性活动较为自由，但也不轻易以身事人，她们向男人献身是有所选择的。要么是倾慕对方的风流才情，要么是迫于对方的权势地位，要么是抵挡不住对方的重金诱惑，她们才会投入对方的怀抱。

关于色妓的生活方式，从唐至清，大致相同。她们都是在妓院老板——龟鸨的管领下倚门卖笑，以色事人，过的是夜夜留客夜夜新的生活。龟鸨对于初入平康的妓女也会进行一些基本技巧的训练，训练内容包括诸如化妆打扮、言语举止、眼色

媚态、直至床笫技巧等在内的风月手段，目的在于让他们能够吸引和迷惑男人，增加收入。有的还被吩咐学习一些弹唱技巧和诗词掌故、谜语酒令等，以适应不同层次嫖客的需要。色妓服务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在妓院送旧迎新，这是主要方式；一种是应邀出局，充当饮妓，这往往要由色妓中的佼佼者承应。如唐代平康妓郑举举，为曲中都知，善令章，巧谈谐，常为诸朝士所眷，凡进士同年宴，多邀为席纠，刘崇状元及第，召同年宴，恰因举举有病不能与会，遂令同年李深之为酒纠，刘崇作诗曰："南行忽见李深之，手舞如蚩令不疑，任尔风流兼蕴藉，天生不似郑都知。"① 历宋元至明末清初，色妓不断发展增多，下等妓女仅仅倚门待客几乎难以谋生，于是不得不走出妓院，拦路拉客。例如晚明扬州"歪妓多可五六百人，每日傍晚，膏沫薰烧，出巷口，倚徙盘礴于茶馆酒肆之前，谓之'站关'。茶馆酒肆岸上纱灯百盏，诸妓掩映闪灭于其间，媠鬌者帘，雄趾者阈，灯前月下，人无正色，所谓'一白能遮百丑'者，粉之力也。游子过客，往来如梭，摩睛相觑，有当意者，逼前牵之去，而是妓忽出身分肃客先行，自缓步尾之。至巷口，有侦伺者向巷门呼曰：'某姐有客了！'内应声如雷，火燎即出，一一俱去。剩者不过二三十人。沉沉二漏，灯烛将尽，茶馆黑魆无人声。茶博士不好请出，惟作呵欠，而诸妓醵钱向茶博士买烛寸许，以待迟客。或发娇声唱《劈破玉》等小词，或自相谑浪嘻笑，故作热闹以乱时候，然笑言哑哑声中，渐带凄楚。夜分不得不去，悄然暗摸如鬼，见老鸨，受饿、受

①《北里志》。

笞，俱不可知矣。”①

艺妓与色妓的归宿大致相同。第一是世袭乐户女子，必须终身为妓，年长色衰之后，她们多成为妓院老板。所以《北里志》说：“妓之母，多假母也，亦妓之衰退者为之。”艺妓的艺术生涯当然要长一些。如唐代教坊妓女庞三娘，年已长，面多皱，她便采用一种特殊的化妆方法来返老还童，借以延长其艺术生命。② 艺妓退出演出舞台之后还可充当艺师，培养弟子，如元代杂剧演员王奔儿后来就是“流落江湖，为教师以终”。③第二是从良嫁人，必须是在年轻美貌之时，尚可遇到如意郎君，一旦人老珠黄，就无人问津了。当然宫妓和地方官妓，自己并无权利从良嫁人。宫妓必须等待皇帝下令外放出宫，地方官妓必须经军事行政长官批准落籍后才能从良嫁人。市妓虽入了籍，则只要拿出一笔足够赎身的钱（无论是妓女自己积攒的，还是由情人支付的均可），即可向龟鸨赎身落籍。所谓从良嫁人，她们一般都只能作妾，做夫人的在唐宋尚有其例，元明清时代就极为少见了。第三是出家为尼为女冠。她们或者是厌倦了妓女生涯，感到人生无味，万念俱灰而出家，或者仅仅是为了寻找一个有衣食居处的归宿而进入寺院，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如唐代玉贞公主修建的安国观内，就有许多女道士原是能善舞的宫妓，所以卢纶写诗曰：“君看白发诵经者，多是宫中歌舞人。”（《过玉贞公主影殿》）唐德宗时著名宫妓萧氏，以善舞《柘枝》而著称，后来也出家到嵩南洞清观，人们称她为萧练

①张岱《陶庵梦忆》卷四。 ②《教坊记》。 ③《青楼集》。

师。元代名妓李真童最后也当了女道士，汪怜怜则髡发为尼。①

4·2 花榜的盛行与《嫖经》的出现

就社会身份而言，凡入籍妓女（指官妓）同属于贱民阶层，她们没有人身自由和独立人格，处于被奴役、被玩弄的卑下地位。然而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妓女各自的色艺才情差别和狎妓者的地位与需求不同，因而在她们之中又有等级区分。尽管这种区分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区标准不一，形式也多样，但在同一时地的妓女中，不同等第之间的差别是明显存在的。例如唐代开元、天宝间教坊妓女就大致分为三等，第一等是宜春院妓女，谓之内人（又曰前头人）；第二等是云韶院妓女，谓之宫人；第三等是平民女入选者，谓之挡弹家。内人带鱼，宫人则否，并且她们之间的待遇也有差别。② 而中晚唐的平康妓女，则按妓女等第来划分营业区域，第一二等居南曲、中曲，多是妓中铮铮者，第三等为卑屑妓，居北曲。南曲与中曲的条件比北曲要优越得多："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宽静，各有三数厅事，前后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右对设，小堂垂帘，茵榻帷幌之类称是。"③ 唐代市妓的这种分布格局，一直到明末还为金陵妓女所继承，她们也被分为三等，第一等为南曲名妓、上厅行首等，居旧院；第二等亦间有殊色，居珠市；第三等则为卑屑妓，居南市。④

①《青楼集》。 ②《教坊记》。 ③《北里志》。 ④《板桥杂记》。

尽管市妓的这种等第格局往往是由妓院经营者的审美标准来划定的，但归根结底，还是由嫖客的审美标准来决定的。尤其是男人世界中有一批堪称名士的高级嫖客，他们对于某个妓女的品评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据《云溪友议》卷中载：

> 崔涯者，吴楚之狂生也，与张祜齐名。每题一诗于倡肆，无不诵之于衢路。誉之，则车马继来；毁之，则杯盘失措。……又《嘲李端端》："黄昏不语不知行，鼻似烟窗耳似铛。独把象牙梳插鬓，岑岑山上月初生。"端端得此诗，忧心如病，使院饮回，遥见二子蹑屐而行，乃道旁再拜竞灼曰："端端祇侯三郎、六郎，伏望哀之。"又重赠之一绝句粉饰之，（其绝句为："觅得黄骝被绣鞍，善和坊里取端端。扬州近日浑成差，一朵能行白牡丹。"）于是大贾居豪，竞臻其户。……红楼以为倡乐，无不畏其嘲谑也。

崔涯利用自己的诗名故意嘲谑妓女的恶作剧固然有些残忍，但据此可以知道，作为高级嫖客的名士对于妓女的品评如何，影响极大："誉之，则车马继来；毁之，则杯盘失措。"或褒或贬，都可立竿见影。由此可以证明，妓女的等第品次，从根本上说，是由嫖客的审美标准决定的。于是，历代才子爱慕佳人，妓女喜交名士，名士才子和妓女佳人的时尚喜好，实际影响着甚至是引导着各代风月界的审美潮流。

所谓花榜，就是在这种由名士品评妓女等次的风气影响下

产生和兴起的。花榜的主持者和品题者多为经常出入妓院征歌选胜的名士才子。最初，这些名士才子不过是一时兴致所至，而对自己所熟悉、所赏识的妓女加以比较品评，或以名花名草比拟妓女，或以科举功名桂冠分列妓女等次，并逐一题写诗词或评语来概括妓女的特征，然后公之于众，以为风流快事。后来竟发展成为一种在某个社区评选和品题妓女明星的形式。品花列榜之前，主持者首先要选好花场，立好章程，然后召集全市诸名妓赴会，一边行令竞饮，觥筹交错；一边品定高下，题写评语，并当场唱名，公之于众。围观群众往往累万。妓女“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其不得列于榜首者，辄引以为憾”。①

花榜之兴，当昉于宋。据叶申芗《本事词》记载：

> 刘几伯寿，素精音律。……熙宁中，以秘监致仕。《洛阳花品》曰：“状元红为一时之冠。”乐工范日新能为新声，汴妓郜懿以色著。一日春暮，值牡丹盛开，伯寿携范日新就郜懿赏花欢饮。因制《花发状元红慢》以纪之，云：“三春向暮，万卉成阴，有嘉艳方坼。娇姿嫩质冠群品，共赏倾城倾国。上苑晴昼暄，千素万红尤奇特。绮筵开会，咏歌才子，压倒元白。　　别有芳幽苞小，步障华丝，绮轩油壁。与紫鸳鸯，素蛺蝶，自清旦，往往连夕。巧莺喧脆管，娇燕语雕梁，留客武陵人。念梦役意浓，堪遣情溺。”郜懿第六，当时人皆呼郜六，生女蔡奴，色艺尤著。

①《清稗类钞》第十一册。

可见，北宋熙宁间汴京已开花榜，郜懿被品评为状元红，称一时之冠。又据《醉翁谈录》戊集载："丘郎中守建安日，招置翁元广于门馆，凡有宴会，翁必预焉；其诸妓佐樽，翁得熟谙其姿貌妍丑，技艺高下，因各指一花以寓品藻之意，其词轻重，各当其实，人竞传之。"翁元广一共品评了二十八名妓女，每名妓女皆以一花比拟，并题诗一首以寓褒贬之意。试举第一、二名为例：

吴玑　红梅　喻清绝而为花籍之魁。"云样轻盈雪样清，琼瑶蕴藉月精神。羞同桃李夸姿媚，独占人间第一春。"

杨倩　水仙　喻仙姿轻盈，取为花魁之亚。"盈盈罗袜欲生尘，冉冉绡衣照水明。移得洛川佳丽种，风标未肯让梅兄。"

联系冯梦龙《卖油郎独占花魁》中所描写的南宋杭州名妓莘瑶琴也曾被称为花魁娘子，可见宋代把最优秀的妓女评为花魁，在南北各城市都已开此风气。不过，吴玑是作为官妓而被评为花籍之魁的，而莘瑶琴似乎并未入籍，实际上只是作为私妓而被嫖客捧为花魁娘子的。因为唐宋并未对卖良为娼加以限制，私妓也可以自由活跃于市井士民之中，所以莘瑶琴也能成为花魁。至元明时代，法律已明令禁止买良为娼，私妓虽然仍不乏其人，但她们的活动已受到限制，因而就更不能奢望列之花榜之首了。

花榜虽然兴起于宋代，但在元代和明前期似乎并不多见，

直至明中叶以后，花榜才得以盛行。我们不妨先看两条关于嘉隆年间南京开设花榜的材料：

> 嘉靖间，海宇清谧，金陵最称富饶，而平康亦极盛。诸姬著名者，前则刘、董、罗、葛、段、赵，后则何、蒋、王、杨、马、褚，青楼所称十二钗也。（冯梦龙《情史·情痴类》引王百谷语）

> 金坛曹公家居多逸豫，恣情美艳。隆嘉间尝结客秦淮，有莲台之会，同游者毗陵吴伯高、玉峰梁伯龙诸先辈，俱擅才调，品藻诸姬，一时之盛，嗣后绝响。（曹大章《莲台仙会品叙》）

嘉靖间金陵十二钗也具有花榜性质，但这十二名妓女是如何评选出来的已不可知。嘉隆间莲台之会，曹大章先在《莲台仙会品》中对入选十三名妓女的姓名、字号及其品目花名作了记录，但没有评语。后来曹大章又作《秦淮士女表》，共列十四名妓女，并增加了评语，补记了妓女居址，其中十三名与《莲台仙会品》同，只增补了王玉娟一人。[①] 现将《莲台仙会品》与《秦淮士女表》结合起来共列一表如下，其中品目全以《莲台仙会品》为凭，惟王玉娟之名目从《秦淮士女表》。

---

①笔者认为《莲台仙会品》中本有王玉娟为女解元，因从会魁以下，各列二名，唯解元缺一，疑为转抄或刻印者之遗漏。

《莲台仙会品》原榜			《秦淮士女表》补记	
品　目	妓女姓名	花　名	妓女居址	评　语
女学士	王赛玉	紫　薇	旧院后门街	瀛楼国色原名玉，瑶岛天仙旧是王。
女太史	杨璆姬	莲　花	旧院纱帽巷	旧家虢国还秦国，绝世吴璆共楚璆。
女状元	蒋兰玉	杏　花	旧院鸡窝巷	丽质人如玉，幽香花是兰。汉宫宜第一，秦史合成双。
女榜眼	齐爱春	桃　花	旧院长板桥	六宫独倾国，一笑可留春。
女探花	姜宾竹	西府海棠	旧院前门上	风月宜为主，心情共此君。
女会元	徐琼英	梅　花	旧院道堂街	飞琼归月态，云英捧玉情。
女会魁	赵连城	芍　药	旧院大街上	连城重良璧，飞舞美纤腰。
女会魁	陈玉英	绣　球	旧院厂儿街	芳英春驻色，雅调玉飞声。
女解元	陈文姝	桂　花	旧院红庙边	旧里陈宫重结绮，高情朱阁细论文。
女经魁	张如英	芙　蓉	旧院石板街	含英娇灼灼，真情自如如。
女经魁	蒋文仙	葵　花	旧院大街上	文姿本超俗，仙籍近题名。
储　材	陈琼姬	蕙　草	缺	缺
储　材	王蕊梅	芝　草	缺	缺
女解元	王玉娟		旧院后门上	璠玙蕴藉昆山璧，明丽婵娟倚月宫。

这些主持花榜和参与品题的文人名士，如梁辰鱼、吴伯高、曹大章等，或者是科场上与仕途中的失意者，或者是鄙视功名而

无意科举者。他们带着不满现实的满腔怨愤出入于青楼酒馆，狂歌痛饮，借以消愁解忧。他们开设花榜的行为本身就是对社会的一种示威和揶揄，因而他们把官场科场最荣显的头衔，毫不吝啬地赐给了妓女，把大自然最美丽的名花名卉献给了妓女，并且还以诗的评语去赞美她们。

这样一来，开设花榜既成了嫖界的高雅举止，也成了花界的莫大喜庆。此后，从南至北，从风而靡。如万历二十五年，冰华梅史同方德甫等人在北京开设花榜，以东院、西院、前门、本司、门外妓女共四十名配叶以代觥筹，亦为一时之盛事，不仅品评妓女的规模有所扩展，而且其品评方式也有所发展。他们将选评出来的四十位名妓，分为十字元（十一人），万字元（九人），百字元（九人），文字元（十一人）等四类品评，不仅有文状元，而且有武状元。每类中又区分高下等次，并通过行酒令的方式来对每名妓女加以品题。一律先引一句古诗，复加一句诗评与古诗相配，再从《世说新语》中引一个故事以寓其意。据冰华梅史说，他们"取怜竞态，傍观无当局之谜；而分品计巧，过目有持平之案。要以爱憎如由，已心作粘泥之絮；妍媸若照，系情无鉴流之波。虽宠极有歇，祇应抱恨于红颜；然阀地不逢，焉用致饥于糊眼"。（《燕都妓品》）可见他们是在对北京妓女进行了比较研究之后才评定等次的。天启元年，潘之恒作《金陵妓品》，他将三十二名妓女，分为四类品评：一曰品，典则胜；二曰韵，丰仪胜；三曰才，调度胜；四曰色，颖秀胜。这实际上是概括了妓女的四种风格，潘之恒对于妓女的研究与品评较之一般烟花品藻又深入了一层。崇祯

年间，桐城孙武公也曾于南京“大集诸姬于方密之侨居水阁。四方贤豪，车骑盈闾巷，梨园子弟，三班骈演。水阁外环，列舟航如堵墙。品藻花案，设立层台以坐状元。二十余人中，考微波(王月字)第一。登台奏乐，进金屈卮。南曲诸姬，皆色沮，渐逸去。天明，始罢酒。次日各赋诗纪其事。”①

清初花榜大致继承晚明格局，如仅以苏州而言，顺治年间就曾两定花榜：

> 顺治丙申(1656)秋，松江沈某至苏，欲定花榜，与下堡金又文招致苏松名姝五十余人，选虎丘梅花楼为花场，品定高下，以朱云为状元，钱端为榜眼，余华为探花，某某等为二十八宿。彩旗锦帐，自胥门迎至虎丘，画舫兰桡，倾城游宴。（《清稗类钞·娼妓类》）
>
> 顺治末，苏州有金某者，为相国之俊之宗人……复集全吴名妓，品定上下，为脞传体，即花榜也。约于某日，亲赐出身，自一甲至三甲，诸名妓将次第受赏。虎阜，其唱名处也，倾城聚观。……（同上）

清初花榜除增加了二十八宿的品目以外，其他形式一如晚明，但以“倾城游宴”、“倾城聚观”等语可知，开设花榜，不仅嫖客、妓女感兴趣，而且市民们也津津乐道。这样，花榜实际成为了风月界的一种最具有权威性的商业广告。妓女一旦名列

①《板桥杂记》。

榜首，就正如被评上了金质奖、银质奖的优质商品一样，立即就会成为嫖客们争相购买的紧俏货。

当妓女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而活跃于社会舞台上的时候，男人（指狎客）们就开始了对她们的欣赏与研究。尤其是随着市妓的兴起，她们以一种开放的姿态面向整个都市社会之后，男人（狎客）们不仅加强了对于妓女的欣赏和研究，而且对于男人如何嫖妓也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探讨和研究。《明代嫖经》就是在市妓疯狂发展，花榜非常盛行的背景下出现的。上述名士才子开设花榜的目的，实际上也包含有引导男子如何择妓而嫖的意图。不过，他们的研究视野一般还停留在妓女的外貌特征、风情趣味上，而《明代嫖经》则已深入到妓女的心理习性，开始对她们作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它是基于男人嫖妓经验的理论总结，因而它不仅成了古代嫖界的指南，而且反映了明代士人和妓女的心态。

《明代嫖经》的基本内容，现在还全部保存在明朱元亮辑注、清张梦征汇选的《青楼韵语》①一书中，全书共四卷，收有《嫖经》的原文，并逐条附有注释。此外，还辑选了古今一百八十位入籍名妓的诗词韵语共五百余首。在编排体例上，“汇语以嫖经为纲，上加一圈，以便条览；次注释，次经目，次诗，次词，次曲，而古今世代名次，其中又各为先后”。据《青楼韵语凡例》说：“嫖经系旧人所作。”“注释系（朱）元亮先生（明代人）名笔，愚（指清人张梦征，系康熙末年进士）意略

①见1935年中央书店铅印本。

加参赞，至旧注稍不俗者，并得备录。”诗词韵语则为张梦征所汇选。

《嫖经》究为明代何人所作，已不可知。但作者之所以作《嫖经》，朱元亮之所以辑注《嫖经》，张梦征之所以汇选韵语，并结集梓行，都是有所寓意的，据花祸上人《青楼韵语题词》曰：“天下事未有不以韵胜。……古之韵人，于是发愤作《嫖经》，《嫖经》韵乎？曰：韵！……则青楼与青楼中人，我视之，又自韵甚，乃况其诗词也者。以故梦征居士为辑是集，言之曰《青楼韵语》，冠之以《嫖经》，附以诗若词，绘以图，与元亮氏漫缀以品题焉。虽曰品题，实《嫖经》注疏也。韵哉梦征！后有肄业此道者，梦征不为之朱夫子哉？余谓课韵子弟，知尊梦征为朱夫子，庶几他日者，不愧为明经之士，此道中经术从可明矣。”原来这一切都是文人士子愤世嫉俗的表现，他们在对官场与科场彻底失望的同时，也早已把朱熹的道学经术看得一钱不值，因而，他们不仅把官场科场最荣显的桂冠赐给了妓女，而且把狎妓品妓等风流韵事作为一种神圣的经术来研究。于是，他们针对明代统治者把《四书》、《五经》以及程朱等人的注疏作为科举考试内容的现实情况，故意依样画葫芦，为风月界作《嫖经》，并逐条加注疏。实际上，这种煞有介事的行为本身，就是对官场科场和社会现实的一种莫大的嘲弄与讽刺。

就《嫖经》和朱元亮的注文（以下简称朱注）的具体内容而言，虽然大部分是关于男子如何嫖妓的原则、方式、技巧以及注意事项等等，但其中也有一些可取的观点，至今仍闪烁着人

道主义的光辉。

首先，他们认为，妓女和嫖客同样是人，她们也同样具有人的爱欲与情感。《嫖经》首条曰："男女虽异，爱欲则同；男贪女美，女慕男贤。"朱注曰："客与妓，非居室之男女也，而情则同。女以色胜，男以俊俏伶俐胜，自相贪慕。"这就是说，世上无论男女，人人都有爱欲与情感，男女之间相互爱慕，实为天理使然。作为嫖客和妓女来说，他们之间的关系虽然同夫妻关系有所区别，但其爱欲与情感是相同的。因而《嫖经》作者主张嫖妓以获得爱心、真情为贵。如《嫖经》第二十九条曰："初会处色，久会处心。"第三十条又曰："情不在貌，色要择人。为情者，嫫母可以同居；为色者，西施才堪并处。"妓女的绝色美貌固然会对男子产生极大的吸引力，但真正的重情者，当不以貌取人。相反，你如果真想获得妓女的爱心与真情，倒不如去追求那些相貌与自己般配的妓女，所谓"村客遇俏妓，而俏妓情不在；中人请下妓，而下妓心反专"（经第三十六条），就是指的这种情况。当然，妓女表达爱心与真情的方式也各有不同，有的是"题诗而寄意，歌曲以伸情"（经第六十二条），有的则是"口头寄信"、"眼角传情"（经第六十一条），这全靠男子自己去感受、去把握。一般说来，"年渐深而情渐密，乃是真心"（经第四十九条），"久浓方有实意"（经第十一条），"贫能周患能济，乃是情人"（经第八十七条）。总之，男子嫖妓，当从情出发，以情为重。即使你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也应"莫将势压，当以情亲"（经第五十八条）。

其次，他们同情妓女受龟鸨压迫与剥削的悲惨命运和她们

不得不向嫖客卖笑索钱的生活处境，甚至认为有些妓女见钱眼开、唯利是图，乃至虚情假意、弄巧做奸，也是事出有因、迫不得已的。如《嫖经》第一百一十条曰："须是片时称子建(才)，不可一日无邓通(钱)。"第一百二十条又曰："子弟钱如粪土，粉头情若鬼神。"这就明确揭示了妓女和嫖客之间的性关系首先是建立在金钱关系的基础上的。历史上虽然有不少妓女因真心爱慕对方的风流才情而漠视金钱甚至倒贴金钱，但大多数妓女由于受龟鸨的教育影响或者威胁逼迫而不得不以赚钱为上，甚至采取种种手段对嫖客进行敲诈勒索。《嫖经》第四十五条曰："夸己有情，是设挣家之计；说娘无状，须施索钞之方。"朱注曰："一个做歹，一个做好，才赚得银子，大是买卖方法。"尤为可贵的是，《嫖经》及其注释认识到，妓女的矫情恶习，并非出自于她们的本性，而是因为"鸨子创家，威逼佳人生巧计；撅丁爱钞，势催妓子弄奸心"(经第二条)。也就是说，"妓之巧计奸心，非由性生，皆威逼势催习成耳"(朱注)。既然如此，那么作为嫖客一方面应该知趣一些，主动付酬，若"允物不待已索之后"(经第八条)，则"最动其喜"(朱注)；一方面应该提高警惕，时加运筹，"若不运筹，定遭罗网"(经第四条)。尤其是"初耽花柳，最要老成"(经第五条)。男子嫖妓时，付钱允物，都要适度得体，"频允物，担雪填井；不使钱，掩耳盗铃"(经第一百二十二条)。

再次，《嫖经》作者和朱元亮还细致地分析了妓女职业心理的种种表现，例如："抱枕昼眠，非伤春即病酒；挑灯夜坐，不候约便思人"(经第一百二十六条)。"约以明朝，定知有客；

问乎昨夜，决对无人”（经第三十一条）。并告诫嫖客应尊重妓女的人格，“事要乘机，言当中节”（经第二十五条），即使她们有忤于你，也应予以宽容、谅解，不必过于认真。

4·3 官妓同狎客、官府、龟鸨之间的关系

封建制度对于官妓的贱视与压迫，不仅以律令法规和道德舆论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还通过狎客、官府、龟鸨来直接施行和体现。她们作为妓女，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和享乐，便不得不屈身依赖狎客、官府、龟鸨的施舍，同时也不得不忍辱服从狎客、官府、龟鸨的奴役。但妓女毕竟也是人，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她们又必然会经常同狎客和官府或龟鸨发生冲突。这种冲突，既表现为妓女厌倦、痛苦、怨愤的心理情绪，也表现为她们挣扎、斗争、反抗的言语行动。因而，妓女同狎客、官府、龟鸨之间的这种矛盾关系及其活动内涵的总和，实际构成了官妓生活的整个悲惨世界。当然，具体而言，并非每位官妓的悲惨世界都必须由这三重关系及其活动构成，（如有的仅由其中的两重关系及其活动构成）而且这三重关系及其活动之间的关系也不一定是并列均衡的。

一、官妓同狎客的关系

妓女同狎客是相互依存的，离开了一方，另一方将不复存在。尽管历史上曾有不少男人同妓女之间产生过浪漫的爱情，

从而使他们的性活动已带有一定的自由平等色彩，但由于大多数狎客往往都是出于一种享乐心理，他们是以"权"或以"钱"来役使、玩弄妓女的，因而妓女同狎客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冲突。

对于历代宫妓和唐五代的地方官妓来说，役使她们的男子往往就是政府权力的体现者，他们不仅可以任意支配妓女的性活动(包括自己占有和支派妓女向他人提供性服务)，而且实际主宰着妓女的命运。因而，这类男子同官妓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买卖关系，而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奴役与被奴役、玩弄与被玩弄的关系。

在众多的宫妓中，虽然也偶有受宠乃至因生子而晋升为皇后者，如唐肃宗的章敬吴皇后即是，但大多由于长期处于一种性饥饿、性抑郁状态而心怀怨尤，甚至还有不少宫妓在向皇帝献伎呈身时遭受侮辱与迫害，如唐武宗时的孟才人因善歌唱和吹笙而得宠，武宗临死前诱逼她殉葬，她悲痛得气绝而死；① 唐文宗时宫妓郑中丞为琵琶能手，一日忤旨，文宗便命内宫把她勒死后投入河中；② 元顺帝常以宫女施行演揲儿法(即房中术)，乃至男女裸处，君臣宣淫；明武宗于宫内建豹房，宫女也有遭其辱者；南明弘光皇帝以南教坊不足充下陈，大购女妓入宫，以至"一日毙童女二人，厚载门，月裹骸出若干。弱质萎蕤，委于尘露"。③

①张祜《孟才人叹并序》。 ②《乐府杂录》。 ③谈迁《枣林杂俎》仁集。

就唐五代地方官妓而言，她们的性活动，既不会象宫妓那样常年幽闭宿空房，也不必象色妓那样夜夜留客夜夜新。她们在向行政、军事长官提供性服务的同时也满足了自己的性欲快乐。其中也不乏因色艺才情超群而颇受宠爱者，如成都营妓薛涛、杭州官妓商玲珑等。甚至也有因同狎客产生爱情而得以落籍从良者，如唐代李曜纳营妓韶光，五代马郁得官妓转转。但仍有不少妓女对于这种被奴役、被玩弄的处境深感痛苦。如据《云溪友议》卷上载：

> 李八座翱，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匣妓而颜色怃悴。殷尧藩侍御当筵而赠诗，曰："姑苏太守青娥女，流落长沙舞柘枝。满座绣衣皆不识，可怜红脸泪双垂。"明府诘其事，乃故苏台韦中丞爱姬所生之女也。曰："妾以昆弟夭丧，无以从人，委身于乐部，耻辱先人。"言讫涕咽，情不能堪。

更为可悲的是，有的妓女不仅被作为高级娱乐工具而供官员们任意玩弄，而且还会因官僚们争风吃醋而无辜受害。如雕阴（今陕西绥德）官妓杜红儿，姿色出众，善为音乐，常为傅戎所狎。当时诗人罗虬，任鄜州从事之职。有一次傅戎外出，罗虬令杜红儿唱歌，歌唱完毕，罗虬心甚爱慕而赠之绡彩，但地方官李孝恭却出面阻止杜红儿接受绡彩，理由是红儿已属傅戎，不准罗虬染指。罗虬一怒之下，拂衣而起，拔刀手刃杜红儿。事后，罗虬又作《比红儿诗》一百首，盛赞红儿的色艺才情。

红儿的鲜血，不过为文人士大夫的风流人格着上了一层粉红的颜色而已。

对于历代市井艺妓和宋元地方官妓来说，她们有的仍属官府钤辖，有的还要受鸨母控制，但相对来说，她们的性活动是比较自由的。宋元时已下令禁止职官宿娼，军事行政长官原则上只能传唤官妓以歌舞承应，而不能直接支派她们的性活动。鸨母只要求她们多挣钱，在狎客较多的前提下，留谁过夜，仍可由妓女决定。因而，在一般情况下，她们基本上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而有选择地献身。这就使得她们与狎客之间的关系，既是一种商品买卖关系，同时又带有一定的自愿平等色彩。如据《癸辛杂识》载："南宋淳祐间吴妓徐兰擅名一时，吴兴乌墩镇有沈承务者，家巨富，慕其名，遂驾大舟往游焉。徐知其富，初则馆之别室，开宴命乐，极其精腆。至此日，复以精缣制新衣一袭奉之。至于舆台，各有厚犒。如此兼旬日，未尝略有需索。沈不能自已，以白金五百星兼缣彩百匹馈之。凡留连半年，靡金钱数百万，于是徐兰之声播于浙右。"徐兰与沈郎之间的关系虽然纯粹是一种买卖关系，但双方之间是自愿的、平等的。沈郎是慕名而来，自愿出重金买欢乐，徐兰则是瞄准了他的钱袋才自愿提供高质量的声色服务的。但也有不少妓女同狎客之间的性活动，除了经济的因素以外，还更多地包含有才貌互赏、志趣相投的感情因素。如北宋汴京名妓李师师就曾先后与词人晏几道、秦观、周邦彦互慕风流，共度良宵。所以，晏几道作《生查子》词云："几时花里闲，看得花枝足。醉后莫思家，借取师师宿。"秦观也有《一丛花》词曰："年时今晚见师师，

双颊酒红滋，疏帘半卷微灯外，露华上，烟袅凉飔，簪髻乱抛，假人不起，弹泪唱新词。”大观年间，宋徽宗慕师师艳名也微行私狎，但与此同时，师师却与词人周邦彦常来常往，两情甚洽。徽宗后来得知此事，也不怪罪师师。由此可见，李师师和狎客之间的关系已渗入了感情的因素，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自由平等的关系。甚至有的妓女与狎客之间的性活动完全排除了经济的因素，而真正成了一种情人关系或恋爱关系。如柳永常在汴京角妓张师师家过夜，柳永当时穷困潦倒，张师师不仅不收他的钱，还倒贴金钱支付他的日常费用。①

至于历代色妓与狎客之间的关系，则纯粹是一种赤裸裸的商品买卖关系。她们在妓院老板的管派之下，常年操皮肉生涯，以计时或计次来向狎客索取金钱。于是，男女之间本来具有浪漫情调和神秘色彩的性生活，由于铜臭的熏染而越来越变得庸俗化、简单化了。大部分妓女的感情日趋麻木，一切笑语欢颜都不过是逢场作戏，以至连她们的性活动也逐渐成为一种机械运动而排除了感情的因素。这样，妓女同狎客之间的冲突就难免会时常发生。狎客既然出了钱，就只顾发泄自己的欲望，甚至还虐待或殴打妓女。例如宋代士人吴南金“恋妓周惜，及归，行囊枵然，周亦厌之。吴悔之，将别，饮于其家。令仆碎其器具，吴捶周有伤”。② 妓女既然一切为了钱，有时也会欺骗狎客，甚至还谋财害命。如据《北里志》记载，张住住本已和情人庞佛奴私通，却冒充处女以骗取狎客陈小凤的重金。令狐滈曾一度为北里常客，“一旦忽告以亲戚聚会，乞辍一日，遂去

①《醉翁谈录》丙集卷二。　②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卷四。

之。谪于邻舍窗窥，见母与女共杀一醉人而瘗之室后。来日复再诣之宿，中夜问女，女惊而扼其喉，急呼其母，将共毙之，母劝而止。及旦，归告大京尹捕之，其家已失所在矣”。

二、官妓同官府的关系

官妓同官府之间的关系，简单地说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封建制度对于官妓的压迫与贱视，主要是通过官府来直接体现和具体施行的。对于历代官妓和唐五代的地方官妓来说，她们的衣食是由官府提供的，她们的生活享受和所受的文化艺术教育，远远高出于同时代妇女的一般水平之上。官府施加给她们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压迫。她们所遭受的痛苦也主要是精神上的痛苦。但由于她们所从事的艺术活动有时也可使人忘却痛苦，加之那些统治她们的官员，既是她们的狎客，又是她们艺术活动的欣赏者，至少在艺术活动和性活动的过程中双方的关系基本上可以趋于和谐。因而，她们和官府之间较少发生直接的外部冲突。

相比之下，宋元地方官妓同官府的矛盾冲突要激烈一些。首先，由于宋元法律规定妓女不准同职官私通。这就导致军事行政长官同官妓在感情上有所疏远。因而他们对待妓女的态度要冷酷、苛刻一些。如据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载：“吕士隆知宣州，好以事笞官妓，妓皆欲逃去而未得也。会杭州有一妓到宣，其色艺可取，士隆喜之，留之使不去。一日，郡妓复犯小过，士隆又欲笞之。妓泣诉曰：‘某不敢辞罪，但恐杭妓不能安也。’士隆愍而舍之。”刘沆则比吕士隆更为残酷与狠毒。他出

镇陈州时，一日启宴于外庭，使妓女迎接宾客，其中有一位朱衣乐人误盲，刘沆当场就将她杖杀于马前。① 其次，她们的生活来源已逐渐由官府供给转变为卖笑自给。但官府仍然规定她们的首要职责是承应官身，凡官府需要她们服务，必须随叫随到。根据元代《金线池》、《谢天香》等杂剧描写，凡妓女延误官身，便要"扣厅责打四十"；歌舞祗应中"若是失了韵脚，差了平仄，乱了宫商"，同样也要"扣厅责打四十"。更为严重的是，"乐户们一经责罚过了，便是受罪之人，做不得士人妻妾。"这就使官妓们陷入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为免于受罚，她们不得不随时做好承应官身的准备工作；另一方面，为了生计，她们又不能不利用空闲时间来向城市中除了职官在外的各阶层人士卖艺乃至卖身。因而，她们作为妓女的生涯，既比唐五代地方官妓艰难得多，也比同时代市井艺妓严峻得多。再次，尽管宋元法律规定不准职官宿娼，但实际上地方军事行政长官私下命令地方官妓侍寝的事仍屡见不鲜，一旦为人所发，妓女首先要遭受拷笞。如北宋杭州官妓薛希涛和南宋台州官妓严蕊，都因被人告发与官员私通而遭到严刑拷打。即使妓女及时到官府去自首告发，也难以幸免于难。如据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载："曾鲁公尹天府，……至来三日，有娼妓讼官吏宿其家。公得牒，审其意在毁败，公特不形色声，惟命检有无胎孕。既得验状无有，始责以敢欲污秽衣冠，重刑而械之。"曾鲁公既不调查事实真相，也不传唤被告，而仅以妓女是否受孕，来判定被

①《东轩笔录》卷十二。

告是否与之私通，这明显是一种官官相护、掩人耳目的行为。妓女被蹂躏后依法投诉，不光不予受理，反而被判为诬陷罪，重刑而械之。由此可见，妓女的命运的确是可悲之极了。

至于官府对于市妓的压迫，则是双重的，即政治上的贱视与经济上的征税。但总的来说，市妓与官府之间，实际是一种比较松弛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她们除了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如设法卖酒、歌舞祗应、因故拘讯时会同官府直接交手以外，一般来说，是很少有机会同官府发生直接冲突的。官府对于市妓的压迫在一定的程度上往往是假手于妓院老板——龟鸨来进行的。因而，我们在论述了妓女同狎客和官府之间的关系之后，还有必要继续考察一下妓女同龟鸨之间的关系。

三、妓女同龟鸨的关系

所谓龟鸨，是指那些专以赢利为目的而开设和经营妓院歌馆的老板，男老板曰龟奴，女老板曰鸨母。他（她）们既是妓女这种特殊商品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又是妓女卖淫活动的贸易伙伴和保护人。妓女虽然入了乐籍，但其身体已折价卖给了龟鸨，因而妓女实际上是龟鸨的私有财产和赚取利润的可变资本。妓女的衣食需要和卖淫场所设施均由龟鸨提供，因而她们计时计次卖淫的收入也全部为龟鸨占有，只有嫖客在常价之外悄悄另送的钱财可归妓女所得。妓女即使有机会落籍从良，也必须首先向龟鸨偿付一大笔赎身费方能得遂心愿。由此可见，龟鸨同妓女之间，实际上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同时也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龟鸨和妓女的这种畸形关系完全是由金

钱，由超额利润所缔结、所维系的。龟鸨为了赚钱，是不惜采取种种手段来逼迫妓女多接客、多赚钱的。因而妓女同龟鸨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冲突。

当然，并非所有的妓女都必须受龟鸨的压迫和剥削。如历代宫妓和唐五代地方官妓，以及一部分专以卖艺为业的市井艺妓，一般是不存在这种关系的。原因是她们并不以卖淫作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谋生手段。这种关系主要存在于历代市井妓院歌馆之中和宋元时代逐渐市妓化了的地方官妓之中。由于这一类妓女既隶属乐籍，又直接受龟鸨管理，因而她们既要遭受政治上的贱视，又要受到经济上的剥削。

龟鸨是卖淫业兴起之后滋生出来的一个食利阶层，至迟产生于唐代。《北里志》中“王莲莲”条曰：“曲中惟此家假父颇有头角。”所谓假父，即龟奴也。关于鸨母，《北里志》记载颇详：“妓之母，多假母也。亦妓之衰退者为之。诸女自幼丐育，或佣其下里贫家。常有不调之徒潜为渔猎。亦有良家子，为其家聘之，以转求厚赂，误陷其中，则无以自脱。初教之歌令而责之，其赋甚急，微涉退怠，则鞭朴备至。”“诸妓以出里艰难，每南街保唐寺有讲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牵率听焉。皆纳其假母一缗，然后能出于里。其于他处，必因人而游，或约人与同行，则为下婢，而纳资于假母。”所谓假母，即不是妓女亲生母亲的鸨母，她们都是从妓女出身的，年长色衰之后便以开设妓院来牟利为生。因而她们的素养、技巧和经验，足以使她们既能严格地教育和训练妓女，也能熟练地驾驭和管理妓女。她们年轻做妓女时自己曾被人蹂躏践踏，年长做了鸨母之

后却又蹂躏践踏自己的同类。

尤为残忍的是，有些妓女的鸨母竟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如南曲妓女张住住，“其母之腹女也”。她从小与邻居庞佛奴青梅竹马，私有结发之契，但其母为了赚钱，竟逼迫张住住接受富豪陈小凤梳栊，并定于三月五日成亲。张住住便提前把处女的贞操献给了庞佛奴。后来母亲又逼迫女儿嫁给陈小凤。住住指阶井曰：“若逼我不已，骨董一声即了矣。”最后因庞佛奴升为邸将，张母才允许女儿嫁给庞佛奴。① 元代关汉卿杂剧《金线池》中描写的济南官妓杜蕊娘的鸨母也是亲生母亲。杜蕊娘“十度愿从良，长则九度不依允。”她向母亲求情说：“母亲，嫁了您孩儿罢，孩儿年纪大了也。”母亲回答说：“丫头，拿银子来镊了鬓边的白发，还着你觅钱呢？”女儿的头发开始发白了，还逼迫她卖淫牟利，金钱臭气的长期熏染，使得母女亲情也荡然无存了。所以当杜蕊娘深深地爱上了书生韩辅臣之时，母亲竟造谣生非，挑拨离间，不择手段地赶走了女儿的恋人。

针对鸨母贪财爱钞的这种唯利是图的心理，明代有人写了一篇《妓家祝献文》，刻画鸨母的内心世界，曲尽其情。其文曰：

伏以香焚宝鼎，烛插银缸，奉请勾栏土地、教坊大王、烟花使者、脂粉仙娘。弟子生长九江之上，侨居圣帝之旁。因无生理，买良为娼。今遇七夕令节，启建荤素道场，拜献本司圣众，愿祈如意吉祥：大姑常接有钱孤老（孤老即嫖客），二姐专招多钞财郎，三姐房中时时舞弄狮子，四

① 《北里志》。

姐床上夜夜捉对鸳鸯，五姐忙兜兜迎新送旧，六姐急忙忙脱裤宽裳，七姐盐商包定，八姐木客连桩，九姐愿得富翁梳弄，十姐只求财主成双。厨厦春梅秋菊，常接个帮闲落剩之客。走动张三李四，频烧些净脚洗手之汤。合家利市，永保安康。谨疏。①

文中假拟一个拥有十位妓女的鸨母，于七夕之夜设荤素道场拜献神明，焚香祈祷，不仅祈求让十位姊妹日日接富客赚大钱，而且希望让侍女佣人也能附带接客赚钞，生动地揭示和幽默地讽刺了鸨母爱钞的铜臭心理。

鸨母本是娼妓制度的牺牲品，却又充当娼妓制度的帮凶来迫害同类女性甚至包括自己的亲生女儿。她们既是可悲的，也是可恶的；她们自己被人吃，却同时又要吃别人。自己受尽了蹂躏屈辱之后，又用强迫别人受屈受辱来作为心理上的补偿，以求得畸形的心理平衡。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妓女的悲惨生活史，不仅是一部男人奴役女性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女性自我奴役、自我摧残的历史。

4·4 官妓的理想和人格追求

在一千多年的官妓生活史上，虽然有不少妓女在长期的卖

①引自《坚瓠七集》卷四，据褚人获说，该文原载于李卓吾《山中一夕话》中。

笑生涯中，逐渐从心理上认同了这种供男人娱乐的社会角色和奢侈放荡的生活方式，因而自甘堕落，不愿从良；甚至有在从良之后，由于忍受不了礼教的束缚或生活的清贫而复入娼门重操旧业的。但大部分妓女在楚楚动人的歌唱声里，仍然掩不住阵阵哽咽；在飘飘欲仙的舞姿背后，仍然饱含着满腹悲哀。她们中有许多人为了摆脱这种受侮辱、受奴役的悲惨命运而进行了种种抗争，甚至有不少人为维护自己的理想和人格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因而，我们可以进一步说，中国妓女生活史，不啻是一部男性奴役女性和女性自我奴役的历史，而且也是一部女性争取解放的历史。本节拟通过考察官妓的理想与人格追求，来探讨妓女要求解放的具体内涵和历史意义。

首先，她们虽然地位卑贱，却心志高洁，无论献伎呈身，都极力维护自己的人格与尊严，希望能够得到狎客的赏识、理解、尊重和爱抚。尽管出于政治压迫或经济交易的原因，她们不得不履行职责，向那些对她们施以贱视、侮辱和蹂躏的男人提供声色服务。但那不过是例行公事，并无主体意识的参与，更无真挚感情的投入。只有遇到那些与她们情趣相投、才貌互赏并且尊重她们、怜惜她们的男子，她们才会有发自肺腑的歌唱，她们才会有出自心底的真情的奉献。于是，在她们所面对的男性社会各阶层人士中，大多数妓女的情爱心理都倾向于风流多情的文人士子。一方面，她们倾慕文人士子的风华才情和艺术趣味，她们所演唱的内容往往都是文人所创作的诗、词、散曲和戏剧，而文人士子往往又是她们艺术表演的欣赏者和评论者，有的妓女甚至会因受到文人的品评或被文人写入诗词而得

以名扬天下。尤其是有些妓女在文人的影响下，不仅提高了文化素养和艺术趣味，而且还学会了创作诗词散曲，并可经常同文人唱和赠答。于是，文人士子实际上成为了妓女的师友和知音。她们在同文人士子的这种微妙关系中，不仅使自己的主体意识得以表现，而且使自己作为人的价值也得以肯定。

另一方面，她们也欣赏文人士子风流自赏的浪漫人格和怜香惜玉的求爱方式。在古代中国，文人狎妓，不仅不为道德舆论所指责，反而还为人们所欣赏、所艳羡。因而，自命风流便作为文人的情爱心理而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甚至还成为文人自我人格价值的一种表现。作为妓女来说，她们既讨厌道学家的故作正经，也反感权豪势要的随心所欲，更不能忍受商贩马夫的粗鲁贪婪，唯有文人士子的那种娓娓动听的赞美，那种执着热烈的追求，那种富有诗意的爱情表白以及那种温存怜惜的爱抚方式，才为她们所乐于接受。《青楼集》中关于顺时秀的一段记载，最典型地反映了妓女爱慕文士的心理定势：

> 顺时秀，姓郭氏，字顺卿，……平生与王元鼎密。偶疾，思得马板肠，王即杀所骑骏马以啗之。阿鲁温参政在中书，欲属意于郭。一日戏曰："我何如王元鼎？"郭曰："参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经纶朝政，致君泽民，则元鼎不及参政；嘲风弄月，惜玉怜香，则参政不敢望元鼎。"阿鲁温一笑而罢。

正因为大多数文人士子都能象王元鼎那样尊重妓女的人格，并

把她们作为情人来对待、来怜惜，她们才会向各自的意中人奉献自己的爱心和真情。在古代，良家妇女都被作为生育机器而存在，大多不知爱情为何物，而妓女却曾体验过销魂的滋味，品尝过爱情的快乐，这不啻是妓女不幸人生之万幸，而且也是作为女性价值的一种自我实现。

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历代许多心志高洁的妓女，都把风流多情的文人士子作为爱慕的理想对象。古人常说："自古才子慕佳人，从来佳人爱才子。"在更多的意义上是指妓女和文人之间的这种情爱心理定势。因此，自唐代开始，每至春闱前后，京师都会出现一次才子佳人谈情说爱的高潮。这时不仅是举人进士寻访名花的浪漫季节，同时也是妓女选择意中人的大好时机。一旦某个士子获得名妓的垂爱，或某个妓女受到才子的品题，马上就会以风流快事传播京都。例如：

> 长安名妓刘国容，有姿色，能吟诗，与进士郭昭述相爱，他人莫敢窥也。后昭述释褐，授天长簿，遂与刘国容相别。诘旦赴任，行至咸阳。国容使一女仆，驰矮驹赍短书云："欢寝方浓，恨鸡声之断爱；思怜未洽，叹马足以无情。使我劳心，因君减食。再期后会，以结齐眉。"长安子弟，多讽诵焉。（《开元天宝遗事》）

象这类进士与名妓相爱的美谈在历代史籍中比比皆是。

妓女爱慕文人的这种心理定势形成之后，往往能够不为权势所屈，不为金钱所动，尤其是在由于"鸨儿爱钞，妓女爱俏"

而构成妓女同文人、商人之间的三角关系的时候，妓女总是倾心于文人而鄙视商人。元代妓女剧对于妓女的这种倾向作了真实的反映和热情的歌颂。

当然，在文人士子中也有不少负心薄幸之徒。试举一例：

> 杨学士孜，襄阳人。始来京师应举，与一倡妇往还，情甚密。倡以所有以资之，共处逾岁。既登第，贫无以为谢，遂纳以为妻，同归襄阳。去郡一驿，忽谓倡："我有室家久矣，明日抵吾庐，若处其下，渠性悍戾，计当相困。我视若，亦何聊赖？数夕思之，欲相与咀椒而死，如何？"倡曰："君能为我死，我亦何惜？"即共痛饮。杨素具毒药于囊，遂取而和酒。倡一举而尽，杨执爵谓倡曰："今倘皆死，家人须来藏我之尸，若之遗骸，必投诸沟壑以饲鸱鸦，曷若我葬若而后死，亦未晚。"倡即呼曰："尔诳诱我至此，而诡谋杀我！"乃大恸。顷之遂死。即婚痊而归。杨后终于祠曹员外郎，集贤校理。（《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

杨孜登第入仕之后，负心悖情尚且罢了。更为狠毒的是，他为了不背上负心之名以影响他的前途，竟然有预谋地诱杀了真心爱他的妓女。可见官场是一个大染缸，士人一入仕途，大都心肠变黑、良心丧尽了。所以古代也有妓女并不盲目迷信文人士子，而是通过比较识别，寻找真正的有情人，例如南京妓女张小三就与商人杨玉山相爱达二十年之久。①

①冯梦龙《情史·情贞类》。

其次，她们虽然身系乐籍，却渴望解放，希望能够获得正常人的权利和义务。尽管从事卖笑生涯，衣食无忧，生活奢华，并且不受礼教的约束，在向人献身时自己也能获得性的快乐，但她们作为人的权利被社会无情地剥夺了，她们作为女性的尊严遭到了肆意践踏。加之她们所受的文化教养高出于同时代一般女子之上，这又使她们更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不幸。因而她们面对自己的悲惨命运而深感屈辱乃至痛哭呼号，并且历代都有不少妓女为摆脱这种受侮辱、受奴役的处境而进行了种种抗争。唐代名妓徐月英作《叙怀》诗曰：

为失三从泣泪频，　　此身何用处人伦。
虽然日逐笙歌乐，　　常羡荆钗与布裙。

把良家妇女的权利和义务，作为自己不幸命运的参照，这是许多妓女自我觉醒的一种标志。南宋绍兴年间，全州司户单符郎见官妓杨玉哭泣而问曰："汝今鲜衣美食，时为爱重，有何不足耶？"杨玉回答说："妾为女子愿为有家。若嫁一小民，布裙短衾，啜菽饮水，亦是良妇。今在此迎新送故，是何情绪。"①希望象普通妇女那样，做贤妻良母，守三从四德，即使是着荆钗布裙，食粗茶淡饭，也心甘情愿。这是许多妓女觉醒之后的一种普遍心态。于是，落籍从良，便成了许多妓女的基本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她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斗争。其具体方式不外有如下三种：

①冯梦龙《情史·情缘类》。

第一是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在众狎客中选择可以托为终身的情人，并凭借情人的帮助跳出火坑，落籍从良。就地方官妓而言，如果是军政长官看中了某妓女，则可以凭借手中权力直接除籍，纳为妻妾。如唐代李曜娶营妓韶光，① 韦保衡纳东川官妓，② 韦蟾纳武昌妓，③ 都是如此。当然也有情郎本人不是军政长官，但能想方设法获得军政长官的批准而落籍，也可娶妓女为妻妾，如五代马郁就以即席做赋而获得镇帅的首肯，将官妓转转纳为内室。④就市妓而言，不管是谁看中了某妓女，都必须经过龟鸨的同意，并交一笔可观的赎金方可脱籍从良。如元代陈云峤爱上妓女王巧儿，“厚遗其母”，方娶为妾；涅古伯经历属意湖州角妓汪怜怜，也是“备礼纳之”。⑤ 明末蔡如蘅出三千金才得以娶金陵名妓王月归家。⑥

第二是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歌舞承应时赢得过往风流名士的好感与同情，并求得风流名士的帮助而落籍从良。如唐代潭州柘枝妓祇应李翱、殷尧藩等人时，乘机向他们诉说了自己的不幸遭遇和渴望从良的心志，李翱等人深表同情，并且立即“于宾榻中选士而嫁之”。⑦宋代妓女恳请风流名士帮助落籍，更富有浪漫情调。试举二例如下：

杭州营籍周韶，……知作诗。（苏）子容过杭，（陈）述

①《南部新书》。 ②《太平广记》卷二七三。 ③《太平广记》卷二七三。 ④《旧五代史·马郁传》。 ⑤《青楼集》。 ⑥《板桥杂记》。 ⑦《云溪友议》卷上。

古饮之。韶泣求落籍，子容曰："可作一绝？"韶援笔立成，曰："晚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开笼若放霄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韶时有服，衣白。一座嗟叹，遂落籍，同辈皆有诗送之。（《侯鲭录》卷七）

（东坡）昔寓京口，官妓郑容、高莹二人侍宴，坡喜之。二妓间请于坡，欲为脱籍。坡许之，而终不为言。及别，二妓之船所悬之。坡曰："尔但持我此词（指《减字木兰花》一词）以往，太守一见便知其意。"盖见"郑容落籍，高莹从良"八字也，此老真尔狡狯耶。（《古今图书集成》卷八二四引《扪虱新话》）

周韶、郑容、高莹在侍宴时向过往的风流名士求情，这的确是一种巧妙的抗争方式。苏子容（颂）和苏轼既已应允，杭州太守和京口太守便不能不照顾客人的情面而同意她们除籍从良。但当妓女直接向顶头上司请求落籍时，则不一定都能得遂心愿。例如：

子瞻通判钱塘，尝权领州事。新太守将至，营妓陈状词，以年乞出籍从良。公即判曰："五日京兆，判状不难，九尾野狐，从良任便。"有周生者，色艺为一州之最，闻之亦陈状乞嫁。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虽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渑水燕谈录》卷十）

苏轼之所以准许营妓某从良，是因为她已年长色衰，而周生色

艺最佳，正是苏轼等辈求之不得的，怎么能轻易让她从良呢？

第三是平时积攒资金，一旦相中情人，便自己拿钱向龟鸨赎身而脱籍从良。这当然是就那些受龟鸨管领和压迫的妓女而言。虽然她们平时以计时计次卖淫所得收入都已为龟鸨所吞占，但仍有不少嫖客为获得妓女的欢心，往往还会在常价之外另送金钱礼物。有心计的妓女便会把这些钱物悄悄积攒起来，或者是自己贮存在隐秘之处，或者是寄放在相知之家。一旦决定从良时，就可拿出一笔钱向龟鸨赎身，另外还要保留一部分资金作为从良后的生活费用。当然，越是年轻美貌，艺绝流辈的妓女，她们作为龟鸨的摇钱树，便越不容易获准从良。即使龟鸨迫不得已允许了，也会漫天要价。因而渴望从良的妓女不能不与之进行巧妙的周旋与抗争。如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写明代名妓杜十娘久有从良之志，因而在七年间积攒下万金而无人知晓。当她爱上太学生李甲之后，一年多不接他客，并故意以此来激怒鸨母。为赶走囊箧早空的李甲，鸨儿在多次叱骂也无济于事之后做出最后通牒：约以十天之内，只要李甲拿三百金为杜十娘赎身，就准许落籍从良。否则，一顿孤拐，打那光棍出去。杜十娘知道这是鸨母的离间之计，便也将计就计，逼鸨母赌咒发誓，决不翻悔。十娘为进一步考验李甲的诚意，自己故意只拿出一百五十两银子，而让李甲去向人借贷了一百五十两银子。第十天李甲交银领人时，鸨儿嘿然变色，大有悔意，十娘便立即以自杀相威胁，迫使鸨儿不得不准许她落籍从良。杜十娘从良事虽系出自小说，但冯梦龙是本于《九籥集·负情侬传》而作，当是有现实生活作为依据的。

当然，落籍从良，并不意味着个个必定幸福，也不全等于人人都获解放。例如关汉卿在《救风尘》中写宋引章从良嫁给花花公子周舍之后，受尽了折磨和侮辱，因而悔恨不已，后来向风尘姊妹赵盼儿求救，才脱离虎口。关于从良的种种情形，冯梦龙曾借刘四妈之口作过详细论述：

有个真从良，有个假从良。有个苦从良，有个乐从良。有个趁好的从良，有个没奈何的从良。有个了从良，有个不了的从良。……如何叫做真从良？大凡才子必须佳人，佳人必须才子，方成佳配。然而好事多磨，往往求之不得。幸然两下相逢，你贪我爱，割舍不下。一个愿讨，一个愿嫁。好象捉对的蚕娥，死也不放。这个谓之真从良。怎么叫做假从良？有等子弟爱着小娘，小娘却不爱那子弟。本心不愿嫁她，只把个嫁字儿哄他心热，撒漫银钱。比及成交，却又推故不就。又有一等痴心的子弟，晓得小娘心肠不对他，偏要娶他回去。拼着一主大钱，动了妈儿的火，不怕小娘不肯。勉强进门，心中不顺，故意不守家规。小则撒泼放肆，大则公然偷汉。人家容留不得，多则一年，少则半载，依旧放他出来，为娼接客，把从良二字，只当个撰钱的题目。这个谓之假从良。如何叫做苦从良？一般样子弟爱小娘，小娘不爱那子弟，却被他以势凌之。妈儿惧祸，已自许了。做小娘的，身不由主，含泪而行。一如侯门，如海之深，家法又严，抬头不得。半妾半婢，忍死度日。这个谓之苦从良。如何叫做乐从良？做小娘的，正

当择人之际，偶然相交个子弟，见他情性温和，家道富足，又且大娘子乐善，无男无女，指望他日过门，与他生育，就有主母之分。以此嫁他，图个日前安逸，日后出身。这个谓之乐从良。如何叫做趁好的从良？做小娘的，风花雪月，受用已勾，趁这盛名之下，求之者众，任我择个十分满意的嫁他，急流勇退，及早回头，不致受人怠慢。这个谓之趁好的从良。如何叫做没奈何的从良？做小娘的，原无从良之意，或因官司逼迫，或因强横欺瞒，又或因债负太多，将来赔偿不起，别口气，不论好歹，得嫁便嫁，买静求安，藏身之法。这谓之没奈何的从良。如何叫做了从良？小娘半老之际，风波历尽，刚好遇个老成的孤老，两下志同道合，收绳卷索，白头到老。这个谓之了从良。如何叫做不了的从良？一般你贪我爱，火热的跟他，却是一时之兴，没有个长算。或者尊者不容，或者大娘妒忌，闹了几场，发回妈家，追取原价。又有个家道凋零，养他不活，苦守不过，依旧出来赶趁，这谓之不了的从良。（《卖油郎独占花魁》）

冯梦龙和关汉卿的看法大体上一致，他们都主张妓女从良，但必须选择理想的郎君。否则，才出狼穴，又入虎口，就既谈不上什么幸福，也算不得什么解放。

再次，她们虽已失身于人，却重情高义，希望能够成为真正被男人所爱的女人和被社会所承认的人。无论从良之前，还是从良之后，她们都把追求爱情和正义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

一旦这种理想确立了具体的内涵之后，她们就会坚守节操，矢志不移，乃至为情为义而死，为维护理想和人格而死，因而历代都曾出现过不少节妓和义妓。

所谓节妓，是指那些一旦爱上某个男子，并且以心相许之后，就真诚专一，为之守节。作为妓女，她们的性与爱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两相分离的，只有在遇到了意中人，并且自己也被爱的时候，她们的性与爱才融为一体，她们的人生也才具有了价值和灵光。因而，当她们一旦选定意中人并与之缔结盟约，誓为伉俪之后，她们就会信守盟约，忠于爱情，即使尚未落籍，也拒不接纳他客，甚至会为情而死。如唐代河中府官妓崔徽因恋人裴敬中调任不能相从，便"情怀抑郁"，乃至"发狂疾卒"。① 青州官妓段东美因情人薛宜僚病死竟素服哀号，抚棺一恸而卒。② 太原妓与欧阳詹相恋，"约至都相迎。别后，妓思之疾甚，乃刃髻作诗寄詹，绝笔而逝"。③ 北宋衡阳官妓王幼玉与柳富一见钟情，并且盟誓焚香，约以嫁娶，柳富别后，幼玉竟以相思卧病而绝。临死前还剪发一缕和手指甲数个，嘱以留赠柳郎。④ "颍妓刘苏哥与悦己者密约相从，而其母禁之至苦，不胜郁悒，以盛春美景，邀同韵者联骑出城，登高冢相对恸哭，遂卒"。⑤ 南京行都角妓陶师儿与王生眷恋甚深，但苦于鸨母所间阻，不尽绸缪。一日游西湖，王生与师儿相抱投入水中，舟人惊救不及而死。⑥ 散乐妓林小姐与傅九两情甚洽，"约窃负而逃，林

①张君房《丽情集》。 ②《诗话总龟》引《唐贤抒情集》。
③《全唐诗》卷八百二。 ④《王幼玉记》。 ⑤《坚瓠七集》卷二。
⑥《古今图书集成·娼妓部》引《名姬传》。

母防其女严紧，志不能遂。淳熙十六年九月，因夜宿，用幔带两条接连，共缢于室内”。① 明代宣德间河南妓女刘盼春爱上周子敬后拒不接客，在鸨母的强逼下，最后以自杀殉情。② 成化间金陵妓杨玉香与林景清一见交欢，恨相知之晚也。居数月而别，杨誓洁身以待，达六年之久，竟以相思之故，遂成沉疾而殒。③

当然，尚未落籍的节妓毕竟比从良之后的节妓要少得多。只不过从良之后的妓女，为了能够获得家庭和社会的承认，而不得不自觉地以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要求自己。因而她们正式嫁人之后，既能矢志忠于爱情，又能始终恪守妇道。例如明末金陵名妓董小宛自爱上冒辟疆后便一往情深，矢志相从，倾万斛心血，仗多方帮助，终于得以完债落籍，嫁给冒生为妾。冒辟疆《影梅庵忆语》说：“而姬之侍左右，服务承旨，较婢妇有加无已。烹茗剥果，必手进；开眉解意，爬背喻痒；当大寒暑，折胶铄金时，必拱立座隅。强之坐饮食，旋坐，旋饮食，旋起执役，拱立如初。余每课两儿文，不称意，加夏楚，姬必督之改削成章，庄书以进，至夜不懈。越九年，与荆人无一言枘凿。至于视众御下，慈让不遑，成感其惠。”遗憾的是，董小宛仅二十八岁就以劳瘁病卒。从良九年的生活表明，董小宛既是一个情至之人，又是一个贤惠之妇，她不仅得到了丈夫的爱情，而且得到了家庭和社会的承认。她的生平事迹虽然未被史书写入烈女传，但冒辟疆为她而作的《影梅庵忆语》不仅使董小宛

① 《情史·情痴类》。　②朱有燉《刘盼春香囊怨·小引》。③《情史·情灵类》。

名传千古，永垂不朽，而且使历代史书中的《烈女传》也黯然失色。

如果说象董小宛这样的从良妓女在丈夫生前能够忠于爱情，克守妇道尚在情理之中的话，那么，不少从良妓女在丈夫死后仍然坚守贞操，誓不改嫁就更不同寻常了。她们或者为丈夫守志尽责而终。（如唐代徐州妓女关盼盼嫁给张建封为妾，张殁，盼盼念旧爱而不嫁，独居燕子楼十余年，后白居易赠诗讽其死，盼盼得诗后，怏怏旬日，不食而卒。）或者出家为尼为女冠。（如元代湖州角妓汪怜怜被涅古伯经历纳为侧室后“克尽妇道，人无间言。数年涅没，汪髡发为尼，公卿士大夫多访之。汪毁形，以绝众之狂念，而终身焉。”）甚至有不少人效法历代烈女而殉夫死节。如明末清初扬州名妓沈素琼，善诗文，与新安才子夏子龙结为伉俪，后“夏以痛饮伤肺卒，琼视敛尽哀，遂盛妆饰，自序平生诗稿，题曰《幽愤言》，复成绝命词三首，以红丝自经于柩旁。”① 又吴门妓梁昭，“适一钱姓者，钱以事系狱将死，昭殉身以报，投缳于尼庵，时人皆称其烈焉”。② 众所周知的金陵诗妓柳如是，于崇祯十四年嫁给钱谦益为妾，（时钱氏嫡妻已死，实为妻。）生一女，做贤妻良母达二十余年。康熙三年，钱谦益病卒，族人中有与谦益为仇者，纠集众凶徒乘丧入室，肆横凌逼，欲瓜分钱氏家产。柳如是镇定自若，大义凛然，一边佯以入内点检银钱为名稳住众凶徒，一边暗谕家人将前后门户，潜为紧闭严守，然后入卧室以自缢

①《古今笔记精华》引《天香谈薮》。②《古今笔记精华》引《十美词》。

殉夫。家人发现后，立即大哄，以逼死主母罪，将凶徒绑而送官，悉置以法。柳如是以她的生命为代价，才平定了家难，保护了家产。①

所谓义妓，是指那些能够深明大义，信守节操的妓女。节妓也可以称为义妓，但义妓追求的内涵比节妓更为广泛。她们除了忠于爱情，坚守贞节之外，往往还讲民族气节，忠义爱国；讲人道精神，侠义为怀；讲人格尊严，道义为上。甚至会为维护自己的理想和人格，为伸张正义而贡献生命。如唐代长安名妓李娃初识郑生时，不过把他当作一般嫖客罢了，但当郑生被其父鞭挞几死，沦为乞丐之后，李娃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心，不仅拯救郑生于垂危之际，而且帮助他再度奋起。② 南宋高邮妓女毛惜惜于端平二年(1235)被地方官接去为叛臣荣全等人侍宴，惜惜深以为耻，不肯承应。同党王安斥责之，惜惜曰："妾虽贱，不能事叛臣。"荣全大怒，遂杀惜惜。惜惜临死不屈。她的人格和节操不仅受到了人民的景仰，而且还得到了统治者的褒扬，元代修《宋史》时，还把她收入了《烈女传》。明代万历年间杜十娘落籍后和情人李甲同赴杭州，途中李甲为贪千金之财，竟负心背情，将她卖给了孙富，杜十娘的心无比痛苦，无比悲愤，但同时又无比镇定。凌晨她即起身挑灯梳洗，盛妆打扮，至天明又催李甲快去成交，待孙富将白银一千两送给李甲时，她还亲自检看。接着当着众人一层层打开自己的百宝箱，将价值万金的首饰珠宝一一投入江中，最后抱持宝箱，投江自尽。从杜十娘身上，我们看到了妓女要求解放的深刻内涵：她

①徐兆玮《河东君遗事》。 ②《李娃传》。

们并不把从良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和最后归宿，而把爱情、理想、道义和人格看得高于一切，希望能够作为一个真正被男人所爱的女人和被社会所承认的人而活着。因此，当孙富破坏了杜十娘的爱情时，当李甲贪财薄情且面带喜色的时候，她深深地愤怒了。为了维护自己的理想和人格，她以牺牲自己的万金和生命为代价作了最后的抗争。

综上所述，尽管历代妓女争取解放的过程中，往往是以遵守三从四德的良家妇女作为参照系统，因而仍然难免被沦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但她们对于爱情、理想、正义和人格的执着追求，却是一种超前性的女性解放意识。就正如夜空中的流星一样，她们的这种抗争精神和超前意识，曾经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闪射出夺目的光辉。

第五章

家妓史叙论

51·历代家妓发展概述

如第一章所述，最早见于史籍记载的家妓，当是公元前562年晋悼公赐给魏绛的八名女乐。两汉三国时期，贵族官僚蓄养家妓便已蔚成风气。至两晋南北朝，家妓的发展开始进入兴盛时期，其间有些大贵族、大官僚蓄妓多至成百上千，其数量与规模几可与帝宫女乐媲美。历史进入隋唐以后，家妓的发展仍然保持这种势头，不仅大贵族、大官僚仍然广蓄妓妾，而且进一步在士大夫中间普遍盛行，历两宋而不衰，甚至直到明清，不少王公贵族家中还是歌妓成群，美女如云。

隋代贵族官僚中拥有家妓人数最多的，当推宇文述和杨素，宇文述屡以奇服异物进献宫掖，深得炀帝的欢心与宠爱，故“言无不从，势倾朝廷”。与此同时，他广占良田，夺人财宝，掠人妻女，以致后宫妓妾有百余人，家僮达千余人。① 杨素本是北方士族，隋文帝灭陈时，他因功升官受封，后又参与宫廷政

①《隋书·宇文述传》。

变，拥立炀帝，自此贵宠日隆，奢华无比。他拥有“家僮数千，后庭妓妾曳罗绮者以千数，第宅华侈，制拟宫禁。”① 隋代官僚贵族的家妓往往是直接从战争中掠夺而来，但也有一部分是由皇帝赏赐所得。根据有关史籍记载，凡是立有战功的将臣，皇帝不仅给他们封赠官禄，而且还会赠给女妓作为奖赏，试择数例列表如下：

官僚贵族姓名	皇帝赏赐女妓人数	资料出处
杨素	“赐陈主妹及女妓十四人”、“谅之妓妾二十人”。	《册府元龟》卷三八三
窦荣定	赐“西凉女乐一部”、“吴乐一部”。	《隋书·窦荣定传》
贺若弼	赐“女乐二部”。	《隋书·贺若弼传》
樊子盖	赐“女乐五十人”。	《隋书·樊子盖传》
李景	赐“女乐一部”。	《隋书·李景传》
于仲文	赐“女妓十人”。	《隋书·于仲文传》
史祥	赐“女妓十人”。	《隋书·史祥传》
杨义臣	赐“女妓十人”。	《隋书·杨义臣传》
王仁恭	赐“女妓十人”。	《隋书·王仁恭传》
董纯	赐“女妓十人”。	《隋书·董纯传》

皇帝的奖赏，实际上意味着提倡，隋炀帝以三万女乐表演散乐

①《隋书·杨素传》。

百戏更是一种表率。由此可见，尽管隋朝的历史极为短暂，但当时贵族官僚蓄妓玩妓的风气之盛并不亚于前朝。

唐代继承了隋朝的这种制度，也对立有军功的将领赏赐女妓，尤其是安史之乱后的中晚唐，获得这种赏赐的人更多一些。皇帝每次赏赐乐人、女妓的数目不大，一般只有数人或十数人，而同时赐予的奴婢则可多达数百人。如河间王孝恭就曾获“女乐二部，奴婢七百人”，① 窦抗获“女乐一部”，② 李晟获“女乐八人”，③ 浑瑊获“女乐五人”，④ 还有程怀直、戴休颜、李元谅、杨朝晟等许多将臣都曾获得皇帝所赐的女妓，恕不一一胪列。

对于官僚贵族蓄养家妓的数量与规模，唐代曾依据官品的等级明确作出过规定。神龙二年(706)九月中宗下令：“三品已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已上，女乐不过三人。”⑤ 至天宝二年(743)九月二日玄宗又下诏：“五品已上正员官，诸道节度使及太守等，并听当家畜丝竹，以展欢娱。” 既然皇帝有明令颁发，那么凡五品以上官僚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蓄妓玩妓了。而实际生活中，不仅这些五品以上官僚蓄妓的数量会远远超过诏

①《旧唐书·河间王孝恭传》。 ②《旧唐书·窦抗传》。 ③《旧唐书·李晟传》。 ④《旧唐书·浑瑊传》。 ⑤引自《唐会要》卷三十四。另《旧唐书·职官志》说：“三品已上，得备女乐，五品女乐，不得过三人。”又《唐六典》也曰：“三品已上，得备女乐，五品已上，女乐不得过三人。”当都是依据中宗神龙二年敕，不过此二说语义不甚明瞭，或在“得备女乐”后脱“一部”二字，录此以供参考。⑥ 引自《唐会要》卷三十四，但此诏在《通典》卷三五则曰天宝七载九月敕，文字略有出入，内容基本相同。

令的规定，就是五品以下的官吏，甚至没有官品的文士、商人、地主，只要具备负担妓乐的经济条件，也都热衷于广蓄妓妾。试看如下数字：

周皓，“有家妓数十人”。（白居易《题周皓大夫新亭子二十二韵》自注）

宁王曼，“宠妓数十人”。（孟棨《本事诗》）

李庾之，“侍婢数十”。（《太平广记》卷二七五）

符载，“以女妓二十人娱侍”。（孙光宪《北梦琐言》）

薛肇，“女乐四十余辈”。（《太平广记》卷十七）

李逢吉，有“姬四十余人”。（《全唐诗话》）

周宝，“女妓百数”。（《太平广记》卷五二）

郑注，“姬妾百余”。（《钗小志》）

李愿，“女妓百余人”。（《太平广记》卷二七三）

郭子仪，有“十院歌妓”。（裴铏《昆仑奴》）

邹凤炽，侍婢“尤艳丽者至数百人”。（《玉芝堂谈荟》卷三）

杨国忠子弟，……每游春之际，以大车结彩帛为楼，载女乐数十人，自私第声乐前行，出游园苑中。（《开元天宝遗事》）

他们大多是有官阶的，最高的为一品（例如郭子仪），但其中邹凤炽却是一位没有官品的富商。无论是官阶高低，还是没有官

品，他们蓄妓的数量都超过皇帝诏令最高限额的数倍、数十倍乃至上百倍。

另外，唐代仍有大量的奴婢存在，许多贵族、官僚甚至一般地主都占有奴婢数十数百，越王贞、太平公主、邓祐和王处存等所役使的奴婢则多达千人左右，最多的是李谨行和冯盎，李谨行有奴婢数千人，① 冯盎役使的奴婢竟达万余人。② 这就有利于他们从女奴中选择大批的姿色出众者充作女妓，进行歌舞培训，供其娱乐，而又不受皇帝所规定的蓄妓人数的限制，如承乾就“常命户奴数百人专习伎乐”，③ 元载家“婢仆曳罗绮者一百余人”。④ 这都是官僚贵族从奴婢中挑选优秀者充作乐妓、侍姬的确证。众所周知的白居易也是如此。白居易官刑部侍郎时，属正四品，按规定他只能蓄女妓三人，但实际上他的家妓除了有善歌的樊素，善舞的小蛮与春草之外，⑤ 还有一些是由奴婢充当的，如他在《池上篇并序》中说：“罢刑部侍郎时，……泊臧获之习筦磬弦歌者指百以归。”所谓臧获，即是奴婢。他还有一首《小庭亦有月》诗说，“菱角执箜篌，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诗末自注曰：“菱、谷、紫、红，皆小臧获名也。”实即以奴婢菱、谷、紫、红四人为家妓。既然家妓可以从各自的奴婢中任意选取而无人非议，那么皇帝关于依据官品限定蓄妓人数的诏令，实际上不过是一纸

①《旧唐书》卷一九九《靺鞨传》。 ②《旧唐书·冯盎传》。 ③《旧唐书·承乾传》。 ④《旧唐书·元载传》。 ⑤《全唐诗》载白居易《杨柳枝词》附引《云溪友议》：“居易有妓樊素善歌，小蛮善舞。”又刘禹锡《忆春草》诗题下注：“春草，乐天舞妓名。”

具文罢了。白居易本来是写过一些反映妇女疾苦的诗，对妇女深表同情的诗人，他蓄妓的人数却如此之多，玩妓的兴趣也如此之浓，至于其他贵族、官僚、文人士大夫乃至商人地主蓄妓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五代数十年的战争动乱，正是军阀、贵族凭借武力掠夺奴婢和良家妻女的大好时机，因而五代蓄妓之风仍然盛行不衰，例如郭廷诲拥有“艺色绝妓七十，乐工七十”。① 时锐有女妓十余辈。② 宋彦筠曾在成都一次就夺取“妓女数十辈，尽为其所有”。③ 前蜀王宗翰“好蓄妓妾，后庭珠翠常百余人”，④ 南唐韩熙载后房妓妾也多达数十人。⑤

宋代的私奴婢虽然比唐代相应减少，但宋代私人蓄妓的数量与规模仍大致与唐代相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宋仁宗时有一名专掌梳头的宫女，曾对仁宗说：“两府两制，家中各有歌舞，官职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⑥ 所谓两府两制是指中书省、枢密院的官员以及接近皇帝与闻机务的翰林学士、知制诰等，他们家中的歌舞妓人，当时究竟增置到多少已不得而知，因为那位宫女还没有来得及具体阐明就立即被遣送出宫了。我们不妨另列一组数字和事例借以管窥全豹。宋代官僚贵族蓄养家妓数人数十人的在史籍中屡见不鲜，例如：

杨褒，有“家姬数人”。（《渑水燕谈录》卷八）

①《旧五代史·郭崇韬传》。②《旧五代史·范延光传》。③《旧五代史·宋彦筠传》。④路振《九国志》卷六。⑤《新五代史·李嶷传》。⑥《曲洧旧闻》卷一。

苏轼，“有歌舞妓数人”。（《轩渠录》）

欧阳修，有歌妓“八九姝”。（《韵语阳秋》）

杨震，“有十姬”。（《本事词》卷下）

韩绛，“家妓十余人”。（《侯鲭录》）

王黼，“家妓十数人”。（《玉照新志》）

张渊，“买佳妾二十人”。（《夷坚三志·辛》卷一）

韩琦，“家有女乐二十余辈”。（《宋朝事实类苑》卷八）

李氏豪家，“家妾曳罗绮者数十人”。（《墨客挥犀》卷八）

李允则，有家妓百数十人。（《龙川别志》卷下）

宋代蓄妓最多且排场最奢的当推张镃：

张镃宴客牡丹会。既集坐，一虚堂寂无所有。俄问左右云：“香发未？”答云：“已发。”命卷帘，则异香自内出，郁然满座，群妓以酒肴丝竹，次第而至，别有名伎数十，首戴牡丹，衣领皆绣如其色，歌昔人所作牡丹词，进酌而退。前后花与伎凡十易，杯器皆如其色。酒竟，歌者舞者数百人，列行送客，烛光香雾，歌吹杂作，恍然若仙游。（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三）

张镃官至宰相，蓄养歌舞妓达数百人，仁宗时那位掌梳头的宫女

所说的两府两制官员蓄妓的规模，大概也难以伦比吧。

由于宋代对于官吏宿娼开始加以约束，规定凡“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① 否则，一经发现，便会受到处罚。而中央派往各州县的地方官僚，一般是不带妻子赴任的，于是，许多既慕风流又想晋升的地方官僚便只好自己蓄妓纳妾，以求两全，加之宋代对于私人蓄妓并无官品的限制，所以，宋代中下层官僚，尤其是文人士大夫蓄妓的风习，实际上比唐代更为普遍。如据李元纲《厚德录》载：

> 自王均、李顺之乱后，凡官于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今（指南宋孝宗时）成都犹有此禁。张忠定公咏，知益州，单骑赴任。是时一府官属，惮张之严峻，莫敢蓄婢使者，张不欲绝人情，遂自买一婢，以侍巾帨。自此官属稍稍置姬属矣。张在蜀四年，被召还阙，呼婢父母，出货以嫁，仍处女也。

张咏虽然对侍婢未曾染指，但他买婢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鼓励其他官员蓄妓买婢，以满足其性欲需要。张咏买婢而禁欲，或是故作道学气，或是性机能丧失，只能算宋代官僚中的特殊例子，而其他中下层官僚，尤其是文人士大夫所蓄的妓妾虽然人数不多，但要求她们既献伎又呈身，则是一种普遍现象。

家妓发展至元明清时代已为强弩之末。由于程朱理学从元代开始被奉为官方的唯一哲学，至明清更成为理学专制的时代，

① 《古今图书集成·娼妓部》引《委巷丛谈》。

封建礼教对于一般官僚的约束便逐渐加强，因而元明清时代一般官僚蓄妓者已不如唐宋普遍。但元代大贵族、大官僚家中仍拥有不少妓妾，他们不仅占有大量奴婢可以任意玩弄，而且常常强占良人妻女。最典型的例子当推阿合马和燕帖木儿。阿合马官至平章政事，因深受世祖宠爱而势倾朝野，淫侈无度。"如果有他喜欢的漂亮的女人，决逃不出他的魔掌。如果她是未出嫁的闺女，他就强娶为妾，至少也要将她奸污。他一听说谁有漂亮的女儿，他手下的一帮爪牙，就到她父亲那里说：'你有个漂亮的女儿，嫁给我们的阿合马吧！我们叫他让你当三年的封疆大臣，或其他的高官显爵，你以为怎么样？'这个人也不敢不答应，于是只好忍痛舍弃自己的女儿。……这样一来，所有美丽的女子，或因自己父母的野心，或是慑于他的淫威，一个一个地都成了他的妻妾和情妇。"① 燕帖木儿秉国专权时，挟震主之威，肆意无忌。他"取泰定帝后为夫人，前后尚宗室之女四十人，或有交礼三日遽遣归者，而后房充斥不能尽识。一日宴赵世延家，男女列坐，名鸳鸯会。见座隅一妇色甚丽，问曰："此为谁？'意欲与俱归。左右曰：'此太师家人也。'"② 更为荒唐的是，他常常"择美姬温软少骨者，枕藉而寝，谓之香肌席。脂红粉白，罗列左右，随其所取，以为花嬉玉乐"。③ 象阿合马、燕帖木儿等这样的大贵族、大官僚广蓄姬妾，大多纯粹是一种肉欲的发泄，与唐宋相比，已缺少那种诗酒留连、歌舞传情的浪漫情调。

①《马可·波罗游记》第二十三章。　②《元史·燕帖木儿传》。③《玉芝堂谈荟》卷三。

元代家妓的发展还有一个特点似乎为前代所不及，那就是和尚胆敢公开蓄妓纳妾。如据《元史·星吉传》载："有胡僧曰小住持者，服三品命，恃宠横甚，数以事凌辱官府，星吉命掩捕之，得妻女乐十有八人。"又元世祖曾命杨琏真加为江南释教总统，他竟然"受人献美女宝物无算"。① 更有甚者，当时的西番和尚竟敢公开入民宅奸污妇女，"泰定二年，西台御史李昌言：'曾经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途，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女妇。'"② 这当然是元代统治者崇信佛教所种下的怪胎。

随着封建政治专制与文化专制的进一步强化，明代在性文明领域逐渐推行锢欲主义，并且革除了地方官妓，但出于政治的需要，皇帝在把宗室各王的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剥夺殆尽的同时，却允许他们蓄妓玩妓，纵欲享乐。据《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三载：

> 建文四年敕礼部曰："昔太祖封建诸王，其仪制服用俱有定制。乐工二十七户，原就各王境内拨赐，便于供应。今诸王未有乐户者，如例赐之，有者仍旧不足者，补之。

可见，明代赏赐诸王乐户的制度从朱元璋立国后就开始实行了，至此时已有二十年左右，其间或有新封为王而未赐乐人者，或

①②《元史·释老传》。

有袭父为王而乐户不足者，故下诏依例拨赐或补足。例如，宣宗就曾于宣德六年（1431）十月，依例“赐宁王权乐人二十七户”。[①] 这二十七户乐人，无论男女都须听任各王的役使。如果每户以四人计算，则已超过百数，各王足可以此组成一个庞大的私人乐团。如宁王朱权和周宪王朱有燉就常年以这些乐人表演杂剧为乐，并且亲自担任编剧和导演。二王可算是诸王中蓄妓玩妓之最高雅者。但有的却纯为色欲而狎玩女妓，如端王朱观焜，“游戏无度，挟娼乐，裸男女杂坐”。[②] 有的甚至还不满足于这二十七户乐人而另择女子入室，如伊厉王㮮之子朱典楑曾矫诏“闭河南府城，大选民间子女七百余，留其姝丽者九十人”，[③] 正因为如此，嘉靖四十四年“礼官言诸王府有广置女乐淫纵宴乐，或因而私娶致冒滥者，乃诏今后各行裁革。如遇迎接诏敕拜进表笺，朝贺宴享当用乐者，即于本府吹鼓手教演充用”。[④] 从中也可见当时诸王妓乐之盛，荒淫之极，朝廷才不得不下令裁革诸王乐户。但只过了十多年，张居正等人又于万历十年奏请恢复诸王乐户，神宗敕曰：“即以先年各府所退出者给还二十七户备用，但不得狎近女乐，致有冒滥之弊。”[⑤]

既然宗室诸王可以享有声色之乐，那么其他大贵族、大官僚自然也不甘寂寞，如严世蕃在京师治第蓄妓，常“日拥宾客纵倡乐”。[⑥] 鄢懋卿在家中纵欲享乐觉得不够刺激，还故意坐上五彩轿子，令十二名女子抬他出行。[⑦] 张居正晚年淫纵，“侍

①《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三。 ②《明史·鲁荒王檀传》。 ③《明史·伊厉王㮮传》。 ④《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三。 ⑤《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三。 ⑥《明史·严世蕃传》。 ⑦《明史·鄢懋卿传》。

妾数十人，蓟、蜀二帅各献一姬，尤殊绝。相国宠之专房，有赵道人以房中术谒，相国试之大喜，以为神仙也”。① 王延喆多蓄妓妾达数十人。② 著名妓女冬儿和陈圆圆都曾一度是田弘遇家的歌妓。明末清初徐青君更是广蓄妓妾，侍宴作乐，把酒酣歌。③ 至于明代一般文人士大夫蓄妓玩妓者也不乏其人，如康海罢官回陕西后，“以声妓自娱，间作乐府，使青衣披之管弦”，甚至“常与妓女同骑一蹇驴，令从人赍琵琶自随，游行道中，傲然不屑”。④ 李开先落职家居后，也是“蓄声妓，征歌选曲，为新声小令，挡弹放歌”，家中蓄养“戏子凡二三十人，女妓二人，女僮歌者数人”。⑤ 但正在任职并想有所作为的一般官员蓄妓玩妓的已不多见。

清承明制，吏议更严，但官僚贵族地主富绅蓄养家妓的现象仍然存在。康熙十八年，御史罗人琮在一份奏章中说：“今之督、抚、司、道等官，盖造房屋，置买田园，私蓄优人壮丁不下数百，所在皆有，不可胜责。”⑥ 这个数目颇大，其中所蓄优人中当有一定数量的女妓。至康熙二十五年，朝廷议准外任官员携带家人的数目，试图加以控制，但其数目也不小，仍有蓄养家妓的可能：“外任官员除携带兄弟妻子外，汉督、抚准带家人五十人，藩、臬准带四十人，道、府准带三十人，同、

①林烃《林氏杂记》。见《明史资料丛刊》第五辑。 ②《玉芝堂谈荟》卷三。 ③《板桥杂记》。 ④参见徐纨《本事诗》和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八。 ⑤参见《列朝诗集小传》丁集和《四友斋丛说》卷十八。 ⑥引自光绪间《桃源县志》卷十三，罗人琮《敬陈末议疏》。

通、州、县准带二十人，州、同以下杂职准带十人，妇人亦不得过此，厨役等不在此数，旗员外官蓄养家人，准照此例倍之。"① 至于那些贵族、地主、富绅和文人蓄养家妓则没有限制，有的甚至自蓄戏班，例如清初李渔风流不羁，自诩为好色的"登徒子"，他到处购买妓妾，蓄养在家中，教习歌舞，组成一个家庭戏班，其中尤以乔复生、王再来最为李渔所眷爱。李渔的家境并不富裕，他主要是依靠戏剧表演活动而维持生活，因而终年带着众女妓奔走于达官贵人之家。有些富有之家，则主要以家妓招待宾客和供自己享用，如江南泰兴大地主季氏，"尤称豪侈，……康熙九年，……家有女乐三部，悉称音姿妙选，阁宴宾筵，更番佐酒，珠冠象笏，绣袍锦靴，一妓之饰，千金具焉"。② 《红楼梦》中描写大观园建成后，贾府从苏州买来十二个小戏子，也是家妓性质的女子。乾隆三十四年十月有上谕曰："朕恭阅皇考谕旨，有饬禁外官蓄养优伶之事，圣训周详，恐其耗费为多，废弛公务，甚且贪缘生事，敕督抚不时访查纠参，虽一二人，亦不可徇隐。圣谕久经编刊颁行……何以近日尚有揆义托黄肇隆代买歌童之事。"③ 实际上，官僚蓄养优伶戏班之事，不仅乾隆间常有，嘉道间也不乏其例，例如嘉庆间任湖南布政司的郑源涛，就仍然"养戏班两班，争奇斗巧，昼夜不息"。④

---

① 福格《听雨丛谈》卷五《满汉官员准用家人数》。 ② 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初编卷三，亦见《觚賸》续编卷三。 ③《清高宗实录》卷八四五，乾隆三十四年十月。 ④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二。

5·2 家妓的角色内涵

尽管家妓的来源各有不同，有的是皇帝赏赐的，有的是他人赠送的，有的是购买或掠夺的，有的是从奴婢中挑选的……但她们一旦作为家妓的角色而进入某个家庭之后，就必然会与以家长为中心的家庭关系及其相关的社会关系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因而在同时也就赋予了家妓这一角色以特定的内涵。

一、家妓是私人蓄养的“女乐”

所谓家妓，是相对于官妓而言，专指私人蓄养于家中并供其役使的女乐。尽管有些家妓是来源于官妓，例如隋唐时皇帝赐给功臣的女乐，明代拨赐给诸王的乐户女子以及历代从官妓落籍买为家妓的女子，在充当家妓之前虽曾隶属乐籍，但她们一旦作为家妓而进入某个家庭之后，就成为了该家主的私有财产，她们的户籍便也附编于家长名下，或以妾，或以婢而登记入册。就法律地位而言，她们中以婢登记的与官妓差不多，以妾登记的则略高于官妓而相当于良民。但就家庭地位而言，她们都不是主子，而仍然只是被主子所奴役、所玩弄的对象。

家妓的衣食之需全由家长供养，因而家妓也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家长的支配。家妓与家长之间的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往往是凭契约建立起来的，其具体形式有终身买断与短期赁买两种。终身买断者的身价已由侍主一次支付，因而侍主可以任意支配

这类家妓的命运，他既可以长期自己享用她们，也可以将她们转送或卖给他人。在历代家妓中，这类终身买断式的女子居多。短期赁买者则须履行契约，到期归还，例如宋代杨端臣尝买一妓，契约三年，尽管杨很喜爱这位女子，但到期后还是只好忍痛割爱，将她归还其父母。谁知她家的邻居有一位富人出重金贿赂其父母又将她买为家妓，杨端臣虽追恨不已，也无可奈何。①

家妓是适应贵族、官僚、文人士大夫和富豪的声色享乐需要而产生发展的。她们的基本职责与宫妓、地方官妓差不多，主要从事艺术训练和表演，同时也向侍主献身。因而家妓的基本条件也必须是既擅长歌舞等伎艺，又姿色出众，风度迷人。不过，家妓并不同于滥交的市井娼妓，她们的性活动基本上是封闭式的。先看两条材料：

> （杨）绘性少真无检操，居荆南，日事游宴，…… 一日出家妓，延客夜饮，有选人胡师文预会。师文本鄂州豪民子，及第为荆南府学教授，尤少士检。半醉，狎侮绘之家妓，无所不至。绘妻自屏后视之，大以为耻，叱妓入，挞于屏后。师文离席，排绘，使呼妓出，绘媿于其妻，遽欲撤席，师文狂怒，奋拳殴绘，赖众客救之，几至委顿。（魏泰《东川笔录》卷七）

> 绍兴间一郎官，不欲言其姓字，疏荡不检，一朝士与之善。朝士家有数妓，客至必出以侑酒。郎官者，与一妓私

①《词话丛编》第一册《古今词话》。

相悦慕而未得间。一日，郎官折简寄妓，与为私约，朝士适见之，妓不敢隐，具言其故。朝士曰："然则非尔之过，当为尔辈为一笑资，姑答简与之，期以来夕，密令于西厢。且云主人者，适有故之城外，越日乃归，此机不可失。"郎官得简，喜不自胜，如期赴之。妓已先待于会所，引入屏后曲房，妓先登榻垂帷，命郎官解衣而登。暨前蹇帷，则妓已自榻后潜去。朝士者方偃卧榻上，瞠目视之。郎官裸露，惶遽欲走，则门已闭。朝士谩为好辞谑之曰："与公厚善，何为如此，妓女鄙陋，不足奉君子之欢，已遣归矣，惟公勿讶。"徐起，复曰："某家使令稍众，不略相惩，彼将观望，无所畏惮。"乃呼群仆披之于柱，以巨竹挺挞之二十。流血及踝，呼服谢罪。复谓曰："与公素善，故不欲闻官，薄示庭训，亦不泄于他人也。"乃遣出，亦不与衣，其人狼狈遁还。（郭彖《睽车志》卷五）

从以上二例可知，家妓作为家长的私有财产和专用玩具，一般是不准他人染指的，家妓如果被他人狎玩、占有，则是一桩有损主人尊严的耻辱。因而当胡师文猥亵杨绘的家妓时，即使杨绘本人隐忍不发，杨绘妻也大以为耻，立即叱妓入挞于屏后。绍兴间某朝士对于某郎官招引他的家妓私下幽会恨之入骨，于是将计就计引郎官入彀，对他进行了羞辱性的惩罚。但也有人气量恢宏一些，对于他人因酒醉狎玩自己的家妓而并不如此醋兴大发，例如：

王韶罢枢密副使，以礼部侍郎知鄂州。一日宴客，家妓奏乐。入夜，席客张绩沉醉，挽家妓不前，遽将拥之，家妓泣诉于韶，坐客皆失色。韶徐曰："比出尔曹以娱宾，而乃令宾客失欢。"命取大杯罚家妓，既而容色不动，谈笑如故，人亦伏其量也。（魏泰《东轩笔录》卷七）

当然，历史上也有极少数以家妓为工具而取悦于权贵的，如清代李渔蓄妓甚多，除了供自己声色之娱外，还常以"女乐游公卿间"，① 甚至"常挟小妓三四人，子弟过游，使隔帘度曲，使之奉觞引酒，并纵谈房中，诱赚重价"。② 但这种现象在历代家妓中并不普遍。

二、家妓的家庭角色

在古代家庭范围内，男人可以任意占有的女人除了妻子之外，尚有妾、家妓和婢女。妾与婢之间是有明确区分的，妾是良民，并且是通过婚姻关系而进入某个家庭的，婢则是佣仆，地位近于奴隶，原则上婢女并无与主子性交的权利和义务，但在实际生活中，家主奸占婢女则是司空见惯的。例如清代乾隆年间"浙中有缙绅寓吴门，御下最残忍。性好淫，家中婢妪无不污狎者"。③ 妾对家主来说，也可以说是奴隶，但对于婢女来说，则为主子。而婢女则不仅要侍奉男主子，也要侍奉女主子。我们在第二章中曾论及早期家妓的地位当在妾与婢之间，后世

①阮葵生《茶余客话》。②《娜如山房说尤》卷下。③钱咏《履园丛话》卷十七。

也大致如此。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要在家妓与妾之间，家妓与婢女之间做出明确区分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有的家妓就是从奴婢中挑选出来加以训练后充当的，所以她们有时仍被称为"婢"或"爱婢"。也有一些家妓由于颇受家主爱慕而纳为妾，或家主为取悦家妓而一律以"妾"或"爱妾"呼之，所以称妾的女子中也有一部分是家妓。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抓住家妓就是家庭女乐的特征来与一般的妾与婢相区别。凡是家庭范围内擅长歌舞伎艺，向家主提供声色服务的妾与婢，我们也一律视为家妓。

在一个家庭中，妻子是主妇，负责治内。因而，作为家妓在同妻妾婢女相处时，首先必须处理好同嫡妻的关系，然后才谈得上为家主服务。例如北宋晏殊为京兆尹时，新收了一名家妓甚为满意，每次张先来访，晏即令该妓出来侑觞，往往歌张先之词。后因王夫人不容，只好把她遣送出门。一日，张先作词相劝，晏殊才立即支钱若干，把遣出的家妓再次买回来。①又如杨绘延客夜饮，胡师文乘醉狎玩杨绘的家妓，杨绘妻便立即行使主妇职权，"叱妓入，扯于屏后"。② 至于家妓同妾与婢的关系，一般是较好相处的。妾的地位虽然略高于家妓，但只能以年轻美貌去向家长争宠，而家妓不仅色艺兼优，而且文化素养也往往高于一般的妾与婢，因而在家庭中往往家妓最能受到家主的赏识和宠爱。家妓往往也要做一些家内服务工作，但多是直接服侍家主的事情，比如说佐酒、陪游、侍寝等，这无疑有

①据《词话丛编》第一册第23页引《道山清话》。 ②《东川笔录》卷七，已见前引。

利于家妓加深同家主的感情。

当然，从根本上说，家妓在家庭关系中最为重要的是她与家长的关系。在家长的心目中，妻妾的职责是治内管家，生儿育女；婢女的职责是侍候主子的衣食住行；而作为家妓的职责，则主要是为之提供文化娱乐和精神享受，家妓可以和家长一起欣赏艺术，一起作诗填词，一起交流思想，一起感叹人生，正因为如此，家长才有可能同家妓从肉体上的结合升华为精神层次上的溶合。如果说在中国古代的家庭中也曾产生过爱情的火花的话，那么，她很少是出自于丈夫与妻妾之间的团圆，而更多的是出自于家长与家妓之间的撞击。尤其是有些士大夫宦游在外四海为家时，往往不带妻眷，只有家妓伴随而行，这些女子实际上履行了妻妾、家妓、婢女的多重职责。在风波险恶的宦海生涯中，经过了这种风雨同舟的考验之后，双方的感情会更加真诚和深沉。如“东坡南迁，侍儿王朝云者，请从行。东坡佳之，作诗。有序曰：“……予家有数妾，四五年相继辞去，独朝云随予南迁。……（绍圣）三年七月十五日，朝云卒，葬于栖禅寺松林中大圣塔。”① 朝云对东坡可谓情深意长，忠心耿耿，因而在朝云死后，东坡仍念念不忘，写诗哀悼。

三、家妓的社会角色

《礼记·内则》说：“礼始于谨夫妇，为宫室，辨外内。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①《冷斋夜话》卷一。

甚至还规定“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可见古代女子不仅不能同男子一起走向社会，而且必须深藏内室，连言梱外之事的权力都没有，而家妓却不受此限制。比较起来，家妓不如官妓所接触的社会那样广阔，但在家庭范围内的女子中，唯有家妓能够较多地走向社会，能够轻松地进入男人的世界，能够自如地和家主的朋友、同事乃至上司们一起品茶饮酒，嘻笑欢乐，歌舞传情，甚至还可赋诗作词，高谈阔论。

家妓走向社会的方式不外两种，一是在家中招待宾客，凡是家主的朋友、同事、上司来家中做客，必命家妓侍筵佐酒，歌舞祇应。如据《轩渠录》载：“东坡有歌舞妓数人，每留宾客饮酒，必云有数个擦粉虞侯欲来祇直。”家妓招待宾客时，如果客人是诗人词人，家妓往往歌客人所作之诗词以使主宾皆乐。有的客人兴之所至，还会即席为家妓赋诗作词，因而在唐诗宋词中，有许多篇章描写了家妓的精神风采和精湛的伎艺表演，许多家妓的名字也凭借这些诗词而得以流传后世。二是奉命陪伴家主出外游访。除了跟随家主在外宦游之外，有时家妓还会陪同家主一起去游玩或赴会。如唐代李白飘游时，马后面常常坐着一位娇小的“吴姬”，元稹也写诗云：“各携红粉伎，俱伴紫微郎。”韦尚书有家妓名泰娘，从吴郡买得，命乐工诲之琵琶与歌舞。过了二年，韦尚书把泰娘携往京师，又习新声，常陪伴韦游访达官贵人之家，因而泰娘名字往往见之于贵游之间。[1] 白居易还曾携家妓与牛家妓乐合宴联欢，并写诗曰：“玉管清弦声旖旎，翠钗红袖坐参差。两家合奏洞房夜，八月连阴

①刘禹锡《泰娘歌》。

秋雨时。歌脸有情凝睇久，舞腰无力转裙迟。人间欢乐无过此，上界西方即不知。”（《与牛家妓乐雨后合宴》）宋代文潞公守洛阳时，也曾携妓访春。① 清代李渔更是蓄养家妓戏班，常年奔走于权贵豪富之家。

由于古代上流社会的男人聚会必设宴饮酒，饮酒必命妓乐祇应。因而贵族官僚、文人士大夫和豪富之家，只要经济条件允许，必蓄家妓以撑门面。家妓的人数多，素质好，年轻美丽，技艺出众，当主人的才显得体面。反之，家妓少而素质差，年长色衰，伎艺不高，就会显得寒酸。如唐人郑惨设宴款待赵伸，因舞妓年老而遭到俳优孙多子的讽刺："相公经文复经武，常侍好今也好古。昔日曾闻阿武歌，今日亲见阿婆舞。"（《谐谑录》）实际上，人们蓄养家妓数量的多少，及其素质、伎艺的高低，已不单纯是为了声色之乐，而往往还是一种地位尊严的体现，一种经济实力的显示，一种高雅人格的象征。因此，色艺兼优的家妓便成为当时社交场中不可缺少的角色。这从宋代寇莱公与李允则的交往中可以窥测当时人们蓄妓养妓的风习与心理：

> （李）允则自雄入奏，过魏。魏守，寇莱公也。谓允则曰："闻君在雄，筵会特盛，能为老夫作小会否？"允则曰："方入奏，不敢留，还日当奉教。"及还，莱公宴之，幄帝器皿，饮食妓乐，百物华侈，意将压之。既罢，谓允则曰："君许我作会，来日可乎？"允则唯唯，公顾谓左

①吴坰《五总志》。

右妓乐如今日，每设百戏，幄帝床榻以假之。允则曰："妓乐百戏，皆如今日，其他随行略可具也。"明日，视其幄帝皆蜀锦绣，床榻吴越漆作，百物称是，公已愕然矣。及百戏入，允则曰："恐外尚有杂伎。"使召之，则京师精伎至者百数十人，公视之大惊，使人伺之，则床榻脱卸毡裹，驰载杂伎变服为商贾以入。明日荐于朝，极称其才。（苏辙《龙川别志》卷下）

李允则官雄州太守，就拥有家妓百数十人，连寇莱公见了都大吃一惊，自愧不如，并因而增加了对李允则的好感，立即把他推荐给朝廷。这种举动固然与寇莱公尚气的性格有关，但据此可知，当时人们是以蓄养众多的色艺兼优的家妓为荣的。在社交场合，家妓除了给主人增欢乐、添光彩以外，有的还直接参与了政治活动。例如：

绍兴中，王铁帅番禺，有狼籍声。朝廷除司谏韩璜为广东提刑，令往廉按。宪治在韶阳，韩才建台，即行部按番禺。王忧甚，寝食几废。有妾故钱塘娼也，问主公何忧？王告之故。妾曰："不足忧也。璜即韩九，字叔夏，旧游妾家，最好欢。须其来，强邀之饮，妾当有以败其守。"已而韩至，王郊迎，不见；入城乃见，岸上不交一谈。次日报谒，王宿治具于别馆。茶罢，邀游郡圃，不许；固请乃可。至别馆，水陆毕陈，妓乐大作，韩踌躇不安。王屏去妓乐，阴命诸娼淡妆，诈作姬侍，迎入后堂剧饮。酒半，

妾于帘内歌韩昔日所赠之词。韩闻之心动，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即欲见之。妾隔帘故邀其满引，至再，至三，终不肯出。韩心颠惫。妾乃曰："司谏最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为妾舞一曲，即当出也。"韩醉甚，不知所以。即索舞衫，涂抹粉墨，踉跄而起，忽跌于地。王亟命索舆，诸娼扶掖而登。归船，昏然酣寝。五更酒醒，觉衣衫拘绊，索烛览镜，羞愧无以自容。即解舟还台，不敢复有所问。此声流播，旋遭弹劾。王迄善罢。（冯梦龙《情史·情累类》）

所谓王铁之妾，实即从钱唐官妓买作家妓的。当韩璜奉命来番禺廉按家主王铁的劣迹时，她主动为家主分忧，利用她和韩璜过去的旧情，使出种种风月手段，终于使韩璜丑态百出，狼狈而逃。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尽管家妓在家内家外的社交活动中是不可缺少的角色，但她们都没有人身自由，没有独立人格，她们不是作为自我个体而走向社会的，而是作为主人的私有财产和玩物而存在于社会，作为主人的高级装饰品和奢侈娱乐品而展示于社交场合的。她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都必须看主人的脸色行事。她们的社会角色的实现，并不等于她们自我价值的实现，而主要取决于她们是否为主人赢得了体面，增添了光彩。

5·3 家妓的命运遭际

与官妓相比，家妓的命运似乎要略好一些，至少家妓的生活要正常一些。历代蓄养家妓的家主，一般都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比较坚实的经济实力，能够供给家妓衣食之需（象李渔那样经济并不宽裕而依靠家妓卖艺维持生活者毕竟是少数）；二是有较好的文化艺术素养，能够欣赏乃至指导家妓的歌舞表演（当然也有文盲艺盲受时风影响而蓄家妓故作高雅的）；这就使家妓一方面能够享受比较优越的衣食待遇，有的甚至非常华侈，一方面能够接受到一定程度的文化艺术教养，从而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与伎艺水平；加之她们往往年轻貌美，风度翩翩，颇受家主宠爱，能够经常侍寝献身。因而，她们除了社会地位不如妻子之外，实际上从生理上、物质上，大多都过着作为上流社会女子才能享受得到的比较正常的生活。官妓的衣食待遇虽然一般都比较优越，但她们所过的生活大多是一种病态型的生活。例如官妓常年幽闭深宫，性欲得不到满足；地方官妓常年不得不去承应那些没完没了的官身；市妓被迫常年操皮肉生涯，夜夜留客夜夜新，这种生活无疑是不正常的，因而历代都有不少官妓在千方百计脱籍从良之后，又心甘情愿去做某个男人的家妓（或称爱妾）。

当然，我们说家妓的命运比官妓要略好一些，是仅仅就生理需求的适度满足和生活的正常与安定方面而言。但如果就人

权角度而言，家妓的命运同官妓一样可悲，有的甚至更为凄苦。

首先，家妓同官妓一样，也不过是男人的娱乐工具和性奴隶罢了。稍有不同的是，官妓（宫妓和少数被人独占的地方官妓除外）是以一种开放的姿态作为公众的性奴隶而面向男性社会，实际带有公众玩物性质，因而她们很少受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而家妓则是以一种封闭的方式作为私人的性奴隶而关锁在家庭的笼子里，供家主玩弄和役使。例如：

岐王少惑女色，每至冬寒手冷，不近于火，惟于妙妓怀中揣其肌肤，谓之暖手。（《开元天宝遗事》）

申王每至冬月，有风雪苦寒之际，使宫妓（虽名宫妓，实带家妓性质）密围于坐侧，以御寒气，自呼为妓围。（同上书）

（孙）晟事李昇父子二十余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骄，每食不设几案，使众妓各执一器环立而侍，号肉台盘，时人多效之。（《旧五代史·孙晟传》）

从唐代岐王以妙妓肌肤暖手，申王以众妓密围御寒和五代孙晟以众妓为肉台盘的荒唐行为中可以看出，家妓完全没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可言，她们的确只是家主享乐的工具或玩物而已。受时风的影响，家妓虽然可以在家内家外的社交场合和家长一起进入男人的世界，但她们只能以言笑、才学和伎艺来取悦于家长的朋友宾客，从而为家长赢得体面，而在同时又必须遵从妇德，固守贞操。家妓如果有外遇，一旦被发现，必将受到严

厉惩罚。如唐代武公业的爱妾步飞烟与赵象私通，为女奴所告发，武公业不胜其愤，缚飞烟于大柱，鞭楚血流而死。① 但也有因怜才而赦其罪过并成全其私情的，如隋朝李百药与杨素的宠妾偷情，被杨素当场抓获，将男女俱执于庭，将斩之。因为李百药是同僚内史令李德林之子，当时年未二十，仪神隽秀，素意惜之，曰："闻汝善为文，可作诗自叙，称吾意，当免汝死。"于是解缚授以纸笔，百药挥毫立就，杨素览之欣然，不仅饶恕了他的罪过，还把宠妾也送给了他。②

其次，家妓作为家主的私有财产，其所有权和支配权都集中在家主的手中，家妓的命运与归宿如何，往往取决于家主一时的喜厌好恶。正因为如此，有些家妓的遭遇比官妓更为凄惨。例如，官妓从良嫁人，尚须经过官府批准落籍方可，官妓被人无故打杀，尚有官府追究治罪。而对于家妓来说，无须任何人批准，家主就可以任意处置她们：

——家主可以随时把家妓作为礼品赠送给他人。由于家妓经常在家内家外的社交场合承应表演，其中的色艺兼优者往往会被家长的朋友、同僚或上司看中，有的会公开指名索要。如杜牧为御史分务洛阳时，一次出席李司徒的家筵，李命丽妓百余人表演歌舞，杜牧早慕崔紫云名，见而爱之，凝睇良久曰："名不虚得，宜以见惠。"李俯而大笑，寻以紫云赠杜牧。③ 有的则以诗词表达爱慕之心。例如，刘禹锡为主客郎中、集贤学士时，一次应邀至李司空第中饮宴，酒酣，李命妙妓歌以送之。

①皇甫枚《飞烟传》。 ②刘悚《隋唐嘉话》。 ③参见《本事诗》、《侍儿小名录》。

刘于席上赋诗曰："婺鬟梳头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李因以妓赠之。① 宋代詹天游应邀赴杨震家饮宴，杨出诸妓佐觞，詹寓意粉儿，口占《浣溪沙》词一首，其中有"不曾真个也消魂"之句，杨遂以粉儿赠之，曰："请天游真个消魂。"② 也有的仅以眉目传情致意，家主察知，即以妓相赠，如唐代郭暧宴客，有婢镜儿，善弹筝，姿色绝代，李端在座，时窃寓目，属志甚深，暧觉之，曰："李生能以弹筝为题，赋诗娱客，吾当不惜此女。"李即席口占，暧大称善，撤席上金玉酒器，并以镜儿赠李。③ 当然，也有对方并无索妓之念，而是家长主动提出以家妓相赠的。如辛弃疾在上饶时，妻子生病，呼医对脉时，有吹笛婢整整者侍侧，乃许诺医者曰："老妻病安，以此人为赠。"不数日妻子病愈，乃践前约，将整整送给医者。④ 通过转赠方式而易主的家妓，其命运的可悲之处，并不在于新主给予家妓的生活待遇不如旧主，而在于这种把家妓作为礼品来赠送的行为本身肆意践踏了这些柔弱女子的人格。

——家主可以任意将家妓遣逐或转卖。家妓被遣逐和被转卖不外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家妓年长色衰，伎艺不精，或性情不好，已不称家主之意。如辛弃疾有姬名钱二，年老遣去，为赋《临江仙》词以赠之。⑤ 一是家主老病或势衰，已无精力或财力来赏玩众多的家妓。如白居易《不能忘情吟并序》曰："乐天既老又病风，乃录家事会经费，去长物，妓有樊素者，年二

①《本事诗》。 ②《乐府纪闻》。 ③《钗小志》。 ④《清波别志》。 ⑤《后斋漫录》。

十余，绰绰有歌舞态，善唱杨枝，人多以曲名名之，由是名闻洛下，籍在经费中，将放之。”此次由于樊素长跪致辞，恳请留下而未遣，但时隔不久，还是把樊素转卖了。司空曙《病中嫁女妓》诗曰：“万事伤心在目前，一身垂泪对花筵。黄金用尽教歌舞，留与他人乐少年。”从他感叹黄金用尽的语气中可知，所谓嫁女妓，实际上是转卖女妓。当然也有家主不收金钱，而以妓易物的，如据《南唐近事》载：

> 严续相公歌姬，唐镐给事通犀带，皆一代之尤物也。唐有慕姬之色，严有欲带之心。因雨夜相第有呼卢之会，唐适预焉。严命出妓解带，较胜于一掷，举座屏气，观其得失，六骰数巡，唐彩大胜，唐乃酌酒，命美人歌一曲以别相君。宴罢拉而偕去，相君怅然遣之。

这种以妓易带的交易是通过赌博的方式来促成的。至于以妓换马这种古老的交易，更乐为人们所重复仿效。如据李玖《异闻实录》载：“酒徒鲍生多声妓，外弟韦生好乘骏马。经行四方，各求甚好。一日相遇于途，宿于山寺，各出所有互易之，乃以女妓善四弦者换紫叱拨。”张祜《爱妾换马》诗二首也反映了这种不人道的现象和当时士人的心理：

> 一面妖桃千里蹄，娇姿骏骨价应齐。乍牵玉勒辞金栈，催整花钿出绣闺。去日岂无沾袂泣，归时还有顿衔嘶。婵娟踯躅春风里，挥手摇鞭杨柳堤。

绮阁香消华屐空，忍将行雨换追风。休怜柳叶双眉翠，却爱桃花两耳红。侍宴永辞春色里，趁朝休立漏声中。恩劳未尽情先尽，暗泣嘶风两意同。

在诗人和交易者的眼里，家妓的价值与马相齐，人的地位与牲畜相等。人们对于家妓的这种悲惨遭遇不仅不表示愤慨与同情，反而把这种惨无人道的交易作为风流趣事来欣赏，来咏叹，甚至来效法。例如：

坡公（苏轼）又有婢，名春娘。公谪黄州，临行，有蒋运使者饯公。公命春娘劝酒，蒋问春娘去否？公曰："欲还母家。"蒋曰："我以白马易春娘可乎？"公诺之。蒋为诗曰："不惜霜毛雨雪蹄，等闲分付赎蛾眉。虽无金勒嘶明月，却有佳人捧玉卮。"公答诗曰："春娘此去太匆匆，不敢啼叹懊恨中。只为山行多险阻，故将红粉换追风。"春娘敛衽而前曰："妾闻景公轩厩吏，而晏子谏之。夫子厩焚而不问马，皆贵人贱畜也。学士以人换马，则贵畜贱人矣！"遂口占一绝辞谢，曰："为人莫作妇人身，百般苦乐由他人。今时始知人贱畜，此生苟活怨谁嗔。"下阶触槐而死，公甚惜之。（冯梦龙《情史·情憾类》）

春娘是古代无数家妓中真正觉醒了的伟大女性之一，她对于苏轼以人换马、贵畜贱人的行为怒不可遏，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她决不苟活由人，毅然下阶触槐而死。她用她的语言和

生命对苏轼和所有贵畜贱人者作了最强烈的控诉与批判。

——家主即使肆意虐待乃至打杀家妓也无人过问。既然在家主的心目中，家妓不是作为一个人而只是作为一桩私有财产而存在，与一件玩具、一只动物没有区别，那么，家妓经常受到虐待拷打则是司空惯见的事，有的甚至被摧残致死，也无人追究责任。例如：

> 江东兵马钤辖王瑜，……婢妾少不承意，辄裸其衣，缚于树，削蝶梅枝条鞭之，从背至踵，动以数百；或施薄板，置两颊而加讯杖；或专捶足指，皆满血堕落；每坐之鸡笼中压以重石。暑则炽炭其旁，寒则汲水淋灌，无有不死。前后甚众，悉埋之园中。（《夷坚志支乙》卷九）

家妓稍不承意，就遭如此暴虐的摧残，真令人惨不忍闻。如果家妓对家主有不满情绪，并为家主所察知，则更难逃厄运。如据《今是堂手稿》载：

> 杜大中自行伍为相，与物无情，西人呼杜大虫，虽妻有过，亦杖之。有爱妾才色俱美，大中牒表，皆其所为。一日大中方寝，妾见几间纸笔颇佳，因书《临江仙》一阕，有"彩凤随鸦"之语，大中觉而见之云："鸦且打凤。"于是掌其面，至项折而死。

既然杜大中爱妾仅在词中流露不满情绪，就被打杀而死，那么

有些家妓胆敢背主偷情，一旦发现，则必遭杖杀无疑。如前文已提及的步飞烟因与赵象私通，而被家主武公业鞭笞而死。又如“蜀女伶孟思贤，甚巧黠，尝为君侯王制宠贮焉。思贤有外遇，私奔后，失所，复投制，制命以短兵关思贤二胫，踣极捶之，再宿而死。”①这些家主都可谓残忍以极。然而古代最为残忍的家主当推南宋杨政，他擢杀家妓的暴虐行为真正令人发指：

杨政在绍兴间，为秦中名将，威声与二吴埒，官至太尉。然资性惨忍，嗜杀人。元日，招幕僚宴会，李叔永中席起更衣，虞兵持烛导往溷所，经历曲折，殆如永巷。望两壁间，隐隐若人形影，谓为绘画。近视之，不见笔迹，又无面目相貌，凡二三十躯。疑不晓，叩虞兵，兵旁睨前后无人，始低语曰：“相公姬妾数十人，皆有乐艺，但小不称意，必杖杀之，而剥其皮，自首至足，钉于此壁上，直俟干硬，方举而掷诸水，此其皮迹也。”叔永悚然而出。杨最宠一姬，掌专房之爱。晚年抱病，困卧不能兴，于人事一切弗问，独拳拳此姬，常使侍侧。忽语之曰：“病势汹漉如此，万不望生，我心胆只倾吐汝身，今将奈何？”是时，气息仅属，语言大半不可晓。姬泣曰：“相公且强进药饵，脱若不起，愿相从泉下。”杨大喜，索酒与姬，各饮一杯。姬反室沉吟，自悔失言，阴谋伏窜。杨奄奄且

①《续补侍儿小名录》。

绝，久不瞑目。所亲大将诮之曰："相公平生杀人如掐蚁虱，真大丈夫汉。今日运命将终，乃留连顾恋，一何无刚肠胆决也。"杨称姬名曰："只候先死，我便去。"大将解其意，使给语姬云："相公唤。"预呼一壮士持骨索伏于榻后。姬至，立套其颈，少时而殂，陈尸于地，杨即气绝。（冯梦龙《情史·情痴类》）

凡家妓小不称意，杨政不仅杖而杀之，而且将她们的尸体剥皮，钉于壁上示众，其数达二三十人之多，真乃惨绝人寰。甚至，他在临死之前，还命人勒杀宠妓殉主。览此可知这些家妓的命运是何等悲惨凄苦了。

再次，家妓有时也会成为权豪势要争夺的对象和牺牲品。这类事件的发生，往往是由于家主的权势地位低于对方，但又不甘愿把自己的爱妓作为礼品主动拱手相送，于是对方便凭藉自己的权势，采取种种手段来夺人所爱。例如：

李丞相逢吉性强愎而沉猜多忌，好危人，略无怍色。既为居守，刘禹锡有妓甚丽，为众所知。李恃风望，恣行威福，分务朝官，取容不暇。一旦阴以计夺之。约曰："某日皇城中堂前致宴，应朝贤宠婪，并请早赴境会。"稍可观瞩者，如期云集。敕阍吏："先放刘家妓从门入。"倾都惊异，无敢言者。刘计无所出，惶惑吞声。又翌日，与相善数人谒之，但相见如常，从容久之，并不言境会之所以然者。座中默然，相目而已。既罢，一揖而退。刘叹咤

而归，无可奈何，遂愤懑而作四章，以叙四愁云尔。（《太平广记》卷二十三）

韦庄，字端己，以才名寓蜀。王建割据，遂羁留之。庄有宠人，姿质艳丽，兼擅词翰，建闻之，托以教内人为辞，强夺去。庄追念悒泱，每寄之吟咏，《荷叶杯》、《小重山》、《谒金门》诸篇，皆为是姬作也。其词情意悽惋，人相传诵，姬后闻之，不食而卒。（叶申芗《本事词》卷上）

以上二例，都是由于家妓具天姿国色，声名远播，权豪势要慕名起意，设计劫夺，家主中了圈套之后，虽愤怏思念，也无可奈何，只能诉诸诗词。也有一些家妓是在家中招待宾客时被客人看中，客人索要，主人却不允，因而对方遂起劫夺之心。例如：

五代安重诲尝过任圜，任圜为出妓，善歌而有色，重诲欲之，而圜不与，由是二人相恶，重诲诬以反而杀之。……及观《旧史梼杌》记潘沆事，则又不然。沆事伪蜀王建，为内枢密使。有美妓曰解愁，善为新声，及工小诗。建至沆第，见而欲取之，而沆不肯。沆弟谓曰："绿珠之祸，可不戒哉！"沆曰："人生贵于适意，岂能爱死，而自不足于心耶。（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九）

应该说，这类曾被权豪势要所劫夺的家妓，既是不幸的，也是有幸的。不幸的是，她们不过是作为一只只猎物为权豪势要所猎取，所蹂躏，有的甚至因此而断送了生命。但这不只是家妓

不幸，而是整个女性的不幸。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权豪势要一旦看中某个女子，不说家妓，即使良人妻女也在劫难逃。有幸的是，这些家妓的家主对她们真心相爱，情深意长，他们并不趋炎附势，不愿将自己的爱妓拱手送人，甚至为了保护自己的爱妓，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功名和生命。

5·4 家妓的生活态度

如上所述，家妓的命运遭际主要取决于家主的喜恶以及以家主为中心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优劣。但家妓毕竟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她们作为自我个体，大多都有着或强或弱的主体意识。从个体角度来考察比较，所谓幸与不幸，实际上是她们对于生活与命运的一种心理感受与自我评价。因而，不仅不同的生活环境会导致她们生活态度的不同，即使面对相同的命运遭际，她们各自的生活态度也会有所不同。概括起来说，历代家妓的生活态度大约有如下三种类型：

一是忠贞专一型。这类女子往往与家主关系密切，感情融洽，颇受宠爱。她们对于自己所充当的角色感到心满意足，并且充满感激之情。因而她们能够矢志如一地忠于家主，心甘情愿以自己最优的奉献来报效家主的知遇之恩。例如，清代李渔蓄妓甚众，唯对乔复生、王再来二姬宠爱至极。乔姬是李渔五十六岁时买入的一名北方贫民女子，当时年仅十三岁，不解声律为何事。但悟性极好，有音乐天才。由于李渔的发现并延师栽

培，才使她的艺术天才得以发挥，不久就以纯正圆润的歌喉压倒群芳，成为李渔私人剧团的旦脚（女主脚），与乔复生同堂共学者竟无一人堪与伦比。后来，李渔至兰州，又买得众妓，其中以王再来最为出类拔萃。于是李渔命王再来从乔复生学艺，乔姬又为王姬的天才悟性所惊奇，每日赞不绝口，喜形于色，不仅以之为偕凰之凤，合埙之篪，而且向李渔推荐，让王姬扮演生脚（男主脚，由女扮男装）。据李渔回忆说：

再来之秉更甚，尝以嘻笑答怒骂，殴之亦不报，有娄师德之风焉。声容较之复生，虽逊一舍，然不宜妇而宜男。立女伴中，似无足取。易妆换服，即令人改观，与美少年无异。予爱其风致，即不登场，亦使角巾相对，执麈尾而伴清谭，不知者目为歌姬，实予之勘友也。予数年以来，游燕适楚，之秦、之晋、之闽，泛江之左右，浙之东西，诸姬悉为从者，未尝一日去身。而能候予之饥饱寒燠，不使须臾失调者，则二人之力居多。壬子（1672）冬，复生诞一女，以不善摄生致病。然素善讳疾，不使人知。其意无他，以予终岁浪游于外，知其疾必阻之，恐作失群之鸟，不获偕行故耳。癸丑（1673）适楚，客于汉阳，病渐加而容不减。非惟不治药饵，仍望以丝竹养生。因所耽在是，非此不足陶性情也。越夏徂秋，稍有倦色。予始知而药之。奈时无良医，一二至者，皆同射覆。非曰寒，即曰疟，即曰中暑，总无辨其为痨者。病剧半载，从未恋榻，惟临终数日，始僵卧不起。前此皆力疾而行，仍施膏沐。同侪讯

以故，答曰："非不欲卧，恐以不起愁主人，徒扰文思，无益于病者。"时予方辑《一家言》之初集未竟故也。言毕，即令焚香祝天，谓："予得侍才人，死无可憾，但惜未能偕老，愿以来生续之。"又以此语嘱同辈，令勿使予知。诸姬中惟与再来最密，临没以女授之，属其抚育，……乃终。予方恸悼不已，诸姬复以前言告予，益抚棺恸哭，不忍独生。甲寅（1674）入都中，诸姬不与，惟再来及黄姓者二人相俱。再来居常安好，从予七年，不识参耆芝术为何味。忽于舟山得疾，天癸不至，腹渐膨然，谬以为娠。盖素望诞儿……至是误以可忧为可喜。如是者累月，病不稍减，而经忽至焉。始知从前见食而呕者，病也，非孕也。始则认忧为喜，今则转喜成忧矣。又以向受复生讬孤之命，讵竟母亡未几，女亦旋没，未免负讬九泉，时时抱痛，皆致疾之由也。予未出门时，诸姬中有一善妒者，好与人角，予怒而遣之。再来不解予意，谬谓一遣百遣，乃向内子及诸妾曰："生卧李家床，死葬李家土，此头可断，此身不可去也。"内子故设疑词难之曰："主人老矣，不若乘此芳年，早求得所之为愈。"再来曰："主人老而主母之中尽有艾者，诸艾可守，予独不能安于室乎。"诸妾又曰："我辈皆有子，汝或不生，后将奚恃？"对曰："主母恃诸郎君，予请恃其所恃。"内子及诸妾闻之，无不沾沾泪下。有一人而三男者，嘉其贤淑，欲以幼子予之。再来曰："姑缓数年，如果不育，请践斯语。"其性之贞烈若此。临逝，执予手曰："良缘遂止此乎？"时欲泣无声，且无

泪矣。二姬之年，皆终于十九。再来少复生一岁，亦死后一年。（《乔复生王再来二姬合传》）

应该说，乔复生、王再来在十三岁就被父母出卖，其命运是极为不幸和可悲的了。但她俩没有被卖给象王瑜、杨政那样的残暴家主，而是被先后卖给了戏剧家李渔，从而能够得侍才人，开始走上艺术生涯，成为优秀的戏剧演员，这又是她们不幸人生之中的万幸了。因而，她们从内心深处对李渔充满敬慕与爱恋之情，即使七年间一直跟随剧团南北奔走，颠沛流离，也苦而无怨。即使只有十九岁就因致痨致病早归九泉也死而无悔。她俩临死前的唯一遗憾是：可惜未能偕老。她俩对死后的最大期望是：愿以来生续之。真可谓一往情深，生死不渝。

象这类以一种惬意满足的心理来面对生活的家妓，不仅在与家主相随共处的正常情境中能够忠贞专一，即使在与家主永诀之后的情境中，她们仍然甘愿坚守贞操，甚至为之殉情死节，例如唐武后时，左司郎中乔知之有位爱姬名窈娘，艺色为当时第一。武延嗣闻知，设计夺去。知之愤痛成疾，因写诗寄情，窈娘得诗悲惋，结于裙带，赴井而死。① 又如众所周知的关盼盼，本徐州名妓，后被尚书张建封买为家妓，宠爱有加。盼盼“善歌舞，雅多风致”，白居易游徐州时，张曾宴请过他，并命盼盼侍宴承应。白居易曾赠诗赞曰：“醉娇胜不得，风溺牡丹花。”没有几年，张建封不幸逝世，归葬东洛。而彭城有张

①《本事诗》。

氏旧第，第中有小楼名燕子，盼盼念旧爱而不嫁，独居是楼十余年，并作《燕子楼》三首来叙述自己的心境和表达对故主的思念之情。后来张仲素拜访白居易时，因吟新诗，其中有《燕子楼》三首，词甚婉丽，白诘问其由，方知盼盼丧主守节事。白居易感慨万端，立即和盼盼诗原韵作《燕子楼》诗三首，对盼盼的遭遇和处境深表同情。但稍后不久，他又写了《感故张仆射诸伎》一诗曰：

黄金不惜买娥眉，拣得如花三四枝。
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死不相随。

在白居易看来，张建封在生时不惜黄金买家妓，竭尽心力教歌舞，他对于家妓可谓宠爱有加，情深意长了，可惜的是，家主一旦死去，就与爱妓两相分离，家主在九泉孤独忧伤，家妓在人世寂寞凄苦。言外之意是，盼盼等既然对主子忠贞专一，与其孤守贞节，不如相随九泉。盼盼得诗泣曰："妾非不能死，恐我公有从死之妾，玷污范耳。"乃作《和白公诗》，旬日不食而卒。其诗曰：

自守空楼敛恨眉，形同春后牡丹枝。
舍人不会人深意，讶道泉台不去随。

关盼盼的死固然与白居易写诗讽刺有关，但对于关盼盼本人来说，为张建封殉情死节的念头实早已有之，只不过觉得自己是

妓女出身，身分微贱；若相从而死，会玷污尚书的清范。

二是隐忍苟活型。这类女子或是为生活所迫或是为权势所逼而沦为家妓的。她们在内心深处并不爱家主，因而感情淡漠，甚至厌倦，但又生性软弱，不敢与命运抗争，只好隐忍苟活，得过且过。尽管她们平时锦衣玉食，生活优厚，尽管她们在侍主娱宾时不得不笑语欢歌，但她们的精神生活是极为痛苦的。例如：

> 宁王曼贵盛，宠妓数十人，皆绝艺上色。宅左有卖饼者妻，纤白明媚，王一见注目，厚遗其夫取之，宠惜逾等。环岁，因问之："汝复忆饼师否？"默然不对。王召饼师使见之，其妻注视，双泪垂颊，若不胜情。时王座客十余人，皆当时文士，无不悽异。王命赋诗，王右丞维诗先成："莫以今时宠，宁忘昔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本事诗》）

卖饼者妻是被迫卖给宁王曼为家妓的，不管宁王给她的待遇如何优厚，对她的宠惜如何逾等，她在内心深处却仍然深深爱着她的丈夫。因而在别了一年之后见了丈夫，还是"双泪垂颊，若不胜情"。但她毕竟是一个弱女子，慑于宁王的权势，她不得不隐忍顺从，委屈献身。有些家妓由于所属家主残酷暴虐，动辄得咎，其处境更惨，其心境更苦。例如：

> 观察使张洲，绍兴中为江东副总管，居建康，每以高价

往都城买侍妾，列屋二十人，而御之甚严，小过必挞。尝盛具延客，偕环侍执乐，歌舞竞妙，一坐尽倾。妾兢兢自持，不敢游目窥视，无论言谈也。中席，渊起更衣，坐客叶晦叔之侧一姝最丽，乘间语之曰："恭人在太尉左右，想大有乐处。"姝惨容不答，但举手指筵上烛云："绛烛分明会得。"（《夷坚三志辛》卷一）

所谓"绛烛分明会得"，是暗示她的生活极为凄苦，如蜡烛长明泪长流一样。实际上象这类家妓忍辱屈从，明里故作欢乐，暗地以泪洗面的情境，在唐代诗歌中早就有反映。如司空曙《观妓》诗曰：

翠娥红脸不胜情，管绝弦余发一声。
银烛摇摇尘暗下，却愁红粉泪痕生。

在历代家妓中，这类隐忍苟活型的女子所占比例最大。且不说如前所述的王瑜和杨政等随意讯杖乃至打杀的那些家妓如何精神痛苦，人人自危；即以那些作为礼品转赠他人的家妓而言，大多数也不过是为了衣食，得过且过而已。她们对旧主既不可能做到忠贞不渝，对新主也很难说会有深情厚爱。迫于权势，她们只能听天由命，任人摆布。至于那些达官贵人所蓄养的成百上千的家妓，虽然能够获得较为优厚的衣食享受，但其中有不少人甚至连性欲要求也得不到满足，其精神状况就更为凄苦了。

三是不满反抗型。这类女子一般都具有较强的自主意识，

她们对于生活往往都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并且为了自己理想的实现而敢于与命运抗争。尽管她们的抗争并不是（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自己以声色事人的从属命运，但她们希望能够把色艺奉献给自己所喜爱的如意郎君。因此，一旦当她们对自己的家主感到失望，觉得所事非人之后，她们往往不愿意隐忍苟活，其不满和怨愤便会与日俱增，以致终于做出偷情、私奔、自杀等非常举动来明确表示自己的不满与反抗。如隋代杨素拥有妓妾以千数，“每公卿入言，宾客上谒，未尝不踞床而见，令美人捧出，侍婢罗列”。甚至连众家妓都看透了他不过是一个“尸居余气”的荒淫之徒罢了。因而她们多想方设法从杨宅逃走，著名的红拂妓就是其中的代表。她因对杨素不满，早有潜逃之心。一旦看中李靖，就当即立断，于当夜五更初，私逃至李靖所居旅舍，叩门求爱曰：“妾侍杨司空久，阅天下之人多矣，无如公者。丝萝非独生，愿托乔木，故来奔耳。”于是，红拂妓与李靖一起私奔太原。杨素所蓄养的众多家妓中，除了“诸妓知其无成，去者众矣”之外，还有身在杨宅而红杏出墙者，甚至连他的一名宠妾都曾与李百药私通。① 唐代由于对家主不满而偷情、私奔的家妓也大有人在。如已见前述的武公业之爱妾步飞烟与赵象偷情、王制家妓孟恩贤因外遇而私奔之事，都是由于家妓不爱家主而又不甘隐忍苟活所致。又如：

> 李中丞有鬼妾，元夕以红绡帕裹诗掷于路，约得之者

①参见杜光庭《虬髯客传》和刘悚《隋唐嘉话》。

来年此夕会于相蓝后门。宦子张生得之，如期而往，姬与生偕逃于吴。（《全唐诗》第十一函第十册）

这位家妓为什么要与张生偕逃，我们从她的《书红绡帕》二诗中约略可知个中端倪：

裹裹真香谁见窃，鲛绡滴泪染成红。殷勤遗下轻绡意，好与情郎怀袖中。

金珠富贵吾家事，常渴佳期乃寂寥。偶用志诚求雅合，良媒未必胜红绡。

李节度家虽有金珠富贵，可是这位家妓却深感寂寥，常渴佳期，可见她根本不爱李节度，但又无缘得会如意郎君，于是便以红绡题诗求爱，果然有幸得遇才子张生，因而果断与之私奔。又据《昆仑奴》曰：大历中一品勋臣（当指郭子仪），有十院歌妓，其中有一妓名红绡，本为北方富家女子，被主人逼为姬仆，“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脸虽铅华，心颇郁结，纵玉箸举馔，金炉泛香，云屏而每进绮罗，绣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愿，如在桎梏”。一日有英俊少年名崔生者，往省一品勋臣疾病，红绡在侧一见钟情，乘送客之机，以手势打隐语约崔生于十五日月圆之夜来第三歌妓院幽会。崔生在家奴磨勒的帮助下，如期而至，红绡甚喜，立即向崔生剖心求爱，并于当晚在磨勒的帮助下私奔至崔生家。

唐宋间以自杀来对家主表示抗议的家妓也不乏其例。如：

唐武后时，左司郎中乔知之，有婢者窈娘，艺色为当时第一。知之宠爱，为之不婚，武延嗣闻之，求一见，势不可抑。既见，即留，无复还理。知之愤痛成疾，因为诗，写以缣素，厚赂阍守以达。窈娘得诗悲恨，结于裙带，赴井而死。延嗣见诗，遣酷吏诬陷知之，破其家。……时载初元年三月也。四月下狱，八月死。（孟棨《本事诗》）

窈娘被武延嗣劫夺后赴井自杀，既是对乔知之深情的回报，更是对武延嗣强横的抗议。宋代苏轼以家妓春娘向将运使者换马，春娘带着悲愤，下阶触槐而死，既是对自己的人格和尊严的卫护，更是对苏轼贵畜贱人的抗议与控诉。①

这类不满反抗型的家妓在历代虽然都为数并不很多，但她们的自主意识和抗争精神却是难能可贵的，在中国妇女解放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①冯梦龙《情史·情贞类》，已见前引。

第六章

私妓史叙论

6·1 官妓时代的私妓概述

所谓私妓，也是相对于官妓而言，专指那些不隶乐籍而以卖笑为生的妓女。私妓也是市民队伍不断壮大、城市经济不断发展的产物，她们甚至先于入籍的市妓而兴起，也活跃于各城镇商业区，为商人、市民服务，但她们既不是乐户女子，也不是女俘、女奴，而大多是良家女子。这类妓女在艺术素质方面虽然偶尔也有佼佼者，但总的来说不如官妓，因而她们主要是以卖淫为业，其活动方式由于时代的不同而略有差异，试分述之。

在唐代以前尤其是汉魏六朝时代，尽管已有私妓活动，但那时官妓制度尚不够完善，市妓也尚未兴起，私妓这个种类的特征也尚未形成。因此，私妓的发展历史当从唐代说起。孙棨在《北里志》中记载的妓女，实有两类，一类是“隶属教坊”的市妓，一类是不入籍的私妓。他说：“妓之母，多假母也，亦妓之衰退者为之。诸女自幼丐育，或佣其下里贫家，常有不调

之徒潜为渔猎。亦有良家子，为其家聘之，以转求厚赂，误陷其中，则无以自脱。初教之歌令而责之，其赋甚急。微涉退怠，则鞭朴备至。”假母所买所教的这类妓女，如果不向教坊司登记入籍，则为私妓。由于唐代是一个性观念比较开放的时代，因而私妓不仅可以公开活动，而且可以和入籍的市妓居住在一起倚门卖笑。如北曲自西第一家假母王团儿有一名妓女福娘就是私妓。孙棨至长安应试时曾游北里，与福娘往从甚密，福娘常惨然郁悲，一日泣告孙棨曰：“某幸未系教坊籍，君子倘有意，一二百金之费尔。”这就是说私妓从良，不必经教坊司批准落籍，只要付给假母一笔身价费就够了。福娘还对孙棨说：“本解梁人也，家与一乐工邻，少小常依其家学针线，诵歌诗。总角为人所诱，聘一过客，云入京赴调选。及挈至京，置之于是，客给而去。初是家（指假母王团儿）以亲情，接待甚至。累月后乃逼令学歌令，渐遣见宾客。寻为计巡辽所娶，韦宙相国子及卫僧常侍子所娶，输此家不啻千金矣。间者亦有兄弟相寻，便欲论夺。某量其兄力轻势弱不可夺，无奈何谓之曰：‘某亦失身矣，必恐徒为。’因尤其家。得数百金与兄，乃恸哭永诀而去。”作为私妓，福娘从良家女子受人引诱而失身，到被人掠卖至平康而为娼，即使兄弟寻找到了也无可奈何，其经历是颇为典型的。

宋代官府所施行的“设法卖酒”制度，实际上是以售色来辅助经商。上行下效，许多私人经营的商场、饭店、茶坊、酒楼也纷纷招置妓女于其中，让她们盛妆打扮，招邀顾客，这些妓女多是私妓。据《武林旧事》卷六载，南宋杭州城内的熙春

楼、三元楼、五间楼、称心楼、严厨、花月楼、银马杓、康沈店、翁厨、任厨、陈厨、周厨、巧张、自新楼、沈厨、郑厨、蛇鳝眼、张花等酒楼饭店，“每处各有私名妓数十辈，皆时妆袨服，巧笑争妍。夏月茉莉盈头，春满绮陌，凭槛招邀，谓之‘卖客’。又有小鬟，不呼自至，歌吟强聒，以求支分，谓之‘擦坐’。又有吹箫、弹阮、息气、锣板、歌唱、散要等人，谓之‘赶趁’。……歌管欢笑之声，每夕达旦，往往与朝天车马相接，虽风雨暑雪，不少减也。”甚至有一类酒店，例如庵酒店，不仅有娼妓卖酒侑尊，而且还于酒阁内暗设卧床，妓女可以随时向饮客献身，这种酒店外面做有特殊的记号：“门首红栀子灯上，不以晴雨，必用箬笠盖之，以为记认。其他大酒店，娼妓只伴坐而已。欲买欢则多往其居。”① 当时还有一些茶坊也多有妓女卖笑招客，如“水茶坊，乃娼家，聊设桌凳，以茶为由，后生辈甘于费钱，谓之干茶钱。”② 宋代的艺妓中也有私妓，据《武林旧事》卷六说：“或有路歧，不入勾栏，只在要闹宽阔之处做场者，谓之打野呵，此又艺之次者。”其中的女艺人，当是到处流动演出的私妓，其伎艺水平大多不如勾栏妓。至于专以卖淫为业的平康妓院中，也有不少妓女是私妓，如杭州著名妓女莘瑶琴，本是汴梁城中良家女子，因遭靖康之乱而被人掠卖至西湖上烟花王九妈家为娼，莘瑶琴正式接客时并未入籍，所以后来她从良时只以千金向王九妈赎身即可，不存在落籍的问题。③

宋代私妓可以自由地在城镇活动，各大街小巷、茶肆酒馆，

①《都城纪胜·酒肆》。　②《都城纪胜·茶坊》。　③冯梦龙《卖油郎独占花魁》。

到处都有她们的踪迹，官府对于私妓不仅不加以禁止限制，而且有时还选择私妓中的优秀者和官妓一起参加官卖酒活动：

临安府点检所，管城内外诸酒库。每岁清明前开煞，中前卖新迎年，诸库呈复本所，择日开沽呈样，各库预领告示：官私妓女，新丽妆著，差雇社队鼓乐，以荣迎引。至期侵晨，各库排列整肃，前往州府教场，伺候点呈。……其官私妓女，择为三等，上马先以顶冠花衫子裆袴；次择秀丽有名者，带珠翠朵玉冠儿，销金衫儿、裙儿，各执花斗鼓儿，或捧龙阮琴瑟；后十余辈，著大红衣，带皂时髦，名之“行首”。各雇赁银鞍闹妆马匹，借请宅院及诸司人家虞侯押番，及唤集闲仆浪子，引马随逐，各青绢白扇马兀供值。预十日前，本库官小呈；五日前，点检所佥厅官大呈。虽贫贱泼妓，亦须借备衣装首饰，或托人雇赁，以供一时之用，否则责罚而再办。（吴自牧《梦粱录》卷二）

自景定以来，诸酒库设法卖酒，官妓及私名妓女数内，拣择上中甲者，委有娉婷秀媚，桃脸樱唇，玉指纤纤，秋波滴溜，歌喉宛转，道得字真韵正，令人侧耳听之不厌。官妓如金赛兰、范都宜、唐安安、倪都惜、潘称心、梅丑儿、钱保奴、吕作娘、康三娘、桃师姑、沈三如等，及私名妓女，如苏州钱三姐、七姐、文字季惜惜、鼓板朱一姐、媳妇朱三姐、吕双双、十般大胡怜怜，婺州张七姐、蛮王二姐、搭罗邱三姐、一丈白杨三妈、旧司马二娘、裱背陈

三妈、片脱张三娘、半把缴朱七姐、斫香王四姐，大脚吴三妈、浴堂徐六妈、沈盼盼、普安安、徐双双、彭新等，后辈虽有歌唱者，比之前辈，终不如也。（《梦粱录》卷二十）

官府选择私妓参加官卖酒活动，实际上等于认可了私妓营业的合法性，而社会舆论也并不谴责私妓卖笑谋生为不名誉之事，甚至杭州人结婚时都时兴"雇借官私妓女乘马……前往女家，迎取新人"，引入洞房。① 这就使得许多利欲熏心的妓院龟鸨大量买良为娼，甚至还出现了一些专门掠卖良家女为娼的所谓"牙侩"：

滕洙为人恭俭好义，尝有一二族女，年甫龆龀，家贫母疾，父为牙侩所欺，鬻之娼家，闻之不平，而莫敢谁何。君独愤然一呼，娼侩许偿直还女，阳诺而谋挟之遁。君廉知之，亟诉诸官，未决。娼与侩谋伪契，增其直，累数倍。（《尊德性斋集》）

由此可见，当时买良为娼活动十分猖獗。直至南宋嘉、祐年间，沈遘知杭州时，才开始采取措施，严令禁止，对"良家女卖入娼优者，悉以钱赎归其父母。"② 但这只是局部地区的临时性行政措施，并未从根本上禁止这种有利可图的黑心行为。

元代初年私妓也颇多。这些私妓大多本是江南良家女子。

①《梦粱录》卷二十。　②《武林纪事》。

元蒙进军南宋时遭天掳掠蹂躏之后，又被卖入娼家送旧迎新的，也有北方民间丈夫逼令妻妾卖淫赚钱的。关汉卿《救风尘》中周舍曾对店小二说："我着你开着这个客店。我那里希罕你那房钱养家，不问官妓私科子，只等有好的来你客店里，你便来叫我。"所谓私科子，就是私妓，这也说明元初到处都有私妓活动。不过，自至元十三年开始以法律的形式来禁止买良为娼的活动以后，私妓的活动就开始受到限制。至元十五年，元世祖又下令："禁官吏军民卖所娶江南良家子女为娼者，卖娶者两罪之，官没其值，人复其良。"① 此后，掠卖江南良家女子为娼的现象便逐渐减少。

不仅如此，元代法律实际上对所有私自为娼活动都是禁止的。据《元史·刑法志》载，

> 诸卖买良人为娼，卖主买主同罪，妇还为良，价钱半没官，半付告者。或妇人自陈，或因事发觉，全没入官。
>
> 诸勒妻妾为娼者，笞四十七，妇人放从良。诸受财纵妻妾为娼者，本夫与奸妇奸夫各杖八十七，离之。其妻妾随时自首者，不坐。若日月已久，不自首者，勿听。
>
> 诸军官鸠财聚众，张设仪卫，鸣锣击鼓，迎赛神社，以民为娼者，笞五十七，其副二十七，并记过。
>
> 诸民间子弟，不务生业，辄于城市坊镇，演唱词话，教习杂戏，聚众逞谑，并禁治之。

①《元史·世祖本纪》。

诸娼妓之家，辄买良人为娼，而有司不审，滥给公据，税务无凭，辄与印税，并严禁之，违者痛绳之。

元代统治者之所以一方面保留娼妓制度，一方面又禁止私妓活动，首先是为了让全国的娼妓保持在一定的数量之内，让广大人民安于从事生产劳动，不误生业。其次是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凡是娼家需要买良家女子为娼者，也必须经过有司审核批准入籍，缴纳税金。上述法令颁行之后，民间虽然仍有不少私妓暗地卖淫赚钱，但一经发现，必依法处治。例如，大德元年（1297）上都民户王用通令妻阿孙和妾彭鸾哥为娼，接客觅钱。每日早晨，王用离开本家，至晚归来，若妻妾觅钱不敷盘缠，则更行拷打，以致彭鸾哥告发到官，结果官府把王用逮捕问罪，判阿孙、彭鸾哥与王用离异，各自归宗。①

明代承续元律规定，也对“买良为娼”活动严令禁止：“凡娼优乐人买良人子女为娼优及娶为妻妾，或乞养为子女者，杖一百，知情嫁卖者同罪，媒合人减一等，财礼入官，子女归宗。”②其处罚还稍重于元律。因而明前期很难找到私妓活动的材料。明后期人欲横流，法令失禁，私妓又大量出现。据谢肇淛《五杂俎》说：“有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谓之土妓，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梅圃余谈》还记叙了另一类私娼的活动：“外城子民度日难者，往往勾引丐女数人，私设娼窝，谓之窑子。室中天窗洞开，择向路边屋壁作小洞二三。丐女修容貌，裸体居其中，口吟小词，并做种种淫秽之态。屋

①《元典章》卷四十五。　②《唐明律合编》。

外浮浪子弟，过其处，就小溷窥，情不自禁，则唧门入，丐女队裸而前。择其可者投钱七文，便携手登床，历一时而出。”此外，《五杂俎》和《陶庵梦忆》中所说到的“扬州瘦马”，其中多是良家少女。她们都生得美丽多姿，性情温柔，举止娴熟，父母迫于生计，而自愿将女儿卖给别人为妾为婢，或卖入平康为娼。在卖方与买方之间，还有一类专门做瘦马生意的牙婆驵侩达数十百人，他们或者是带买主到瘦马之家亲自挑选，或者是先将童女购进，集中训练之后加以打扮，再以高价卖入娼家，凡未入籍者也为私妓。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明代私妓与宋代稍有不同的是，她们大多是由于生活贫困而自卖为娼的。当社会逼得人们无法生存，而卖淫收入又高出一般劳动之上若干倍的情况下，这些女子只好置贞节、廉耻、人格于不顾，沦落风尘，操皮肉生涯以活己养家。表面上看她们是自愿为娼，实质上是当时的社会现实逼良为娼。

明清易代之际，良家女子沦为私妓者更不可数计。清初统治者为了禁止以良为娼，先后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行政措施和法律措施：顺治五年制订并颁行的《大清律集解附例》，重申了明律中禁止以良为娼的条文。顺治九年清世祖又下令禁良为娼，对误落平康者，许平价赎归。康熙时开始修订，后来颁行的《钦定大清律例》关于“买良为娼”的律令，除一字不差照抄大明律之外，还在后附“条例”中作了进一步的补充：

有私买良家之女为娼者，杖一百，徒三年。知情卖者与同罪，媒合人减一等，妇女并发还家。

凡籍充牙将领卖妇人逼勒卖奸图利者，枷号三个月，杖一百，发云贵川广烟瘴少轻地方。如虽无局奸图骗情事，但非系当官交领，私买领状，将妇女久养在家，逾限不卖，希图重利者，杖一百，地方官不实力查拿，照例议处。

凡无籍之徒及生监衙役兵丁，窝顿流娼土妓，引诱局骗，及得受窝顿娼妓之家财物，挺身架护者，均杖一百。生监革去衣顶，衙役兵丁不准食粮充役，邻保知情容隐者，杖八十。受财者准枉法论，计赃从重科断。其失察之该地方官，交部照例议处。

这些措施的施行对于控制和抑止清初私妓的发展，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清初顺治、康熙两朝七十九年间，各大小城市虽然都不乏私妓活动，但它们无论从数量到质量都仍然不可能与公开活动的市妓相抗衡。

6.2 清中叶私妓发展盛况

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清世宗胤稹即位后主动顺应历史潮流，从雍正元年至八年间，持续推行了颇得民心的“除贱为良”政策。他在先后分别下令让各地的所谓惰民、伴当、世仆、蛋户、丐户、棚民、寮民等贱民一律免贱从良，列为编氓之前，率先“除乐户籍，各省乐户皆令确查削籍，改业为良”，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否定和废除了延续实施达一千多年之久的乐籍制度，使卖淫

为娼活动失去了其合法性，这对于乐户作为一个阶层的政治解放和对于城市娼妓业的控抑乃至于废止，无疑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胤禛并无意于要在全国范围内彻底解决娼妓问题。因而他既未对众多市妓除籍为良之后的生活出路做出安排，也未对滋生娼妓的社会土壤予以铲除。曾几何时，她们之中有不少人迫于生计又只好自甘污贱，重操旧业。加之雍正之后的几代皇帝对于娼妓的活动也多听之任之，令虽行而禁不止，乾隆皇帝巡视江南时，甚至还亲自召幸过女伶昭容和雪如。① 于是，从雍乾至嘉道年间，官妓虽然基本上消灭了，但却让私妓乘机得以发展，并且日趋繁盛。

清中叶私妓繁盛之地，不是在北京、上海，而是在南京、扬州、苏州、广东等地。这种局面的形成，既有现实政治和经济的原因，也与历史和文化传统相关。

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可谓是南北辐辏，人文荟萃。清初，尚有东院、本司（即教坊司）胡同、勾栏胡同、演乐胡同、马姑娘胡同、宋姑娘胡同、粉子胡同和南院为风流胜地，但自顺治皇帝废除宫廷女乐，康熙和雍正皇帝相继采取措施对都市娼妓加以控抑乃至禁止之后，北京作为首都，自然首当其冲，所受到的禁限和处治比全国其他任何城市都要严厉，加之居京的达官贵人、膏粱子弟和文人士大夫慑于王法，也承袭前明遗风，转以狎玩像姑（即男伎）为时尚，至清中叶，此风尤盛。据《清稗类钞》记载："道光以前，京师最重像姑，

① 《清稗类钞》第十一册

绝少妓寮，金鱼池等处，特舆隶溷集耳。”既然那些高层次狎客都雅重像姑，光靠一些车夫、轿夫、走卒、苦力之类的低层次狎客，是不可能领导风月潮流的，因而，北京私妓在这时难以大肆发展。

上海虽然始置于元，但直至清中叶以后才逐渐发展成为一座新兴城市，因而上海青楼之名也是到嘉庆、道光年间才渐次传闻于海内。如据《清稗类钞》记载：“沪自嘉、道间名流踵至，提倡风雅，领袖章台者，如王月仙、褚云孙，固一时之秀也。其时朱某、陈某以财雄，丁某、王某以侠著，闽粤大贾固皆拥有巨赀，不惜千金为此中生色也。”不过，上海娼妓业的真正发展，要到1843年上海开埠之后，才伴随着租界的逐步扩展和工商业的渐臻繁荣而日趋兴盛，以至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一跃成为全国之冠。这种盛况我们将在下编予以详细阐述。

真正可以作为清中叶私妓繁盛的标志并且有详细记载的，当推南京、扬州、苏州和广东等地为代表，总括来说，各地私妓发展的轨迹大致相似。在雍正年间，私妓尚不敢肆无忌惮，基本上还是以半隐蔽半公开的方式卖色售奸。至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则已极度繁盛，各地私妓都俨然同以前的官妓一样，竟公然各立门户，鳞次而居，或倚门迎客、声色并呈，或招摇过市、出局侑觞。虽然官府有时也例行公事，依令施禁，但多是朝散夕聚，屡禁屡兴。试择要分述如下：

一、南京私妓之盛

南京佳丽云集，以有明一代号称极盛，故仕宦者夸为仙都，

游谈者据为乐土。虽然于甲申乙酉之交，惨遭战火焚劫，一片欢场，化为瓦砾，但至乾隆时代，又因山温水软、风月撩人，而复以秦淮河两岸河房为风流薮泽，中历嘉庆、道光二朝，直至1853年太平天国起义军攻占南京之前，百余年间，皆为一河风流，两岸笙歌。对此间艳史韵事，以珠泉居士的《续板桥杂记》、捧花生的《秦淮画舫录》及《画舫余谭》、雪樵居士的《秦淮闻见录》、许豫的《白门衰柳记》等书记之甚详。

乾隆初年，妓女居秦淮河房者，不过数家，开宴迎宾，也不常有。至乾隆中叶以降，则裙屐笙歌，又复繁艳，十里秦淮，皆为烟月作坊。自利涉桥至武定桥地段，妓女人数最多，两岸河房皆有丽妓栉比而居，各立门户。此外，自利涉桥东的钓鱼巷至水关临渡一带，以及自武定桥而西，至白塔巷、王府塘诸处，也都有妓女择居开业。南京妓女大部分来自本地，俗称本帮。如乾隆末以汤九、汤十姊妹俩为本帮翘楚。其他多来自苏州、扬州，俗称苏帮、扬帮。一般说来，苏帮善文，扬帮善武，如朱大、金二、董三、马四，皆为苏帮佼佼者；扬帮则以郭心儿为翘楚，时人戏以“武状元”目之。南京冶游，最时兴挟名妓乘画舫以游秦淮。每年自夏初至仲秋，秦淮河水涨波荡，常有游船数百，震荡波心。清曲南词，十番锣鼓，腾腾如沸，各奏尔能。薄暮须臾，则烛笼炫耀，帘幕毕钩，倩妆倚栏，声光缭乱。百余年间，一直盛行不衰。凡有特客，或外地之来南京者，必招游画舫以表示敬重。先数日，即擎小红笺，贮以小红封套，笺书“某日买舟候叙，某人拜订”，命仆人送至客所。客不欲往，即于小红笺上书“辞谢”，下书“某人拜手”字样，

仍贮送去之封套内，并原请之笺还之，是曰“不扰”。或者事先不下请柬，主人预计客之多少，先租赁船只，或藤缏，或走舱，停泊水边，临时邀客共登。大率午后方集，早则妓女梳掠未竟，无可省览。另以小舟载仆辈于后，以备装烟问话，盘餐或由家庖治成，用珠红油漆盒子抬至码头，伺船过送上；或择名馆代办，以取其便；或雇请外间庖人，载以七板儿两支，谓之伙食船，随船烧割烹调。献酬既毕，人倦酒阑，回顾篾笋灯笼，早已陈列岸上，主客欢揖而散，亦已斗转参横矣。乾隆四十一年和四十二年之夏为尤盛。其时，十里灯火游船，衔尾蟠旋，不睹寸澜；河亭上下，照耀如昼。诸名妓家广筵长席，日午至丙夜，座客常满，樽酒不空，大抵一日之间，千金靡费。至乾隆末叶，不仅男子兴趣不减，即使大家闺秀，也常招名妓乘秦淮画舫，以作清游。画舫名妓以吹弹歌唱为能事，乾隆间多娴习法曲，至嘉庆初，复以歌昆曲为时尚。游客之设宴于妓船，未开宴时，先让妓女唱昆曲一二出，合以丝竹鼓板，五音和协，豪迈者令人吐气扬眉，凄婉者亦足以销魂荡魄。知音者或于酒阑时倾慕再三，必请妓女重唱一二，而客也歌而和之。唱者以知音互赏而忘倦，听者也以雅会而忘返。

从雍乾至嘉道年间，南京官府也曾多次奉命禁妓，但由于当时的地方官僚大多在心灵深处是以狎妓赏音为风流快事的，禁妓不过是例行公事。因而令行之日，妓女或隐匿或迁徙，风流云散，但只待风声一过，她们又不召而至，规模如旧。例如，据雪樵居士《秦淮闻见录》载，乾隆末年“双湖太守禁妓，简斋太守（袁枚）以诗解之，赵云菘观察冀戏题五绝句。”其一二首云：

登车红袖满啼痕，诗老为招已断魂。十四楼高功保障，平康护法好沙门。

八十衰翁已白粉，惜花心在老逾殷。哥舒半段枪无敌，专救人间娘子军。

虽为戏笔，却深刻揭示了袁枚至耄耋之年仍惜花恋妓的心理。至道光年间陶澍任两江总督时，则已不禁妓女，而只严禁僚属冶游，却又允许幕僚胡林翼眠花宿柳，甚至说，“润之（胡林翼字）他日为国勤劳，将无暇晷以行乐，今之所为，盖欲偿其后之劳也。”即使其他僚属有狎妓者为陶澍所知也不过责之而已。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南京妓女就难免会有增无减了。

二、扬州、苏州私妓之盛

扬州自古为东南名胜之地，历史上曾艳名远播，即使降至清代，其金粉之盛，也仍不亚于秦淮。吴蔼茨《扬州鼓吹词序》云：

郡中城内，重城妓馆，每夕燃灯数万，粉黛绮罗甲天下。吾乡佳丽，在唐为然，国初官妓，谓之乐户。土风立春前一日太守迎春于城东蕃厘观，令官妓扮社公春婆一、春姐二、春吏一、皂隶二、春官一。次日打春官，给身钱二十七文，另赏春官通书十本。是役观前里正司之。至康熙间裁乐户，遂无官妓，以灯节花鼓中色目替之。扬州花鼓，扮昭君、渔婆之类，皆男子为之。故俗语有好女不看

春，好男不看灯之例。官妓既革，土娼潜出，如私窠子、半开门之类，有司禁之。泰州有渔网船，如广东高桅艇之例，郡城呼之为网船浜。遂相沿呼苏妓为苏浜，土娼为扬浜。一逢禁令，辄生死逃亡不知所之。①

由此可见，康雍年间，由于禁妓颇严，扬州私妓并不十分兴盛。至乾隆初年，稍弛其禁，扬州妓女又逐渐增加。水榭歌台，丝管竞奏，虹桥一带，复有小秦淮之称。据《清稗类钞》载："高宗南巡至清江，曾召女伶昭容，旋以钿车锦辇送扬州，赐玉如意、粉盞、金瓶、绿玉簪、赤瑛、玉杯、珠串诸珍物。又有雪如者，高宗尝以手抚其肩，雪如乃于肩上绣小龙，以彰其宠。"高宗皇帝亲召女妓并赐予珍物的风流行为，对于扬州私妓的发展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加之乾隆年间，扬州盐商丛聚，斗靡夸侈，猎粉渔脂，蔚成风尚。于是粉白黛绿，列屋而居，呈能角媚，尽态极妍。至乾隆四五十年间，进入全盛时期，艳名复播天下。

扬州冶游也盛行画舫风流，因而扬州妓女大多都择居河岸湖畔，以利买棹纵游。据李斗《扬州画舫录》载：城内自龙头至天宁门水关，夹河两岸，皆为名姝云集之地。如赵大官、赵九官、大金二官、小金二官、陈银官、巧官、麻油王二官、杨大官、杨三官、吴新官、汪大官、闵得官、闵二官、沈四官、沈大二官、赵三官、陆爱官、佟凤官、夏大官、小青青、蒋大官、蒋二官、张三官、王大官、小脚陈三官、大脚陈三官，皆

①引自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九。

为色艺俱佳者。每舟游湖上，遇者疑为仙至。虹桥一带，则为北郊佳丽荟萃之地，也是扬州冶游的中心。虹桥上游之湖水，号称小秦淮，故湖畔妓馆也称小秦淮妓馆。妓女乘画舫游湖有二种方式：一种是游客招邀，既可提前预约，也可临时招携。提前预约则须先投柬帖，上书“湖舫候玉”等字样，相沿成俗，渐以为礼。临时招携则可省去此道手续。一种是妓女买棹湖上招引游客，“大抵梳头多双飞燕、到枕松之属，衣服不着长衫。夏多子儿衫，春秋多短衣，如翡翠织绒之属，冬多貂覆额、苏州勒子之属。船首无侍者，船尾仅一二仆妇。游人见之，或隔船作吴语，或就船拂须握手，倚栏索酒，倾卮无遗滴。甚至湖上市会日，妓舟齐出，罗纬翠幕，稠叠围绕。”此外，据珠泉居士《雪鸿小记》载，自凡家花园至水关一带两岸河房，也为城北妓女聚居之地，其中以方璇、王珑、黄翠儿、陈银儿、陆庆儿艳名尤著。

扬州私妓全盛之时，官僚士大夫也多置律令于不顾，公开狎妓赏音，甚至钱湘舲游扬州时，也曾于谢未堂司寇筵席上品题诸妓，以杨小保为女状元，顾霞娱为女榜眼，杨高为女探花。赵翼为此题诗曰：

> 酒绿灯红绀碧花，江乡此会最高华。科名一代尊沂国，丝竹千年属谢家。拇陈酣摧拳似雨，头衔艳称脸如霞。无双才子无双女，并作人间胜事夸。①

① 《扬州画舫录》卷九。

这样的花榜胜事虽然已经逊于晚明两京的品题规模，但在清中叶官妓已革，私妓遭禁的背景之下，却是绝无仅有的。

苏州也为东南一大都会，俗尚豪放，宾游络绎。宴客者多买棹虎邱，画舫笙歌，四时不绝。垂杨曲巷，绮阁深藏，银烛留莞，金觞劝客，见之者不能不叹服其气质高雅。清人论及花事，常以苏扬并称，或进一步曰，苏帮善文，扬帮善武。虽不尽然如此，但苏州妓女工诗词、善弹唱，柔情绰态、气质高雅，倒确属寻常之事。

苏人最喜竞渡游山。竞渡多在山塘。士人于四月末即起龙舟开演，画船箫鼓也陆续聚于冶芳渌水间矣。至端阳前后十余日，观者倾城，万船云集，远郡士女，结伴纷来，鬓影衣香，雾迷七里，百工废业，小户倾家，甚至雷雨不能阻，父兄不能禁。逢此盛会，诸名妓一日所得缠头无数，而舟子也往往藉诸丽品以昂其价。乾隆间以船妓缠头有余，即购楼台于近水处，几案整洁，笔墨精良。春秋佳日，妆罢登舟，极烟波容与之趣。薄暮维船，登楼重宴，添酒回灯，宛如闺阁。遇风雨不出门，至酷暑严寒，虽千呼万唤不出也。诸佳丽游山，一般不愿涉远，故常集于虎邱。虎邱本不高峻，上又遍造浮图屋宇，往往丽妓一至，游观者如蜂接踵，以至虎邱上下万头攒动，自晓至晚，川流不息。此风至嘉庆年间，仍盛行不衰。西溪山人的《吴门画舫录》和箇中生的《吴门画舫续录》对之记载甚详。

实际上，清人常以苏扬并称，并不仅仅指苏扬本地花事之盛，还包括苏扬妓女往往引类呼朋，分赴各省，开拓花场，扩张领地。使南之闽粤，北之辽沈，无不为其殖民之地，而所至

又为人所欢迎，故著称于通国也。

三、广东私妓之盛

广东烟花，无论土妓流娼，皆以水居者为上，陆地虽有，然不足贵。土妓多为蜑户女郎或冒名蜑户者，流娼则多来自扬州。就其人数之多而言，清中叶当推珠江为最，韩江次之。然仅就蜑户女郎的资历而言，当以韩江沿岸的潮嘉蜑户为正宗，珠江沿岸的广州蜑女则大多为渔民女子或农家女子而冒名蜑户者。之所以形成这种格局，既有地理的原因，也有历史的、政治的原因。

广东濒临南海，河流众多，水域宽广，这是自古以来蜑户能够在水上居住繁衍的地理条件，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历代统治者侮视这些水上居民，把他们列为贱民，规定他们必须世世代代以船为家，自为婚姻，不得陆居，更不得取应入仕。据俞蛟《潮嘉风月记》说：

> 潮嘉曲部中，半皆蜑户女郎。而蜑户惟麦、濮、苏、吴、何、顾、曾七姓，以舟为家，互相配偶，人皆贱之。间尝考诸记载，蜑谓之水栏，辨水色也，即知有龙，又曰龙户。秦始皇使屠睢统五军监禄杀西瓯王，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意者，今之蜑户，即西瓯之遗民欤？生男专事篷篙，祇在清溪、潮阳五百里内，往来载运物货以受值。生女则视其姿貌之妍媸，或留抚畜，或卖邻舟。父母兄弟，仍时相顾问。稍长，辄匀眉敷粉，拨管调丝。盖其相沿之习，有不能不为娼者，非如燕赵之区，随

处可游，资生多术，乃不顾廉耻以身为货可同日而语。故遇交好者，择纯谨可倚，即托以终身；不俟老大始嫁作商人妇也。广东蜑户，与浙江堕民，曾蒙谕旨，准其为良，与居民一体安居习业，土豪地棍，横加逼辱，依律治罪，载在令典。（笔者按：雍正七年，圣谕准广东蜑户上岸居住，编为民户。）此真胞与为怀，欲涤斯民旧习之污，无如结习莫除，甘于下贱。亦可哀也已。

可见蜑女为娼，是为生活所迫，因而即使雍正七年已除贱为良，准许上岸居住，但她们仍乘坐绿篷船，往返于韩江清溪之间，以卖身来维持生活。

作为全省第二大河流的韩江尚且如此，那么，作为全省第一大河流的珠江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著名文学家赵翼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出任广州知府时，曾亲眼目睹了珠江花舫活动的盛况。他说：

广州珠江蜑船不下七八千，皆以脂粉为生计，猝难禁也。蜑户本海边捕鱼为业，能入海挺枪杀巨鱼，其人例不陆处。脂粉为生者，亦以船为家，故冒其名，实非真蜑户也。珠江甚阔，蜑船所聚长七八里，列十数层，皆植木以驾船，虽大风浪不动，中空水街，小船数百往来其间。客之上蜑船者，皆由小船渡。蜑女率老妓买为己女，年十三四即令侍客，实罕有佳者。晨起面多黄色，傅粉后饮卯酒作微红。七八千蜑船，每日皆有客。小船之绕行水街者，

卖果实香品，竟夜不绝也。余守广州时（乾隆三十五年），制府尝命余禁之，余谓："此风由来已久，每船十余人恃以衣食，一日绝其生计，令此七八万人何处得食？且缠头皆出富人，亦哀多益寡之一道也。"事遂已。闻潮州之绿篷船较有佳者，女郎未笄，多扮作童奴侍侧，官吏亦无不为所染也。"（《簷曝杂记》卷四）

乾隆中叶，仅珠江蜑女为娼者，就有七八万人之多，赵翼虽为知府亦欲禁不能，只得听之任之。于是，广州私妓从乾隆至嘉道年间日趋繁盛。扬州妓女也成群结队，不招而至，并且因其来粤先后和活动方式不同，而有"大扬帮"与"小扬帮"之分。先来者基本上保持了扬州妓女的风格，居河南福仁里河旁，人称"大扬帮"。后来者则仿效珠江蜑女，由陆居而变为水居，人称"小扬帮"。

广州虽有七八千蜑船分布在珠江上下，但以谷埠花舫为其上乘。清中叶广州尚无碾米厂，各乡谷米，多用船运至广州，集中在谷埠停泊。故谷埠一带，商贾云集，格外繁华，与之相适应的谷埠妓女也名价最高。谷埠花舫极为繁华阔绰，以艇肚住妓女，各有房舱，名叫白鸽笼，艇面前后有厅，作为宴客之所，陈设华丽，一入其中，几不知为浮家泛宅了。花舫一字排连，两行排列，中离三丈许，可容沙艇往来渡客。花舫之外又泊"紫洞艇"若干支，大的紫洞艇有内外厅，隔以锦帐，分别男女内外，陈设与花舫差不多，艇头置睡椅一，圆桌一，以备游客纳凉或赏月之用。紫洞艇头也泊沙艇无数，作为渡客之用。

仅谷埠一地所泊大小艇不下三百余艘，有上中下三档之分，下档最佳，上档次之，中档为姻缘艇，妓女留髡的即以此艇为阳台，所以叫姻缘艇。每至夜晚，月明风清，波平若镜，琉璃灯火，皎洁如昼。所有珠娘，成群结队，晚妆初罢，妖态万方。客至开筵，陈设华焕，先之以弦管嘹嘈，笙箫喧沸，诸校书各逞珠喉，互赓迭唱，脆堪裂帛，响可遏云。歌声既阕，然后入席，珍错杂陈，烹调尽善，即鸭臛鱼羹，亦复别有风味。席撤再唱，绮兴愈浓，往往至星堕月斜重复入席。斯时侑酒拇战，钏动钗飞，击鼓催花，传觞醉月，倍极其乐。游客至此，无不色授神眩，魂销心荡。①

从以上列举的南京、扬州、苏州、广东等地私妓发展的盛况，以及首都北京的私妓虽不甚发达却依复存在的事实足资说明，清中叶虽然废除了乐籍制度，消灭了官妓，并且在法律上一直禁止私妓，但实际上此时却正是私妓得以发展并且独立主宰花界的时代。朝廷的律令在一定范围内成为了一纸具文，各级地方官府的偶尔施禁也不过是例行公事、掩人耳目罢了。于是，私妓在名义上受到禁抑而实际上可以自由活动的社会背景中，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繁衍，逐渐从南方沿海一带城市向内地蔓延，最后南北京包抄，终于在全国范围内迎来了近代妓女复兴的时代。

①参见《珠江花史》、《珠江花舫记》。

6·3 私妓出卖声色的原因及其归宿

无论是唐宋元明时期的私妓，还是清中叶的私妓，她们与官妓的最大区别是：官妓隶属乐籍，其法律地位低于良民（归在贱民之列），她们的行为要受官府的钤管，因而实际上带有政治压迫的性质；而私妓则大多为良家女子，不隶乐籍，她们出卖声色的行为，不是由于政治的压迫，也不受官府钤管，恰恰相反，从元代以降，历代法律都禁止良家女子为娼。那么，为什么历代（尤其是清中叶）都有不少良家女子在各城镇出卖声色呢？其原因大致如下：

一、为生活所迫而自愿为妓

这类女子是私妓的主要来源之一。不过由于各自的处境不同，她们下海的情形也有所不同。

1．年小时被父母卖入娼家。为了保证妓女后继有人，名妓辈出，不少龟鸨在经营卖淫业的同时，还不断买来雏妓教习歌舞。这些雏妓无疑都是贫家女子。她们多是在家境困窘、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由父母直接卖入娼家，或先卖给人贩子（又称牙侩），然后再辗转卖入娼家的。她们初入娼家时，小至七八岁，大不过十三四，尚无自主意识，无所谓自愿不自愿。况且在娼家衣食丰美，又教习诗词歌舞，从生活到教育都优于自家。至二八芳龄，龟鸨为之请名士豪客梳拢时，除极少数不情愿者

外，大多都心安理得，急欲一展风姿。由于嫖客也多有狎玩处女的嗜好，因而雏妓初次接客的礼节之隆重和排场之华侈，并不亚于贵族女子的婚礼。嫖客不仅要向龟鸨付梳拢费，而且要购置妓女当日穿戴的衣服首饰和新房的家俱摆设、床上用品。此外，还要请客庆贺。这既可以给妓女的心理上带来一定程度的满足，也可以为龟鸨敲诈嫖客提供一个绝好的机会。甚至在乾隆年间，南京有些老鸨为了骗取大笔钱财，让已经梳拢过的妓女多次冒充处女请人梳拢。① 广东珠江、韩江一带的舟妓，有相当比例的女子出身渔民之家或陆居的贫苦人家，年幼时为生活所迫被父母卖入舟中为妓。至于蜑户女子，虽然大多都在本家船上随母为妓，但也有不少从小就被父母卖入邻舟为妓的。如据《潮嘉风月记》说："舟中妓女亲生者少，皆买自贫家，或得诸他舟，教习弦歌，传授衣钵，颇费劬劳。迨梳拢后，一切家计，取给于女，谓之当家。"所谓"当家"，实为老板的钱树子。

2．因家难而自卖青楼。所谓"家难"主要是指父母得了重病而负债累累，或父母死后无依无靠。这类女子往往为生计所迫而自卖青楼。如程月娥，本为新安人，"年才十五，因父死无以偿逋负，堕入青楼。故酬对羞涩，而女工独贤，兼营刷印碑版坊刻，命作校书，实不负名矣。惜狭邪中重歌舞而轻文墨者，十八九也"。②又如南京妓女张宝龄，"本泰州潘氏女，父母相继去，其兄无恒业，挟之游江湖，遂堕女闾"。她"生性

①参见《续板桥杂记》。　②《吴门画舫续录》。

静婉，蛾眉淡扫，丰韵不凡，粗识字义，而绣榻之旁，玉轴牙签，恒不去手”，为嘉庆间名妓之一。① 这类女子在私妓中所占比例虽然不大，但她们进入妓院时基本上已有自主意识，面对生活的困境，她们只好置人格、羞耻于不顾，而自愿卖入青楼为妓。

3．随父母习艺为妓。这类女子的父母往往是优伶、娼妓或龟鸨。一方面由于她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之中，从小就在父母的影响下学诗词，习歌舞，观风月，妇德、贞操观念较为淡薄。一旦年至及笄，大多心甘情愿倚门卖笑。例如，据《潮嘉风月记》载：“程江蜑船中，有雏女年才十一岁，髦发鬖鬈垂肩际若松鬟。一夕，窥见其母与所欢，横陈榻上，不觉欲心顿炽。比晓，告母，欲人梳拢。母笑其稚年无识，谕止之。女曰：‘不如我愿，即服毒死，母无悔也。’越日，窃取鸦片和酒欲吞，母夺弃之，不得已，为之请人梳拢。”当然，也有少数妓家女子出淤泥而不染，不肯习歌学舞，拒绝出卖声色。如南京妓女朱大有一个亲生女儿，“年方十岁，教以歌曲，不肯发声，自言愿归里门，织布为业。”② 另一方面由于她们父母的职业在社会上颇受贱视，作为优伶或妓家的女儿也相应受人歧视，因而她们既不能象大家闺秀一样地嫁为人妻，（即使做人妾，也要在青楼中出了名方能嫁一位如意郎君，）也不可能找到处境比青楼好的其他易于谋生的职业，（古代贫家女子也有不少做婢女或乞丐的，但这类女子与妓女相比，不仅社会地位更低，而且生活处境也更差。）于是，为了生存，她们只好随母

①《秦淮画舫录》。　②《续板桥杂记》。

为妓，在酒楼歌馆出卖声色。如南京妓女周四，年逾三十，风韵犹存，善弹琵琶，名著青溪桃叶间。她不仅自己出卖声色，还让自己的两个女儿自幼习伎艺，仅十来岁就开始登台演戏，以赚取缠头。①

4.除籍免贱之后仍自甘污贱重操旧业。从唐至明的官妓，由于获得某种机遇而落籍免贱之后，在法律上虽然获得与良民同等的社会地位，但实际上她们仍然受人贱视，如果不能嫁为人妾，或做妾不久又被逐出，迫于生计，就不得不驾轻就熟又充当私妓。尤其是在清代雍正年间，虽然所有的乐户、蜑户等一律被除籍免贱，但这些为数众多的乐户女子或蜑户女郎，既无谋生的其他技能，又无从事农业劳动的习惯，她们中除了少部分色艺兼优的年轻女子可以嫁给名士富豪为妾以外，大部分女子为了生存，只好自甘污贱，依旧重操旧业，出卖声色。

二、因婚姻不幸而被迫为妓

这类女子大多是带着心灵的创伤而被迫出卖声色的。虽然她们都遭受到了不幸婚姻的打击，但不幸的原因却各有不同，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形。

1.所嫁非人，被丈夫逼迫为娼或卖入青楼。尽管这种情况自元代以降一直为历代法律所禁止，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屡见不鲜。逼妻妾为娼的男人往往是一些懒汉、恶棍或者优伶、龟头，他们把妻妾作为赚钱的工具，逼迫她们以隐蔽或公开的方式卖淫赚钱。如元代上都民户王用逼令妻阿孙和妾彭鸾哥每日在家

①《续板桥杂记》。

中接客觅钱，若收入少，即遭拷打。① 清中叶私妓主宰花坛时，这种现象更为常见。如丹阳良家女子郭心儿，“父早亡，及笄之岁，母惑媒氏言，误字维扬郭某，成婚未几，竟以胁诱，堕入风尘，年十九，移家金陵之桃叶渡，妖冶倾一时。”② 又如扬州王天福之妾黄翠儿和儿媳小玉奴，都被天福夫妇作为赚钱的工具而被迫卖淫为娼。③ 至于那些将妻妾一次性卖入青楼的男人则往往是一些官吏、军将、商人和纨绔子弟，他们先以婚姻的形式娶良家女子为妻妾，玩厌之后又将她们卖入娼家。这种男人实际上与人贩子没有区别，只不过他们是通过利用买卖婚姻的合法方式来达到其既得快乐又赚钱的肮脏目的罢了。当然，卖妻妾入青楼的男子中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形，例如苏州妓女蔡蕙芳就是由于丈夫受人引诱，赌博负债，不得已而被卖入沈家妓院的。④

2．中断婚姻关系之后而被迫为娼。这主要是指那些做童养媳或嫁人做妾的女子，一旦由于某种原因而被休弃之后，有的可能从夫家直接进入妓院，如扬州妓女陆庆儿，本是嘉兴良家女子，初为王三童养媳，长大不为婆婆所容而被直接驱事章台。⑤有的即使允其回娘家居住，但由于她们已失去了贞操而在社会上倍受歧视，如果不能改嫁他人，最终难免堕入青楼。

3．丈夫因故早逝后，不为公婆或大妇（大老婆）所容而被迫为娼。这类女子往往是嫁人做妾（多为老夫少妾），而又无子，丈夫死后，即使自己愿意留居夫家守节，也多为公婆或大

①《元典章》卷四十五。　②《续板桥杂记》。　③《雪鸿小记》。　④《吴门画舫录》。　⑤《雪鸿小记》。

妇所不容。有的走投无路，只好去妓院寄生；有的则是被公婆或大妇卖入青楼；有的即使回居娘家，如不能改嫁他人，最终也可能只好下海为娼。有的女子本是从青楼嫁人为妾的，一旦丈夫逝世，大多难为大妇所容，因而不能不重操旧业。例如，据《潮嘉风月记》载，石姑“曾随伧父，四年而寡，遂返程江理故业”。

4．因与丈夫感情不合，且难于改嫁他人，不得已而寄身青楼。例如据《续板桥杂记》载：“徐二，江阴之青阳镇人，本姓张，乳名银儿，年十七，适同里徐权，田舍郎不解温存，大有骏马驮痴汉之感。权又性耽逸乐，不愿力田。感于匪人，夫妻皆赴吴门，转徙秦淮，作脂粉生活。性情豪迈，不屑效倚门娼，与人较钱帛，非心之所好，即诱以多金，弗顾也。”封建社会的女子一般都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象徐二这样宁肯寄身青楼去选择理想的情人而不甘屈从于笨伯痴汉的女子虽然并不多见，但她的这种举动对于封建婚姻制度无疑是一种莫大的讽刺与批判，因而仍然值得我们加以注意。

三、受人引诱而误堕风尘

这类女子本是良家女子，她们因受别人引诱而误堕风尘的遭遇不外乎如下三种情形：

1．受男子的引诱而先失身，后下海。这类男子往往是相邻的乐工、优伶或荡子，他们利用少女单纯好奇、喜欢诗词、歌舞、易于冲动等心理特点，逐步引诱她们失足，最后为人所知，难于嫁人，只好下海为娼。例如唐代长安私妓福娘，本是解梁

人，就是因为年少时受邻家乐工的引诱而失身，最后被人聘往长安为妓的。①

2．受龟鸨或牙侩的引诱而先习艺卖艺，继而卖身。这类女子往往容貌与身姿都很美，一旦被龟鸨或牙侩发现看中，他们便想方设法（或亲自或托人）去接近和引诱她们，让她们学习歌舞伎艺，许以重金美服，并先以卖艺不卖身为约以打消其心理顾虑。不久之后，她们受环境的影响和刺激，大多也随顺潮流，声色并呈。

3．受同里妓女的影响而结伴下海。这类女子一般都家境贫寒，但内心又羡慕荣华富贵。她们目睹同里妓女乘车坐轿，佩金戴银，也难免心猿意马，跃跃欲试。加之有些妓女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见了同里少女便有意美化青楼生活如何高雅、舒适、快乐，极力怂恿她们去追求那种四季歌舞竞奏、丰衣足食的享乐。于是，同里少女经不住诱惑而置贞操、人格于不顾，成群结队，离乡背井，择繁华城镇，跻身青楼。清中叶南京的苏帮、扬帮，广州的大扬帮、小扬帮，就或多或少带有这种性质。

四、被人掠卖而迫陷平康

这类女子往往是在非正常的情境下被不测之徒连骗带抢，挟离本籍之后而卖入青楼。等到女子明白真相时，已身非己有，无可奈何，最后只好被迫送旧迎新。例如，北宋末年靖康之难

①《北里志》。

中，汴梁女子莘瑶琴随父母一起逃难，途中忽遇乱军冲突而跌了一跤，爬起来时已不见了父母。瑶琴当时仅十二岁，因胆小不敢叫唤，便在道旁古庙中躲了一夜。次日天明偶遇近邻浪荡子卜乔，被他编造谎言骗至杭州，以五十两银子卖入西湖上烟花王九妈家中，过了两年，十四岁的瑶琴已出落得娇艳非常，色艺超群。王九妈要为她请客梳拢，瑶琴执意不从。于是王九妈设计先用酒将瑶琴灌得烂醉如泥，然后让嫖客强奸了她。①由此可见，被人掠卖进入青楼的女子是被迫出卖声色的。清中叶受人掠卖而被迫陷入平康的女子也不乏其例。如据《吴门画舫录》载："郑默琴，字韵梧。少字良家，及笄而父悔之。其人鄙弃不复争，乡里鉴于前车，无问名者。父母相继卒，旋为匪人卖。遂入籍。居恒怏怏，不屑作倚门伎俩，欲择人而事，物色风尘，蹉跎未偶者数年矣。"掠卖者是在郑氏父母相继逝世之后而乘人之危，将她掳往苏州，卖入妓院的。郑默琴虽然被迫做了妓女，但其内心非常痛苦，希望能尽快跳出火坑，嫁为人妻。

从上述种种情形可知，历代私妓在各城镇出卖声色的原因，虽然不是由于官府的直接逼迫，但其中除了少数女子是为了追求声色刺激、衣食享乐而主动下海以外，大多数女子都是为当时社会的某种现实困境所迫，因而仍然带有社会现实逼良为娼的性质。这也是自元代以降历代法律都禁止私妓，而实际上有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清中叶废除了官妓，同时也禁止私妓，私妓却反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这

①冯梦龙《卖油郎独占花魁》。

种情形进一步表明，娼妓决不是一种独立的、偶然的社会现象，而是一系列社会制度和社会矛盾连锁反应中的必然产物。清代统治者幻想不更动社会制度，不铲除滋生娼妓的社会土壤，而仅仅通过法律命令来废娼禁娼，只治末不治本，实际上是不可能彻底解决娼妓问题的。

正由于私妓大多是为现实生活所迫而出卖声色，而不是由于政治的压迫，不是命中注定非终生为娼、世代为娼不可，因而积金赎身、择偶嫁人便成了大部分私妓的理想与归宿。官妓也把从良嫁人作为最高理想与最后归宿，但她们必须先落籍，后嫁人，相对而言，私妓择偶嫁人要容易得多。她们不存在落籍问题，只要经龟鸨同意，交一笔赎身费即可。有些自立门户的私妓去留由己，更为自由。因而，与官妓落籍从良者相比，私妓赎身嫁人的比例要大一些，嫁人时的年龄也小一些，例如，扬州妓女王珑从小就随兄嫂习歌舞伎艺，破瓜之年已色艺兼优，名噪一声。她早就打定主意要誓脱风尘，嫁为人妇，而不愿作势家姬妾。稍后结识吴人王某，虽贫穷却气宇非凡，因而与结夙契，十八岁便决定于归，弃纷华于敝履焉。① 既然私妓赎身嫁人相对来说较为容易，那么选择佳偶则成为实现其理想的重要环节之一。长期送旧迎新的风月生活固然夺去了她们的贞操，损害了她们的人格尊严，使她们遭受了莫大的屈辱与痛苦，但在同时，她们不仅学会了诗词歌舞，增强了文化艺术素养，而且还丰富了自己的情感世界，提高了识别男人的能力，懂得了

① 《雪鸿小记》。

什么是爱情，什么是玩弄。因此她们（尤其是色艺兼优者）一般都不轻率允嫁，宁肯暂且在青楼受屈等待，也要选择一个合意的郎君为偶，以免才跳出火坑，又落入虎口。例如，乾隆间南京妓女张玉秀，眉目轩爽，举止大方，有男子气概，善唱昆曲。及笄之年，与楚省吴公子一见钟情，以身相许，为欢匝月而别，半载之后，吴公子卒于浙东官署，仆从云散，宦橐萧然，旅榇不得归里。玉秀闻之大恸，立出箧中赀，遣人赴浙，扶柩西旋，舟过江关，素服哭临，呼号欲绝。遂于江口招提，广集缁流，礼忏二昼夜，倾赀命其家人伴送至楚，为之营葬而返。此后常泪眦荧荧，隐有“母也天只”之恨。过了几年之后，有同邑名士邹生，年甫三旬，断弦未续，属意于妓，玉秀也倾慕其才，立即赠以所蓄缠头，易金奉母，偕邹生飘然而去。此后夫妇同心，笔耕针黹，唱随相得，堪称嘉偶。①

私妓的归宿之二是转为老鸨，蓄妓营业。这种情形主要是就清中叶私妓而言。清初以前是官妓主宰花坛，私妓本来就没有多大市场，因而由私妓转为老鸨，蓄妓以营业者极为少见。清中叶私妓中凡是有了一点名气的，一般都会做两手准备：一是积累资金和选择佳偶，为赎身嫁人作准备；一是收买雏妓为义女，从小就开始教习歌舞伎艺，为充当老鸨、自立门户做准备。如果有幸遇到如意郎君，结为伉俪，则可将义女留院或出卖。例如南京妓女张玉秀随母为娼时，曾买雏妓凤儿（十三岁）和双福（十一岁）为义女，教以歌舞戏剧。玉秀从良嫁给邹生

①《续板桥杂记》。

为妻时，便将凤儿、双福留给其母，仍作脂粉生活。① 如果久无知音，终于年长色衰，难以择偶，则可自家开业，先以义女支撑门户，打开局面，再逐步扩大营业规模。也有徐娘半老、风韵犹存者，可以一边蓄妓营业，一边自己接客。例如扬州女子郭心儿，因婚姻不幸误堕风尘。十九岁时转徙南京，妖冶倾一时，人们戏以武状元目之，所交好皆达官贵人及文士负盛名者。同时买一雏妓名小姑者，称为义女，言传身教，日有长进。郭心儿至二十六时已自立门户，恰小姑年十七，正为风月妙龄，郭妓一边以小姑招邀裙屐少年，一边自己迎接花丛老手，车马盈门，仍不减当初。②

私妓的归宿之三是年长色衰后改做曲师或退为房老。妓女走红一般不过五六年，最多十几年。欲从良嫁人，应在年轻貌美时，一旦年老色衰，门前冷落鞍马稀，就再也无人问津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置房产，蓄义女，不具备转为老鸨的条件，就只好在青楼中帮衬觅食了。善歌舞伎艺者，尚可改做曲中教师，如嘉庆间老妓胡七，就曾充曲中老教师。③ 伎艺不精者，则只能退为房老，在妓院充当女佣或管领婢女，服事名妓。如据《雪鸿小记》载："爱奴，苏州人，向居金陵，近以年长，退为房老。色犹未衰，举止温和，长于应对，都人士每乐称之。"爱奴是乾隆年间名妓王珑的长嫂，年轻时也曾送旧迎新，颇有艳名。后虽年长色犹未衰就退为房老，也因不能与该家名妓分庭抗礼所致。

---

①②《续板桥杂记》。　　③《秦淮画舫录》。

此外，私妓中因病早夭者有之，殉情自尽者有之，看破红尘、出家为尼为女冠者有之，人老珠黄后乞讨流浪、抛尸路旁者也有之，但因此类情形与官妓没有区别，不拟另作论述。至于那些有丈夫、有家庭儿女的女子出卖声色，无论是受丈夫逼迫，还是自愿为之者，都是以赚钱为最高理想和唯一目的，一旦赚足了钱或赚不到钱之后，就会谢客息业，仍与丈夫儿女一起过日子，一般不存在另找归宿的问题。

6·4 私妓经营活动的主要特征

私妓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官妓的影响而兴起的。因而在本质上与官妓毫无二致，都不过是男人的娱乐工具和男权社会的牺牲品罢了。但私妓的经营活动和心理世界却较为复杂，试加以比较分析。

一、私妓的经营特征

私妓的经营活动与官妓有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经营的性质不同。官妓是由官府直接经营或间接经营，妓女的存在与活动都是合法的，只不过对于她们服务的对象有所限制而已。而私妓则是由私人自发经营的。唐宋时期私妓尚可自由活动，官府听之任之，不加禁止；从元代以降，历代法律都禁止私妓。因而从理论上说，私妓的存在与活动都是非法的。

其次，经营的目的不同。官府直接经营的官妓与地方官妓，

主要是为宫廷与各级政府举行各种礼仪活动服务的，并不是为了赚钱牟利。由官府通过征税来间接管理的市妓，固然可以为政府增加一定的财政收入，但同时也是促进城市经济与文化发展繁荣的一项重要措施。而私妓经营者则是以赚钱牟利为唯一目的，妓女的歌舞伎艺表演，固然也起到了传播文化艺术的作用，但在经营者的心目中，那不过是为适应社会需求所采取的一种手段而已。

第三，经营的秩序不同。官妓隶属乐籍，世代相因，由政府实行宏观控制，分级管理，各级地方政权都设乐营以处官妓，由所在官府直接钤管；各繁华城镇都设歌楼妓馆以处市妓，由政府通过征税来间接管理，这实际上是一种制度化的管理，因而整个官妓系统的经营秩序基本上是稳定有序的。而私妓纯是一种自发的、分散的经营，没有统一的管理，妓女不隶乐籍，自营者去留由己，龟鸨经营者所拥有的妓女队伍虽然稳定一些，但一遇官府施禁往往也星流云散，逃往他城，因而整个私妓的经营秩序基本上呈混乱无序状态。

第四，活动的方式不同，由于官妓受政府控制与管理，是一种合法的存在，因而官妓的活动方式也是公开的。而私妓由于不受官府管辖，其活动方式也因时因地因人不同而有别。概括地说，大致有公开、隐蔽、半公开三种方式。唐宋时期，不禁私妓，她们可以象市妓一样公开活跃于歌楼酒馆。但也有一部分女子只想临时赚点钱应急而仍然顾惜自己的名声，因而便采取隐蔽的方式接客卖淫。元代以降，慑于法令，私妓主要采取半公开方式或隐蔽方式活动。所谓半公开方式，是元明至清初私妓营业活动

的一种主要方式。她们一方面对市民社会开放，公开在大街小巷招邀游客，出卖声色，一方面又千方百计躲避官府的缉查。有的时期或有的城镇，由于法纪整肃、为政严明，私妓只好由半公开方式转为隐蔽方式活动，但一旦法律在哪个时期或哪个城镇失禁，私妓的这种半公开方式就会转变为公开方式。如晚明和清中叶，就有不少城镇的私妓是以公开的方式来活动的。当然，以隐蔽方式卖淫的私妓在元明清三代也始终存在。

二、私妓的基本特征

所谓基本特征，是指私妓的年龄、家庭出身、文艺素养、服务方式等方面的特征。这些基本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私妓的经营特征所决定的。

第一，妓龄特征。与官妓相比，私妓的妓龄（指为妓年岁的累计数，同时也兼指自然年龄的下限）相对要小一些。这主要是由于私妓的人身依附关系比官妓要松弛一些所致。官妓中有较大一部分是乐户女子，出生之后就隶属乐籍，命中注定终身为娼，其中有机会获准脱籍从良者实属凤毛麟角，因而官妓的妓龄一般较大。而私妓中虽然也有一部分是雏妓，但她们长大后从良嫁人的可能性比官妓要大得多。只要她们在为龟鸨赚钱的同时也积攒了一笔可观的私房钱，并且选择到了合意的情人，然后设法征得龟鸨同意，即可赎身嫁人。（当然，凡年轻美貌的妓女，正是赚大钱之妙龄，龟鸨往往不会轻易同意她们赎身嫁人。）因而除开雏妓的训练与准备阶段之外，私妓出卖声色的年龄主要集中在十六岁至二十五岁这十年的黄金岁月之间，

超过三十岁尚未从良嫁人（或转业为鸨）者并不很多，有不少私妓甚至在刚刚走红的二十岁左右就抛弃繁华与艳名而赎身嫁人了，如乾隆末年扬州名妓王珑就是在十八岁时跳出火坑的。

第二，家庭出身。官妓中有一部分没籍为娼的女子实际上出身于官宦贵族之家，还有一部分世代因袭为娼的乐户女子虽然在政治上受贱视，但其家庭经济状况往往都超出社会一般水准之上，有不少乐户甚至接近于贵族的生活水平。这类女子是官妓的基本队伍，她们之所以为妓，都不是由于生活的困窘，而是由于政治的压迫。而私妓几乎都出身于下层人民家庭，主要是市民、农民、渔民和清代雍正年间除籍为良的乐户、蛋户等。她们的家庭大多经济贫困，因而私妓中有较多女子完全是由于生活所迫而下海为娼的。当然私妓中也有一部分是出身于优伶、娼妓之家，其经济状况也超出社会一般水准之上。她们之所以为妓，虽然不是由于家境的窘困所迫，但也是为了求得生存，并过上宽裕一些的生活才出卖声色。

第三，文艺素养。总的来说，私妓的文化与艺术的素质、教养都不如官妓。官妓中出身贵族之家的女子往往都受过较好的文化教养，有的也具有一定的艺术才能；出身乐户之家的女子，从小习诗词歌舞，不仅具有较好的文化艺术素质，而且往往在歌舞弹唱等方面，具有较高的水平。这是出身于贫困之家的私妓所望尘莫及的，但自幼卖入青楼的雏妓，在名妓的带养或龟鸨的训练之下，也可以达到一定水平。如宋代莘瑶琴在王九妈的训导之下，吹弹歌舞，无不尽善，在当时的临安城中被推为花魁娘子。尤其是清中叶废除官妓制度之后，南京、扬州、

苏州、广东等地私妓空前繁盛时期，蓄养雏妓，教吹弹歌舞已成了各青楼培养名妓的重要方式之一，例如：

周四，又称梁四，苏州人。年逾三十，风韵犹存。善弹琵琶，名著青溪、桃叶间。有两女（名大官、二官）貌不甚美，而演剧颇佳，十余龄耳，已识曲中之味。同时小女伶，有周玲（苏州人）、方全（江阴人）、吴双福（名妓张大养女）、汪银儿、胡四喜、秦巧姐（皆苏州人）等，并工院本。而周玲实创厥始，四喜独冠其曹。鉴湖邵子升岩尝语余云："周玲之《寻梦》题曲，四喜之《拾画》叫画，含态腾芳，传神阿堵，能使观者感嫫目心，回肠荡气，虽老伎师，自叹弗如也。"（珠泉居士《续板桥杂记》）

顾阿夷，吴门人。征女子为昆腔，名双清班。延师教之。初居小秦淮客寓，后迁芳药巷。班中喜官《寻梦》一出，即金得辉唱口。玉官为小生，有男相。巧官眉目疏秀，博涉书籍，为纱帽小生，自制官靴，落落大方。小玉为喜官之妹，喜（官）作崔莺莺，小玉辄为红娘；喜（官）作杜丽娘，小玉辄为春香，互相评赏。金官凭人傲物，班中谓之斗虫，而以之演相约相骂，如出鬼斧神工。徐狗儿清拔文雅，羸瘦玉削，饮食甚微，坐戏房如深闺，一出歌台，便居然千金闺秀。三喜为人矜庄，一遇稀姓生客，辄深嘬颊蹙额，故其技不工。顾美为阿夷女，凌猎人物，班中让之，而有离心焉。二官作赵五娘，咬姜呷醋，神理清切，庞喜作老旦，垂头仍雨中鹤。鱼子年十二，作小丑，骨法灵通，

伸缩间各得其任。季玉年十一，云情雨意，小而了了。秀官人物秀整，端正寡情，所作多节烈故事，闲时藏手袖间，徐行若有所观，丰神自不可一世。康官少不慧，涕泪狼藉，而声音清越，教曲不过一度，使其《痴诉》、《点香》，甫吹歇台，满座叹其痴绝。瞽婆顾婕，鬻其女于是班，令其与康官演《痴诉》作瞎子，情状态度最得神，乃知母子气类相感，一经揣摩，便成五行之秀。申官、酉官姊妹作双思凡，黑子作红绡女，六官作李三娘，皆一班之最。……是部女十有八人。（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九）

这些妓女的艺术水平，无疑已达到了那个时代的优秀水准。

第四，服务方式。私妓为男人服务的方式与官妓一样，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以表演伎艺为主，二是呈身献伎的双重服务，三是以卖淫售色为主。不过，二者的比例却大不相同。官妓中第一类占多数，包括官妓的全部、地方官妓的大部分和市妓中的一部分；第二类次之，包括地方官妓中的一部分和市妓中的大部分；第三类又次之，主要指市妓中的末等妓女。而私妓中则是第三类占多数，包括自营妓女的大部分（凡以隐蔽方式自营的妓女全部以卖淫为主）和鸨营妓女中的一部分；第二类居中，主要包括自营妓女中的一部分和鸨营妓女中的大部分；第一类又次之，主要指以某种伎艺闻名的艺伎和女伶，如上述扬州顾阿夷所蓄养的双清班十八名女伶，即属此类。由此可见，私妓中的优秀分子在为男人服务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向官妓学习，在她们身上基本上保留了擅长吹弹歌舞和表演戏剧等伎艺的传统的高雅的

格调，尤其是清中叶的女伶或艺妓，对于当时戏剧花雅二部的争胜和民间伎艺的发展，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与此同时，私妓也把市妓中已有的赚钱为上、唯利是图的倾向加以进一步发展，使妓女的声色活动逐渐把感情因素摒弃出去，而完全蜕变为一种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甚至有些妓女堕落到和龟鸨沆瀣一气，为了贪图钱财而不择手段地对男子进行引诱、腐蚀、敲诈、坑骗、毒害等活动，最突出的情形有以下三种：1.以做假说谎来敲诈男子的钱财。有的妓女本来早已接客，却仍多次冒充处女，请富商豪客出高价梳拢。① 有的妓女盯中某个男人的钱袋之后，假意与他订立婚约，含情脉脉，信誓旦旦，一旦把他的钱骗到手，便逃之夭夭，例如南京妓女金二就是这样贪财负心的女子。② 2.故意制造某种情境，以色相引诱男子堕落，例如明末京师有些私窖子，故意在向路边的屋壁上凿小洞二三，私妓裸居屋中，口吟小词，并作种种淫秽之态，以引诱过往男子出钱买欢，这对少年男子的腐蚀与毒害尤大。③ 清中叶私妓主宰花界时，这种情形更是屡见不鲜。例如，有浙东陈生，游幕海阳，衣食俭朴，从不狎妓，十年后积金近万，因年迈而束装思归。韩江有某妓闻之，事先买通陈生仆人和船上篙师，然后设盛筵请陈生赴舟中饮酒，酒毕辞归时，篙师故意将陈生挤落水中，妓又立即跳入江中将陈生救起，因衣湿只得宿于舟中，当晚终于经不住妓女的诱惑而丧志失守。从此朝朝暮暮，迷恋数年，半生心血所积，尽归妓有，最后死于妓舟中。④ 3.以鸦

①②参见《续板桥杂记》。　③《梅圃余谈》。　④《潮嘉风月记》。

片和赌博来挽留嫖客、谋财害命。鸦片自明代开始从外洋流入中国，在清初开始逐渐成为社会公害，至清中叶则已流行于江南沿海一带繁华城镇的青楼妓馆。如据《潮嘉风月记》说："鸦片烟出外洋诸国，色黑而润，凡游粤者，无不领其旨趣。……近日四民中，惟农夫不尝其味。即仕途中，多有耽此者，至于娼家无不设此以媚客，然嗜好过分，受害亦酷。"《画舫余谈》也说："今之所行鸦片烟，则购外洋土泥，熬制而成。……价值昂贵。嗜之者，谓可助精神，利百病，荧荧一灯，卜昼卜夜，吞吸无厌。历二三年后，耸肩伸领，面若死灰。虽具人形，实登鬼箓。屡奉严禁，买卖均有科条，其实私相授受者，殆终不免。少年子弟，流恋平康，珍如慎邮。姬亦间以媒宾，罔知利害，罟擭陷阱，不待驱而自蹈之，可哀也夫。"至于妓院中设赌局以留客生财，也是清中叶的一种时髦。妓女除了向嫖客索取留髡缠头之外，还可以从赌资中抽利分红。上述三种情形，对近现代妓女的畸变，都发生了恶劣的影响。

三、私妓的心理特征

私妓作为女性和妓女，其心理特征既与一般女性相联系，也与官妓有不少相似之处。但由于各自所面对的客观现实（主要指社会环境、家庭关系、文化素养、人生经历与遭遇、政治地位、经济状况、生活方式等）不同，私妓的心理特征也与一般女性和官妓有不同之处。另外，还由于不同时代以不同方式活动的私妓的生物性因素（主要指年龄、体姿、容貌、喉嗓、气质等）和社会性因素并不是同一的，因而在私妓阵营内部，

其心理倾向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笔者这里只能就一般心理倾向择要加以分析。

第一，贞操观念与自贱心理。

中国古代的贞操观念基本上可以说是专为妇女确立的，尤其是封建礼教被程朱理学进一步强化之后，贞操实际被视为妇女的第二生命。女子一旦失身于人，就意味着第二生命的中断。私妓大多出身于良民家庭，从小都或多或少受过贞操观念的影响，但并未达到宋儒所提倡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高度，而仅仅接近于求生第一，守贞第二的水平。因而大多数私妓都表现为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为失去贞操而内疚痛苦、自卑自贱，一方面为求得生存而送旧迎新、自处污贱。例如，有些女子正是由于失身之后带有一种沉重的负罪心理而自堕风尘，破罐子破摔的；还有一些以隐蔽方式卖淫的女子，也时刻都会被一种负罪感所萦绕，唯恐为人所发而无地自容；至于那些被卖入青楼之后才破身接客的私妓，大多也会为自己的第二生命的中断而痛心疾首。当然，私妓的这种自贱心理（既为求生而自从污贱，又为失贞而自我贱视），在一部分官妓中也存在，不过官妓大多是由于政治压迫而为妓，是命中注定、别无选择的。而私妓中虽然也有大多数人是由于某种现实困境所迫而为妓，但并非命中注定非为妓不可，也是可以另做选择的，例如，为生计所迫者还可以选择做女佣、女仆、或是乞丐谋生。另外，作为官妓主体的乐户女子，由于世代为娼，其贞操观念相对要淡薄一些，她们内心的痛苦虽然也与失去贞操有关，但主要是为受压迫、受贱视的人生命运而悲伤。

第二，忍屈求伸的自救心理

私妓虽然一般都是为求生而自从污贱，但真正自甘污贱的并不很多。正由于她们曾经或多或少受过贞操观念的影响，沦落风尘之后还常常为自己的失贞而痛苦，在她们的内心深处仍然向往良家女子的那种忠贞专一、夫唱妇随的境界；因而她们对于倚门卖笑、送旧迎新的生活有一种厌倦感、耻辱感，但她们并不完全颓废和彻底绝望。恰恰相反，她们大多都有着自己的理想和打算，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解救自己，从而恢复自己的第二生命。当然，她们的这种理想与希望，首先是以她们的年轻貌美、多才多艺作为前提的。而这些前提，既是她们能够吸引嫖客、赚取重金的资本，又是她们能够选取佳偶、获得爱情的条件。因而，寄身青楼，暂处污贱，积金赎身，择偶嫁人，便成为鸨营妓女忍屈求伸、自救自新的一种普通的心理过程和实践过程。至于那些自营妓女（包括以隐蔽方式活动的妓女），所得缠头，除了支付经营过程所需费用以外，赢利部分基本上可归己有，这类女子一般都能够较快地解救各自当时所面临的经济困窘，即使为长远计，再积攒一些资金，也不会延时太久，就可以谢客息粉，洗面自新，重新开始过良家妇女的正常生活。宫妓与地方官妓中也有许多女子渴望从良嫁人，但能否实现这个理想，并不取决于自己的努力，而主要依靠皇帝或地方长官的恩赐，才能落籍从良。因而宫妓与地方官妓的自救意识不强，倒是市妓中有不少人与私妓一样存在有忍屈求伸的自救心理。她们虽然也隶属乐籍，但政府只是通过征税来间接控制，具体经营概由龟鸨负责，妓女欲从良嫁人，只要多

交银子，取得龟鸨同意，即可除籍免贱，因而市妓自救自新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第三，二重角色的心理差异

所谓二重角色，主要是指那些虽身处污贱却并不甘于污贱的女子。她们既是以声色事人的风尘妓女，但又保持了正常女性的心理结构。因而她们不仅在不同的情境中对于不同的事情会表现出不同的心理倾向，而且即使在相同的情境中对于相同的事情也会表现出不同的心理倾向。这些不同的心理倾向，大致可以排列成为两个相对应的系统，这两个系统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就是私妓二重角色的心理差异，它是由于同一女子所充当的两个角色的心理结构不同所决定的，限于篇幅，我们这里只能选择几组带有普遍性的心理倾向加以分析。1.喜悦与悲伤。作为妓女，欢歌笑语是最基本的职业要求，但其中也不排斥有着发自她们内心的喜悦。比如说，当她们的美貌、伎艺和聪明才智受到嫖客的赞美之时，或者当她们收到嫖客的重金馈赠之时，甚至在她们接受嫖客的甜言求爱、款款调情之时，她们往往也会发出由衷的欢笑。但是，当她们各自独处之时，当她们与知心的姊妹谈起各自的身世命运之时，当嫖客以诗词言语触动她们内心的隐忧之时，她们往往又会跌入痛苦与悲伤之中。当二重角色的心理结构交替作用时，就会导致妓女的情绪起伏不定，喜忧无常。2.贪爱钱财与倾慕才貌。由于赚钱牟利是私妓经营活动的唯一目的，因此，见钱眼开、唯利是图便成了私妓的一种普通心理。但事实上这只是她们的一种表层心理，她们在心灵深处，仍然同正常女性一样倾慕男子的才华和英俊，有

时因为爱才惜才，不仅不收钱，甚至出钱资助对方。例如据《续板桥杂记》载：

> 许寿，本郡人。年逾二纪，举止风韵，俨如闺阁中人。有张生某夙与善，生以笔耕为业，而未有家室，岁入悉以遗姬。既而生以失馆，旅居，窘飧不继。姬招致之，日用皆取给于姬，衣履亦姬所制。继复为宛转营谋，得膺某邑侯之聘，馆谷丰美。濒行时，姬置酒祖饯，生恋恋不忍别！姬于酒半，忽抗声谓生曰："青楼中那有情好，所绸缪者钱耳！君留意烟花，罔思自立，浪游数载，如梦如泡。今年已三旬，一误岂容再误！自兹以往，君当绝迹狎邪，亟图嘉耦。妾不能终事君，亦不愿继见君，此后君勿复来，亦无复以妾为念也。"言已歔欷，泣下如雨。生大感动，即振策去。

从许寿的行为和言语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她的表层心理与深层心理之间的差异。当张生有钱时，她照收不辞，并且自己也承认："青楼中那有情好，所绸缪者钱耳。"但当张生落拓时，她又为之惋惜，不仅将他招入妓馆，供给衣食日用之需，而且为他宛转谋得新职，临行时还劝他往后"当绝迹狎邪，亟图嘉耦"。3．虚情假意与真情实感。出于职业需要，为了赚取缠头，她们不得不经常向嫖客献媚献身，甚至山盟海誓，但实际上却很少有感情的投入，因而社会上也普遍认为"婊子无情"。当然，妓女的这种虚情假意仍然只是她们的表层心理，在她们的心灵深处，仍然象正常女性一样珍藏着真情实感，不过，在

一般情况下不会轻易表现出来。一旦遇到知音君子或理想的情人，她们就会热烈地将全部感情献给对方，甚至于执着专一，生死以之。例如南京妓女于三与秋崖真心相爱有年，后来秋崖得了重病，僮仆皆散去，“姬独肩舆往来，自辰迄亥，一切污亵之役，靡不躬亲尽瘁，秋崖终不起，殡之日，姬恸哭失声，尽典钗珥，资其丧事”。又如侯双龄与施郎情投意合，誓订鸳鸯之盟，但因受到假母间阻破坏，无缘结合，于是双龄与施郎相约服毒，殉情而死。①

第四，羡慕虚荣，及时行乐。

私妓中存在这类心理倾向的也不少。她们中有的是羡慕荣华富贵、追求感官刺激而自甘堕落的，因而无所顾忌，只管纵情享乐。甚至在妓院中还仰慕虚荣，想出风头，喜欢听嫖客的赞美之词，希望能得到文人墨客的赠诗题词，力争能够在《画舫录》一类的书中立传留名。例如据捧花生回忆说，张素云“闻余辑《画舫录》，逢人谘访，展转寄声”，沈金珠“知余将采入《画舫录》，欣欣然意颇自负”。② “《画舫录》成，一时纸贵。诸妓群相诘问，以列名其间为幸。不知余以子京纰缪之游，展平幽忧之疾，抒写信手，轩轾何心？诸姬皆斤斤若是，宁独非余命笔之初意，抑将陷余为薄幸人矣，闻某姬展转购一部去，遍检其名不得，乃至泪下。”③ 至于那些被迫卖入妓院的女子，既有一失身就悲观失望、破罐破摔、及时行乐的；也有最初哭

①于三与侯双龄事均见《秦淮画舫录》上卷。 ②《秦淮画舫录》上卷。 ③《画舫余谭》。

泣痛苦，不久之后就心安理得、习以为常的；还有一些妓女已彻底堕落，淫荡成习，表现出一种不接客便难以忍受的变态心理。

第三编

妓女的复兴与消亡

（近代、现代、当代）

第 七 章

近、现代妓女的复兴与蜕变

7·1 天朝的禁娼与清末的弛娼

古老的中国是在国外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之下和国内农民起义的怒吼声中进入近代社会的。以两次鸦片战争为标志的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和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农民革命暴动，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二者不仅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而且对于中国近代妓女的发展也有着各自不同的重要意义。

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以中国的失败求和及其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而告终。英国侵略者不仅逼迫清廷割让香港，赔偿巨款，而且迫使中国打开门户，首先开放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此例一开，便一发不可收拾，美、法、俄等侵略者也接踵而来，乘机讹诈勒索，攫取特权。从此以后，中国自主权遭到破坏，中国的社会性质也开始由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帝国主义武装侵华的根本目的在于经济掠夺。鸦片战争以

后，随着五口开放，外国资本家纷至沓来，外国商品也不断倾销中国。尤其是英国侵略者，一方面占据香港，设官治理，把它作为侵华基地，一方面率先于1845年在上海设立租界，试图把中国逐渐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紧接着，美、法侵略者又分别于1848和1849年在上海强行划分了租界。后来，租界制度逐步推广到其他口岸城市，从而使东南沿海地区最早出现了一批半殖民地性质的城市。这样一来，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基础遭到了破坏，从而使广大农村的经济和农民的生活面临困境；一方面，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开始从萌芽时期进入原始积累时期，从而促使工商业不断得以发展，城市经济也日趋繁荣。

近代社会经济这两个方面的特点，恰好都有利于妓女的发展。因为娼妓业总是与城市经济同步发展的。近代城市工商业的扩展与繁荣，尤其需要娼妓业的辅助与刺激，而农民的破产又为城市妓院的扩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妓女来源。不过，正当中国妓女进入近代社会不久就开始以这种势头向前发展的时候，广大农民终于忍受不了这种既受资本主义掠夺又受封建主义剥削的困境而揭竿起义，凡起义军所攻占的城镇，娼妓业都受到了暂时性的冲击，尤其是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建立天朝之后所推行的禁娼措施，曾经在一定范围内强行取缔了妓院和彻底消灭了娼妓，这对于近代初年正在扩展的娼妓业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太平天国的禁娼措施同他们的社会理想与妇女政策是一致的。太平天国革命者主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他们所构想的

社会蓝图，就是一个天下一个家、男女平等的大同世界。在革命实践过程中，他们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也基本上做到了男女平等。从政治上说，妇女可以同男人一样参加起义战斗和革命工作，甚至可以出任官职，带兵参政；从经济上说，妇女可以和男子一样分得土地；从婚姻关系上说，天朝废除了买卖婚姻，开始实行一夫一妻制（但中高级官将仍行一夫多妻制）；从妇女的人身束缚上说，天朝不仅禁止蓄养奴婢，而且还发布了“解放缠足令”。既然太平天国从理论到行动都主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那么，取缔妓院、禁止娼妓也就成为势所必然。

关于天朝禁娼的命令，今仅见于国宗提督军务韦俊、石凤魁两人会衔颁布的《诲谕官兵良民人等各宜革除污俗以归正道》一件文告，其第二条云：

> 娼妓最宜禁绝也。男有男行，女有女行。男习士农工商，女习针指中馈。一夫一妇，理之当然。倘有习于邪行，官兵民人私行宿娼，不遵条规，当娼者，合家剿洗。邻右擒送者，有赏。故纵者一体治罪。明知故犯者，斩首不留。①

天朝为了彻底消灭娼妓现象，竟采用斩首重刑来惩处男子宿娼、女子卖淫的行为，甚至还以奖赏的方式来鼓励人们捉拿娼妓，这恐怕是古今中外最严厉的禁娼法令了。因而，在太平天国所

① 转引自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中册《女位考》。

占领的城市内，妓院全部被取缔，娼妓全部被禁绝。这从当时目击者呤唎（英国人）的记叙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 太平天国妇女或结婚成为家庭一员，或入姊妹馆，（许多大城中都设有姊妹馆，由专人管理，）而不准单身妇女有其他生活方式。这条法律是为了禁娼，违者处以死刑。自然这是非常有效的办法，因为在太平天国所有城市中，娼妓是完全绝迹的。①

在太平军所占领的东南各城中，有历来花事最盛、艳名远扬的南京、扬州和苏州（其中苏州被占时间稍迟），天朝禁娼之后，娼妓也完全绝迹。这在中国妓女生活史上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天朝禁娼的迅速与彻底，不仅保证了天朝妇女政策的贯彻实施，而且为历史提供了在一个政权范围内彻底消灭娼妓制度的可能性。

当然，天朝的严令禁娼，并不意味着原有的妓女都被斩首了，那不过是以重刑示儆而已。禁令发布之后，即使原来是妓女，只要不再违禁卖淫，就不会遭到处罚。实际上，当太平军于1853年3月20日占领南京时，秦淮河两岸的妓女为了逃避战祸大多已挟金他逃。她们中有的逃入乡下隐蔽起来，有的逃往扬州、苏州、上海等城市继续浅斟低唱。不过，只隔十来天，太平军又攻占了扬州，于是扬州的新老妓女中有不少人也纷纷

①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十一章，王维周译，《中华书局》1961年版。

逃往苏、沪。1860年6月太平军攻克苏州，汇集在苏州的妓女又大批涌入上海。在此前后不久，杭州、宁波也有不少妓女赴沪。与此同时，东南各省也有相当数量的地主富绅挟金逃沪避难，从而使外来的妓女同男人之间结成了相应的供需关系。当然，无论是妓女，还是地主富绅，进入上海后都是集中在租界内寄生。这就使上海租界在太平天国期间乘机得以飞速发展。至1864年（洪秀全逝世，天京陷落）左右，租界人口激增到50万以上，租界妓女也达668家之多。① 尽管上海县城于1853年曾一度被“小刀会”占领，尽管太平军也曾分别于1860年和1862年进攻上海（二次都以太平军失败而告终），寄居在租界内的华人男女却因“倚洋人为护符”而安之若泰，乐不思蜀，日日觥筹交错，夜夜歌舞竞奏。

正当太平军与清军在长江中下游和天京外围激烈搏斗的时候，英法侵略者在俄国、美国的支持下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逼迫清廷先后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1858）和《北京条约》（1860）。外国列强不仅又强行攫取了派公使常驻北京、沿海通商、内地传教、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特权，而且逼迫中国增开了牛庄（营口）、登州（烟台）、台南、淡水、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和天津等处为通商口岸，甚至还取得了招募中国人出国做工的权利。（此项权利使列强掠卖中国妇女出国做娼妓的非人道行为变为合法。）这就使得列强在政治上对清廷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列强在中国

①参见孙国群《旧上海娼妓秘史》第7页。

的经济掠夺也从五口城市扩展到东南沿海各城市和长江中下游一带。紧接着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仓皇逃往热河的第二年，清廷发生了辛酉政变(1861)，慈禧以“垂帘听政”为名夺取了实际的最高统治权。为了稳定局面，慈禧一方面命令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加紧围剿太平军，一方面公开与帝国主义勾结，借助洋兵来平定内乱。于是，太平天国起义终于在中外反动军事力量的夹攻下失败。从此之后，中国便真正成了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中国妓女的发展，也由于国外资本主义的扶植和国内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纵容而出现了复兴之势。

当曾国藩统湘军于1864年7月攻占天京之后，慈禧立即任命他署两江总督。于是，曾国藩一边派兵围剿太平军的残部，一边着手恢复两江地区(包括江苏、江西、安徽)的经济。为了恢复和发展工商业，迅速繁荣城市经济，曾国藩“效管仲之设女闾”，首先在南京发布弛娼令，并亲自倡设陆、李、刘、韩等六家妓院于清溪一带，允许六家任意增妓，扩大规模。于是六家公开营业，“招四方游女，居以水榭，泛以楼船，灯火箫鼓，震炫一时，遂复承平之盛”。另外，在大行宫钓鱼巷也有妓院开始营业，但因不是曾国藩亲自倡设的，当时便为六家所薄视。有的地方官如江宁太守涂宗瀛对这种变化了的形势反应不够敏感，仍然以嘉庆间修订的《大清律例》为准绳，立即檄文各县严厉禁娼，然后，登门向总督汇报。可是，曾国藩不仅不同意禁娼，而且还感叹秦淮画舫远不如往昔之盛。第二天，曾又亲自约集一群幕僚买棹游览，以为倡导，并命江宁、上元二县令

于河岸设宴，款待涂宗瀛诸人。于是江宁各县也解禁弛娼。“一时士女欢声，商贾麇集，河房榛莽之区，白舫红帘日益繁盛，寓公士著风闻来归，遂大有丰昌气象矣。”① 许豫《白门衰柳附记》中所记的金陵旧妓汤小聪、安月蛾、郑二娘、陆兰英、施文馥和老伎师刘培珊，就是在这时分别从上海、本乡或其他城镇回到南京的。《白门新柳记》以及《白门新柳补记》中所记的几十个名妓，则大多是南京弛禁之后下海为娼的。对咸同间南京妓女的这种禁而绝迹、弛而复盛的历史变迁，有人写诗感叹说：

何顿风流久寂寞，青青无复柳千条。
谁知几劫红羊后，又见春风舞细腰。②

既然总督亲自倡设妓院以兴商业，两江地区各城镇在剿除太平军的余部后，无不从风而靡。素有盛名的苏州与扬州，更是首当其冲。苏州被天朝占据时间不过三年半（1860.6～1863.12）而已，当时妓女大多逃入上海租界，待驻苏巡抚张文达将艳帜一举，她们又纷纷从沪返苏，依旧乘画舫，游虎丘，四季笙歌，不减往年。“扬州为盐务所在，至同治初，虽富商巨贾迥异从前，而征歌选色，习为故常，猎粉渔脂，寖成风气，闾阎老妪，畜养女娃，束足布指，涂妆绾髻，节其饮食，以视其

①参见《清稗类钞》第十一册和许豫《白门衰柳附记》。 ②《白门新柳记题词》，诗作者署名为上海畹香留梦室主人。

肥瘠，教之歌舞弦索之类，以昂其声价。贫家女往投之，谓之养瘦马。”① 在曾国藩的影响下，凡是曾经受到太平军冲击和禁止的城镇卖淫业，（包括两江地区以外的，）大约在同治十年间都恢复了原有规模，有的城镇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因为东南各城市开禁弛娼，上海租界的妓女曾一度有所减少。但由于上海已具备了工商贸易的初步规模，1865年，李鸿章又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过了几年以后，上海逐步成了中国洋务工业的重要基地和中外贸易的商业中心，上海的娼妓业也伴随着工商贸易的发展而振兴。据1871年（同治十年）不完全统计，英租界共有妓院444家，妓女1575人，法租界共有妓院250家，妓女2600人，② 如果还加上美租界和上海县城的妓女，总数可能已达六千人。至于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其他口岸城市如广州、潮州（汕头）、天津、宁波等地，也同上海、南京一样，娼妓业的发展规模基本上与城市工商业的繁荣程度同步相应，互为因果。

以上我们所论述的主要是近代前三十年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各城镇妓女活动的情形。为了准确地把握近代妓女发展的总体趋势，现在我们还有必要回过头去考察一下作为首都北京的情形以及清政府对于娼妓的态度。先看二条材料：

> 嘉道中，六街禁令严，歌郎比户，而平康录事不敢侨居，士大夫亦恐罹不测，少昵妓者。至咸丰初年，有兰

①《清稗类钞》第十一册。　②《旧上海娼妓秘史》第12页。

仙、竹仙、蕙仙，一时名噪都下，朝绅争联镳诣之。金吾令亦少弛矣。（王韬《燕台评春录上》）

道光以前，京师最重像姑（指男优），绝少妓寮，金鱼池等处，特舆隶溷集之地耳。咸丰中，妓风大炽，胭脂、石头等胡同，家悬纱灯，门揭红帖，每过午，香车络绎，游客如云，呼酒送客之声，彻夜震耳。士大夫相习成风，恬不知怪，身败名裂，且有因之褫官者。（《清稗类钞》第十一册）

清中叶严令禁娼，在北京还是有威慑力的，所以，一直到道光以前，京师绝少妓寮，只有金鱼池等处，有少数低级妓女活动。鸦片战争以后，随着社会性质的改变，嘉庆时修订的《大清律例》也越来越不适应日益变动的社会形势，其神圣性也开始动摇；与此同时，京师的商业经济因受外来资本主义的影响（尤其是通商口岸城市的影响）而开始活跃起来，于是京师妓女也伴随商业经济的活跃而逐渐崭露头角。加之当时的统治者已被外侵内乱搞得焦头烂额，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来顾及娼妓问题，以致连一些朝臣缙绅也争相走马章台，及时行乐。在这种情境下，掌管京师治安的长官也于咸丰初年稍弛其禁，继而酿成京师妓风大炽的盛况，王公大臣无不却像姑而拥丽妓，文人士大夫也经常出入于胭脂、石头之间，招妓佐酒赋诗，以显其风流本色。

慈禧执政后，曾于同治年间修订《大清律例》予以颁布，其中虽然仍保留了禁止买良为娼和禁止文武百官宿娼或娶娼的律

文，但却删除了嘉庆间颁布的《大清律例》中关于“京城内外拿获窝娼至开设软棚日月经久之犯”，“照例治罪”的内容，这实际上是默认了妓院存在的合法性。所以后来处治的违禁案例，也多是官吏宿娼娶娼者或买良为娼者，京师的妓院并未因为同治年间《大清律例》的颁布而有所减少，这从同治皇帝载淳“好冶游”的行为中也可以管窥全豹。据王无生《述庵秘录》记载：“（载淳）与贝勒载濂尤善，二人皆好着黑衣，娼寮酒馆及摊肆之有女子者，遍游之。其病实染毒疮，头发尽脱落（言因发疥疮致命者误）。甲戌十二年初五夜，载淳死。”同治帝的早夭，正是由于微服私游京师娼寮而染上花柳病所致。这从反面说明，京师娼寮不仅在同治末年仍然大量存在，而且已蔓延至皇宫周围不远的地区。王韬在《燕台评春录》中所记的数十名妓女大都是咸丰、同治年间的京师名妓，有些人的艳名一直延续到光绪初年。不过，据王韬说，咸、同间“京师三曲多在城外”，只有少数进入城内，例如胡畹芗就居住在宣武门内。当时“都中妓女多皖、齐、燕、代产，莲泾竹西，绝无仅有，至珠江春色，亦于此一见”。①

光绪时代，基本上是北京妓女自由发展时期，但其间也曾受到二次局部禁止和一次战争冲击。第一次禁妓发生在光绪初叶。由于同治末年至光绪初年，京师妓女开始大量从外城向内城转移，尤其是在西城内砖塔胡同、钱串胡同、大院胡同、三道栅栏、小院胡同、玉带胡同一带居多，一时宗戚朝士，趋之若鹜，后

①王韬《燕台评春录》。

为某御史指参，乃尽数驱逐出内城。[①] 第二次禁妓发生在光绪二十五年，也是由于又有大量妓女集居于西城内各胡同，其中有一个胡同名口袋底（在砖塔胡同之南），集居了许多女子，既唱曲又卖淫，闹得沸沸扬扬，颇为出名。当时是载澜任步军统领，闻而禁之，严令不许内城立乐户。[②] 这次禁妓，人们往往称之为“禁止口袋底”，实际上是包括所有的内城妓女。这两次禁妓都是局部的，并非真正禁止，而是规定娼妓只能在外城营业，不能入内城活动。因为内城是政治中心和人口稠密地区，妓女的活动会有伤风化。所谓战争冲击，当然是指1900义和团进京和八国联军的侵华。战火弥漫之时，不仅妓女星流云散，即使是皇帝太后也仓皇出逃，市民中也有不少人四出避乱。当然，战乱中留在京城内的妓女也不乏其人，例如曾轰动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名妓赛金花，当时就在北京城内。赛金花由于会说德语，并且认识德军统帅瓦德西，还被德军请去做了许多恢复秩序的工作。[③] 庚子之变后，内城也大开禁令，允许外国娼妓居住。但中国娼妓大多仍居外城，并且由于乱后秩序不好，妓女出门常常被掳，因而不敢出局，直到京师设立警署，实行保卫后，京师妓女的活动才恢复正常。

至于同光时代其他各繁华城镇都基本上处于弛禁状态，尤其是那些被列强占据的地区（如香港、台湾、辽东半岛、各租界区等）和各通商口岸城市（后来又增开了宜昌、芜湖、温

①据邓之诚《骨董琐记》引《塔西随记》。 ②参见岳麓书社《赛金花本事》第22—23页，第54—55页。 ③《赛金花本事》第31—34页。

州、北海、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妓女一直处于自由发展状态，有的地方政府即使下令禁娼，也往往是有始无终，有禁无止，或是禁此奔彼。例如，沈葆桢禁娼之举正好可以说明这一点：

> 沈文肃公葆桢帅两江时，下令严禁娼妓，曲中诸姬咸风流云散。适扬州太守来见，文肃告以禁娼之政策，且询以扬州曾禁娼否？守对曰："大帅禁娼，而卑府治下之娼愈多。妓女多扬州产，卑府不能不许其回原籍吧。"文肃为之恍然，遂弛其禁。（《清稗类钞》第十一册）

与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近代妓女大多集居于各繁华城镇的商业繁华区开馆营业。但继通商通航之后，水上交通运输业和旅游业也相应得到发展，于是又有不少妓女从陆居改为水居，长年乘坐画舫在港口和航道沿途漂流，她们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水上船工和旅客。如随着潮州、广州口岸的开放，韩江流域的蜑船和珠江流域的画舫比清中叶更盛。试另举钱江画舫为例：

> 钱江画舫，夙著艳名，自杭州之江干，溯流而上，若义桥，若富阳，若严州，若兰溪，若金华，若龙游，若衢州，至常山而上，计程六百里之遥。每处多则数十艘，少或数艘。舟中女校书，或三四人，或一二人。画船之增减，视地方之盛衰。停泊处，如鱼贯，如雁序，粉白黛绿，列

舟而居。每当水面风来，天心月朗，杯盘狼藉，丝竹聒罗，洵足结山水之胜缘，消旅居之客愁。（王韬《淞滨琐话》卷一）

至于那些活跃在城镇范围内或风景名胜区的水上画舫，例如秦淮画舫、扬州画舫、吴门画舫、西湖画舫，则主要是为城区市民和游客服务的，她们的活动仍然保持了亦歌亦弹的传统风格。

此外，妓女的输入与输出，也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后的特有产物。外国妓女的输入，一方面是为居住在中国的外国男人服务，一方面也是为了赚中国人的钱。这类妓女主要来自欧洲和日本，后来也有来自俄国的。她们首先是在各租界区活动，后来（光绪末年）在北京也先后出现过日本娼寮和西欧娼寮。所谓妓女输出，实际上是外国侵略者掠卖中国妇女的一种暴虐行为，尤其是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列强在大批贩运华工出洋的同时也公开掠卖中国妇女出洋为娼。她们大多被卖在列强属地或其他外洋地区，其中尤以南洋为多。例如广州杨氏女就曾经在1886年被卖入红霞地区（离新加坡不远），后又被转买至庇能（英属）。[1] 也有卖入日本的，例如福建秋玉蜻就曾于光绪末年被卖往日本神户为娼。[2]

综上所述，近代妓女虽然曾经在局部地区遭受过禁娼的打击和战争的冲击，但就总体趋势而言，她们基本上是在一个弛禁的政治背景中生活，并且由于受到中外资本主义势力的扶植

①②《清稗类钞》第十一册。

而得以迅速发展。至光绪时代，近代妓女在数量上已经基本上恢复了历史上的兴盛局面，但在质量上却已经发生了蜕变，并带有一定的殖民化色彩。其中以上海妓女最为典型。《海陬冶游续录》中说："沪上一隅之地，靡丽纷华，甲于天下。寰中十有八省，海外一十七国，悉辐辏于此，虽十年之间，两阅兴衰，而踵事增华，日见其盛。花为世界，月作楼台，香车宝马，门外尘生，脆管繁弦，座中春满，征歌斗酒，自夜向晨。由城内而达城外，勾栏益众；易山邱为华屋，平田垅作市廛。斗柄潜移，沧桑屡变，而世道人心其趋愈下。"实际上，"靡丽纷华，甲于天下"还只是表面现象，"倚洋人为护符"，"世道人心其趋愈下"，才是根本实质。

7·2 公娼制度与现代废娼运动

民国时代徐珂说："古有官妓，今无之，然有公娼、私娼之分。纳捐于官中，略如营业税，得公然悬牌，可以出而侑酒，设宴于家者为公，反是则私。"① 实际上，现代公娼同古代官妓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的。首先，现代公娼的法律地位与良民平等，政府并不强制她们为娼。而古代官妓则往往带有政治强制的性质，她们一律隶属乐籍，其法律地位低于良民而近似于奴隶。其次，现代公娼必须照章纳捐，而古代官妓中只有市妓纳捐，历代官妓和唐五代地方官妓不仅不存在纳捐问题，而且

①《清稗类钞》第十一册。

是官给衣粮。至于现代私娼，则与古代私妓大体上差不多。只不过现代私娼一直是被禁止的，而古代私妓在有的朝代却为统治者所默许，可以公开活动。

中国的公娼制度最早是在租界区由洋人来施行的。自1845年11月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同上海道台订立《上海租地章程》之后，上海租界的规模便逐渐扩大。①1854年列强又对原订章程加以修订，并在租界区内组成一个被译为“工部局”的机关，在下设立各个机构办理诸如警务、税务、财务、学务等方面的事情，另外还设立了法院。从此以后，所谓“工部局”实际成为了租界范围内的一个政府机关。这个政府既不是中国设立的，也不是外国派来的，而是根据中国地方官所承认的章程，由住在上海的外国人“民主”选举产生的。凡租界内的一切事务均由“工部局”处理。从1854年开始，上海工部局对租界内的妓院实行登记征税制度，虽然在形式上尚未发放营业执照，但实际上是实行公娼制度。凡是登记过并按章纳税的妓院及其妓女，都是“合法”的，警察对她们予以保护。否则，以私娼论处，禁止营业。恰好就在这之前至以后的十余年间，江浙

①1845年11月，英领事强行在黄埔江以西划定800亩土地为英租界，1848年又扩大到2820亩。同年，美国文惠廉牧师以建立教堂为名，先在虹口地区租地，并以此作为美租界，占地达7856亩。1849年法国也在英租界南面强行划地为法租界，至1863年扩大到1200多亩。1863年，英美租界为便于界内治安管理而合并成为公共租界。从此以后，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为止，上海实际是由英美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三部分组成。英美租界最后扩展到8万亩以上。法租界最后也扩大到2万亩以上。

一带的殷商富户和妓女因受到太平军的冲击而纷纷逃往上海，“工部局”不仅利用妓女的吸引力而迅速建立起十里洋场的经济秩序，而且还通过捐税从妓女身上获得了大量的收入。由此可见，租界的妓女不仅成了殖民主义者掠夺中国经济的工具，而且她们本身也成为了殖民主义者掠夺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说，近、现代上海租界的畸形繁华，正是殖民主义者把数以万计的中国妇女的躯体作为奠基而建立起来的。

当上海娼妓业的发展与租界的扩展和工商业的繁荣并驾齐驱的时候，花柳病也逐渐开始在妓女和嫖客之间蔓延。针对这种情况，“工部局”一方面从中划出一批妓院专接洋人，以确保洋人狎妓的安全；一方面迅速着手建立性病医院（1877），对中下等妓女实行定期检查，以求尽量减少性病的传染源。

毫无疑义，上海公娼制度的实行，不仅有利于殖民主义者稳定秩序和大发横财，而且对于妓女本身的发展也起到了保护和促进作用。因此，从1854年起，直至1920年以前，上海娼妓业的发展，除太平军失败后曾一度有过跌落或停滞以外，一直呈上升趋势。尤其是1894年中日战争以后，随着上海工业化速度的加快，江浙一带的农村少妇少女们为生计所迫纷纷结伴进入上海找工作，人贩子也乘机以招工为名大肆贩卖女子入沪。而实际上她们中只有一部分幸运者为纺织厂、卷烟厂等单位所录用，还有一部分人或者当保姆、女佣，或者是入青楼觅食。从而使上海的妓女总数又急剧增长。据1915年《中华新报》的不完全调查，当年上海有明娼暗妓9791人。邹依仁在《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一书中进行了统计，1915年上海平均每十几个

青壮年妇女中，就有一个娼妓。

1918年上海《大陆报》倡论禁娼，租界内外一时间舆论大哗。于是，“工部局”不得不组织了一个“淫业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娼妓现状和拟定废娼措施。1920年3月公布调查结果，上海（不含华界及虹口）各类娼妓总数已达60141人，①并同时提出废娼方案。经纳捐西人会议讨论通过。决定自1920起至1924年止，分五年一律禁绝。“其入手办法，先期迫令各妓院捐领执照，无照者不得营业。（中西各妓院一律，华妓不分等级）再定期假南京路议事厅当众摇珠，珠上分注执照门牌号码，摇去者勒令禁止营业。”②会后，工部局立即发了一份公报，公布了“妓院领照章程”，共十五款，兹录如下：

1.一家妓院，不可转移又一家。

2.领照者即开设妓院之人，彼当负责，依法经营。

3.未经工部局之许可，院主不可分租或抛弃其所经营之妓院。

4.执照之号数牌子，应置妓院当路显明处，始终不可任其污毁，而执照则悬诸院内。

5.上差巡捕及卫生处所与捐税处人，得随时入院查验。

6.院中妓女姓名、年岁、国籍，应一一在执照空白处填写。如有更动，宜即报告河南路捕房总巡。

7.院内不许卖易于醉人之酒。

①郭箴一《中国妇女问题》。　②魏子翁《上海六十年花界史·庚编》，时新书局1922年版。

8.院内不许有不正当行为或赌博。

9.院内不许吸鸦片，如有吸烟人入院，应由领照人报告捕房。

10.院内不许使用吗啡，或不正当之药物。

11.妓女不许在道路或公共处所或在院门首与窗口招徕游人。

12.13.14.（略）

15.如有违背上列任何一款，其处罚为取消或吊回执照，或将保证金之全部或一分充公。

在这份“领照章程”之后，工部局还发了一份附告。其中规定，凡在1919年12月31日已成立之妓院，始可领照。一院至多许容十妓，或较少之数。妓院若在学校附近，不可领照。妓女招徕游人有犯法律者，得将执照吊回。凡开妓院者如不领照，当被控诉。为保证章程的施行，每个妓女都要交一笔保证金，以便于工部局对违章妓女进行经济处罚。①

随着领照章程的施行，上海的公娼制度进一步完善，从而更有利于工部局加强对妓女的管理与征税。尽管淫业调查委员会提议捐领执照的初衷是为了便于摇珠废娼，但事实上上海娼妓并未真正废止，反而越来越多。关于1920年以后上海公娼的发展及其废娼的情形，容在下文再论。现在我们有必要先考察一下租界以外中国公娼制度的实施过程。

①魏了翁《上海六十年花界史·庚编》。

清代自雍正皇帝下令废除乐籍制度以后，直至公娼制度建立以前，历朝政府都没有再行乐籍制度。在这一时期产生的许多冶游笔记（例如《秦淮画舫录》、《画舫余谈》、《潮嘉风月记》）中，虽然时时可以看到某妓女入籍、脱籍或隶乐籍之类的记载，但这时的所谓乐籍实际上已不具有唐宋元明时期的含义，而仅仅指某个妓女同某个妓院之间的依附关系。尽管清中叶以来尤其是近代以来，娼妓现象大量存在，历朝政府也没有明文下令征收花捐，这从赛金花的自叙中可以得到证明。赛金花在光绪十三年（1887）正月嫁给洪钧为妾之前，已是苏州的名妓。她后来回忆说："我是只作清倌，应酬条子。苏州那时候也没有花捐。"① 至于租界征收花捐，实际上是殖民主义者进行经济掠夺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既没有报请清政府批准，也没有向清政府交纳花捐收入。不过，清末公娼制度的建立，可能受到过租界的影响。

受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法律学说的影响，1898年以康有为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发动和领导了戊戌变法维新运动。尽管这次运动不久就被慈禧太后镇压下去，但只过了三年，慈禧迫于形势与潮流，居然也于1901年1月下诏变法，宣布实行新政，紧接着进行官制改革和修改法律。1905年设立巡警部，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并将巡警部改为民政部。由中国政府所施行的公娼制度就大约是在设立巡警部或民政部之后开始的。试引两条材料为证：

①刘半农等著《赛金花本事》第7页。

光绪末叶，（京师）捞人勒赎之风甚炽，妓之著名者，每出门，辄被掳，故相戒不敢出局。业此者，北人谓之浑浑，庚子乱，浑浑多戕死。警署立，又实行保卫，各妓衣服丽都，彻夜来往。老妓见之，咸谓别有天地，非复人间也。①

光绪末叶，奉天衙署局所多南人，而江、浙人尤多，于是妓界始有扬州人，继则苏州、杭州名妓亦渐有至者。……至丁未，官厅以各妓散居，不易检查，特于西关外改筑马路，直通铁路，以余资创平康里五巷，建屋百余间，使妓院聚于一处，有私行卖笑者，查出惩之。②

第一条材料提及“警署立，又实行保卫”，当指1905年设立巡警部之后首先在北京施行了公娼制度。第二条材料明言“丁未”年（1907）奉天（辽宁）官厅管理公娼、查惩私娼，则是在1906年11月改巡警部为民政部之后才将公娼制度推行于各省。清末统治者对于娼妓问题的这种态度，在同时或稍后修订的法律中也有所反映。例如，宪政编查馆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八月十八日向慈禧奏请批准的《违警律》第七章就只提到“嗜娼卖奸”为风俗之违警罪，③不提明娼就是肯定了明娼营业的合法性。又如沈家本于宣统元年（1909）向慈禧奏请批准的《核定现行刑律》关于“卖良为娼”的条文，就与《大清律例》的原文有

①《清稗类钞》第十一册第5154页。②《清稗类钞》第十一册，第5158页。③参见《大清法规大全》卷四。

了不同。原《大清律例》中该条目下有这样一段例文："若妇女男子自行起意为娼为优，卖奸者照军民相奸例治罪，宿娼狎优之人处六等罚。"《核定现行刑律》将这一段例文全部删除，并向慈禧解释说："谨按娼优业经弛禁，其自行起意为娼为优一层，出于本人之自愿，无须治罪，应请节删。"① 既然已经实行公娼制度，女子只要是自愿为娼，即使是良家女子，当然也无须治罪。

清末施行的公娼制度，虽然同古代对于市妓的管理形式差不多，但它并不完全是古代乐籍制度的恢复或再现，而主要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文化的输入或引进。在西方，"法国是首先实行近代化的'娼妓检验制度'的国家。在1798年，革命政府公布了一种制度，强迫一切的妓女登记并受体格的检验，有性病的不许营业（接客），并由风化警察送入指定的性病医院就医，没有不就医或出院的自由。这个管理公娼的检验制度，很快地发展到欧洲大陆各国，这个制度于是盛行于十九世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很多的国家"。② 所以法国和英美帝国主义者在向中国输入资本、倾销商品的同时，也把公娼制度首先移植到上海租界。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联军驻天津，忌妓之患梅毒也，设局验之"。③ 可见，他们是走到哪里，就把"娼妓检验制度"搬到哪里，但天津妓女却一时接受不了，往往有人在被检验时"屡绝而苏，深以为耻"。过了几年后，清

①《大清法规大全》第六册第3533—3534页。　②《中外社会问题比较研究》第117页，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2年版。　③《清稗类钞》第十一册第5232页。

廷统治者从西方引进政治法律制度的同时，也把公娼制度一并引入中国。

当然，光绪末年在中国施行公娼制度，也与近代社会的现实处境有关。在内外交困的背景下，清政府既然无力(也无意)禁绝娼妓，又不愿违背雍正皇帝的禁令而重行乐籍制度，便索性解禁弛娼，对娼妓采取放任态度。这就导致了娼妓的自由泛滥和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产生。首先，性病的蔓延危害着国人的素质和健康。尽管中国自明代以来就已有性病流行，但在近代以来性病的危害更为严重，尤其是同治皇帝死于花柳病的惨剧早已深深震动了朝野君臣。其次，妓院成了吸毒、赌博的重要场所，清代统治者屡次严令禁烟（鸦片）、禁赌，却收效甚微。第三，娼妓无节制地向各城镇繁华区和人口稠密区发展，扰乱了社会秩序，有伤风化。第四，赢利颇大的娼妓业助长了买良为娼现象的大量发生，而娼妓的大量增加又会酿成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从而构成恶性循环。从理论上说，清政府施行公娼制度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上述社会问题，至少可以抑制娼妓自由泛滥的无政府状态，更何况政府可以由此而增加一笔花捐收入呢？但此令一行，反而促使全国各中小城镇的娼妓业普遍得以发展，各级地方政府无不仿效北京、上海，纷纷在城镇里划定“风化区”，以征收花捐和刺激城镇经济的发展。于是，从光绪末年至宣统年间，除了早有花名的上海、北京、南京、扬州、苏州、杭州、宁波、广州、潮州、西安、洛阳、开封、天津之外，又出现了一批花事颇盛的中小城镇，例如厦门、福州、营口、奉天、郑州、芜湖、南昌、长沙、重庆、汉口、沙

市、梧州等，甚至兰州与拉萨的娼妓也开始名播海内。①这一时期各城镇的公娼，大多都集中在某一个或某几个区域，栉比而居，挂牌营业，妓院和妓女的等级格局普遍开始形成。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政府和封建制度，但清末所施行的公娼制度却被保留下来，一直延续到解放为止。

民国公娼紧承清末之势，在全国各城镇有秩序地活动。与此同时，也仍然有大量的私娼无秩序地活动。比较起来，民国时期的妓女（包括公娼与私娼）的发展以上海、北京、天津、汉口、广州最盛。试依据《申报年鉴》等有关资料，②将北京历年公娼人数分等级列表如下：

北京公娼人数统计表

年份	妓院家数	妓女人数					说明
		头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合计	
1912	253	635	915	1315	231	3096	
1913	366	721	838	1368	257	3184	
1914	357	744	833	1467	256	3300	
1915	388	760	908	1535	288	3491	

①参见《清稗类钞》第十一册《优伶类》和《娼妓类》。 ②本表以《申报年鉴》统计为主，同时参考了甘布尔《北京娼妓调查》，鲍祖宝《娼妓问题》，郭箴一《中国妇女问题》以及近年出版的《北京封闭妓院纪实》等。

续上表

年份	妓院家数	妓女人数					说明
		头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合计	
1916	391	729	893	1580	298	3500	
1917	460	781	986	1814	308	3889	
1918	406					3880	
1919	377	642	743	1465	280	3130	二月份统计
1928		445	639	2160	349	3593	八月至十二月平均
1929	332	390	503	2130	350	3373	
1930		324	412	1908	362	3003	
1931		295	354	1598	327	2574	一月至六月平均
1949	224					1316	封闭妓院后所收容的妓女人数

从上表可见，自民国元年至五四运动以前，北京公娼呈逐年增长趋势。1928年首都迁往南京，有不少头、二等妓女也相继离京转移至其他城市，因而从1929年起，北京公娼人数逐渐有所减少。北京公娼数量最多的是1917年和1918年，另据甘布尔《北平娼妓调查》，这时北京的私娼大约有七千人。那么，两项相加，总数已将近11000人。与此同时或稍后，其他城镇的妓女人数也急剧增长。例如，根据有关调查，1919年10月以前汉口约有妓女 10500 余人（其中公娼2533人，私娼约 8000

人)；① 1920年3月以前，上海（不含华界与虹口）共有公娼6万余人，② 1926年广州有妓女约4000人（其中公娼1362人，私娼约2600余人），③ 甘布尔曾经将1919年北京、上海公娼与居民的比例同世界几大名城做了一个比较：④

城　市	公娼与居民总数比例
伦　敦	1：906（即906名居民有一名公娼）
柏　林	1：582
巴　黎	1：481
芝加哥	1：437
名古屋	1：314
东　京	1：277
北　京	1：258
上　海	1：137

这个比较一目了然，中国北京、上海的公娼人数密度居世界之首。如果把私娼也计算进去，仅以当时北京而言，则每81名居民或每21名女性中间就有娼妓1人，⑤这个比例真正令人吃惊和痛心了。

恰好就在这时，中国爆发了新文化启蒙运动，人们在反帝反封建、要求人的解放（尤其是妇女的解放）的同时，掀起了

①郭箴一《中国妇女问题》第130页。 ②郭箴一《中国妇女问题》第123页。 ③郭箴一《中国妇女问题》第129页。 ④鲍祖宝《娼妓问题》第三章。 ⑤郭箴一《中国妇女问题》133页。

一个轰轰烈烈的废娼运动。这次运动是一次有理论准备、有舆论声势、有组织、有行动的运动，它作为现代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内容，不仅为各妇女组织、团体所倡导呼号，而且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这个运动的最终目标是要废除娼妓制度和消灭娼妓现象，但对于废娼的具体办法和步骤却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尤其是关于如何解决公娼问题成了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多数人认为，从人权角度而言，必须立即废除娼妓制度，禁绝一切娼妓。另一部分则认为，禁止公娼的结果只能使公娼变为私娼，从而导致娼妓的泛滥和性病的蔓延；因而实行禁娼，不如暂时保留公娼制度，由政府加以控制，并施行卫生检查制度。主张禁娼的人又认为各城市公娼众多，检查都是走过场，况且只检查娼妓，不检查嫖客也不平等。这两种意见甚至还被拿到南京政府去辩论，但最终并无定论。

实际上早在民国初年的妇女运动中就已经开始了对于公娼制度的批判，不过那时并未提出废除公娼制度，而是主张改良公娼制度。1912年4月8日，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南京开会，一致通过了九项决议，其中有一项就是关于公娼制度之改良。[①] 1916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第5号上发表了具有宣言性质的《一九一六年》一文，号召中国女子“勿自居被征服地位”、“勿为他人之附属品”。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又成为一种极大鼓舞。自此以后，反对妇女卖淫和男子嫖娼的呼声此起彼伏，有的报刊杂志还特地开辟专栏讨论妇女解放和废娼问题。1918年上海《大陆报》发表了一篇痛论娼妓性

①谈社英《中国妇女运动通史》1936年版第57页。

病传染情形、主张禁闭妓院的论文，在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与此同时，许多报刊杂志也纷纷载文揭露娼妓制度的种种罪恶与危害。1919年4月27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废娼问题》一文，他认为“到了今日，人类社会还有娼妓存在，国家法律上仍然认许公娼，真是可痛可耻的事情！”因而他提出五大理由，坚决主张废娼，并且提出废娼的办法：

> 第一，禁止人身买卖；第二，把现在的娼妓户口调查清楚，不许再行增添；第三，拿公款建立极大的感化院，专收退出娼寮的妓女，在院经一定的时期教他们点工艺和人生必需的知识，然后为他择配；第四，实行女子强迫教育，入公立学校概不收费。其实这都还是些治标的办法，根本解决的办法，还是非把这个社会现象背后连着一部分妇女不去卖淫不能生活的社会组织根本改造不可。

李大钊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现代废娼运动的一篇纲领性文献，它不仅在当时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于解放后彻底解决娼妓问题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1920年8月5日李三无在《妇女杂志》上发表《废娼运动管见》一文进一步指出：“社会上所以有娼妓这种阶级，完全是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下面必然的结果”，“那么，要想铲除娼妓阶级，非先从现在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着手实行改造不可”。这种认识是非常深刻的。不过当时人们废娼心切，还是首先把矛头直接对准公娼制度，甚至有些对于娼妓深恶痛绝的人还组成

“废娼会”，为废除娼妓制度而摇旗呐喊。各妇女团体或组织都把废娼作为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22年8月23日，女权运动同盟会在北京成立，她们发表宣言，提出七大纲领，其中明确提出“禁止公娼”。1923年春，四川民权运动女界大同盟成立，她们在请愿书中提出八项要求，其八曰：“提高人格，废娼妓，不准收花捐。”1924年3月8日，由何香凝主持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妇女第一次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上，明确提出了“废除娼妓制度”的口号。1927年5月18日，第二路军政治部妇女运动委员会在上海成立，她们在宣言中提出“改革各种不良恶习如婢妾娼妓等制度。”1928年秋北平特别市妇女协会成立，她们在《工作计划大纲》中明确写道：“关于堕落妇女之宣传，分为两方面：1.堕落妇女宜求解放；2.堕落妇女解放生活的问题。”她们还要求调查部“调查全市妓女的确数”。1928年9月11日，天津特别市妇女协会成立，主张娼妓制度须切实废除。1931年全国妇女代表向国民会议提交了《严厉禁娼案》。①

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全国不少城市都先后采取措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禁娼。1920年12月21日，上海工部局在南京路议事厅举行了首次当众摇珠禁娼，珠上分注执照、门牌号码，凡摇去者勒令停止营业；第一次摇去173家，妓女有500人；1921年12月6日举行第二次摇珠禁娼，又摇去139家，妓女也是500人。这两次摇去的执照号码、路名、里弄名、门牌号码和妓

①参见谈社英《中国妇女运动通史》，妇女共鸣社1936年9月出版。

女姓名都及时被登载在《游戏报》上，使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1]不过，此后再没有举行第三次摇珠，上海工部局原拟从1920年至1924年逐年摇珠，五年禁绝的计划并未兑现。1922年广州也曾倡议禁娼，但直到三十年代初才勉强实施。1928年9月南京禁娼的措施当是民国时期最为严厉的一次。当时南京公娼有三千余人，刘纪文担任市长后立即制订了严厉禁娼的四项措施：一是停止征收捐税，二是命令各妓女从速自行改业，三是将不改业者驱逐出境，四是扩大救济院及平民工厂，以利于做好善后工作。接着，江苏、浙江、安徽等省的各大小城市也纷纷效法南京禁娼，这对于控制现代娼妓的发展，无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仅仅采用局部地区禁娼的办法，仍然只是治标，而不是治本，因而国民党政府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娼妓问题。因为这些公娼的执照被没收以后，大部分妓女并未真正改业，她们或者仍在本市充当私娼，或逃往外地继续倚门卖笑。所以金仲华在三十年代初说："目前我国都市中娼妓的众多，是无可讳言的事实。在实行禁娼的地方，私娼特别众多；在开放娼禁的地方，公私娼一样众多；而除去公私娼外，还有种种变相卖淫和以卖淫为副业的妇女，统计起来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大的数目。例如单就公私娼的数目而言，据最近大约的统计，在上海一埠就在六万以上、十万以下；南京一市就有私娼约三千人；北平公娼约二千人，汉口公娼达一千七百三十五人，而二处的私娼

①魏了翁《上海六十年花界史》庚编《禁闭妓院案始末记》。

还数倍于公娼，其他大小都市，都有一千左右的公私娼妓。”①试以上海禁娼后的情形为例。1920年至1921年公共租界两次播珠之后，这些妓女并未改业，也未离开上海，一部分进入公共租界其他妓院照常营业，“每日傍晚时，以红帖书明某妓姓名，张贴门首，以便问津者按图索骥，至夜深后乃揭去，明日复张帖如故，且若辈皆租有小房子，并非住宿寓中，虽捕房严行查察，终不易得其破绽也”；②还有一部分则逃入法租界，仍然公开做倚门娼。1928年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各大小城市实行禁娼之后，大批妓女也纷纷逃入上海重操旧业。另外，被俄国十月革命冲洗出来的大批“白俄姑娘”先逃往中国东北一带，后来也辗转来到上海卖淫谋生。（据基希《秘密的中国》记载，三十年代初“上海有一万白俄”。不过这里面可能含俄国男子在内。）这就使得三十年代初的上海几乎成了娼妓的世界。“据旧上海的一些记载，30年代上海的公娼、私娼、咖啡馆、游戏场、茶馆女招待、按摩院侍女等变相娼妓，总计有12万人左右”。③1945年日寇投降后，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提出了一个“化私为公，化繁为简，化零为整”的娼妓管理计划，决定在虹口划定“风化区”，把私娼变为公娼，把变相的卖淫场所变为公共合法的妓院，把四散的卖淫活动集中为大规模的“人肉市场”。正因为如此，直到1949年1月上海临近解放时，在大批上等妓院已经随着国民党达官贵人逃沪而解散的情况下，当时营业的妓

①金仲华《妇女问题的各方面》1934年6月开明书店出版。②魏了翁《上海六十年花界史》庚编。③孙国群《旧上海娼妓秘史》第20页。

院仍有800多家，妓女4000多人。① 此外还有变相妓女和私娼万多人。

现代废娼运动收效甚微的事实，证明了李大钊和李三无关于废娼见解的正确性，要彻底废除娼妓制度和消灭娼妓现象，必须先对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具体地说就是要先对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这个历史使命，国民党执政几十年都未能完成；解放以后，共产党执政不久就基本上完成了。

7·3 近、现代妓院的形式类别与经营管理

中国娼妓业在近、现代百余年间的复兴繁荣，不仅表现在妓女的数量之多和活动范围之广已经恢复乃至超过了历史水平，而且还体现在各城镇妓院等级格局、派别的形成和经营管理体制的完善。撇开战争对于娼妓业的冲击与影响不计，前六十余年除局部地区由天朝施行禁娼以外，基本上可以说是私营妓业自由发展与租界公娼制度并行的时代。后四十余年除部分区域在某个时期废除了公娼只有私娼以外，基本上可以说是公娼与私娼并行发展的时代。相对而言，前六十余年由于清政府解禁弛娼，私妓也可以公开活动，因而对于各城镇妓院等级、格局、派别的形成起了奠基的作用；而最早在租界区活动的公娼和后

①杨洁曾、贺宪男《上海娼妓改造史话》第4页。

四十余年的所有公娼，对于各城镇妓院等级、格局、派别的形成和经营管理体制的完善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至于后四十余年为数颇众的私娼，则由于一直遭到禁止，因而她们的经营活动往往以各种特殊的形式来进行。

一、妓院的组合形式与营业方式

各地妓院的组合形式与营业方式不尽相同，主要有如下几种：

1．班子制。这是一种由妓院老板与领家或自混妓女（即所谓自家身体）合伙分成的形式，主要盛行于北京。妓院老板称为“掌班”或“班主”，妓女的主人（龟鸨）称为领家。一般说来，掌班只开妓馆，不自买妓女，凡房屋家具均由“掌班”租赁或购置，另外还雇佣仆役、伙计负责供应膳食和提供一切服务工作。有点近似旅馆的性质，不过只容留妓女住宿罢了。凡妓女之来，谓之搭班，除少数红倌人可以自备家具和另买膳食外，所有妓女的家具和膳食都由班子供应，平时费用由柜上记帐，每隔几日结算一次。故妓女之营业发达者，班子极为捧场；至其生意冷落时，则必遭白眼。搭班妓女大部分为讨人身体，皆由其领家与掌班订约分成，这类妓女没有人身自由，要受掌班与领家的双重剥削，最为可悲。还有一类妓女为自家身体，则可直接与掌班订约分成，处境相对好一些，但需自付花捐和杂税。后来有些掌班自己也买妓女放在妓院，既是老板又是领家，则获利更多。

2．大院制。其特点是规模较大，房屋由老板（由龟鸨自任）

成片成幢租赁，然后分别布置出一间间大小不等的房间，各房家具摆设的优劣程度不一。入院妓女大多为讨人和自混妓女，讨人居住房间必须听从老板的分配，没有人身自由，收入全归老板，称为"断账"。自由身自称伙计，本家称她们为客师，她们可以自选房间，但家具必须自备。所得收入由妓女（客师）和本家（老板）分成，一般为四六开或三七开，称为"拆账"。她们的行动较为自由，只要结清账目，即可离院。另外，还有典押而来的妓女，称为"押账"；包身而来的妓女，称为"包账"；"捆来"的妓女（指本家为之代还债务者）称为"退账"。这类妓院盛行于各地，以上海最为完备。广州谷埠大火(1894)后上岸兴建的"大寨"，也属此类。

3．分院制。即本家拥有房屋设施，但自己只有少数几个讨人，多余房间分租给自由身的妓女，称为包房间。妓女（自家身体）每月按时向本家交付房租、饭金。本家如同旅馆老板，但各包房妓女摆酒，必须用本家厨房的酒菜。其他费用例如花捐杂税概由妓女自付。这种组合方式，有点近似于北京班子中掌班与自混妓女的合作关系。

4．住家制。由自由身妓女自租房屋，自备厨房，自雇佣仆，自立门户。住家房间家俱齐全、精致，装饰考究，摆设高雅。妓女往往是姿色出众者。她们公开挂牌营业，嫖客都是上流社会的巨公或名士，"然不延生客，必有蜂媒蝶使，方许定交。"她们都是自愿为娼，也要上缴花捐和各种税款，自付盈亏。例如赛金花就曾在上海、天津、北京做过住家。还有一些不挂花标的住家，又称住家野鸡，实即私娼，她们采用半公开

的形式卖淫，往往是以家庭兼做妓院。

5．舫艇制。这是一种以舟船为单位的水上妓院，有画舫和大艇之分。画舫的规模要小一些，既可以驾舟游览，又可以傍岸停泊，许多城镇及名胜风景区的河流、湖泊上都可以见到。老板往往就是船主，也可以租船并雇请船工。舟上妓女人数不多，都是讨人或老板的亲生女儿。大艇的规模要大得多，虽然可以移动，但主要停泊在繁华城镇的江边，船上不仅可以供多个嫖客同时留宿，而且可以摆花酒宴客，例如广州的大寨在光绪二十年谷埠失火前就是设在这种大船上。内可分隔三四个厅，供游客宴饮。其中有一种叫做“紫洞艇”的尤为出名，人们往往戏称为“鸳鸯艇”。广西梧州的西江上也有类似的大船和紫洞艇。大艇由老板租赁，也有老板自己就是船主的。妓女多是买断的讨人，有时也有拆账的自由身，当然，在舟上卖淫的妓女也有私娼，如韩江和钱塘江沿岸即随处可见。

以上五种组合形式是近、现代妓院的基本形式。关于妓女的经营方式，我们已相带提及。不过，近、现代极为流行的“出局”，北京称为“出条子”，还有必要补充一下。所谓“出局”，就是妓女应某嫖客之邀而去侍宴佐酒（称为“酒局”）、陪赌（称为“牌局”）、陪看戏（称为“戏局”）。这种形式早在唐代就已流行，不过近、现代以来名目和规矩更为繁多。嫖客或在妓馆或在书寓或在酒馆或在戏园招妓前来，谓之“叫局”（北京谓“叫条子”）。“叫局”时一般要先填写“局票”，然后派人送给妓女本人。妓女出局时，老板往往派大脚娘姨或小大姐“跟局”，名为侍候，实为监视。有的妓女（长三）出局要唱毘曲，

则又有乌师（乐工）相随伴奏。一客叫二妓谓之“双局”，一妓连续收到局票，从甲处直接到乙处，谓之“转局”。出局一般在傍晚时分，夜晚出局称“夜局”，陪客至天明，谓之“天明局”。每局收费因妓女等级不同而价格有别（详见后文）。熟客叫局，钱于年节结算，过路之客则临行时结算。讨人所得局钱要全交老板，自家身体的妓女则与本家平分。上海妓女最初是坐轿出局，光绪末年工部局征收轿捐之后，妓女出局改由男佣肩负而至。有时，一位妓女一天中往往出局多次，因而局钱的收入也相当可观。

此外，还有一些变相妓院和秘密妓院等隐蔽性质的卖淫场所。变相妓院主要是指那些凭借女性的美色和性感来招邀顾客的服务行业或娱乐机构，例如咖啡馆、饭馆、旅社、按摩院、舞厅等。这些女子所得的正式收入微乎其微，只好靠卖淫来补充。秘密妓院除了人数众多的暗娼以自家为妓院或租借房间做妓院以外，上海的台基和广州的半私明也带有这种性质。上海的台基又称为咸肉庄或韩庄，最初是一种秘密卖淫的媒介机构。其特点是台主（老鸨）没有固定的妓女，有嫖客来时，由台主临时去招邀女子。上台基的女子大多是自愿卖淫的良家妇女，甚至是有身份的贵妇人。当然也有为台主引诱而来的少女。台基供男女幽会做爱的房间都分散在各僻静地带，分高档、中档、普通诸等，并雇有女佣管理。由于台主为女子绝对保密，因而有不少良家妇女乐于长期以此为副业，赚点钱贴补家中开销；有些官僚富商的姨太太、少奶奶或富家寡妇上台基，则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需要，对于钱多钱少并不在意，这更有利

于台主从中渔利。后来，台基渐渐演变成半公开的韩庄，并且要向租界当局领照，方能营业。不过，除了少数几个坐庄女是公开的以外，其他临时招邀的女子仍然带有秘密卖淫的性质。广州的半私明（又称半掩门）与上海领照后的韩庄差不多，娼鸨既蓄养一批妓女卖淫，也为那些在家庭内对性生活不满足的巨室妾媵做淫媒，并且为她们绝对保密。

二、妓院的管理与竞争

就公娼性质的妓院而言，主要存在着两种管理：一种是各城市政府当局的宏观管理，一种是各妓院老板、领家的具体管理。而私妓或私娼性质的妓院，则只存在后一种管理。

各城市政府当局对于各妓院的管理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核实和控制妓女人数，二是检查妓院有无违禁行为，三是检查妓女有无性病，四是征收各类捐税。但在实施过程中，政府当局对于前三者的管理并不严格认真，往往是走过场，唯对后者才真正重视，并且管理得严格细致，有条不紊。从政府的角度而言，及时、认真地向各妓院征收种种捐税，无疑可以增加一笔相当可观的财政收入；但与此同时，它对于各妓院等级格局的形成和竞争意识的加强，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不同年代、不同城市乃至于不同妓院的花捐名目与数字并不一致，它主要是由当时执政的各城市政府当局根据该市的具体情况和妓院的等级来决定的。例如清代宣统年间广州就已设立了筵席捐，普通筵席加一收费，如果妓院摆酒，则在此基础上再加收二成花筵捐。也就是说，凡妓院摆酒设筵，便须按价加

三抽捐。① 民国时代广州除向各妓院征收花捐以外，还附加军捐、市政费、清濠费、教育费、工艺费等。妓女所得的实数，仅为其收入全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上下。北京花捐的名目更多，由妓院交纳的有乐户执照捐、乐户捐、贫民捐等，由妓女交纳的有妓女上捐、照费、妓女牌纸费、妓女月捐、妓女卫生检验所医费等。征收捐费的工作由警察厅具体负责。据有关资料记载，北平每月可收花捐10967元，汉口每月可收得花捐13950元。② 上海公共租界的花捐收入更加可观，例如，1939年和1940年妓院税收就分别为68865元和77092元。③ 由此可见，妓院税捐实际上成为了各城市政府当局的重要财源之一。据郭箴一说："妓院纳捐，以等级而定，妓院等级之升降，亦以纳税之多寡为标准。"④ 这就使得各城镇妓院都形成了比较鲜明的等级色彩，各妓院所处的等级又会相应影响到各自吸引嫖客层次的高低和营业收费的多少，因而在妓院与妓院之间不能不展开竞争。

当然，政府当局对妓院的管理，毕竟只是一种宏观控制，妓院的具体经营主要由老板或领家来管理。老板为了获得高额利润，一方面将讨人按等级分配优劣房间，以赚取不同层次嫖客的钱；一方面尽量为自由身提供好的服务条件，双方订约分红。这样一来，在一个妓院内部往往也有等级之分，也存在着竞争问题。

当然，无论是某个妓院的等级，还是某个妓女的等级，都

---

①刘国兴《清末以来的广州娼妓》。 ②郭箴一《中国妇女问题·娼妓问题》。 ③参见孙国群《旧上海娼妓秘史》第112页。 ④同②。

不是固定不变的。作为妓女来说，加强文化艺术修养，提高服务质量，扩大知名度，也可以升级，否则便会降级。作为妓院来说，通过改善服务设施、调整妓女队伍、提高妓女素质、扩大社会影响，也可以升级。否则不仅降级，甚至有可能倒闭。于是，妓女与妓女之间，妓院与妓院之间的竞争也非常激烈。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帮派竞争和花榜竞争。

帮派竞争主要是以地方风格特色来吸引和争夺嫖客，许多繁华城镇都存在这种现象。试以上海为例：

> 沪上为烟花渊薮，求艳章台中者，皆非一处之人，以苏帮为上。靓台土艳，芜草皆香，茂苑春浓，名花有种，土著则亦能效吴语，学吴歈。歌清水温，自饶风韵，泖峰山秀，妙擅风流，皆窃附于苏，如大国之有附庸焉。其次则为扬帮。邗上繁华，二分春色，竹西歌吹，十里花光，固夙昔著名焉。其来自金陵者，亦附于其间，不独树一帜也。然细腰纤趾，举体若仙，花貌雪肤，人尽如玉，名更出扬帮之上。至江北，则下于金陵一等矣。又其次曰宁帮。罗四明之奇芬，采十洲之新艳，亦于此中别创一格。湖州一帮，以妆束胜，今（光绪年间）则不复著闻。又其次曰湖北帮，神女解佩，来自汉皋；洛妃赠枕，渡从江浒。其有巴蜀之秀，路远而稀至；豫章之英，境接而独多。所谓江西帮者，不独以色著，兼以艺称能，唱大小曲，擅长各剧，人家有喜庆事，亦招之往。锣鼓喧天，笙箫聒耳，于侑觞中，别开生面焉。凡此十种，溯厥来源，别其流派，

尽于此矣。（王韬《淞滨琐话》卷七）

书场初创时代，书寓中人数无多，故无党派之分。无论苏、常、吴、扬，皆同莅一场。其后人数渐众，不免互相倾轧。初时惟苏、常、吴和扬州两派相竞争，扬州究不能与苏、常、吴为敌。扬州帮派既被排斥，苏、常、吴三帮，日久又各分立门户。其后吴江人中途失败。书寓仅有苏、常两帮。此两帮中，以艺论，常熟人为上，苏州人次之；以色论，苏州人为上，常熟人次之。苏、常两帮，彼此皆旗鼓相当，然常熟帮人数较少，苏州帮人数较众。竞争结果，苏州帮竟全军奏凯矣。相沿至今（民间时期），娼妓遂为苏帮之专利品。（魏了翁《上海六十年花界史》乙编）

从上述二段引文可以想见，近、现代上海不仅妓女帮派之多，而且竞争激烈。竞争的结果是苏帮全军奏凯。苏帮获胜的原因大约有四，一是苏州妓女的吴侬软语在上海居正统地位，二是苏州妓女善昆曲最为时尚所好，三是苏州妓女姿色出众，四是苏州妓女人多势众。王韬列举上海著名的妓帮有十派之多，实际上不止这个数字，例如当时的粤妓（有老举和咸水妹二类）也是别树一帜的，她们讲的是粤语，唱的是粤剧，摆的是粤菜，有鲜明的地方风格特色，因而不仅颇受广东籍嫖客喜欢，而且其他地方的男子也愿意一品广东风味。此外，还有外国妓女也是中国男子猎奇的对象，后来不仅有欧洲妓女，而且有日本妓女、白俄姑娘等。

北京妓女也有南北帮之分，“大抵南帮活跃，而不免浮滑，北帮诚实，而不免固执。南帮仪态万方，酬应周至，若北帮则床第外无技能，偎抱外无酬酢”。天津自光绪时代起，也有南帮、北帮之别，“南帮多扬人，北帮多直隶人”。广州除了本帮之外，还有扬帮等。清末民初，汉口也有苏帮、川帮、湖南帮、江西帮、本帮之别，其中以川帮为巨擘。

帮派之争是集体之争，除妓女的色艺之外，地方特色和人多势众往往是竞争取胜的重要因素。而花榜之争则是个人之争，主要依靠妓女自己的风姿、容貌、伎艺和人缘关系来取胜。近、现代花榜开设最为频繁、竞争最为激烈的当推上海。

上海花榜之争大约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由文人名士主持花榜，品评名妓。采取的方法与明末清初盛行的传统方法大致相同，即品评时仍以诗词或评语题写，着墨于音容笑貌、身姿风采、性情技艺等方面。评选出来的妓女，也仍然以名花名卉或科举功名来命名。这一阶段较为著名的花榜有：1877年丁丑书仙花榜（评出王逸卿等28名名妓），1880年庚辰春季花榜特科，1881年辛巳春季花榜和秋季花榜，1882年壬午春季花榜，1883年癸未秋季花榜和冬季花榜，1888年戊子夏季花榜，1889年己丑书寓花榜和曲中花榜……这时的花榜与明末清初稍有不同的，一是开榜次数频繁，甚至一年之内开两次榜。这就使得妓女中选的可能性大一些，因而对于妓界的刺激与鼓舞更大；二是花榜已有艳榜与艺榜之分，艳榜以美色为主要标准，等于是选美，艺榜则以伎艺为主要标准。为了便于比较，艺榜

中又按伎艺专长分选，所以1889年有书寓花榜和曲中花榜之名称。

第二阶段：从1897年至二十世纪初，由报社主持花榜。具体方法是，每年一二月前登报通告，请赏花诸君投函保荐，然后报社根据荐函多少，参考舆论，确定入选名单。开榜之日，不仅在报上公布，而且请鼓乐送匾报喜。这样一来，报纸因此而销路大开，入选妓女因此而声名鹊起，所在妓院也随之门庭若市，于妓院、于报社皆有利可沾，于妓女则名利双收。最先开此例者，是近代著名文学家李伯元。1896年李伯元在上海创办《游戏报》，为扩大发行量，《游戏报》不仅常常刊载一些风月艳闻，而且于1897年登载《游戏报花榜凡例》而戏开花榜。当年评出艳榜状元王秀兰，榜眼金小宝，探花祝如椿，传胪王者香和艺榜状元张四宝。在《游戏报》的影响之下，其他后起的许多小报也纷纷仿效。例如《笑笑报》、《春江花月报》、《飞报》、《花天日报》、《花世界报》、《娱闲日报》、《闲情报》、《天铎报》、《文娱报》、《写言报》、《国魂报》、《沧海遗珠报》和《采风报》等等。它们迎合市民趣味，或纵谈风月，或开设花榜，闹得沸沸扬扬，甚嚣尘上。1905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之后，上海虽然还连续几年开过花榜，但人们普遍觉得此举已经有点不伦不类，于是至宣统元年（1909），由《采风报》最后开了一次花榜做为小结。随着花榜的泛滥，妓女说情行贿走后门的事也屡见不鲜，因而花榜状元也随之贬值。于是《游戏报》在花榜之外又首创花选，“最脍炙人口者，为四大金刚（林黛玉、陆兰芬、金小宝、张书玉），次则为五经魁、登瀛图等，其

后相继踵行，五雀六燕，争相夸耀”。① 花榜停开之后，花选仍继续举行。

第三阶段：从1917年至1920年，由新世界游艺场和《新世界报》主持花国选举，其方法完全仿效民国选举制度，由嫖客投票选举妓女组成花国各级政府，中央分设正副总统、花务总理，各部（才、貌、品、艺四部）总次长，参政院正副院长及参政等职，各里设都督、花政长等职，每届任期一年，至年末改选。不过选票要卖一元一张，每人所购多少不限。1917年冬举行第一次花国选举，入选任职者二百一十余人，“一时北里诸姬，及走马章台者，咸奔走相告语，目为旷代未有之盛典，冠裳群展，随粉白黛绿连翩而至，极一时之盛”。② 1918年冬如期举行第二次花国选举，官职与规模基本同前。1919年因“五四”运动波及上海，新世界未能如期举行第三次花国选举。由于这种选举不仅可以为嫖客提供捧妓的机会，从而使中选妓女大出风头，而且可以使主办者大发横财，于是英商企妹牛奶糖公司便乘机于1920年春在天韵楼举行香国选举，其官职删繁就简。自正副总统、总理、各部总次长下，仅设护花二十六人，于三月十六日开票。但新世界认为花国选举是自己发明之专利，不容英商侵夺，因而立即追踪而起，举行第三届花国选举，至四月开票，距香国开票仅后一月。一年之中上海花界竟举行两次花选，选举出两个大总统，从而使妓界的竞争达到高潮。同年冬天，工部局迫于舆论压力而实行摇珠废娼，花国选举也就

①②魏丁翁《上海六十年花界史》丁编。

此告一段落。

三、妓院的等级与类别

受中外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近、现代妓院的商业化色彩进一步加深。金钱作为妓院所信奉的唯一上帝，几乎在妓院管理的任何一个环节上都显现出来。我们前文提到的政府当局和老板领家的管理，说到底就是一种以金钱为中心的管理。金钱不仅支配着老板和妓女的一切行动，而且决定着妓院和妓女的等级格局，从而促使近、现代娼妓业形成一种以金钱为准绳的等级制度。它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一是妓院和妓女都依等级缴纳税捐，二是妓院的营业区域和妓女居住的房间也依等级划定，三是妓院和妓女的服务皆以等级确定收费标准，四是妓院的称名也往往带有鲜明的等级色彩。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竞争的调节，各城市妓院的等级格局也日益规范化，即使是那些在帮派竞争中抱成一团的地方派别，最后也不能不受等级标准的切割而将大帮分成小帮，各处一地。例如，宣统末年，汉口“妓院分四等，一等有苏帮、湖南帮、四川帮、本帮之别，居歆生路、三分里、四成里、长怡里、通济里。二等仅有扬帮、湖南帮、本帮之别，皆居南城公所。三等为本帮，居武圣宫、天子巷。客所费之赀，一等，饮博各银币二十圆，侑酒一圆。二等，饮博各钱二十千文，侑酒一千文。三等，饮博各钱十六千文。四等，有湖南帮、本帮之别，皆居沙家巷，开小盘点曲，共钱一千文”。①汉口妓院的这种四级格局，显然是光绪

①《清稗类钞》第十一册第5178页。

末年实施公娼制度以后才得以完善的。

就全国范围而言，各城镇妓院所形成的等级格局以四级格局或三级格局为多。例如北京妓院自光、宣以来就形成了四级格局，长此以往等级分明。头等妓院称为“清吟小班”，也称“一等小班”，主要分布在八大胡同①之内，房屋设施居一流水平，妓女一般能弹善唱，色艺皆佳，嫖客多为上层官绅，富贵名流。二等妓院称为“茶室”，主要分布在朱茅胡同、石头胡同、小李纱帽胡同等处，房屋设施稍逊于清吟小班，妓女年轻，以姿色胜；嫖客多为商人、地主绅士和中下层官员。三等妓院称为“下处”，房屋中等偏下，室内布置简单，妓女年龄稍大，容貌一般，嫖客以店员、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居多。四等妓院称为“小下处”，因其房屋简陋，破瓦寒窑，屋内设有土坑，故又称“窑子”，还因妓女年龄大故又称“老妈堂”，嫖客多为车夫苦力等下层市民。（三等和四等妓院分布区域较广，且有变动，不拟一一介绍。另外关于北京历年头、二、三、四等妓女的具体数字，可参见本章第二节有关表格）。

妓院等级为三级格局的城市也不少，例如天津妓院称为妓窑，大致分三等：头等妓窑称为“小曲班”，相当于北京的“清吟小班”，多为军阀、政客留连之所；二等妓窑称为“坐排班”，

①八大胡同：指陕西巷、石头胡同、小李纱帽胡同、胭脂胡同、百顺胡同、韩家潭、王广福斜街、皮条营等街巷，清末至民初为北京冶游中心。时人有诗曰：“陕西巷里觅温柔，店过穿心向石头。纱帽至今犹姓李，胭脂终古不知愁。皮条营有东西别，百顺名曾大小留。逛罢斜街王广福，韩家潭去听歌喉。”

相当于北京的“茶室”和“下处”，多为上中阶层及各机关高级职员与普通商人等猎艳之处；三等妓窑实与北京的“小下处”差不多，嫖客多为车夫小贩劳苦工人，因而被人们贬称为“狗男女”，意谓妓女接客时不择地，不择偶，随在可合，如狗之奔走道途急急求欢一样。天津妓院收费，又有南班与北班之别；北妓茶叙一元，住局十元，外有小费三五元不等。如打牌吃酒则需四十元。南妓茶叙二元，住局十元，下钱必多，打牌与北妓同。

广州和上海的妓院等级分得更细，且同一等级中有时又有类别之分，且各有规则与特色。但大而别之，也可分为三级或四级。

广州妓院统称为老举寨，（因粤人称妓女为“老举”而得名，）清末民初，“按其气派的豪华或简陋，共分为十级。大别之：最豪华的那一类，称为大寨；其次为半私明（俗称半掩门）；再其次为二四寨，（设花捐后二四寨按收费多寡为标准，分为三级：价格二元六者为一级，一元三为一级，一元以下又另一级；二元六那级只在夜间营业，其余日夜都营业）。打炮寨，（亦为三级：五毫、二毫及半毫，都日夜接客。）以下还有讲古寮等等名称。”① 至民国二十、三十年代，广州妓院的等级区分由繁到简，仅有上乘寨（大寨）、中乘寨（二四寨）和下乘寨（打炮寨）三等之别。不过每等之中又因服务的方式与时间不同而有价格区分，例如，上乘寨有大小局之别，大局即留宿，小局即侑酒，小局每台二元九毛，大局倍之；中乘寨有日夜局，

①刘国兴《清末以来的广州娼妓》。

夜局收夜度资三元五毛，日局每台收一元六毛；下乘寨度日则收六毛或八毛，夜间十一点钟后则为夜局，收夜度资二元二毛。1926年据广州市社会局调查，全市共有公娼性质的妓寨131处（其中有69支妓艇），计有妓女1632名。其中有上乘寨70处，妓女761名；中乘寨45处，妓女486名；下乘寨16处，妓女115名。

上海妓院类别繁多，等级森严，但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四等。头等妓院有书寓、长三等。书寓本来为上海最高档妓院，初创时身价高出长三之上。长三诸妓，呼曰校书；书寓妓则称之为词史，通称先生。凡酒座有校书，则先生离席远坐以示区别。书寓妓女擅长弹唱和说书等伎艺，门首标某某书寓，以示院内为艺妓，只卖艺不卖身。后来受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真正卖艺不卖身的书寓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长三书寓，她们既卖艺也卖身。书寓与长三之间的等级区别也逐渐消失。长三妓院门首大都张贴某某寓，妓女往往是以住家形式自立门户，因为她们出局和留宿的价都是三元（银洋），所以有“长三”之称。不过长三妓女的服务方式还是以出局为主，一般不随意接客留宿。嫖客欲问津于长三妓女，必须经熟人介绍，或者先到书场点戏，依照妓院规矩逐渐讨得妓女的欢心，直到她心甘情愿时才行云雨之情。此外，广东堂子也多属于长三等级。二等妓院有么二、二三，宁波堂子也属于这一等级。“么二者，夜局、酒局、戏局统收二洋，惟加茶钱、装干湿，则收一洋，故曰么二。门前俱以堂名称，楣上既标寸纸，槛内复悬大灯，每家少则一二十人，多亦三四十人”，① 嫖客无须请熟悉人介绍，叩门

① 指迷生《海上冶游备览》卷一。

即可登堂入室。二三者，实与么二差不多，出局陪席侑酒或陪客看戏均为二元，唯夜厢（即过夜钱）为三元。么二和二三妓女多有色无艺，都以接待应酬和卖淫为主，出局为辅。宁波堂子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才出现的，妓女在旅馆租订房间，多以交际花身份活跃于各社交场合，实为私娼。三等妓院统称为野鸡妓院，野鸡一词本是当时上海商业界对于未入行会而营业者的一种贬称。由于三等妓院房屋狭小简陋、破烂寒酸，登门嫖妓者不多，于是人数众多的妓女只好每日到茶肆酒馆和娱乐场所甚至到街头路旁去拉客，因而人们把这类妓院称之为野鸡妓院。客人宿于野鸡妓院，夜厢费为银币一元半至五、六元。若在深夜十二时后，过客稀少，风雪交加，而遇哀鸣求偶者，则一元二角绰有余裕。如果客人短衣褴褛，即不及一元也能成交。另外还有一类住家野鸡，又称私窝子，房屋摆设优于野鸡妓院，嫖客多由熟人介绍，有时妓女也外出物色客人，每夜价格三元。四等妓院有花烟间、钉棚等。花烟间系由鸦片烟馆演变而来，是既供吸毒又供宿娼的场所，顾客多为瘾君子。先吸一灯鸦片烟，过足了烟瘾之后又乘精神亢奋之势与烟女一度春风，俗称打炮。“夜度资银币一元三角，其中之三角，析计之，实开灯二角，下脚一角也。若为日厢，黄昏厢，则各出五角数十文”。① 钉棚妓院多为草棚，室内脏乱昏暗，分布在下层劳动人民居住较集中的棚窝区。妓女都是贫苦妇女，既无伎艺，也无姿色。嫖客多是车夫、苦力等下层市民。“出银币三角，

① 《清稗类钞》第十一册第5169页。

于光天化日之下，即可求欢，俗曰打钉。生涯之盛者，日可十余次。若夜间留宿，所酬较多，然亦不及一元”。① 比较起来，上海三等妓女最多，四等次之。例如1920年春工部局统计的60141名妓女中，头等为1200人，二等仅490人，三等却多达37161名，四等也有21315人。

由以上论述可知，近、现代妓院的等级格局主要是在金钱的作用下形成的。金钱这个罪恶的魔鬼，不仅践踏了无数女子的人格和灵魂，而且还运用其魔力把遍布各地的人肉市场调控得等级森严，秩序井然。

7·4 近、现代妓女生活面面观

相对于官妓时代而言，近、现代百余年间，既是中国妓女在数量规模上得以恢复和扩展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妓女的素质和生活方式发生畸变的时期。这种畸变不仅从妓女生活的各个侧面表现出来，而且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观念密切相关。试择要论述如下：

一、近、现代妓女的基本特点

尽管近、现代私妓和私娼已经与清中叶以前的私妓有所不同，并且所占的比例也大于公娼，但鉴于我们已在第六章详细

① 《清稗类钞》第十一册第5170页。

论述了私妓的特征，因而本节拟以论述公娼为主，私娼与私妓仅兼而论及。

1．家庭出身

北京妓女家庭出身统计表　　（表一）

阶层	家庭出身	人数	百分比
上层	资本家	20	1.9%
	破落官僚地主	32	3%
	富民	14	1.2%
中下层	工人	115	9%
	手工业者	68	5%
	城市贫民	126	10%
	小商贩	150	12%
	自由职业者	14	1.2%
	职员	12	0.8%
	游民	1	26%
	宗教职业者	31	0.08%
	奴隶	336	2.6%
	雇农	4	0.4%
	贫农	197	15%
	中农	95	7%
	不明情况者	50	4%
	总计	1287	100%

我们可以依据北京封闭妓院时的统计数字，① 先做一个定量分析。1949年11月22日，北京224家妓院全部被封闭，一次收容妓女达1268人，稍后又陆续收容了几十人。统计有关数字时，妓女总数为1287人，其中头等130人，二等219人，三等763人，四等134人，另有私娼41人。她们的家庭出身如上表所示：尽管由于北京的解放（1949年2月3日）已有许多妓女离京或息业，因而此表并不能准确地反映近、现代北京妓女的构成比例，但从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出，近、现代妓女的家庭经济状况已与官妓大相径庭。官妓大多数出身于乐户，其次是贵族女子和良民女子，家庭经济状况好的（乐户也属于经济状况好这一类）占相当大的比例，而近、现代妓女中家庭经济状况好的仅占6.1%，90%以上都是出身于中下层家庭，其中农民、奴隶、游民和城市贫民占60%以上。

2．文化艺术修养

官妓中，除了出身贵族家庭的女子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以外，其他一般也并未系统地读过书，但她们的艺术修养都比较好。凡乐户女子和贵族女子几乎人人都有一技之长，良民女子中也有不少具有一定艺术修养，例如唐代张好好就是以善歌而被杜牧看中才被编入乐籍的。官妓中即使有些女子不识字，但几乎人人都能背诵和歌唱一些著名的诗词、散曲或戏曲唱段。而近、现代妓女中大多为文盲艺盲，例如在北京收容的1287名妓女中，文盲为1037人，占80%；初中3人，占1%；其他247

①凡关于北京封闭妓院时的统计数字和有关情况，均引自《北京封闭妓院纪实》一书（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7月出版），以下恕不一一注明。

人，占19%。如果把私娼也统计在一起，文盲的比例还会升高。从艺术素养来说，近、现代妓女中，仅有女伶和一部分头等妓女（例如北京的清吟小班，上海的书寓、长三）擅一技之长，大多数妓女既不能歌，也不能弹，甚至不懂艺术为何物。这是近、现代妓女蜕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3．年龄与妓龄

北京妇女生产教养院曾对妓女的年龄和妓龄分别做过统计，可以作为我们分析近、现代妓女生活情况的可靠依据。另外，上海妇女教养所对她们先后收容的7513名妓女所做的初为娼时的年龄统计，① 也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依据。特摘引如下：

北京妓女年龄统计表　　（表二）

年　龄	少　年	青　年	壮　年	老　年	总　计
人　数	105	776	399	7	1287
百分比	8%	60%	31%	1%	100%

北京妓女妓龄统计表　　（表三）

年　限	2年以下	2—3	4—5	6—10	11—15	15年以上	总计
人　数	315	237	285	363	72	15	1287
百分比	25%	18.4%	22%	28%	5.6%	1%	100%

① 凡关于上海封闭妓院后的统计数字和有关情况均引自《上海娼妓改造史话》一书，以下恕不一一注明。

上海妓女初为娼时的年龄统计表　　（表四）

年龄	15岁以下	16～20	21～25	26～30	31～35	36～40	41～45	46～50	50岁以上	总计
人数	24	1551	2083	1558	994	553	419	259	72	7513
百分比(%)	0.3	20.7	27.9	20.8	13.2	7.3	5.5	3.4	0.9	100%

把上面三份表综合起来加以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近、现代妓女大部分是十六岁至三十岁之间的青年女子，（北京占60%，上海占69.4%，）这正是女性一生中的黄金时代。近、现代妓女主要以色相取悦于男子，故公娼中以青年为多。北京妓女的妓龄在五年以下的占65%，在十年以下的占93%，这两个比例恰好说明了妓女大多是在青年时代下海卖淫的。其次，三十一岁至四十五岁之间的壮年妇女为娼者也占较大比例，（北京占31%，上海占26%，）这些女子已徐娘半老，又无伎艺，当主要是在三四等妓院中供下层市民疗饥。再次，近、现代十五岁以下的雏妓并不很多，（北京占 8 %，上海仅占0.3%，）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妓院老板大多为租房开馆，为讲求经济效益，一般不愿分拨房间抚育培养雏妓，而是从蓄养雏妓的退休妈姐或人贩子手中去买十五六岁的少女，买进来不久就可以请客梳拢。二是社会舆论谴责妓院蓄雏妓，例如上海自徐瑞卿开创以雏妓出局侑酒的先例之后，有许多人也纷纷效尤，但至光绪末

年，“济良所商之于中西官，禁十五岁以下之妓应客，上海雏妓遂绝迹矣”。① 三是由于解放初北京、上海公安局都曾颁布过管理妓院的暂行规定，对于未成年妓女接客的现象已经加以控制。而古代官妓中除少数有幸落籍免贱者妓龄稍短一些以外，大多是终身为娼，世代为娼，从小到老，妓龄颇长。近、现代妓女年龄集中在十六岁至三十岁和妓龄不长的特点，主要是由人肉市场的供需关系所决定的，妓女年长色衰，无人问津，便只好息粉改业。

二、近、现代妓女卖淫的原因

（一）客观原因

1．政府当局的弛禁与纵容

由于近代以来清政府的解禁弛娼，使娼妓的活动公开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娼妓的发展。而首先在租界施行，后来在全国推行的公娼制度，使娼妓的活动合法化，实际上为娼妓的疯狂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代废娼运动虽然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但并未抑止娼妓恶性泛滥的趋势，不少城市的禁娼，仅仅是把公娼变成了私娼，或者是把公娼从甲地赶到了乙地。

2．中外资本主义势力的扶植与利用

随着口岸通商，门户开放，资本主义经济最先在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各城市发展，中外资本主义势力，为了发展和扩

①据《上海六十年花界史》乙编引《我佛山人笔记》。

大城市工商业经济，往往利用中国妇女的肉体来开路，例如上海租界十里洋场的繁荣，就是以数万名妓女的身体作为奠基的。遍布各口岸城市的租界，无一不是藏污纳垢的场所，例如后来在天津强占租界的，有九国之多，其中妓风最盛的是日租界和法租界。1936年日租界妓院达200余家，公娼达千人以上，仅花捐收入一年就达25392元。1943年，法租界妓女达2667人。① 甚至中国的地方官僚（例如曾国藩）也往往采用设妓院以兴商业的手段，来发展城市经济。

3．繁华都市男女比例不平衡构成潜在的买淫队伍

近、现代许多城市都在急剧扩展，进入工商业社会的商人、工人绝大部分是男人，这就造成了繁华都市男女比例的不平衡，例如根据1932年1月的调查，② 我国著名的八大城市都存在这种性别的比差。

从表五可以看出，全国当时最繁华的八个都市男女比例都不平衡，少则有九万之差（青岛男性比女性多90842人），多则有三十余万之差（北平男性比女性多329339人，上海男性比女性多317478人，天津男性比女性多311541人）。如此众多的单身男人，或有妻在乡村，或无力结婚，或无偶可配，因而便构成了潜在的买淫队伍，为妓女卖淫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各城镇的三、四等妓女就主要是适应这些单身男人的性欲需要而产生和存在的，这也是近、现代都市愈繁华娼妓愈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

①参见《民国黑社会》第398页。　②引自《中国妇女问题》第121页。

我国都市男女人数比较表　　（表五）

性别 / 都市名	男	女	合计
南京	402,758	275,205	669,963
上海	1,079,150	762,672	1,871,822
北平	882,422	553,083	1,435,505
天津	818,515	506,974	1,325,489
汉口	467,023	311,693	287,716
广州	525,831	384,546	910,377
杭州	316,697	208,548	525,545
青岛	246,909	156,067	402,976

4．下层人民因经济贫困而被迫为娼

这是近、现代娼妓队伍急遽膨胀的根本原因。尤其是广大农民，既要受封建主义的剥削，又要受资本主义的掠夺，因而导致农民不断弃土离乡，流入城市。男子靠苦力谋生，女子只好卖身觅食。若遇灾荒，农村妇女便会组成浩大的队伍陆续进城，她们即使不立即为娼，大多也会因找不到工作而成为游民，最终不得不以卖淫为业。另外，由于卖淫收入高于其他劳动行业的工资收入，因而不仅农村妇女进城后多以此为业，即使城镇贫民女子也有不少人因经济窘困而下海为娼，或者一边做工，

一边以业余方式卖淫。根据有关统计，北京收容的1287名妓女中，有54.1%的女子是由于生活所迫而从小被卖入妓院或自愿进入妓院的。上海第一批收容的501名妓女中，由于生活所迫而被丈夫、父母卖押给妓院或自愿进入妓院的女子占63.9%（被骗被拐卖者不包括在内）。

5，家庭及周围环境的影响

家庭的影响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家庭年长成员中不良行为的影响，包括年长成员（父母、兄嫂、姐姐）中直接从事娼妓业的活动，或性行为放荡，使这些女子从小耳濡目染，见多不怪，一旦她们在生理上发育成熟，便也想一尝禁果，继而下海为娼。二是家庭经济困难或遇到突然事变(比如赌博欠债)，女儿或妻子不得已自愿为娼，或者被父母、丈夫卖给妓院，或典押给妓院，甚至有的女子是被后父母或公婆、丈夫虐待无法生活，只好下海为娼。据有关统计，上海第一批收容的501名妓女中，由于这几类原因而为娼的女子达169人，占33.7%。三是因家难带来不幸，例如父母死亡或失业，丈夫死亡或失业，父母离婚，或者本人婚姻不幸（如离婚）等。据有关统计，上海第一批收容的501名妓女中，属于上述原因而为娼的有204人，占44.5%。

另外，女子受周围环境影响为娼的也不少。所谓周围环境，除家庭外，还包括受亲戚、朋友、邻居、同事的影响，甚至居住在妓院、舞厅附近，也难免受到影响。

6，社会秩序混乱，被不测之徒欺骗拐卖为娼

据有关调查，北京收容的1287名妓女中，有244名是被拐骗

为娼的，占19%。上海妇女教养所于1953年10月曾对1259名妓女为娼原因进行统计，被骗为娼的有221人，占17.5%。

（二）主观原因

1．缺少文化，认识能力低下

关于妓女的文化水平我们已在前文提及，大约有百分之八十的妓女是文盲。因而认识能力低下，难以判断是非善恶，容易受诱惑，受欺骗，那些被拐骗卖入妓院的女子往往都是没有文化的农村女子。有些是因为破产或灾荒而已经进入城市的女子，即使遇到招工的机会，她们往往也因为没有文化而不能胜任，最终只得加入卖淫队伍。

2．受贞操观念的影响，失足后，破罐破摔

有些女子因为某种原因而失去贞操，即使家中及邻里不知，自己也深感自卑，认为自己已不是处女，难以嫁人。若已被家中和邻里知晓，在舆论的谴责下，更加无地自容，因而干脆破罐破摔，自动为娼。一旦下海，就难以改邪归正了。

3．贪图享受，自甘堕落

这类女子为娼，既不是为生活所迫，也不是被人拐骗，而是因为慕虚荣，图享受。有的还因吸毒上瘾，即使有工作，其收入也难以为继，因而自愿下海，自甘堕落。据上海妇女教养所1953年10月对1259名妓女为娼原因所作的统计，自甘堕落者竟达498人，占39.6%，其中有些女子甚至已经淫荡成习，不愿改邪归正。

4．追求性自由

这是受西方性解放、性自由观念影响而在近、现代出现的

一种新现象。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女子自愿到秘密妓院（如上海的台基、广州的半私明）去追求性快乐，性交的对象既可以是自己选定的男子，也可提出标准要求由老鸨物色安排。由于整个活动都是绝对保密的，毫不影响男女的名声，因而有些上流社会的女子也乐意接受老鸨的招邀。她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要求，对于报酬的多少并不在乎，有时遇到理想的男子，即使不给报酬，甚至倒贴钱，她们也乐意相从。还有一种是未嫁的自由女子，年轻漂亮，有一定文化艺术修养，并且稍具薄赀，但她们既不愿嫁人结婚，也不愿公开卖淫，而是自租房屋，和自己满意的男子同居，前客离开本地走了，才接后客，一般不在同一时期内和两个男子发生性关系。这些男人大多是上流社会的熟人，如是生客，则必须经熟人介绍，并且自己觉得满意，才予以接待。从性质上说，她们是住家妓女，但在接客时，她们完全是依据自己的意愿来选择满意的男子，实际上也已带有追求性快乐的性质。

三、近、现代妓女的卖笑生涯

1．服务方式

虽然官妓和公娼都是男人的娱乐工具这一根本性质相同，但在服务方式上，从古代官妓到近现代公娼，却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妓女的服务方式从以表演歌舞伎艺为主，蜕变为以售色卖淫为主；妓女的择客倾向从倾慕才情的高雅格调，蜕变为见钱眼开、唯利是图的势利心理；妓女同服务对象之间的交往从富有诗意的浪漫关系，蜕变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当然，这种蜕变在官妓内部就已开始发生。历代官妓和

唐五代地方官妓，虽然也时有风流佳话传播宇内，但她们并不售色卖淫。至宋元地方官妓和历代市妓，则已经形成了色艺并售的普遍倾向。（当然，早期妓女如齐女闾、汉营妓就已开卖淫之端，但那时尚处于妓女的发生发展时期，妓女制度还不完善，也未延续实施。）同时或稍后的私妓又将市妓的这种倾向加以发展，从而初步形成了以卖淫为主、卖艺为辅的服务格局。近、现代妓女中一部分高级妓女最初也试图保持官妓（艺妓）的传统，例如上海书寓在同光年间尚坚持卖艺不卖身。但后来受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不能不改变旗帜，实行色艺兼售。就整体而言，即使色艺兼售者所占比例也很小。例如1920年春上海工部局公布的统计数字中，头等妓女（长三）为1200人，仅占总数（60141）的2%。北京头等妓女的比例要高一些，但实际上这些头等妓女中也仍有一部分不擅伎艺而仅以姿色、应酬获得艳名。即使略擅伎艺，或能唱昆曲，或善弹琵琶，也不过是以伎艺辅助卖色，与艺妓从事的艺术表演活动已有区别。且不说私娼基本上都是靠卖身赚钱，即以公娼而言，其中至少有90%的妓女是专门从事赤裸裸的卖淫活动（上海专事卖淫者占98%），这就足以说明近、现代妓女的蜕变之巨和可悲之极了。

当然，近现代的女伶（主要有女戏子和女歌手）还是保持了古代官妓（艺妓）的传统。尽管她们中仍有人偶尔以身侍人，或者业余，或者失业后也去出卖色相，但她们主要还是从事艺术表演活动。不过，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和花界妓女的蜕变堕落，近、现代女伶大多已不愿与娼妓为伍，因而逐步从妓女的队伍中分离出来，开始具有了独立的人格，就本书的

体例而言，从事表演艺术活动的女性一直应该是中国妓女史上的主角，那么，毫无疑义，近、现代唯有女伶堪当此称。但由于中国妓女经历了一个从以表演伎艺为主逐步蜕变为以出卖色相为主的过程，尤其是近、现代随着卖淫业的泛滥，妓女这个本指女乐的概念，在这时已经成了卖淫女的代名词；因而笔者在论述近、现代妓女的生活特征时，主要是指以卖淫为主的娼妓的活动，涉及艺妓的活动并且有必要区分时，则改用女伶一词。

2．职业特征

既然近、现代娼妓业是以卖淫为主要服务方式，以赚钱为根本目的，这就使得妓女的卖笑生涯具有两重性，即既有遭受虐待、迫害、侮辱的一面，又有坑骗他人、危害社会的一面。妓女所受的虐待、迫害或侮辱主要来自于龟鸨的剥削压迫和嫖客的摧残蹂躏。凡是讨人身体的妓女，以肉体换来的钱，全部要交给老板，即使嫖客在常价之外另送的钱物也要一一搜走，出局或拉客都有人监视，毫无自由可言。有的生了病或月经期间，甚至怀了孕也仍要接客，否则就要受到迫害。据刘国兴《清末以来的广州娼妓》一文说：

> 对于不听她们摆布的妓女，（包括不愿应客，或钟情某一嫖客，过从过密，不愿与之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以便娼鸨从中榨钱等。）娼鸨所采取的压逼手段，也因人因事的不同，或软或硬，软硬兼施，不一而足。有时用甜言蜜语，以打动妓女的心；有时用禁闭和断绝妓女的饮食供

应相逼迫。同时，指使这些“容嫂”（平时对服侍妓女的女工的通称，为娼鸨的爪牙）从旁婉劝，软硬兼施；有时则以把她们转卖到二四寨（中等妓寨）或转卖下乡作威胁（对于那些年纪已大，不能再作她们的摇钱树的妓女，或那些确实不屈服于他们的威逼利诱的妓女，他们常常会这样做）。最残酷的是对妓女采取“打猫不打人”的毒刑。所谓“打猫不打人”，就是把妓女捆在床上，将一只猫放在她的裤裆内，扎紧裤头及裤管，然后鞭打那只猫，猫受痛在妓女裤裆内挣扎，自然会用利爪在妓女阴部乱抓，使妓女不堪创痛，向娼鸨屈服。这种毒刑，虽使妓女受到重创，但不损及妓女身上易为嫖客发现的肌肤，又不影响这个妓女以后出而应客，可谓极残酷而又极阴毒。至于那些在娼鸨看来，以后仍须利用，既不愿转卖出去，又不便用毒刑的妓女，他们往往假称将她们转卖，实则送到其他大寨“搭灯”。所谓“搭灯”，是原属某一个妓寨的妓女，到另一个妓寨应客的专用名词。这个被自己的娼鸨伪称转卖，送去其他妓寨“搭灯”的妓女，便由所在“搭灯”的妓寨管束，但仍属原来的娼鸨所有。在“搭灯”期间，所得收入由两寨娼鸨按议定的办法分帐。由于被“搭灯”的妓寨内的娼鸨用以压迫妓女的办法不同（往往更残酷），常常可逼使妓女对原娼鸨“回心转意”；加上原来的娼鸨在这段期间，仍不断前来探视妓女，故作关怀或以甜言相诱，使妓女终于屈服，愿意回到原寨听从摆布。

可见妓院真如人间地狱。北京还有领家用烧红的通条钉妓女，以罚跪、捆绑拷打等残酷办法迫妓女就范。1950年1月18日北京召开妓女控诉大会，妓女卢金舫控诉老鸨王张氏（外号母老虎）和老板王玉峰（大帽王）说：

> 她在屋顶上安一个滑车，常常是将姐妹们捆起来吊上去，晕过去再放下来，这样反复吊打。……（我）初次接客，什么也不懂，一点不对就打。……打了再罚跪，直到天明。……有一次未留客，被罚跪四个钟头，不许上厕所，自己忍不住，站起来就去了，回来母老虎就用刀背敲了一顿，又拿烧红的火筷子在腿上烫。……桂花十二岁被大帽王（老板）强奸了，长子宫瘤不给治，病得久了，便死在炕上，但他还说她装死就打了一顿扦面杖，揭开被子看时，人早就死僵了。……老五抽白面，母老虎就把她按在厕所里，叫她喝屎汤，弄得全身胖肿死了。另一个得性病很厉害了，病得奄奄一息时，还被大帽王强奸了一顿，第二天就死了……”

这是妓女亲口说出来的，真正惨不忍闻。那些和老板分成的自由身妓女处境稍好一些，但既要纳捐，也要被老板剥削。

妓女受嫖客的蹂躏、侮辱是司空见惯的。即使头二等妓女也难逃厄运。有的嫖客仗势欺人，无理取闹，骂妓女、砸房间的事也常常发生。三四等妓女每日接客，少者几人，多者几十人，一天到晚，身不由己地供人蹂躏摆布，根本没有快感可言。

尤为不幸的是，一个个良家女子，刚下海为娼没有几天就会从嫖客那儿染上性病。染上性病后仍须继续营业，从而又不断地通过嫖客把性病传染给其他妓女，结果导致大多数妓女都染上一种或几种性病。1930年麦倩曾《北平娼妓调查》说："就注册2725名妓女中，竟有20%是患病的，特别是花柳病，梅毒。"1949年北京收容的妓女中性病患者约在95%以上。1951年11月上海对515名妓女进行检查，患各种性病的有459人，占88.3%。当时妓女的性病种类主要有梅毒、淋病、梅毒型淋病和横痃引起的宫颈糜烂等四种。得了性病的妓女，如不及时医治，继续接客，轻而痛痒肿胀，重则溃烂致残乃至死亡。如上海张菊卿妓院有一名妓女叫王莉莉，她得了梅毒（杨梅疮），下身的肉烂成一个一个小洞，遍体长满了杨梅子，张菊卿和张金芳两人说要给她治病，竟用烧红的铁条把杨梅疮烫焦，再用剪刀剪掉，撒上食盐和明矾，一道烙迹，一声惨叫，一汪鲜血，这个妓女就这样活活地给痛死了。何小妹妓院有名妓女叫何金定，因患梅毒，下身全部腐烂了，连大小便都失去控制，幸亏被上海妇女教养所收容，由医生给她做了一个人工肛门才保住生命。

近、现代妓女是压在社会最底层、苦难最深的阶层，她们不仅深受剥削和压迫，而且忍受了作为一个女人最不堪忍受的凌辱和摧残。作为被害者，她们的命运的确是非常悲惨的了。但更为可悲的是，她们在自己受害的同时，又去害别人。她们最初本来都是纯洁无邪的良家女子，一旦进入妓院这个龌龊的环境以后，由于受到龟鸨的教育和同类的影响，许多人都逐渐养成了虚情假意、弄巧做奸、说谎行骗，甚至掘井坑人、谋财

害命等职业恶习。虽然这些恶习是导源于她们的售色卖奸活动，但对于这些恶习的形成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性”，而是“钱”；促使近、现代妓女蜕变、堕落的，也不是“性”，同样是“钱”。正是为了钱，她们才出卖色相；也正是为了钱，她们才会去坑骗他人，为害社会。当然，她们在坑人骗钱时往往又是以色相作为诱饵和资本的，最为普遍而又最为灵验的方式主要有如下两种：

一是借“定情”来抠银子。某妓女一旦确知某嫖客富有多金，便主动逢迎，先与之“定情”，口头百般恩爱，床上万种风情，把嫖客弄得如痴如醉，难解难分，然后大施“丁娘十索”手段。豪富的嫖客在这时往往是有求必应，挥金如土。于是，妓女今天订戒指，明天选珠宝，大把大把地从嫖客身上抠银子，直到把他的钱袋掏空之后，再慢慢冷淡他，或找个借口摆脱他。“定情”不过是一种解除嫖客警惕的手段，妓女并无真情实感，也不会真正嫁人。

二是以“溷浴”来敲竹杠。所谓“溷浴”，本意是洗澡的意思。清末民初上海四大金刚之一的林黛玉最先称从良为“溷浴”，意谓负债过多，只好择富客而嫁以偿还债务，就正如背了一身污垢，洗个澡就干净了。林黛玉以善于交际和擅长唱戏而著称于花界，她一生由妓而伶，由伶而妓，时而从良，时而下堂，总共下嫁达十七次之多。第一次就是因为欠了债而嫁给纱商黄某为妾。一旦债务还清，她又恣意肆放，不久便离开黄家，重举艳帜。所以魏了翁《上海六十年花界史》说：“盖林之嫁黄也，非为终老计，实因偿负计。妓女溷浴之称，实始于

此也。”林黛玉后来又多次重演故技。例如：

> 己亥（1899）冬，复适南浔邱某为妾，身价八千金。邱之家资，不可胜计，林之嫁也，利其多金。既入门，旦夕私运所有至沪，备下堂计。居未一年，与缝工通，与邱之戚串通。邱风闻一二，诱以食阿芙蓉膏（鸦片）。诟烟癮虽进，淫念未杀，依然不减本相。邱愤而锢之，卒为林勾通守者，遁至海上。所有首饰蓄积，私运至沪，至是坐享所有矣。（魏了翁《上海六十年花界史》丙编《林黛玉事略》）

由此可见，所谓“溷浴”，实际上是一种骗人钱财的假从良。后来这种丑恶行为还有所发展。她们跟老鸨串通一气，遇到富有嫖客之前，即使不欠债，也假意欲从良，求其完“债”赎身。嫁人不久之后，便恣意妄为，大肆挥霍，招蜂惹蝶，不安于室，闹得主人无法管束，只好允其重归北里。甚至有的妓女仅仅以“溷浴”为幌子，等嫖客为之付钱完债赎身之后，突然逃之夭夭，不知去向，使男子落个人财两空的下场。

选择知音君子，从良嫁人为妾，这是古代官妓中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与归宿。然而，近、现代却有许多妓女仅仅把“订情”和从良作为一种骗钱的手段来反复运用，即使嫁为妻妾之后，也要千方百计逃回妓院，重操旧业。这标志着近、现代妓女中的确有不少人从人格到灵魂都彻底堕落了。

3．妓女的觉醒

当然，近、现代妓女中自甘堕落者毕竟只是一部分（据上海有关统计，占39.6%），大部分妓女还是希望跳出苦海，从良嫁人，过正常人的生活。尤其是随着近、现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与发展，青楼中有不少女子也深受启迪和鼓舞。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既不是某个妓女的义举与抗争，也不是某些社会团体或慈善机构（例如全国妇孺救济会，济良所等）对于妓女的救济与帮助，而是她们曾作为一个阶层的自省和自救。她们一方面迫切要求改变那种受虐待、受压迫、受侮辱的生活处境，希望能够获得解放，成为一个个有着独立人格的人；一方面以一个正式公民要求自己，关心国家大事，积极投入爱国运动。

1912年5月，上海由祝如椿发起成立了青楼进化团，其宗旨为“联络同侪，普施教育，作从良之预备，为艺妓之模型”。① 她们认为青楼女子之所以“沉沦黑海”，主要是由于没有文化和不能在经济上自立，因而主张先兴办学校，让妓女学文化，为从良做准备。她们所理解的从良，并不等于嫁人，而是主张经济自立，以艺谋生。开办学校，需要资金，她们立即发动和组织妓女以演戏募捐的方式来筹集。在义演时，她们以歌唱的形式号召妓女：

姊姊妹妹大家来献技，
为今日兮提倡青楼进化计，

①《上海六十年花界史》己编第156页。

愿我姊妹努力进行休自弃，
他日达到完美地，
大家多欢喜。

受到了花界的响应和社会各界的支持。接着她们选举有组织能力的妓女组成理事会（由柳如是、张曼君任正副理事长），然后由理事会负责租赁校舍，聘请教师，终于在当年七月初七日开学，入学妓女共50余名。不过这个学校由于种种原因只办了半年多就停办了。1919年上海又有一个名叫鉴冰的妓女，利用自己的房子创办了一所学校，并由她的哥哥担任教师，“凡年长失学诸妓，及妓院中雏年女子，均可入学肄业。”该校取名鉴冰学校，但也只办了四个月就关闭了。

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花界妓女也组织起来参加了反帝救国的斗争。例如上海青楼进化团在“普施教育”的同时，还积极提倡国货，抵制外货，规定“青楼中人，凡服御一切，禁用舶来品”。1915年袁世凯接受了日本提出的分割中国的“二十一条”之后，全国大哗，各地都纷纷成立了“反日同志会”、“救国储金会”等组织，号召全国人民抗日救国，不少城市的青楼女子也纷纷响应。她们不仅自觉抵制日货，而且拿出卖笑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救国储金。还有不少妓女先后致函各报馆表明心志。例如，上海清和坊沿马路藏春阁寄一函曰：

妾生不辰，侧生曲院，然虽属青楼，终期有家。有家必须有国，故人生当以报国为本。每于歌罢酒后之余，

闻诸客言：有某国要求苛例，实欲制我中华为印度、高丽之第二。妾身虽为妓，亦属国民一分子，听闻之下，殊堪痛心。盖我国不能言战，实乏财耳，幸有爱国志士，倡救国储金之举，妾愧无力追随，愿以每日堂差一半收入，作救国储金。……

有的妓女不仅以“国民一分子”参加储金救国，还主动“向各院姊妹处，广为激劝”。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各大中城市的青楼女子也主动积极地投入到斗争中来。北京、南京、浙江、汉口等地，花界俱停购日货，纳捐充费，作一致行动。上海西福致里有一妓女名妙莲者，出于一种爱国的责任感而印发了《敬告花界同胞书》，分送至各妓院。其文曰：

我们中国到了将亡未亡的时候了。现在所以未亡，全仗一点国民的志气。自外交失败的信息传来，首先由爱国的学生，发起惩警卖国奴，抵制日本货。没见几日，全国各界万众一心，下至小工车夫，亦不肯与日人工作。可见人心不死，正是我国一线生机。惟我青楼一无举动。我本我的良心，想出几条办法，劝告我花界同胞，各本良心尽我国民应尽之天职。（后附办法数条，计有“请花界同胞，不购日本货”；“请花界同胞不可收受日本纸币”；“请花界同胞哀恳各界，一致救护被捕爱国学生”；“请花界同胞，将波兰、朝鲜亡国苦处，择要印在局票后面”；“请花界

同胞将国耻纪念二十一个条件，印在请客票后面”；“请花界同胞量力捐助国民大会，及学生联合会经费”等。）

6月10日，妙莲又同鉴冰、笑意、金书玉等人发起组织青楼救国团。她们发出传单2000张，其中说：“我们花界，斯业虽贱，爱国则一。愿我同胞，抱定宗旨，坚持到底。国贼弗除，学生不放，誓死不休。”后署“青楼救国团泣告”等字样。学生上街游行宣传时，妓女们热情支持学生的行动，还在街上专设学生饮茶休息处。上海罢市时，所有妓院书场罢唱、罢演、罢说书。

江苏海门是一个小城，京沪罢课、罢市消息传来，海门妓女夏蕙卿等四十余人立即召集会议，决定与工商学界采取一致的爱国行动。她们发表《宣言》说：“蕙卿虽粗识之人，亦知大体，自怜薄命，虽系堕溷之花，敢诩热心，忝作高林之木。但时事如此，国势如此，人心之忿激如此，我姊妹其各奋此娉婷之质，期作桴鼓之助。”她们还拟具了爱国办法数条，其中包括自制爱国歌、提倡国货歌、讨卖国贼歌。分头拍唱，以歌代曲等。①

杜牧《泊秦淮》诗曾云“商女不知亡国恨”，近、现代妓女中有不少人在国难临头的时候，不但知亡国恨，而且以“国民一分子”自居，积极投入爱国运动。这不正是妓女觉醒的一

①以上关于五四运动以来花界情形，主要引自《五四爱国史料》第十一章和彭明《五四运动史》第二十章。

种标志吗？

4．妓女的归宿

关于近、现代妓女的归宿问题，我们可以依据彭阿木在《上海卖笑妇》一文中公布的三种结果加以分析：

好结果
- 金满家，为官吏等作妾者。
- 为商人、农夫的妻妾者。
- 买私生子教育之以乐其余生者。

中结果
- 亦为鸨母蓄妓以营业者。
- 与邻里贫困人结婚者。
- 与苦力同居或为车夫之妻者。
- 为女工、佣人、娘姨、阿妈等以度其残年者。
- 回里为人做洗衣、梳头等事者。

恶结果
- 为花烟间、钉棚的营业者。
- 死亡，或苦于毒病生涯者。
- 做乞食者。

上例中得好结果者仅2.5—3%，中结果者为45.5—46%，恶结果者为41.5—42%。可见，娼妓中之有好结果的实在很少很少，百人中只得二三人而已，其余都不免沦入苦海。①

实际上，与官妓相比，近、现代公娼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要松弛一些。除了一部分讨人身体没有自由之外，其他自由身妓女本来是可以早作归计的。但为什么得好结果者仅2.5—3%呢？这既有妓女本身的原因，也与普遍的社会心理有关。

旧社会的男子虽然自己可以经常狎妓宿娼，但很少有人愿

①《中国妇女问题》第135—136页。

意娶妓女为妻。妓女从良时，往往是做妾。所以尽管大都市男女比例不平衡，那些未婚的工人、商人，宁肯去娶一个农村少女为妻，也不愿择城市妓女为偶。而真正有条件娶妓为妾的人，必定是中产阶级以上的男子，所娶之妓也必定是年轻貌美、伎艺超群的女子，这就使得占总数97%以上的三、四等妓女失去了做富贵之家妻妾的可能性。由此可见，近、现代妓女的素质差、层次低，也是导致她们中的大多数只能获得中结果和恶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 八 章

娼妓的取缔与残余

8·1 解放初期大陆娼妓的取缔

如以上有关章节所述，中国自宋元以来开始以法规律令对妓女的活动加以控制，从明清至近、现代都曾实施过不同程度、不同范围、不同方式的禁娼废娼，这说明旧时代的统治者和人民早就或多或少地认识到了娼妓泛滥的危害性，历代这类措施的实行对于当时和后世都曾产生过或大或小的作用与影响。尤其是雍正皇帝从制度上废除了娼妓、太平天国在一个政权范围内彻底禁绝了娼妓和现代以来从理论到行动上对于废娼问题所作的探讨，不仅在中国妓女生活史上有着重要意义，而且为解放初期的彻底禁娼提供了一定的经验与教训。当然，历代实施的禁娼措施，除了天朝是成功的、彻底的以外，（可惜这种无娼社会在旧时代仅仅是昙花一现，马上就随着天朝的失败而消失了，）其他基本上可以说是不彻底的、不成功的。究其原因，固然与统治者的决心不大、实施不力有关，但根本的原因还在

于旧时代广泛存在着孳生娼妓阶层的社会土壤。这种社会土壤主要是由私有制度、等级制度（包括奴婢制度）、多妻制度、买卖婚姻制度和男尊女卑观念等因素构成的。要彻底解决娼妓问题，必须先变革这些社会制度和观念，即正如李大钊所说的那样，“非把这个社会现象背后逼着一部分妇女不去卖淫不能生活的社会组织根本改造不可”。① 这个历史使命，无论是古代地主阶级政权还是现代资产阶级政权都不可能完成，只有无产阶级政权才有可能完成。

正因为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全中国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对娼妓阶层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进行逐步清除，所以共产党在解放全国之后很快就在大陆范围内取缔了娼妓制度，清除了污泥浊水，从而使中国这个人口居世界第一的大国在较长时期内基本上杜绝了娼妓现象。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壮举，不仅令中国人民惊叹不已，而且使世界各国为之瞩目。

建立新制度与铲除旧制度往往是同时进行、相辅相成的。所以随着各地的相继解放，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一个声势空前的禁娼运动。这次禁娼运动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消灭娼妓制度，封闭妓院，解放妓女；二是对妓女进行改造和安置，帮助她们改业从良，自新自立。前者是基本目标，后者是实现基本目标的根本保证，因而二者基本上是同时部署，同时进行的。但为了行文的方便，本节先论述前者，主要包括禁娼运动的总体形势、主要方式和基本政策等。后者拟

①李大钊《废娼问题》，载《每周评论》第19号。

在第二节论述。

一、禁娼运动的总体形势

由于共产党是把取缔娼妓、解放妓女作为人民解放的一项内容来对待，因而并没有等到全国解放之后再统一部署，统一行动，而是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分别处理，各个击破。整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摸索经验时期。有些地区先解放，如果条件允许，便立即着手解决娼妓问题，为全国大规模的禁娼行动摸索经验。例如，石家庄市于1947年11月解放，次年元月4日，市政府就签发命令，出示布告，取缔娼妓，封闭妓院，把当时尚在营业的72名妓女从老板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并对其中两名残酷虐待妓女的老板逮捕法办。比石家庄禁娼还早一些的城镇也不少，并且方式也不一致，例如焦作、邯郸、邢台等城镇，在石家庄解放之前就已经动员妓女转业从良了。

二是全面行动时期。时间集中在建国前后一段，许多城市的人民在庆祝建国的欢呼声中，也迫切要求政府立即解放妓女，于是禁娼运动进入高潮。例如，1949年7月，吉林市下令封闭妓院，解放妓女103人；1949年11月22日，北京市224家妓院全部被封闭，1268名妓女获得解放；1949年11月30日，蚌埠市由公安局长指挥，封闭妓院119家，175名妓女获得解放；1949年12月，杭州市取缔娼妓，600多名妓女被解放；1949年底至1950年初，苏州、南京、扬州、镇江等地妓女也获得解放，纷纷转业从良。

三是重点突击和清扫残余时期。建国前后禁娼时，有一部分妓女隐藏起来了，风声一过，又出来活动，各地对这类残余仍需不断清扫。还有一部分妓女听到禁娼的风声后，赶紧向尚未禁娼的城市转移，这也增加了一些城市禁娼的难度。尤其是有些城市由于历史的原因，娼妓太多，一时人力、物力、财力不够，同时还要做好充分的调查和准备工作，所以建国一年甚至二三年之后，才正式宣布取缔娼妓，例如，西安市1951年6月5日调查全市妓院为372户，妓女为687人，但在6月26日下令封闭妓院时，查出的妓女却达1049人，其中有许多都是刚刚从外地逃来的；① 1951年11月20日南通市封闭全部妓院；1951年11月22日青岛市封闭残存妓院，收容妓女296人；1951年11月25日，上海封闭妓院72家，解放妓女501人；1951年底，天津市也将残留妓院全部封闭，妓女集中收容；1952年9月11日，武汉市政府下令封闭妓馆，取缔暗娼，收容妓女297名。由于越是后禁娼的城市，自甘堕落的娼妓越多，也就越难以禁绝，因而有的城市如上海抓了一次又一次，直到1958年才禁绝。

二、取缔娼妓的主要方式

解放初期各地的禁娼行动，不仅在时间上有先后不同，而且在具体做法上也有较大的区别。后禁的城市固然可以学习先禁城市的经验，但都必须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选择最适当的禁娼方式。当然，禁娼的重点与难点都在大城市，至于那些妓女

①本节有关西安封闭妓院的情况，参考了张敏《1951封闭妓女院》一文（1988年《金城》增刊），以下恕不一一注明。

人数本来不多的小城市，随便采取什么方式，都不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因而，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主要还是大中城市的禁娼方式，影响最大的主要有骤禁式、渐禁式、追禁式三种。

1．骤禁式。先由政府做好娼妓调查工作和禁娼准备工作，然后在保密的前提下，集中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全市统一行动，一次性封闭所有妓院，收审所有妓院老板、领家，收容所有妓女。犹如狂风骤起，将残云一扫而光。以这种方式禁娼，只要准备工作做得充分，并且人力、物力、财力诸条件许可，基本上能够一举禁绝娼妓，使城市面貌陡然改观，社会风气迅速好转。全国采用这种方式禁娼的城市为数较多，并且都基本上获得了成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其次是西安。北京于1949年2月3日解放，3月，市政府就颁布了一个关于管理妓院的暂行规定，由公安部门对各妓院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登记。5月，市政府召开会议，专门研究了妓女问题，决定组织有关方面力量成立调查组，以查户口等种种借口为名，对妓院作深入、全面的调查了解。8月，北平市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确定了处理妓女的办法。紧接着由各有关单位组成“处理妓女委员会”，10月15日又成立“封闭妓院总指挥部”，由罗瑞卿（公安部长兼市公安局长）任总指挥，11月21日下午5时，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与此同时，全市已抽调2400余名干部和民警，征用37辆汽车，分为5个分指挥部、27个行动小组，预先到达指定的地点待命。当晚8时正式开始行动，一举将224家妓院全部封闭，收容妓女1268人，454名老板、领家也被集中收审。后

来北京陆续收容的妓女不过几十人（含暗娼）而已。这说明用驱禁方式禁娼在公娼比较集中的城市基本上能够一次禁绝。过了一年半之后，西安市也是采用驱禁方式，于1951年6月26日晚11时半开始至次日上午8时结束，用8个半小时封闭了全市372户妓院，收容了1049名妓女。

2．渐禁式。先由政府采取种种措施，对妓院进行严格管理与限制，并在同时动员教育和支持帮助妓女改业从良，规定老板不得阻拦，甚至对那些非法勒索和阻碍妓女转业的妓院主严加惩处，造成一种取缔娼妓势在必行的环境和压力，使妓女人数逐渐减少，当最后只剩下一批自甘堕落分子之后，再发布命令，封闭残存妓院，取缔私娼，收容所有妓女。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可以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但禁娼后仍需继续严格控制暗娼现象。解放前夕娼妓颇盛的天津、武汉就是采用的这种方式。天津在解放前夕尚有妓女近二万人，依靠妓院为生的茶房等职工也有一、二万人。解放后虽然妓女数量略有减少，但仍需要相当大一笔资金，才能够在全部封闭妓院之后收容所有妓女，如果这样做，势必会增加人民的负担。于是在1950年1月，天津市召开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围绕妓女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最后作出决定：严格管理限制妓院的活动范围，消除老板、领家对妓女的压榨，解放妓女的人身束缚，帮助妓女转业，防止流为暗娼，在预定时期内彻底消灭娼妓制度。这个决定公布后，有些妓院老板、领家见人民政府不封闭妓院，仍想继续干下去，不准妓女改业从良，甚至有些已经关闭的妓院又要求复业。在这种情况下，天津市公安局对那些非

法勒索妓女和阻碍妓女改业的老板、领家进行了严厉惩处。同时，多次召集妓女开会，对她们进行说服教育。为了安置妓女，政府还将裕德里一带几家已停业的妓院改为纺织厂、地毯厂、饭店和旅馆，从而使不少妓女纷纷跳出苦海，改业从良，有的当了工人，有的结了婚，有的回乡参加农业生产。1951年11月，天津市政府认为禁娼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立即签发命令，一举将残余妓院全部封闭，妓女也被全部集中收容。武汉市最初也是采取多种限制的措施来逐渐禁娼，直到1952年9月，武汉市人民政府才下令封闭残存妓院和取缔私娼，最后集中收容的妓女仅297名。

3．追禁式。有些城市由于娼妓（包括暗娼）基数大，且居住分散，很难一次禁绝，因而需要选择时机，追踪再禁。两次禁不绝，又追加第三次、第四次，边禁边收容边改造，直到禁绝为止。上海就是以这种方式禁绝娼妓的。近、现代上海烟花为全国之冠，三十年代最盛，多达12万人，至解放（上海于1949年5月25日解放）前夕的1949年1月，上海仍有公娼性质的妓院800多家，妓女4000多人，另有私娼和变相妓女30000多人。毫无疑义，上海禁娼的任务是最艰巨的，因而需要较长时间作准备。1949年8月16日，上海市公安局颁发了管理妓院的暂行规定，对妓院的活动严加管理与限制，并支持和帮助妓女改业。1951年开始筹建妇女劳动教养所，以便大规模禁娼时收容妓女。1951年11月25日晚上8时至次日上午10时，公安局、民政局执行市政府的命令，调集数百名干部和民警，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禁娼，封闭妓院72家，收容妓女501名（公娼181，

暗娼320），并将324名妓院老板集中审查，强制劳动改造。第一次大收容以后，不少公娼变为私娼，公开宿娼现象虽然基本上消灭了，但各种暗中卖淫活动仍然非常猖獗。市公安局经过周密调查，摸准她们的规律后，又于1952年9月25日夜间进行了第二次大收容。1953年8月，针对各种变相卖淫的情况，又进行了第三次大收容。此后，上海暗娼的卖淫活动更为秘密和分散，市政府便采取灵活措施，一方面掌握卖淫活动频繁的季节（如春节前后）突击收容，一方面发动群众检举，随时收容。从1951年至1958年，上海多次追踪施禁，先后收容各种娼妓共7513名。各年收容妓女的具体数字如下：

上海历年收容妓女人数统计表

年　分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总计
人　数	618	1115	964	1131	1724	875	807	216	7513
百分比%	9.1	14.8	12.8	15.1	22.9	11.7	10.7	2.9	100

上表中各年所收容的妓女都是成百上千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追禁方式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禁娼方式。连续经过了八年的追踪取缔，上海娼妓终于基本绝迹。

三、取缔娼妓的基本政策

各城镇取缔娼妓、封闭妓院的基本政策，一般都是由该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确定的，并非随心所欲。先看几条材料：

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

《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其主要内容如下：

查妓院乃旧统治者和剥削者摧残妇女精神与肉体、侮辱妇女人格的兽性的野蛮制度的残余，传染梅毒、淋病，危害国民健康极大。而妓院老板、领家和高利贷者乃极端野蛮狠毒之封建余孽。兹根据全市人民之意志，决定立即封闭一切妓院，集中所有妓院老板、领家、鸨儿等加以审查和处理，并集中妓女加以训练，改造其思想，医治其性病，有家可归者送其回家，有结婚对象者助其结婚，无家可归、无偶可配者，组织学艺，从事生产，并没收妓院财产作为救济妇女之用。

1951年6月26日，西安市人民政府发布命令（府秘字第1137号）说：

本府为根除旧社会遗留的侮辱妇女摧残妇女的妓院制度，解放长期陷入苦海的妓女，防止性病传染，保障国民健康，并安定社会秩序起见，特根据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议，责成本府公安局即日封闭全市所有妓院，逮捕管训妓院老板，查封其财产，集中妓女，教育改造，对其他人员亦有一定处理办法。所有妓院老板、妓女、茶役、司帐、嫖客及其他妓院人员等，均须服从命令，不得违抗。

1951年11月23日，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向市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协商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作了关于取缔妓院、解放妓女的报告，其中提出了处理妓院老板和妓女的不同方针政策：

> 对于罪恶昭著的妓院老板定予法办；对于罪恶较小的应予强制劳动改造；对于一般的妓院老板则令其转业。对于妓女应有计划有步骤的集中收容，加以教育改造，医治其性病，然后有家可归者送其回家，有结婚对象者助其结婚，无家可归、无偶可配者则组织学习生产技能，助其转业。

从北京、西安、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来看，各地取缔娼妓的基本政策大致相同，只是在一些细节问题上略有区别。在封闭妓院、解放妓女的过程中往往会涉及到对于妓女、嫖客、妓院食利者（包括老板、领家、鸨儿等）及其财产的处理问题，试联系北京、西安、上海执行禁娼政策的情形略加阐述。

1．对于妓院老板、领家及其财产的处理

1949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解放妓女》的短评说："妓院的老板、鸨儿、领家们过去的罪恶是应该被清算的。他们当中，有著名的恶霸，有拐卖人口或逼良为娼的凶犯，有曾经犯了杀害人命的大罪的，这些都是人民政府的法律所不能容许的。对于罪恶重大的分子，政府应接受妓女的控告，依法惩处，但对于情节较轻愿意悔改的分子，则应允许他们坦白认罪，给以自新之路。所以妓院的老板、鸨儿、领家们依靠买

卖与剥削妓女而积累起来的妓院财产，应予以没收。这些财产实际上完全是妓女出卖肉体与灵魂所换来的，应该用作妓女解放的经费。”北京封闭妓院时一共收审了454名妓院老板、领家或鸨儿，1950年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根据他们的犯罪事实，先后分两批宣判处罚决定。第一次判决48人，分别处以徒刑（多者7年，少者1年），并没收其妓院财产。第二次判决81人，除没收其妓院财产外，还分处徒刑（多者12年，少者12个月）、劳役，罚米罚钱。另外，军法处还于1950年4月6日，依法将罪大恶极的黄树清、黄宛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执行枪决时，妓女们无不拍手称快。西安市收审妓院老板297人，1951年12月19日召开大会，宣布对3名罪大恶极的妓院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203名分别判处1至12年有期徒刑，91名罪行较轻、态度较好者当场释放。

2．对于妓女的处理

解放初期的禁娼是以妓女的解放作为基本内容和首要任务的，各地政府主要采取两种方式帮助妓女解放。一种是动员和支持妓女自动改业从良，不准妓院老板阻拦，被迫为娼的女子中有相当数量的人高兴地脱离了妓院，开始了新的生活。一种是将妓女收容在教养院（所），逐步进行改造与安置，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拟在下节详论。这里只着重谈谈关于妓女的成分问题和财产问题以及收容妓女的政策界限。

各地禁娼时都把妓女与老板、领家严格区分开来，分别对待。老板、领家是剥削者、压迫者，妓女是被剥削者、被压迫者。解放初划定成分时，一般把妓女定为“游民”或“城市贫

'民"。1949年12月5日《解放日报》就妓女的成分问题作过明确的阐述：

> 妓女如以出卖肉体为生活主要来源，连续三年以上的，可定为游民。但是，她们原系劳动者，在万恶的旧社会，她们有的误入歧途，有的被拐卖而流落成为娼妓，她们中的多数人并非出于自愿，积极想跳出火坑，重新恢复劳动生活。尽管她们以不正当方法作为主要生活来源，并连续三年以上，也不应视为游民，而应分别情况，视为劳动者或贫民。人民政府将帮助妓女改造思想，医治性病，有家可归者送其回家，有结婚对象者助其成婚，无家可归、无偶可配者，组织学艺，从事生产。

关于妓女卖身所得的财产，无论多少，政府一律予以保护，永远归妓女本人所有。妓女自动改业从良的，应允许其全数带走。被收容教养妓女的财产，则既可由自己保管，也可由教养单位代为保管，就业离院（所）时允许她们各自带走。例如北京封闭妓院时似迅雷不及掩耳，许多妓女在匆忙中上了车，自己的衣裳、手表、金戒指等物都未来得及拿。妓院被查封后，政府专门派了战士看守保护，后来教养院干部带着妓女回妓院一一取走，仍归己有。上海教养所专设了一个库楼，为妓女存放保管一切财物，全都编上号，写上名字，登记在册，以便离所时如数领走。

关于收容妓女的政策界限，上海教养所始终遵守这么一个

原则：被收容的对象必须是以卖淫为生、以卖淫为业的妓女，而不是其他罪犯或做了错事的女人，坚持不错收、不滥收，发现有错，立即纠正。凡仅仅是属于作风不正派而乱搞男女关系者，不收；和一两个固定对象长期姘居，不属卖淫性质者，不收；受人引诱偶而失足者，不收；歌女、舞女无卖淫行为者，不收。有一次，上海教养所依据群众的检举而收容了一个姓颜的姑娘，她嚎啕大哭，宁死也不承认自己有卖淫行为，结果经医生检查，发现她还是一个处女。原来她平时不过是以谈恋爱为名，常和男子出去兜风，乘机骗点钱财，并无卖淫行为。于是，立即将她放回。西安封闭妓院时错收了一对新婚夫妇，也立即放回。另外，公安战士还在永庆巷查获了21名老妓女，她们因人老珠黄，无人问津，已分别和马车夫或小商贩长期姘居，也没有收容。

3.对于嫖客和妓院中其他人员的处理

各地处理方式不同，但基本政策一致。对嫖客予以教育，对妓院中其他人员如茶房、跟妈等予以解散。北京封闭妓院时，也将嫖客和其他妓院人员分别集中在二个房间，等将妓女和老板、领家用车拉走之后，再予以处理。对于嫖客，一一登记姓名、年龄、职业和单位或居址，当场进行教育。凡有单位的嫖客，打电话让单位来人领走；没有单位的，经教育承认错误，写出保证、当场释放。对于跟妈和茶房也进行审查，看是否犯有帮助老板、领家迫害妓女的罪恶，如无问题，便可取保释放。对于司帐，则令其清点妓院财产，逐件登记造册，听候处理。西安市封闭妓院时则将嫖客和妓院其他人员也一起抓起来予以

登记审查，其处理方法大致与北京差不多。当晚查获的919名嫖客经过教育后通知单位领走，近千名茶役丫环及其家属经审查后予以解散。①

8·2 解放初期对妓女的改造与安置

旧时代的娼妓之所以禁而不止甚至屡禁屡兴，还与统治者未能对众多娼妓的生活出路作出安排有关。且不说明初只革除地方官妓而仍保留市妓的有条件禁娼，必然会导致市妓的增多；即以雍正年间既废除官妓又取缔私妓的无条件禁娼而言，由于未能对娼妓的生活出路作出安排，她们为了生存仍不得不继续以卖淫为业，结果导致了清中叶私妓的兴盛。近、现代有不少仁人志士已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例如李大钊在1919年4月发表的《废娼问题》一文，不仅提出了“治本”（改造社会）的卓越见解，而且还提出了废娼的具体办法，其中第三条说：“拿公款建立极大的感化院，专收退出娼寮的妓女，在院经一定的时期教他们点工艺和人生必需的知识，然后为他择配。”实际上自清末民初以来，就已有一些慈善机构如济良所（清末创立）、全国妇孺救济会（1912年创立）开始收容和救济妓女，一边教她们一些基本的生活技能，一边为她们选择配偶，帮助她们改业从良。这两个机构在各省都设有分支机构，妓女只要逃入了这些

①本节和下节的写作，参考了《北京封闭妓院纪实》和《上海娼妓改造史话》二书。

机构，龟鸨便再无权索回。可惜这些机构太小，经费也有限，不可能救济千千万万受害的妓女。另外，苏联禁娼时采取封闭妓院及一切卖淫机构，同时设感化院、性病治疗所以及妇女救济院来帮助妓女治心治病、改业从良的措施，也对中国现代的禁娼产生过影响。例如南京于1928年禁娼时就曾将一部分妓女收容在救济院，或安置在平民工厂。三十年代初有的妇女协会组织向政府提出过种种救济妓女的办法，其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一）由党政军警妇女团体各派员每日检查，如发现私娼，即收入救济院收容；（二）请政府将现有之救济院内妇女教养所扩充，以作收容教养之所；（三）由党政军警妇女团体共同筹办一大规模之妇女工厂，收容彼等入内学习各种工艺。① 遗憾的是，这在当时仅仅成为一种设想，国民党政府并未认真采纳和实施。

从中国妓女生活史的角度来看，近、现代许多仁人志士为谋求妓女的解放而在理论上、行动上所作的种种探索，都是非常可贵的，不仅在现代废娼运动中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解放初期的禁娼运动给予了一定的启迪和影响。随着各城镇的不断解放，各地政府不仅迅速取缔了娼妓制度，封闭了所有妓院，而且在解放妓女的同时，采取相应措施，帮助所有妓女改业从良。使她们各有所归，各得其所，一个个都成了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人。直到这时为止，旧时代许多仁人志士的良好愿望与种种设想，才真正变成了现实。

---

①参见金仲华《妇女问题的各方面》第166页。

上节我们曾提到，政府帮助妓女解放的方式主要有二种，第一种是动员和支持妓女自动改业从良，帮助她们直接从妓院走向新生。这类妓女虽然不被集中收容，但政府仍然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是对妓院进行严格的管理与限制，废除妓女与院主之间的一切契约，解放妓女的人生束缚，不准院主强迫妓女接客，不准院主阻拦妓女从良。其次分派干部对妓女进行思想教育，或召开大会、小会，或个别谈心，明确指出取缔娼妓势在必行，帮助她们认识卖淫制度的罪恶，唤醒她们的自尊心、羞耻心，动员和说服她们尽快转业从良。再次是帮助妓女解决转业从良的具体问题，有家可归者送其归家，有偶可配者助其成婚，无家可归、无偶可配者介绍她们参加工作。许多中小城市和采取渐禁式禁娼的大城市（如天津、武汉）就主要是以这种方式来对妓女进行教育与安置的。毫无疑义，这类妓女身上也或多或少染上了一些恶习，因而都需要进行一定的改造，才能真正地获得新生。但她们既然是受了教育（这种教育也带有改造的性质，但还远远不够）以后自动改业从良的，就说明她们仍然还具有正常人的心理结构，因而也具有一定的自我改造能力；加之在她们走向新的生活之后，周围的社会环境（这是一个迥异于妓院的崭新环境，主要由各自的家庭、邻里和工作单位所构成）也会影响她们和改造她们。于是，新的生活很快就使这些妓女在社会改造与自我改造的双重作用下去掉一切恶习，真正成为一个个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人。

当然，这类妓女走向社会后，也有人由于主观（如好逸恶劳、贪图钱财）和客观（如环境不良、受人唆使与勾引）的种

种原因而暗地进行卖淫活动，这仍需要当地公安部门和有关单位加强监督管理，一经发现，立即进行教育改造，如有屡教不改、发展成为女流氓者，则依法处治。由此可见，各地普遍加强社会治安管理，也是解放初期彻底取缔娼妓的一个重要的措施。

正由于第一种解放妓女的方式难免会留下一些后遗症，从而增大了当时社会治安管理的难度。所以有不少城市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完全采用或部分采用第二种方式：即在施行禁娼时将妓女收容在教养院（所）内，然后对她们逐步进行改造与安置。当然，在封闭妓院、收容妓女之前，各地都必须事先筹建好教养院(所)，做好有关的准备工作。例如上海封闭妓院前几个月就已确定将原来的灾民收容所（通州路418号)改做妇女劳动教养所，二十天前就抽调了50余名妇女干部来所集中学习。所以当市公安局于1951年11月26日上午把第一批收容的500多名妓女送进教养所时，所长和干部们很快就安排好了妓女的住宿、生活等问题，当日下午还召开了欢迎大会。紧接着将她们按8人一班，56人一分队，500人左右一大队编排，让她们开始过有组织、有纪律的生活。

综合起来说，各地教养院（所）收容改造妓女的模式只有两种，一种是一次性教育改造，凡骤禁式和渐禁式城市都属于这种情况，无论收容人数的多少，都集中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圆满完成任务。例如北京妇女生产教养院从封闭妓院之日起（1949年11月21日），至将所有妓女安置完毕（1950年6月底），总共只用了七个多月的时间。另一种是分期分批教育改造，因而整个教养所的工作要延续较长一个时期，这是由追禁式城市的特

殊情况所决定的。例如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从第一次大收容起（1951年11月26日），到安置完最后一批妓女为止（1958年），总共花了七年时间。当然，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各地对妓女进行教育改造的内容和步骤，基本上是一致的。

将妓女集中收容之后，各地教养院（所）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与支持下，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为妓女检查和治疗疾病。

妓院是传染性病的场所，大部分妓女（尤其三四等妓女）都患有一种或多种性病，因此各地都把为妓女治疗性病作为一个重要的事情来抓。当妓女被收容进所后，马上就调集医护人员对她们进行普遍的性病检查。北京收容妓女后第七天，市政府就调集北大医院、性病防治所等6个单位57名医护人员组成医疗队，陆续进入妇女生产教养院，为妓女检查、治疗性病以及其他疾病。谁知，开场时却遇到了阻力，妓女们根本不相信政府会为她们免费治病，担心这是一个圈套，甚至有人认为医生要抽了她们的血去卖。后来经干部们做了许多思想工作，她们才一个个接受了性病检查、健康检查和血液检查。检查的结果如下表：

北京妓女性病检查统计表

病名	梅毒	梅毒淋病	梅毒淋病第四性病	梅毒第四性病	淋病	淋病第四性病及其他病	无病者	合计
人数	385	377	182	161	119	35	44	1303
百分比（%）	29.54	28.93	13.96	12.35	9.13	2.67	3.4	100

在被检查的1303名（包括后收的领家养女在内）妓女中，性病患者达1259人，占总人数的96.6%，有许多人是同时患有二种或三种性病。这个结果一公布，所有医生和妓女都为之大吃一惊，市政府立即表态同意增加拨款，购置油剂盘尼西尼等贵重药品，要求一定要为姐妹们治好病。于是治病的过程，也成为了感化教育妓女的过程。教养院、所（北京妇女生产教养院下设8个所）的干部从治病出发，把妓女按性病的不同情况重新编组编队，医生和护士在突击治疗期间干脆取消了休息日，尤其是13名护士在10天内一共注射了13000针，没出任何问题。对重病不起的，则更加细心治疗，殷勤护理。有一名叫郭赵氏的妓女梅毒发作，生命垂危，教养院赶紧把她送到正式医院去抢救治疗，回所后她满含热泪，逢人便说共产党的恩情比海深。上海第一批大收容后的第四天（1951年11月29日）就调集性病防治所、公济医院、广慈医院等五个单位的16名医生和7名护士，进入妇女教养所为妓女检查、化验。检查结果如下：

上海第一批妓女性病检查统计表

病　名	梅　毒	淋　病	梅毒型淋病	正　常	总　计
人　数	59	155	245	56	515
百分比	11.5%	30%	47.6%	10.9%	100%

在515名妓女中，患各种性病的有459人，占88.3%，这个比例虽然略低于北京妓女的比例，但同样使妓女大受震动。尤其是陈毅市长批准同意把本为朝鲜战场志愿军伤病员准备的盘尼西

妃先调拨给教养所使用一事，使许多妓女从心底里升起了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有的闻讯后感动得痛哭流涕，有的竟“扑通”一声跪下来给医生磕头。由于有第一流的医疗队伍，并使用了十分宝贵的药物，这些妓女的致命宿疾——性病都得到了医治。除此之外，妓女们所犯的其他疾病，如宫颈糜烂、子宫肥大、滴虫等也得到治疗，严重的还动了手术。有一名妓女得了子宫癌，是送到外面医院开的刀，一次就花去了790元。有些妓女进所前是吸毒患者，无论瘾轻瘾重者，出所时都被一一治愈。以后，上海教养所又陆续对新收容的妓女进行过四批集中大检查，性病患者的比例逐渐下降。第二批检查了911人，性病患者为611人，占67.1%。第三批554人中有266人患性病，占48%。第四批822人中有287人患性病，占35%。第五批848人中有165人是性病患者，占19.5%。教养所始终如一，坚持为她们治愈性病后才准出所结婚或就业。

二是对妓女进行教育改造。

被收容的妓女中有许多不仅患有致命的性病，而且患有严重的心病。虽然她们也是被剥削者、被压迫者，但肮脏和腐朽的妓院生活已经使她们的心态发生了倾斜，使她们的灵魂受到了污染，教养院（所）的干部们想要矫正她们的心态，洗涤她们的灵魂，实际上比治疗她们的性病还要难得多。各地教养院（所）在其他部门的配合支持下，采取种种措施，来进行这场特殊的战斗，基本上获得了预期的效果。这种教育改造，主要包括思想教育、文化教育和劳动教育三个方面。

思想教育的内容丰富，方式也灵活多变，比如上政治课，

开大会小会，集体讨论，个别谈心等，但最能体现当时时代特色并且效果颇佳的是召开诉苦斗争会来启发觉悟。北京收容的妓女中有803名曾经是讨人身体，（占总数1287人的64.2％）她们都受过妓院老板、领家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其他几百名自混妓女也同样遭受过各种侮辱与摧残，所以教养院、所的干部经过充分发动后多次召开了诉苦斗争会。1949年12月12日，妓女郑玉梅在斗争大会上控诉了领家陈周秀兰的罪恶事实，最后兴奋地对大家说："我真想不到会有今天，能活着跟陈周秀兰报了仇——要没有共产党解放我们，那会有今天，我感谢共产党。"1950年1月18日，有两个教养所的200多名妓女参加了斗争老板领家王玉峰、王张氏、王长才的大会，姐妹们听了卢金舫等妓女声泪俱下的控诉之后怒火万丈，蜂拥而上，怒吼着要揍死王玉峰，维持秩序的同志只好赶紧把他从台上拉走。但所有与会妓女一致要求政府枪毙王玉峰。1月24日军法处判决第一批妓院老板、领家、鸨儿等48人，25日又判决第二批妓院老板、领家等81人，分别处以徒刑、劳役、罚米罚钱。审判员在法庭上宣判他们的罪行时，教养院的姐妹们也被邀请来旁听。宣判完毕后，妓女赵兴华说："我们听说来听宣判，高兴得忘了吃饭，现在我们真有说不出的痛快！要是没有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我们翻身，我们能有今天吗？"1950年4月6日，军法处判处领家老板黄树清和黄宛氏的死刑，立即执行。刑车经过教养院时，妓女们振臂呼号，高唱复仇伸冤歌。曾经受过他们蹂躏的姐妹吴新生、杨爱华和另外50多名妓女，都赶赴刑场亲眼目睹了这两个罪犯伏法。吴新生回来后说："今天的政府真是

我们自己的，这回仇也报了，气也出了，该好好打算我们自己的事了。”说完激动得哭了起来。尹桂红也说：“政府替咱们报了仇，我们冤也申了。我们应该好好学习技术，准备以后好好工作，改造我们的思想，做个新社会的新妇女！”上海教养所也于1951年12月27日举行了类似的诉苦斗争会，会上由妓女们控诉、斗争了五花大绑的妓院老板张菊卿、张金芳，私娼老板何小妹、王阿四，妓院恶霸戴云卿等。通过这种大规模的群众诉苦斗争会，妓女们逐渐认清了把她们从人变成鬼的不仅仅是几个妓院恶霸，更是黑暗的社会制度，尤其是罪恶的娼妓制度。

文化教育包括文化学习和文艺娱乐活动。北京妓女中80%是文盲，大多数年轻的都要求学文化。她们请求说：“净呆着吃算怎么回事，教我们认字吧！”于是教养院办起了文化补习班，依各自的文化基础编排班次。教学以识字为主，还结合生活实际教一点算术、常识和地理，学员还经常写作文，甚至进行作文竞赛，王六妹和糜金妹作的文都得了奖金和奖品。一所妓女李红玉的一编题为《感想》的作文还在《新民报》上发表过，她写道：

> ……政府把我们受苦的姐妹救出了火坑。从前，我们过的不是人的生活，只要旧社会存在，我们就是抬不起头来；也只有现在的人民政府，把我们受苦的姐妹救出来，才把头抬起来。在长安看《日出》，使我们回想起过去的生活是可耻的！在华北看的《九尾狐》，我才了解地主的可

恶！还给我们打针，政府费了多少心血？在当时我一个字不会写，现在我可以写文章，这是政府给我们的，将来学习好了，我一定好好去生产，自己做，自己吃，多光荣。

上海妓女中也是80%以上为文盲或半文盲，具有高小文化程度的仅占5.5%，初中占3%，全所先后收容的7513名妓女中，只有一个念过大学。根据各自的文化程度，所内设一、二、三、四年级，重点扫盲。有五六年级程度的组织自学，初中和初中以上的动员担任扫盲教师。出所时，姐妹们基本上都摘除了文盲帽子，睁眼瞎都开眼了。另外，经常组织妓女们看戏、看电影、看文艺节目以及自己开展一些文化娱乐、文艺表演活动，也是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例如，北京教养院曾经组织全院姐妹观看过《日出》、《九尾狐》、《一个下贱的女人》、《白毛女》、《中华女儿》、《白衣战士》、《爱国者》等演出。尤其是马少波等艺术家根据妓女的生活而创作的大型话剧《千年冰河开了冻》演出后，使她们深受感动和启发。在节假日，她们还自编自演了许多文艺节目。谢纯一编写的大鼓曲词《妓女翻身》，不仅表现了她们在旧社会过的苦难生活，而且还反映了她们在教养院接受改造时的生活情形与精神面貌，特摘引如下：

表的是旧社会妇女们受残害，老鸨子开妓院他们大不该，那旧政府里包庇这种买卖，反动派收花捐给他们作后台，也有的自小儿被了人贩子拐，也有那恶家庭把她们卖出来，也有那身受剥削不能待，也有那无耻的丈夫图了钱

财，也有父母因为穷把女卖，也有那结交了坏人甩也甩不开。一下水进窑门先得受虐待，皮鞭子沾水打得肉绽皮开，红通条火筷子烫烙难说处，管的你服服在地好好挣钱财，肚子里吃的不是人间饭，身上的衣服都是贷了来，除了自己的皮骨之外，什么车马家俱都是假招牌，白天里受摧残折腾不能耐，夜晚的蹂躏更是遭灾，要是惹着嫖客不满意，这一顿毒打脱也脱不开，要是有一个知心的客，老鸨子疑心你爱上了小白，从此加紧严看管，深了不是浅也招灾，更有官面的和窑痞，白吃白住仗着势力拍，要没钱花使押帐，叫你一辈子逃不出来，或是借小印子等着换宰，加月加印算尽你的钱财，如果得了风流病，带病接客也得认头挨，要不然专往疮上打，藤鞭木棍楞往伤口上拍，病到十分没了病，难得混上一口薄皮棺材，两人提溜到南下洼子去，离地几尺往下摔，过去的妓女冤深似海，直到如今才解放开。

1949年冬，11月22日，人民政府决心把她们救出来，动员各机关把窑子封闭，先把成千的难女好安排，领家和老板加看管，全部没收他们的剥削钱财，妓女的恶名从今改，改叫新生妇女名誉正过来，总数人有1200，都编入妇女生产教养院中来，院中共有八个所，每所之中又有班排，有规律的生活进步真快，早晨七点她们全起来，上午各所讲故事，讲的是妇女翻身改造成材，下午集体学文化，好多的字认明白，有的知识高看书报，自动的学习把思想打开，晚饭后娱乐时间她们喜爱，学会了新歌曲唱起来，有

的敲锣有的打鼓，扭起秧歌笑脸开，各所的床铺炉灶都搭好，大家做饭烧水添柴，每天轮流把值班的派，集体劳作大家搞起来，为了保健和医病，28日把医疗所开，从此再不受病苦，有大夫有药不费钱财，各班代表取回各人的物，有小孩的也把他带进来，小孩见娘多高兴，娘见了孩子乐的叫乖乖，所有的事实大家感动，觉悟到人民政府的好心怀，这个说咱们翻身如展翅，那个说铁索长枷才得打开，这个说从此洗去前番耻，那个说要加紧学习想明白，这个说我们要生产争模范，那个说咱们得参加劳动站在前排，第一所大家省下来纸烟费，为了学习把纸笔买来，第三所九班起得早，带头劳动打扫庭台，第十班擦净玻璃扫净了土，第四班拾金不昧交了出来，第九班发动不吃家中的饭，十二班保证团结互助不疑猜，从今扔了脂和粉，从今戒了烟和牌，从今自强还自爱，从今翻身更要站起来，感谢人民政府把正路带，感谢人民政府使我们把头抬，我们齐下决心把恶习改，我们要学习生产团结起来。

这个节目演出后，在院内外都引起强烈反响，当时的《新民报》还把它全文发表。

劳动教育是改造妓女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只有通过劳动教育，才能真正地戒除她们已经养成的好逸恶劳习性，从而逐步树立劳动光荣的观念，同时在劳动改造的过程中，尽可能让她们学习一些生产技术和生活技能，以便于她们出院后能够较顺利地走上自食其力的道路。北京教养院让学员普遍学会洗

衣、做饭、补衣、绣花，同时北京政府还专门设立了一个“新生棉织厂”，让学员们去学习生产技术。上海教养所明确地制定了劳动生产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方针，并提出了参加劳动的四项原则：（一）从各人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她们的年龄大小、身体强弱，由少到多，由轻到重，逐步增加劳动量。一般半天劳动，半天学习，提高思想认识。（二）根据各人的爱好和身体、文化条件，尽量从事具有创造性的劳动：摇纱、织袜、织毛巾、缝纫、弹药用棉花以及医务、保育、炊事等等。使她们学得一技之长，以便为将来安置就业创造条件。（三）表扬她们的点滴劳动进步，开展以“评质量、评产量、评操作”和“找窍门、找潜力”为主的“三评两找”红旗劳动竞赛，发动工场与工场之间、小组与小组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挑应战，夺红旗。（四）逐步实行奖金制度和计件工资制度。通过劳动，学员们不仅能获得劳动的价值，而且还会从中发现自身的价值。当教养所第一次分发奖金的时候，许多学员为第一次挣到干净的钱而高兴得哭了，有的还把第一次挣到的“干净钱”寄回家中，让家人也来分享她们在劳动中获得的幸福。

三是妥善安置妓女。

各地集中收容改造妓女的基本目标是：让这些受过污染的姐妹们洗涤污垢之后走向社会，成为一个个新型劳动者，不再从事卖淫活动。尽管在教养院（所）教育改造期间，姐妹们的身心疾病都基本上得到了医治，逐步恢复了健康，但她们毕竟是久病初愈，还显得有些弱不禁风，如果出院以后生活环境不良，仍有可能受到感染，导致旧病复发。因而各地都非常重视

妓女的安置工作。总的原则是：有家可归者送其归家，有偶可配者助其成婚，无家可归（或有家难归）、无偶可配（或暂不愿结婚）者帮助就业。由于各自的家庭状况、社会关系及其思想表现不同，教养所实行严格把关，坚持条件成熟一批便安排一批，不搞一刀切。北京教养院在对妓女进行改造的同时，就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参考学员的意愿，制定安置方案。凡愿意回家或结婚的，只要已经治好了性病，并且思想表现好，可以早安置、早出院。所以从1950年元月份起就已开始安排少数学员出院，二月至三月又陆续送走大批学员。在学员出院之前，教养院在有关方面的配合下多方面了解了她们出院以后的环境，并且要求履行一定的手续。凡“具领人要有区政府的证明信，证明接领学员出院的人确是有正当职业的居民。此外还要取得殷实铺保，填具保证书，保证（一）该学员出院后须参加劳动生产或主持家务；（二）该学员今后在任何地区不当明娼或暗娼；（三）根据政府婚姻法，保证该学员婚姻自由，不得有变相买卖婚姻的行为。如果具领人是学员的丈夫或结婚对象，须经卫生局检查有无性病。学员要有院方发给的出院证明书，才能在当地呈报户口。此外教养院还有通知书给当地政府，当地政府可以随时检查具领人所保证的条件”。① 这一切都体现了各地政府对新生姐妹的负责精神，希望她们出院后能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自立。有的妓女（多为头等妓女）从前是想嫁一个阔老板作姨太太，过一辈子“舒服”的寄生生活。通过学习新婚姻法以后，了解了婚姻自由和一夫一妻制的意义，因

①张洁珣《新生妓女的出路》。

而宁肯找一个勤劳踏实的工人或农民为偶，也不愿嫁给她们原来认识的嫖客；有的妓女本有相好，但还不放心，因而请求教养院的干部予以调查，证明是好人后才与其结婚。“到1950年6月底，1316名学员中，596人与工人、农民、店员、摊贩等结了婚；379人被亲属领回家；有62人参加了剧团和医务工作；8名被送进安老所；还有62人被查出是妓女兼领家已分别另案处理。最后剩下无家可归和有家难归的209人，政府为她们组织了新生织布厂，当了工人。”① 上海市政府规定，凡收容进所的妓女，必须符合四个条件方能出所安置：（1）改掉好逸恶劳的游惰习气，确已提高了思想觉悟；（2）学会了一定的劳动生产技能；（3）医治好性病和其他传染性疾病；（4）有家属保释，出所后有生活来源或生产就业条件。由于旧上海娼妓泛滥成灾，积重难返，尤其是后几批收容的妓女中有不少是自甘堕落的暗娼或流氓阿飞，她们中有的人不仅积习难改，而且还抗拒改造、策划外逃，因而上海教养所对妓女进行教育改造的任务要艰巨一些，所花的时间也要长一些，一般要经过一年多到两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教育改造，才能符合市政府提出的有关要求。从1952年起至1958年止，学员们被分期分批予以安置就业，其具体数字如下：

上海教养所历年安置出所人数统计表

年　分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合计
人　数	92	999	778	1968	1695	619	1042	7193

①李万启《冰河解冻》。

这些女子中有2500多人被安置在皖南、苏北等地的国营农场，1500多人由亲属领回家乡参加农副业生产，近2000人去新疆、甘肃等地支援边疆建设，500多人在上海企事业单位参加工作，500多人有家庭抚养条件的，保释回家从事家务劳动，还有300多人没有亲属，并且不愿离开教养所，1958年教养所改为国营工厂，迁到甘肃，她们随厂去甘肃，当了正式工人。除上述历年安置的7193人以外，还有274人因年老体弱已转入养老院，26人经审查不属收容范围已由家属领回，13人因病死亡，另有7人因多次外逃，继续违法犯罪，由公安机关逮捕，强制劳改。

当最后的300多名妓女于1958年离开上海前往甘肃建厂就业时，上海妇女教养所也随之解散了。这不仅表明教养所的干部们已经圆满地完成了当时上海市政府和人民所赋予的特殊使命，而且同时也意味着解放初期我国对于妓女进行的较大规模的改造与安置工作已经基本结束。各地学员从教养院(所)走向社会后，虽然仍有不少女子因旧病复发而被公安部门收容教养，(如1950年北京妓女张金香被安置在人民艺术剧院当演员，只过了一个多月，因遇上她原来的嫖客就跟他逃走了，后来又经常到天坛公园等地卖淫，1952年被公安局再次收容教养)，但绝大多数的姐妹们都获得了真正的新生，成了新时代的劳动者，其中有不少人还入了党，入了团，当上了劳动模范。①

由于解放初期施行禁娼之后，一方面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

①例如北京教养院学员王大顺于1950年出院后被安置到卫生部防疫总队当化验员，工作积极，是年底加入了共青团；原七所学员赵领娣后来还入了党，成了劳动模范。

妓女进行了改造与安置，一方面加强了社会治安管理，严厉打击暗娼卖淫活动，所以自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中国大陆基本上消灭了娼妓现象。这不仅对于中国历史来说是一个奇迹，而且对于世界各国来说也是一个奇迹。因而许多外国朋友出于好奇，曾先后到中国作过大量的采访和调查，最后几乎无不承认中国取缔娼妓之彻底堪称世界的楷模。

8·3 当代台、港地区的娼妓

尽管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而至今仍为国民党和英、葡殖民主义者所统治，但它们毕竟是中国神圣领土内不可分割的部分，本书作为中国妓女生活史，自然应该留下一些篇幅来论述台湾、港澳地区的娼妓生活。

1949年大陆解放以前，港澳台地区的娼妓业大体上与国内口岸城市（如上海）同步，故可略而不论。不过，香港当局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之下已于三十年代后期取缔公娼，(尽管是禁而复弛，弛而又禁)，而澳门、台湾则一直是实行公娼制度的。所以当代四十年来，台湾、澳门一直是公娼与私娼并行发展，而香港则是由私人来经营娼妓业。鉴于澳门地区小，且与台湾同制，故本节拟主要论述台港地区娼妓的发展概况，关于澳门的娼妓仅附带提及。

1949年5月，蒋介石败退台湾，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也随之逃往台湾。这种逃亡性质的大转移使得台湾总人口由1946

年的624万，急剧增加到753.8万。毫无疑义，这些为数众多的大陆迁台人员，不仅大部分挤居在城市中，从而导致了城市社会秩序的混乱；而且由于大部分是男性而进一步扩大了城市性别的比差。各城镇在调控社会秩序的同时不得不增加公娼人数以适应这种变化了的形势。加之紧接着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又迫使农村的地主、富农退出土地后纷纷进城充当资本家和商人，从而促使城市工商业经济开始恢复到光复以前的水平，这无疑也为娼妓（包括公娼与私娼）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自1957年起，台湾公娼人数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1966年共有公娼41000人。”① 至于私娼和变相娼妓，虽然没有具体数字统计，可能为数也十分惊人。1970年时，《华侨日报》就估计台北市的“捞女”（即妓女）约有5万人。②

1964年至1973年十年间，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时期。随着社会不断对外开放，外资和外商大量涌向海岛，旅游观光事业日益兴盛，于是台湾的国际卖淫事业也开始大肆发展。所谓国际卖淫事业，又称“性观光事业”，主要是指一些旅社、酒家、咖啡馆以观光妓女专门接待外国人。“据统计，在台湾，主要以外国人为对象的观光妓女，全省即多达22万人，约占人口总数的1.29%。”③六十年代中期以前，“性观光者”往往多为赴台度假的美国大兵，从六十年代末开始，日本男性观光团也乘坐飞机，成群结队地前往台湾寻花觅柳。据台湾《时报周刊》编辑部编辑的《地下色情面面观》说：“在五权路（台中市）有

①②茅家琦主编《台湾30年》第195页。　③《台湾30年》第393页。

家最具名气的酒家，专做日本观光客的生意。日本人也不是三三两两地来，而是坐满一辆游览车的来，一个一个进去，一对一对出来。这家酒吧的行情不低，春风一度得3万日币……据说这些吧女根本不做国人的生意，倒不是国人付不起价码，而是和日本人做生意干净利落。”该书谈到花莲的“观光妓女”时也说：“她们最喜欢的是‘扶桑客’（即日本客），除了较为体贴之外，花钞票也比较大方，一度春宵五千、一万，并不值得大惊小怪。”① 在台湾，凡是挂有“观光”招牌的行业，几乎90%以上都经营色情、卖淫交易。还有一些女子或在歌场舞厅唱歌伴舞，或在浴场、理发店充当按摩女郎，同时也兼营卖淫。“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台北市有国际性观光妓女大约6万人以上，占全市总人口的3%。如果再加上那些无执照的卖淫者，其人数更不知高达几许？再如只有15万人口的台北市北投区，经过调查统计，有正式执照的妓女就有5000人，无执照的约有3000人，二者合计占全区总人口的5.3%。在台中市，据台湾官方统计，共有人口57万，专业卖淫人员至少有3万人，亦占全市人口的5.3%。”②

1974年至1979年间，由于世界性石油危机的冲击，台湾经济曾一度出现不景气状况，全省色情、卖淫业也或多或少受到过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台湾当局一方面采取紧缩措施，抑制通货膨胀；一方面调整经济结构，为提高经济的应变能力，开始建立以资本密集型及技术密集型为主的工业。至八十年代

①转引自《台湾30年》第393页。　②《台湾30年》第394页。

初，台湾经济状况又出现了好转的趋势。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大幅度上升，台湾终于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一跃进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发达地区的前列。正如柴松林教授所说："相对于数千年来战争频仍、贫穷困乏的历史而言，真正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富裕。"① 1987年9月《福布斯》杂志发表稍前统计的全世界拥有10亿美金以上的96个富豪名单，其中有3个是台湾人。资本家越富有，台湾的两极分化也越严重。就全省而言，属于大资本家与权贵家族这一阶层的人口至多50万人，占总人口的2%，他们却控制了比例较大的财富。而在贫困线上生活的人却有200多万，占总人口的10%以上。在台湾这个经济挂帅、金钱第一的社会环境中，这种日趋严重的两极分化，从两方面促进了台湾娼妓业的恶性泛滥。作为有钱的富有阶层，大多是"饱暖思淫欲"，妓院歌馆，实际成了他们追求刺激和显示财富的场所。加之中产阶级也有许多人随波逐流，纵欲享乐，这就形成了较大的买淫队伍。而贫困阶层的人们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往往由于入不敷出，只好"鬻女为娼"。② 有些女子虽有工作，但由于物价（尤其是房价）昂贵无法生活，也只好以业余卖淫的方式来增加收入。于是，许多经营色情的场所也应运而生，大量女子的售色卖奸，大量男子的纵欲嫖娼，导致了台湾社会风气的腐朽糜烂。1989年5月30日罗汉在台湾《民众日报》载文说：

①柴松林《匮乏于富裕之中》，见1988年4月16日台湾《自立晚报》。
②参见庄万灵《贫富不均是工农街头运动的主因》，1988年4月18日台湾《民众日报》。

放眼望去，社会上处处“歌舞升平”，骄奢淫佚，人人醉生梦死，个个花天酒地，所陈现的以色和赌为最。谈到“色”字，变态的理容院、按摩院等等已是公开贩卖色情的场所，什么地下餐厅、地下舞厅、地下俱乐部，更是目标显著。尽管大众媒器传播切切注意“世纪黑死病”艾滋病，而这些色情场所依然吸引无数老中青年的男人。单以台北市而言，连那十字路口，繁闹的东门、西门街头，也有色情黄牛在兜售“女人”。至于华西街、广州街、三水街那一带，更是贩色大众化。每当华灯初上，大大小小300多家餐厅（名为餐厅实为地下酒家）开始营业，小者也有五六个陪酒女郎，多者不输似延平北路的五月花和黑美人等等大酒家。几乎整个台北市的大街小巷，都存在着色情。只要你有“性”趣，随时都可随传随到。

根据著名社会学家谢康的研究，以及各报刊的报道，台湾公娼的存废已不是当务之急，目前最令人惊心和焦虑的是地下色情、非法卖淫的泛滥成灾。贩色的大众化、卖淫的普遍化、性交易场所和明娼暗妓的数量之多，不仅在台湾历史上空前未有，而且超越了中国妓女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如本书有关章节所述，三十年代上海妓女达12万人之多，已堪称史之极盛了。可是，过了半个世纪之后，台湾城市妓女的总数却已数倍于当时的上海。据1988年6月台湾有关报道：

今日台湾，色情业已不仅限于妓院。大凡冠以“观光”、

"服务"字样的行业，大都经营色情、卖淫交易。诸如休闲中心、按摩院、鸳鸯浴、应召站、观光理发厅、伴游公司、婚姻介绍所、酒廊、咖啡厅、舞厅、寡妇俱乐部，在在充满色情，花样不断翻新。台湾高级警政官员估计，台湾介入色情业的场所，共有5.78万家左右。

据一项非正式的统计数字，台湾的明娼暗妓达50万人之多，每20个女性中就有一个从娼者。而且，台湾妓女年龄明显趋向偏低，据估计，未满16岁者（雏妓）有10万人。

不过，近年来，由于有一名妓女已死于艾滋病和两名嫖客已染上艾滋病的阴影笼罩着台湾，妓女和嫖客的性行为相对来说有所收敛，有经验的妓女开始注意观察客人的"个人卫生"，而较为自爱的嫖客（包括老外）有时也只要妓女陪玩、陪饮即可，不一定要发生性关系才尽兴而返。尤其是那位蓝姓女艾滋病患者曾经服务过的基隆海港酒吧间已无人问津。①

在台湾酒吧业生意逐渐萧条的同时，脱衣舞却风靡全岛，越演越烈。台湾人把脱衣舞色情表演的场所称作牛肉场。因为台语中"牛肉"音近于"有肉"，所以牛肉场就是露肉、卖肉的地方。近几年，以暴露赤裸裸胴体为最终目的"脱衣秀"、"透明秀"、"香艳秀"和"穿帮秀"，从南蔓延到北，从都市到乡村，日盛不衰。据估计，台北市演出脱衣歌舞秀的餐厅、剧院，至少有9家，而全岛最保守估计，则在80家以上。牛肉场的表演

①参见《危"滥"阴影笼罩宝岛》，1988年8月4日台湾《自立晚报》

方式，从一个或一群、上裸或全裸在舞台上载歌载舞，发展到目前标新立异，衍生出不少新花样，例如“美人出浴”、“贵妃醉酒”、“十八般武艺表演”、“台上台下联欢”等等，令人目不暇接。脱衣舞的表演者，可分为附属于经济人（公司）和跑单帮两种，前者大都被卖身下海，多因找工作误入陷井和被黑道控制所致；后者多半为老江湖，不乏自甘堕落者。她们的薪水，按日计酬，现金交易。通常刚出道的，日薪约为3000元至5000元，知名度高点或自带合音和伴舞的大牌，则每日价码超过一万元。① 甚至有的地方办丧事时也请来舞妓，大跳脱衣舞。②

台湾色情、卖淫交易的严重泛滥，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一些有识之士和广大民众曾通过各种途径，强烈呼吁取缔公娼，消灭私娼，要求当局“提供一个没有色情污染的环境”，甚至有些民间组织还成立了一些挽救妓女的团体。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台湾警方也搞了几次大的“扫黄”、“正风”行动，但绩效不彰。据台报分析，这首先要归咎于当局政策不明，法律缺失，是完全禁娼，还是只保留公娼制度，至今没有一个基本政策；其次是处罚太轻，一般只依“妨害风化罪”、“行为不检”等对从事色情交易者拘留五日，这是无济于事的；再次是色情花样太多，警力明显不足。更有个别不肖警员，明里取缔，而暗中“护航”，使色情进一步泛滥。不过，一些有识之士认为，说到底，色情泛滥是台湾社会的缩影，社会如此，又怎么能够取

①知昂《台脱衣舞越演越烈》，见1989年5月10日香港《快报》、②参见1988年4月19日台湾《民众日报》。

缔娼妓呢？

上述台湾的50万娼妓，大概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并且各类妓女的营业方式也有所不同。

第一类是公娼。即依照现行的《台湾省各县市管理娼妓办法》，由警察机关核发许可证，并经卫生机关检验后认为身体健康，可以接客的妓女。这类妓女照规定在原则上应住在所谓“风化区”的妓女户内，但也有回家住宿按时“上班”的，这种妓女户有甲、乙、丙三级之分，门上必须悬挂一盏绿色的电灯，故俗称“绿灯户”。依规定，她们必须在绿灯户内接客，而不能在其他地方卖淫，也不能让客人在妓女户内请客或用餐吃花酒。顾客只须付钱，即可叫妓女陪宿或作普通短暂停留。按照现行管理娼妓办法的规定，公娼必须经过体检，必须是没有性病的，才可以接客。但嫖客并不接受性病检查，因而妓女仍难免染上性病。每座城市的“风化区”都是由警方分片划定的，凡繁华城市，可以有几处“风化区”，例如台北市就有三处，第一处在万华宝斗里（华西街），第二处在重庆北路归绥街（保安街一带），第三处在新北投。不过，新北投的公娼后来被废止了，现在只剩下前两处。

第二类是专业私娼。她们是未取得合法登记的卖淫妇女，不交税，也不接受性病检查。她们活动的社区较为广泛，活动的方式也灵活多样，大致有如下八种：（一）高级的应召女郎，（二）兼卖色情的酒吧女郎，（三）在新式公寓楼房内接客的交际花或高级私娼，（四）普通私娼馆内卖淫的娼妓，（五）冒充公娼混在绿灯户内卖淫的私娼（年龄较轻、领不到合法执照

的所谓雏妓），（六）由旅社召来或在旅社住的妓女，（七）街妓（一称“马路天使”），（八）咖啡室、茶室中兼营副业实则专门卖春的“小姐”。

第三类是兼业的私娼。这类女子名目繁多，简直不胜枚举，大致有：（一）酒家女，在合法的酒家或地下酒家陪酒的侍者，（二）舞厅中的舞女，（三）理发厅的按摩女（又称“马杀鸡”），（四）各种私营浴室中的女招待，（五）中下级旅社中的女服务生，（六）早年“理疗院”中的护士，（七）某些水果店中的女侍应生或旅行社及旅运公司的“导游小姐”，（八）某些不甚著名的歌星或舞姬。另外，还有一些业余的、季节性的、间歇性的卖淫者也分别在各种场合以各种方式活动。例如黄春明的小说《看海的日子》中描写的许多妓女在南方澳渔港向讨海人卖淫，就是季节性的，每年仅在三四五月干一阵，所以她们的娼寮也是临时搭起的。

后二类私娼，无论专业还是兼业，都是非法的。一旦被警方发现，便须立即施行体检，有病则强迫其治疗，病愈后必须转变为公娼身份，取得许可证，才准许营业。有些私娼老板为了对付警方的搜捕，采用电脑储存每个妓女的容貌、身姿、体重、学历、价码等资料，嫖客物色妓女时只需按按电键，选中了谁再用电话通知即可。至于这二类私娼的等级，虽然不便于象公娼一样划为甲乙丙三级，但似乎可以依照现时她们每月的总收入作为一个标准。例如高贵的“应召女郎”以及兼营色情的“歌星”之类月入新台币10万元以上的，为第一等级或“超级”；月入数万元的为中上级；不及1万元的为下级。不过这并非固定不变

的，仅能为作参考而已。①

谢康曾经带领他的学生一起调查过台湾妓女的卖淫动机，结果以经济的原因占绝对多数。那么，毫无疑义，上述为数众多的台湾妓女，大多都是生活处于贫困线之下的下层社会女子，无论是自愿为娼，还是被迫为娼，往往都与金钱密切关联。具体说来，她们的来源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养女。在五十、六十年代，这些女子是台湾妓女的主要来源。她们往往是由于父母双亡或离异而无家可归，流浪街头，因而被他人收养；或者是由于生家贫困，无力养家活口，因而将幼女送人或卖给他人为养女。她们在养父母家里，经常受到非人的虐待。等养女长到十三四岁时，养父母往往便以租赁或出卖的方式，强迫她们下海为娼，甚至有的是先被养父奸污，然后被迫操皮肉生涯。这种黑心行为实际上在日本占据台湾的时代就已普遍存在，那时每家可收养女50名左右。五十、六十年代此风仍盛行不衰，因而各地都先后成立过所谓“保护养女运动委员会”，以期能够保护养女不受养父母的虐待与欺凌。七十、八十年代这种现象略有减少，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至今仍有相当数量的妓女是被养父母逼迫下海的。例如，1989年2月14日台湾《联合报》登载的《面对雏妓——四位不幸少女口述亲身经历》一文中，美慧就是在15岁时被养父从台北带往台中的某酒家开始卖身的，后来又先后在应召站做过应召女郎，在理发厅当过马杀鸡小姐。② 养女卖淫的收入除被娼

①以上关于娼妓的种类，参考了谢康《中外娼妓问题比较研究》的有关论述。 ②见《台湾文学选刊》1989年第3期。

察老板剥削一部分以外，其余部分基本上都被养父母占有，有些家庭正是依靠养女的血泪钱才改善了家庭经济状况。如黄春明《看海的日子》中写的白梅，因为父亲早死，八岁就被生母卖给陈家做养女。白梅长到十四岁时，陈家便把她卖入中坜的窑子里，后来辗转到全省各地卖淫，直到二十八岁。有一次白梅和养母闹翻了脸，养母骂她是"烂货"，白梅气愤地说：

"是的，我是烂货，十四年前被你们出卖的烂货。想想看，那时候你们家里八口人的生活怎么过的？现在是怎么过的？你们想想看，现在你们有房子住了，裕成大学毕业啊，结婚了；裕福读高中了；阿惠嫁了。全家吃穿哪一样跟不上人家？要不是我这烂货。你们还有今天？"①

二是城乡贫苦家庭的少女。这些女子的家庭往往是人口多、负担重，为生活所迫，她们或者是被父母亲属卖入娼寮，或者是自卖为娼以解救家庭的困境，或者是被拐骗而沦落风尘。女子被卖入娼寮有短期出卖和终身卖断两种，如《面对雏妓——四位不幸少女口述亲身经历》一文中，小薇是十二岁时被亲生父亲卖给某旅社为娼，父亲因赌博欠了债，便把女儿卖了3年，得款35万元。小雯则是十一岁时，被外婆以80万元卖了终身。1989年初，高雄刑警大队从一应召站捕获了7名雏妓，其中未满十四岁的阿兰是自愿卖入娼家的，订约只卖两年，代价为60万。

①《台湾文学》（研究资料）下册。

她对警察说："我妈妈打官司需要钱，我要让她打赢，我是自愿的。我给人开苞时很痛，大哭一场。赚了两、三万寄给妈妈，她也哭了。"① 林聪仁的报导文学《天堂路》中记叙的桃园妓女芬芬，本是台南乡下女子，父母健在，她是在十三岁时被表姐阿绸骗卖到娼寮的。当然，她的母亲暗中也同意。不过，表姐将她卖了20万，却只分给母亲5万元。父亲起初被瞒骗了，后来知道后想去找女儿，可又不知道女儿的行踪，直到过了6年之后，芬芬逃回家中时才明白真相。②

三是山区少数民族少女。她们沦入娼门也不外乎以下三种情况：一种是因为家庭极度贫困，从山区跑到大城市找工作，结果无法求得正当职业，只好下海为娼；一种是被人贩子骗卖到妓院的；还有一种则是由父母亲属卖入娼寮的，其中有被迫的，也有自愿的。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山区少数民族少女沦为妓女的现象尤为突出。台湾西部花莲山区的花莲村，平均5户居民中，就有1户有妇女在城市从事色情卖淫活动。据调查，该村69名15至34岁的妇女中，就有32人有过卖淫经历。③ 1989年初高雄刑警大队抓获的7名雏妓中，小华是新竹县尖石乡泰雅村人，家中没有母亲，父亲有病，妹妹年幼，她15岁时自愿卖入应召站，只卖两年，代价20万。由于她是山区少女，价码比平地少女少了一多半（平地少女阿兰卖两年为60万）。记者胡台丽特地去采访了小华的家乡，"当地人透露这个12户的小聚落就有

①胡台丽《走出野蛮台湾》，见台湾《中国时报》1989年2月15日。②见耀亭选编《台湾社会百态》，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3月版。③参见《台湾30年》第394——395页。

4户女孩被卖，另一个更偏远的秀峦村据说卖女儿的户数更多，有的人家还不只卖一个。”①

如果说台湾贩色卖淫的大众化已经引起了有识之士和广大民众的忧郁的话，那么，这些色情卖淫场所中妓女的低龄化，则最为人们所关注和愤怒。上述的养女、城乡少女和山区少数民族少女大多都是从十三、四岁起开始卖淫的。尽管台湾现行管理娼妓的办法规定，不许雏妓营业，但私营娼寮和地下色情场所的雏妓却比比皆是。其中有一部分女子在第一次接客时还没来月经，妓院老板往往以注射荷尔蒙的方式来刺激雏妓发育。而台湾许多嫖客也养成了玩雏妓的嗜好，他们宁肯出大价钱，也要买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开苞。例如上文提到的阿兰，十四岁就开始接客，初次为她开苞的嫖客为她出了3万元。尽管阿兰当时痛得大哭，嫖客却以之为乐，任意蹂躏。从此以后她天天接客，“一天最多接过三十几个客人，年龄从十几岁到七十岁不等”。这些嫖客也真正是丧尽天良，灭绝了人性。当然，台湾妓女中成年女子的比例还是要大一些，但她们中有相当数量的人也是从雏妓出身的。

无数雏妓的哭声，终于震动了社会。1987年初，有三十几个团体首度上华西街游行，抗议贩卖少女为娼。台湾当局迫于舆论压力，终于下令警方从1987年3月开始施行“正风专案”，至年终警政署共查获500余名16岁以下的雏妓，其中有100多人未满14岁，平地汉人女子约占五分之四，原住民少女占五分之一。

①胡台丽《走出野蛮台湾》，见1989年2月15日台湾《中国时报》。

但警方在处理这些雏妓时，只将七十几名移送妇女习艺所，其余大多责付家长“监护管束”，结果导致她们复入娼门。① 甚至有些被救出去的姐妹，从妇职所出来后，恶毒的老板照样可以雇流氓当场在门口将她们截回去重操旧业。② 1988年1月9日，台湾妇女救援协会又发起组织了抗议雏妓的大游行，不久又向“立法院”呼吁，要求增订修正《少年福利法》，试图以法律的形式控制雏妓泛滥。1988年以来警方又捕获了几百名雏妓，但警员对此并无多大兴趣。1989年又设立妇女救援基金会，号召社会各界捐款救援雏妓，并且从2月14日起至20日止，举行了“雏妓救援周”活动，各地报纸也纷纷载文表示声援。但这一切都只是治标的方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例如据1989年5月8日台湾《联合报》报道，17岁的汪姓少女和15岁的许姓少女在被人诱骗失身之后，组成应召站，被安排到各宾馆、饭店强迫卖淫，终于被警方抓获。

香港虽然取缔了公娼制度，但私娼和变相娼妓之盛比起台湾来并不逊色。妓女售色卖淫的场所和方式主要有“音乐厅”、“酒帘”、“三温暖”、“浴池”、“脱衣舞”、“人体写生”、“导游公司”、“美女擦鞋”、“美女插花”、“女子美容院”、“真人表演”、“小电影”、“一楼一妓”、“征友”、“小舞院”以及各大小“娼寮妓寨”、“无上装夜总会”、“中国式酒吧”等等。当然以上列举的有关场所中也有正当营业者，但大多都兼营或专营色情卖淫业。根据香港法律及《保护妇孺条例》，妇女卖淫并不

①胡台丽《走出野蛮台湾》。 ②睦谯平《地下的哭声——雏妓泪痕》，见1989年2月15日、16日台湾《联合报》。

算犯罪，但经营妓院，或介绍女性为娼者，则可叛处两年徒刑。任何住户将其用房供妓女寄宿，或用来开妓院，除了罚款和处以徒刑外，其租赁关系得依法终止。一个男人向妓女提出不道德的要求，或者靠妓女收入为生也属犯罪行为。因此，上述色情场所，并不是由正当商人所投资开设，而主要是由黑社会人物所经营管理。

与台湾妓女大多为生活所迫下海为娼不同，香港妓女大多是由黑社会人物中的惨绿少年，以甜言蜜语或物质享受为引诱，从而跌入火坑的。这类惨绿少年，俗称为“姑爷仔”。据不完全统计，香港有此类“姑爷仔”达8万名之多。这些受骗女子则大多为香港居民的女儿。从素质上说，香港妓女普遍高于台湾妓女，因而这类“姑爷仔”的骗术也相当高超，否则就难以引诱她们上钩。

这类“姑爷仔”诱女下海分“有组织”和“独行侠”两种方式。当然，前种方式的成功率要高一些。试以“十四K”①的十来名姑爷仔为例，他们有私车，有打手，主要活跃于九龙一带，“总部”设有非常豪华的五个房间，某人工作需要时，可以带女子到指定的睡房去“幽会”。另在花园街还租有一层唐楼，作为平时聚集之用。姑爷仔物色少女的方法，有在舞厅认识的，有在夜校中认识的，有在集体旅行中认识的，也有“来手”介绍的。总之，他们的办法很多，触须也伸得很远，只要看中一名对象，女子不喜欢某甲可以介绍某乙，不喜欢某乙可

① “十四K”为香港黑社会组织之一。

以介绍某丙，因为姑爷仔群中，什么类型的都有，务求女子喜欢为止。身份方面，可以扮富家子，可以扮书院学生，可以扮白领阶级，也可以扮穷光蛋。由于这些姑爷仔大多具有演员天才，所以能够迎合对方胃口，投其所好，先尽可能创造一种"爱"的情境。当一名少女陷入姑爷仔的柔情蜜意的圈套以后，进一步的行动便是"打印"（即发生肉体关系），至此，那被俘虏的少女已是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了。

"打印"又有"单对单"与"轮大米"之分。前者用以对付个性较为文静而又痴情的对象，这类少女一旦委身于姑爷仔，往往感情执着。姑爷仔便会以种种借口，劝她"暂时"厕身在风月场中，储蓄金钱，作为结婚或建立事业之用。到了这步田地敢于拒绝的女性并不多，否则，姑爷仔或以暴力威胁，或以"苦肉计"感化，逼迫女子就范。后者用以对付个性倔强、贞操观念较强的女子。他们首先把某少女约出来，用汽车载到僻静的地方，突然来一个下马威，把她痛打一顿，接着逼她在来人之中选择一个作为"条仔"。然后，从"条仔"开始，一个个轮奸。此后的几天之内，他们仍不断地蹂躏她，直到把她的少女尊严和贞操观念全部摧毁为止。最后带回"总部"，"量才使用"，或介绍到某色情场所，作为"组织"的摇钱树，或者干脆把她们卖出去。例如仅在1974年至1979年5年间，经由这个组织卖出去的少女就不下300名之多，其中17名被卖到澳门。

象"十四K"这样的"姑爷仔"集团，在香港的其他黑社会组织中几乎都有。比较著名的有"同新和"、"单义"、"新义安"、"和胜和"、"和胜义"、"老联"等经营的"姑爷仔"集

团，其作案方式大同小异。另外那些所谓“独行侠”，虽然不一定能将他所企图引诱的每名少女都弄到手，但他们在物色对象时会尽可能选择自己容易攻克的目标。他们单独行动的方式，更富于“恋爱”、“找情人”的色彩，因而更不易于被少女和警方所发现。香港中文大学百余名学生曾自动组成调查团进行调查，并于1978年9月29日公布了《香港色情问题研究报告书》，其中指出，1978年上半年失踪少女达1300多人（未有报案者不在统计之列）。毫无疑义，这类少女大多都是被“姑爷仔”骗卖为娼了。

这类女子进入色情场所之后的管理有二种方式，一种是仍由“姑爷仔”组织控制，收入由组织与色情场所老板分成，上班时间由老板严密控制其行动，其他休息时间均由姑爷仔控制，上下班也是姑爷仔用汽车接送。女子即使想逃也难以找到机会。再说，有些女子落到这种地步后，慢慢适应了环境，也不作“乳燕还巢”之想了。另一种是以卖断方式进入某色情场所，该女子的行动、收入全归其老板控制和支配，防守更为严密，逃跑的可能性极小。当然这类老板往往也受黑社会控制，或者他们本人就是黑社会的成员。

由于香港是禁止娼妓的，这些色情场所大多是以合法的形式干非法的勾当。他们想方设法钻法律的空子，千方百计逃避警方的搜捕，因而各色情场所售色卖奸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不可尽述，我们这里仅举“妓寨”和“妓社”为例。

妓寨是将若干名妓女分布于一层楼宇之内，派姿色出众的女子充当“火车头”，下到街道上去招徕顾客。有意光顾者便问

明价钱，由“火车头”带上楼，送入“寨”内，欢娱时间一般不超过二十分钟。这类半公开营业的妓寨，实际与台湾的私营娼寮差不多。所在区域的警察并非不知，而是由于妓寨老板事先已作了“表示”，并得到他们的容许和包庇才得以存在的。不过，后来香港施行廉政措施，“包庇者”开始敛迹，妓寨也逐渐转入地下活动。

“社”的经营方式，与“寨”完全相反。顾客不但不知“社”的地址何在，即使顾客愿付更高的代价，也不能在“社址”进行交易，必须经由“公寓”、“酒店”、“招待所”及“别墅”等来电提货，然后“送货上门”。各妓社都有严密的组织分工和营业程序，试以“和胜和”尖头×在油麻地经营的一家为例。这个“社”设总管1名，经管“社”内一切业务；交际1名，负责联络收费，接线生1名，专管电话，通话时一律用暗语；杂务女工2名，专门负责膳食和清洁卫生工作；司闸1名，专门看门，严禁社女私自出入；打手4名，负责对付外来势力捣乱和镇压社女反抗。另有社女17名，年龄由15至30岁不等，其中7名是“合约身”，10名为“公主身”。前者系合作关系，收入对半分成，合作期限多为3个月，这一段时间须遵守“社”方“纪律”，不能随便行动或干“私帮生意”。后者是从姑爷仔手中购入的少女，一般代价为每名10000至15000元。规定每万元代价须替“社”方服务一年，期内由社方酌支零用，每月约300元，期满可恢复自由。但实际上是一种骗局，因为行将期满之际，姑爷仔又会把她们转卖到别的色情场所去。社方备有私家车两辆，接到求货电话后，便由一名打手带一名妓女乘车前往，见货合意，交易

成功时，打手便在附近监视。“社女”服务时间一般为一小时，社方收费100元，招待所另向顾客收介绍费40%，顾客实际付出140元。顾客如需延长时间，便得付出额外款项。社女服务完毕，又在打手监视之下，上车返“社”。每天最繁忙的时间是华灯初上至凌晨三时左右。这段时间内，接线生不停通话，“社女”不断进出，司机不断接送，打手不断奔忙，钞票也从四面八方滚进老板的腰包。该社的收入有多少呢？据估计，17名社女，平均每日有一名因“生理问题”而休息，实际出勤的为16名。仅以平均每人每日服务4次计算，则日收入共6400元，其中6名为“合约身”，拆帐1200元，社方实际收入约为5200元，一月总计为156000元，而实际支出仅55500元(房租800元，水电及电话费200元，社女零用3000元，膳食1500元，员工薪金共20000元，打手费20000元，另加临时“打秋风”、“交际费”等10000元)，收支两抵，老板每月可获纯利收入约10万元。正是因为获利甚巨，老板才甘愿担当风险，苦心经营，干这种可耻的勾当。

象这样的“社”，香港不知有多少，加上其他色情场所的女性，比如“帘女”、“吧女”、“池女”、“舞女”等等，若集中起来，简直可以构成一个女儿国了。据《香港色情问题研究报告书》统计，七十年代末香港色情行业的女性有12至14万人。这些女子几乎完全成为了“姑爷仔”或老板赚钱的工具，谁不从命，小则疾言厉色，大则夏楚横施，更有甚者，会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例如上述大阿哥尖头×社内有一名社女秋×，因为拒绝侍候一个印籍嫖客，打手便把她双手反绑，拳打脚踢，

还用驱风油捞饭强迫食下，以至整个月都不能起床，此后长期患上胃病。①

通过以上对台港地区娼妓生活的阐述，我们从一个侧面认识到了台港这个自由世界中最不自由、最无人性的残酷现实。这些色情卖淫行业如此兴旺发达，也反映了台港社会风气日趋糜烂的现实。公正地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台港地区的确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但同时也酿成了可怕的精神贫困。所以台湾柴松林教授在一篇题为《匮乏于富裕之中》的文章中写道："我们忍不住要说，经过多年盲目的追求，徒然的勤奋，无厌的积累，所创造的竟然是前所未有的、世世代代的祖先向未经历过的真正的贫困。"②

最后，我们还有必要补充论述的是，港台不法集团和嫖客早已对大陆妇女发生兴趣。解放四十年来，大陆妇女被偷渡到香港为娼的事已屡见不鲜，这在香港的小说、电影、电视中都有所反映。尤其是自1979年对外开放以来，香港不仅有许多嫖客进入内地利诱大陆妇女，搞所谓的"性旅游"，而且有一些不法集团或不法分子进入内地建立"性基地"，或者拐骗大陆妇女到香港卖淫。例如广州有名纺织工张五妹，1979年经人介绍结识了一名自称老板的香港客，不久就以结婚为名把她带往香港。张五妹回忆说："我终于到了日夜向往的香港，住进一间豪华的酒店。一觉醒来，我的头炸了，他不见了，抱着我的竟是一个50多岁的老人。原来他根本不是什么老板，是个专门

①关于香港娼妓的论述，主要参考了《香港的法律》、《香港一瞥》、《香港黑社会真相》等书。②1988年4月16日台湾《自立晚报》。

从广州向香港贩卖姑娘的流氓。我已经是第37个被他欺骗拐卖的女青年了，我们都被他卖进了妓院。只身一人，举目无亲，只得去接客，不接客就得挨打。一年之后我才逃离虎口回到广州。我没脸再回工厂，虚荣心又使我不敢讲真情，只好继续装扮成阔太太，为了撑住门面，我又做了妓女。反正在香港已经干上了这个，横下一条心吧。”① 近年来，拐骗大陆妇女至台湾卖淫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凡已偷渡至台的大陆妹大多集中在高雄火车站附近的许多应召站内，每个应召站均有固定的计程车接送她们到各饭店、旅社卖淫。客人经饭店或旅社的服务生介绍，大约花3000元新台币即可应召到一名大陆妹。台湾人口贩卖集团之所以大量引进大陆妇女，最主要的因素是：目前各色情场所竞争激烈，且台湾女子不易控制，动不动就不去上班。引进大陆妹不但新鲜，深受顾客欢迎，而且由于她们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比较容易控制管理。台湾不法集团拐骗大陆女子入台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人口贩子以赴大陆观光为名引渡大陆姑娘乘飞机赴台，一种是依靠渔船在南部沿海一带偷渡大陆女子过海入台。尽管这两种方式都带有危险，例如据1989年6月19日香港《明报》报道，台湾高雄居民庄龙治因涉嫌拐骗大陆妇女，终于在福州机场被我公安人员逮捕。但大陆妹在台湾行情看涨，“每名每年以新台币15万买断，介绍到各色情场所的媒介费，至少可以从中赚到20万元。获利之高，并不下于走私枪械”。因此仍有不少人铤而走险，争相引渡。这些大陆姑

①《垃圾王国的臣民们》，见《时代》1988年第8期。

娘往往是做着“天堂梦”而进入台港地区的，直到被卖进色情场所开始接客的时候，她们才真正从“美梦”中清醒过来。然而事已至此，即使有无穷的悔恨也为时太晚，在老板的逼迫之下，她们只好脱光衣裤，忍辱从命，在一次又一次的摧残、蹂躏之后，她们的理想破灭了，眼泪流干了，人格和尊严也被摧毁了，唯有心中还保留着一份对于大陆家乡和亲人的记忆与思念。

8·4 近十年来大陆暗娼的活动和扫除暗娼的斗争

旧时代遗留下来的的中国娼妓文化残余，不仅在港、澳、台地区延续存在，即使在大陆也未能完全根绝。本章一、二节我们曾论述过大陆解放后取缔娼妓和改造妓女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要消灭卖淫嫖娼现象和扫除娼妓文化残余，决不是短期内所能彻底完成的。因此自五十年代中期至1979年经34次易稿的中国刑法草案，始终把引诱、容留、强迫妇女卖淫定为犯罪。1957年公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规定：“违反政府取缔娼妓的命令，卖淫或者奸宿暗娼的”、“处十日以下拘留、二十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这一条款也一直施行了近30年。这都说明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仍然有暗娼卖淫现象存在。较为突出的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部分大中城市，有一些妇女在旧日妓女和嫖客的唆使下，又以售色卖奸来赚取钱财；文革时期失学的学生和上山下乡返城知青中的一

部分女性，或出自无聊或出自生计或出自贪财，也干起了类似的勾当。只不过当时这种社会现象并不普遍，加之有关部门往往习惯于用“乱搞男女关系”、“腐朽生活方式”等术语来笼统概括，因而二十余年间的暗娼现象很少为人们所关注。① 直到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某些旧社会的沉渣乘机泛起，暗娼活动也逐渐蔓延，才为社会各界所关注，各级政府也积极地开展了反暗娼的斗争。

首先我们有必要明确指出：近十年来出现的暗娼，既不是门户开放后从外国直接引进的“洋货”，也不是在改革进程中直接创造出来的“新产品”，而是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娼妓文化残余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复活与蔓延。

在1979年至1989年的十年多的时间里，大陆暗娼卖淫现象，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由沿海到内地、由开放城市到一般城市乃至县城集镇的发展过程，至1989年秋，已蔓延至全国各大中小城镇及公路干线沿途的乡村。不过，目前正在深入开展的扫“六害”运动已经有力地打击并抑制了卖淫嫖娼活动。

1979年国门刚开，改革伊始，暗娼即乘机首先在沿海城市如广州、珠海、深圳、福州、上海等地开始活动。这时的嫖客多为入境的港澳人士、海外华侨和外国人，妓女则多为单干户。不过，由于港澳黑社会派人进入内地利诱少女卖淫，试图在大陆建立性基地，搞所谓的性爱旅游团，因而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已有一些卖淫团伙或地下妓院。是年夏天，华东政法学院

①参见谢德辉《钱，疯狂的困兽》（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219—220页）和闵征《卖淫现象的社会学透视》（《青少年犯罪研究》1989年第7期）。

副院长曹漫之察觉到这一社会动向之后立即大声呼吁："要百倍警惕卖淫、贩毒和暴力犯罪的国际化。"但当年广东抓获的暗娼仅35人，上海抓获135人。1980年暗娼逐渐增多，上海于1月至5月仅在北京路、南京路和外滩等处就查获卖淫案件376起。是年6月，上海团市委首先严正指出卖淫行为正在蔓延。1981年广东省境内的53个市县都发现了卖淫嫖娼现象，当年仅广州市就抓获暗娼483人。"有人估计1981年抓获的暗娼大约相当于总数的一半到三分之一之间，所以1981年广州市娼妓总数在千人左右应该说较为实际。"　这一严峻的社会现实，终于引起了广东省政府的警惕与重视，并立即着手制订地方法规来控制这一丑恶现象的蔓延。1981年8月7日广东省第五届人代会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省关于取缔嫖宿、卖淫活动的暂行规定》，8月15日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实施。根据暂行规定精神，公安部门不仅处罚暗娼和国内嫖客，而且对入境的外来嫖客（包括港澳人士、海外华侨和外国人）除科处罚金（大约3000元至5000元）以外，还要在当事人的旅行证上盖上"嫖客"两个大大的红字，次年换发旅行证或证件遗失后补发时，"嫖客"两字仍要再盖上去。设若情节严重，就要被驱逐出境，限期不得复入。② 这一措施用来防范和抑止外宾到大陆做"性旅游"，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1982年以后，虽然有不少妓女的淫荡目光仍在搜寻外来嫖客，但大部分妓女却把目光转向了内地人尤其是个体户逐渐鼓

①《垃圾王国的臣民们》（《时代》1988年第8期）。　②参见张自强《大陆采访录》，收入《台湾记者看大陆》一书。

起来的钱包。当然，其中也不乏既搞内销又搞外销者。而许多内地人尤其是个体户也正愁钞票没处用，于是双方一拍即合，迅速在各大中城市刮起淫风，掀起浊浪。就广东省而言，1982年有95个市县，分别发现了暗娼卖淫现象。1983年以后，每年在全省各市县均有普遍的卖淫活动。“根据警方从1982年开始的不完全统计，卖淫嫖娼活动呈上升趋势：1982年被警察抓获的卖淫妇女为3601人，1983年为6346人，1984年为3115人，1985年为5601，1986年达到7142人，而1987年仅上半年已有5088人被抓获，因为这种活动的隐蔽性，实际数字远远超出上述统计范围。”① 其中1983年抓获的暗娼人数分别高出1982年和1984年的一倍左右，显然是由于当年8月开展的“严打”斗争所取得的成果。1983年9月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引诱、容留、强迫妇女卖淫的人处刑，从1979年最重的十年有期徒刑提高到无期徒刑以至死刑。1986年公布，自1987年1月起生效的新《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在第三章第三十条规定：

> 严厉禁止卖淫、嫖宿暗娼以及介绍或者容留卖淫、嫖宿暗娼，违者处十五日以下拘留、警告，责令具结悔过或者依照规定实行劳动教养，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嫖宿不满十四岁幼女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以强奸罪论处。

①张卫华《广东卖淫嫖娼活动调查纪实》，见《法律咨询》1988年第1期。

1987年6月19日广东省第六届人代会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广东省关于取缔卖淫、嫖宿暗娼的规定》，由广东省人民政府于6月20日公布实施。这个法规明确指出：引诱、容留、强迫妇女卖淫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判处死刑。嫖宿不满14岁幼女的，以强奸罪论处。聚众嫖娼、集体淫乱的，以及卖淫团伙的为首分子，依法从重处罚。对卖淫者和嫖娼者，均处15日以下拘留，责令具结悔过，妓女由其家属或所在单位领回管教。情节严重的，嫖客和妓女均可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同时对嫖客实行劳动教养，对妓女予以6个月至1年的收容教养或者实行劳动教养。① 此后广东省警方每年都要组织数次大小不同的扫黄行动，并且对娼妓嫖客大张旗鼓地公开处理。是年9月，广州市中级法院一次处决了14名罪犯。其中罪犯吴桂权不到五个月，容留20多名妇女在他的家中卖淫70多次，收费1200多元。另一姓张的罪犯，引诱十几名妇女为娼，得到250元介绍费，这两人不仅命归西山，而且财产被全部没收，上交国库。②

上述措施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卖淫嫖娼活动的嚣张气焰，但并未控制住这一丑恶现象逐渐在全国范围内蔓延的趋势，公安部门每年查获的人数仍在继续上升。“据有关部门统计，1984年全国查获卖淫嫖娼人员1万余人次，1986年2万余人次（其中暗娼10733人），1987年为6万余人次，1988年第一季度查获6861人次”。每年抓获的人数如此之多，各地又只好仿效

①详见《南方日报》1987年6月20日第2版。②张卫华《广东卖淫嫖娼活动调查纪实》。③潘允康《在亚社会中沉思》第89—90页。

解放初期的办法，纷纷建立收容教育所。1985年10月广州市率先在一个小岛上建立了妇女教养所，至1987年春，已收容妓女1060名。1986年到1987年7月，全国建立了18个收容教育所，到1987年底增加到62个，但这还远远不够。有许多地区由于没有资金兴建或扩建收容教育所，他们处理暗娼时往往只是拘留半月、处以罚款了事，然后通知其家属或所在单位领回，结果导致不少女子又重操旧业。这也是各地暗娼屡禁不止、常抓常有的原因之一。

随着暗娼的发展增多，绝迹了十多年的性病也通过妓女和嫖客的滥交而得以滋生与蔓延。“据卫生部统计，性病患者1983年全国发现1000多例；1986年发现5000多例，上升了5倍。1987年元月至3月份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全国性病患者猛增到50000多人。卫生部有关权威人士透露，50000人这个数字太保守，据估计仅是实际情况的五分之一。也就是说，目前我国性病患者起码在250000人以上”。① 卖淫嫖娼与性病蔓延这一对孪生毒瘤的社会危害，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警惕和重视。1986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坚决取缔卖淫活动和制止性病蔓延的通知》，接着，全国性病防治中心在南京成立，并在全国16个沿海开放地区和内地一些开放城市建立性病监测网点，许多城市的大医院也设立了性病专科门诊。但因积重难返，卖淫嫖娼和性病蔓延的趋势一时间很难制止。1987年9月21日，国家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民政部、全国妇联联合向中共中央、国

①吴晔、李正堂《性病的复活》，作家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214—215页。

务院递交专题报告，明确指出卖淫嫖娼活动和性病蔓延，有继续发展的趋势，必须采取坚决施措予以制止。1987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以正式文件转发了这个报告，这便是《关于严厉打击、坚决取缔卖淫活动和制止性病蔓延的通知》，于是，一场全国性的大扫荡立即在各地展开，至1987年底，全国共处理参加卖淫嫖娼活动的人员64773人次。

1988年至1989年秋，卖淫嫖娼活动仍在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包括新建的海南省）的各大中小城市以更隐蔽、更巧妙的方式继续发展，并且向各县城集镇和公路干线的沿途乡村蔓延。深圳是最得风气之先的城市之一，尽管多次扫荡、打击，暗娼仍如过江之鲫，1988年1月至9月抓获的280名暗娼，① 大多是在宾馆、酒店、旅社、招待所、桑拿浴室作案，有些则是在私人出租的房间内或者出租汽车内卖淫。山西通往河南、河北的公路干线沿途不仅有许多悬挂着饭馆、客店招牌的“嫖窝”，而且公路两旁的一些农妇家中也设有“暗门子”，甚至还有不少村姑三三两两的站在路旁向过往的货车司机招手搭车，从搞所谓的“免费旅游”开始，失身后便干脆充当职业性的“公路女郎”。② 1989年12月1日至3日，湖南省公安厅组织岳阳、长沙、湘潭、衡阳、郴州五地市，开展了一次代号“107行动”（107系公路国道）的统一扫荡，对620多公里长的公路沿线所有路边店和复杂场所进行清查，抓获卖淫嫖娼人员700多名。

---

①邹素芹《深圳市女青年卖淫现象的考察》，见《青年研究》1989年第8期。　②小枫《查禁黄色书刊录像带卖淫赌博吸毒贩毒纪实》，见《当代电视》总第29期（1989年11月出版发行）。

实际上在公路沿线路边饭店中招娼引嫖的事情，广东省早已有之，如在1987年春以前，广东公安部门就曾在广汕、广湛、广梅三大公路干线上查获有卖淫活动的路边店377家。①

海南建省前后，内地大量女子成群结队涌向海口市找工作，结果有些女子找不到工作，就干脆以卖淫为业；有些女子即使找到了工作，也以卖淫为第二职业。因而导致海南建省后一切工作尚未展开，卖淫嫖娼就已十分猖獗。1988年11月初，海南省人代会常委会通过了《海南省取缔卖淫、嫖宿暗娼的暂行规定》，对强迫妇女卖淫或以营利为目的引诱、容留妇女卖淫者，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处包括死刑在内的各种刑法。对卖淫者、嫖娼者视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或劳动教养，这对于控制海南日益猖獗的卖淫嫖娼活动，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在法令颁行一个多月之后，德新社驻海口记者埃德加·鲍尔于1988年12月19日报道：在热带岛屿海南，人们可以看到妓女在街头徘徊。一些来自香港的旅游者说，他们在海口饭店经常接到准备卖淫的姑娘打来的电话，确切说这是些“电话召唤的妓女”，有时深夜还有姑娘来敲他们的门。如果说地处“天涯海角”的海南省流莺遍地尚在人们意料之中的话，那么，地处“世界屋脊”的青海省暗娼活动也较为频繁的现实，就真正足以令人忧心忡忡了。1988年4月26日西宁市第十届人代会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西宁市严禁卖淫嫖娼的规定》，1989年3月3日经青海省第七届人代会常委会第七次会议批准后自1989年3月20

①钮海津《广州卖淫扫黄纪实》，见《文学天地》总第十七期(1989年出版)。

日起实施。① 不过，与广东、海南的地方性法规相比，青海省西宁市对参与卖淫嫖娼活动人员的处罚相对要轻一些，据此也可以看出，青海的卖淫嫖娼活动虽然也已构成较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毕竟不如广东、海南之甚。

从1979年至1989年十多年的时间里，公安部门每年都或多或少抓获了一批参与卖淫嫖娼活动的人员并予以处理，但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屡禁不止、屡抓不绝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以前有些决定政策的人士往往把卖淫嫖娼当作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来看待和处理，而不是结合其他社会问题一起进行综合治理。直到1989年秋冬，各级政府才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和领导下，真正下决心实行综合治理。首先在经济上反对贪污腐化、索贿受贿和政治思想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时，全面清理整顿文化市场，坚决查禁取缔黄色书刊、录像带，彻底扫除“精神毒品”和“文化垃圾”，尽可能地净化文化环境。紧接着于11月中旬由中央部署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行动，大张旗鼓地开展扫除“六害”（卖淫嫖娼、聚众赌博、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拐卖妇女儿童、吸食贩运毒品、利用封建迷信骗财害人）的运动。据《人民日报》记者吴恒权报道：

……截止12月15日，全国共查处“六害”案件14万多起，查处违法犯罪人员35万多人。其中依法逮捕2500多人，送劳动教养2200多人，给予治安处罚258400多人，正

①见《青海日报》1989年4月4日第2版。

在审查的74200 多人。……

在全国统一扫除“六害”的工作中，各级党委、政府认真加强领导；宣传、文化、教育部门，认真开展了思想、道德、法制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文化、出版、影视部门对文化市场加强了管理和整顿；工商、行政部门加强了对宾馆、饭店、舞厅、咖啡厅、酒吧、个体旅店的管理，及时取缔非法经营；卫生部门积极着手对卖淫妇女、嫖客进行性病检查及治疗；财政部门对办案的经费给予了支持。

公安部新闻发言人今天指出，公安机关将把除“六害”工作长期坚持不懈地抓下去。①

全国自 11 月中旬至 12 月15日一个月期间被查处的“六害”案件中，最多的是聚众赌博。至于卖淫嫖娼者的具体数字，记者没有分列出来。不过，笔者就近了解到湖南省的有关数字也可作为参考。通过深入群众调查摸底，湖南省掌握的“六害”对象共12万名，其中卖淫嫖娼者为 34000 余名。但到11月底止，全省实际破获“六害”案件 16410 起，查获“六害”违法犯罪人员 39944 人，其中卖淫嫖娼者为6565名。据估计，在除“六害”运动开始后的头一个月中，全国抓获的暗娼至少有3万人。目前，全国除“六害”工作尚在深入开展之中，各地卖淫嫖娼的势头已经得到了控制。但要彻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仍然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各级政府必须继续实行综合治理，

①见《人民日报》1989年12月31日第3版。

坚持下去，常抓不懈，力求使社会风气尽快得到根本好转，除“六害”的成果才会得以巩固。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在论述了近十年暗娼发展、蔓延的情状与趋势之后，还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一下当代暗娼卖淫的原因与特点。

一、近十年来暗娼卖淫的社会原因

近十年来暗娼卖淫现象的日趋发展与蔓延，固然不是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但却与这个时代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作为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它不仅冲击了僵化的经济体制，而且也引起了人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等一系列变化，加之我们在改革过程中也发生过失误，或者存在着弊端，这又给不法分子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卖淫活动以可乘之机。因而，整个社会环境诱发妇女为娼的因素增多，卖淫活动的空间增大。这些诱发妇女卖淫的社会原因较为复杂，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主要有如下七个方面：

1．商品经济的发展，固然带来了市场的繁荣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但也助长了“拜金主义”，甚至导致一些“人”的商品化。近十年来，尽管我们的舆论宣传不断地呼唤雷锋精神，但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拜金主义思想越来越有市场，几乎是一切向“钱”看，谁捞的钱多，就意味着谁的本事大。为了捞钱，人们自动地把自己的劳动力拿到市场上去出卖。有的是以智力、技能生财，有的是以体力、玩命换钱，有的则是以容貌、体姿赚钞（如模特儿），更

有甚者，是把女人的“性”（性机能和性魔力）作为商品来与男人交换，这种交换主要指暗娼的卖淫活动，同时也包括买卖婚姻和拐卖妇女的行为。从劳动力的商品化发展到色情、性交的商品化，金钱这个魔鬼起了引诱、催化的作用。因而当今国人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并不把卖淫嫖娼视为耻辱与罪过，相反，他们认为，妓女提供性服务，嫖客得了享乐后付给报酬，这是一种双方自愿、公平合理的交易。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当事人心安理得，周围群众也见多不怪。“广东不少市民村夫对警察打击这类活动，表现冷淡，甚至嘲笑。部分宾馆、饭店从客房利用率考虑，对卖淫嫖娼保持沉默，有的还通风报信，破坏警察的突然袭击，看警察扑空的笑话”。①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那些文化水平低、没有工作、没有技能的女子，最容易认同这种社会心理，从而选择做皮肉买卖的道路。如上海姑娘姜某到深圳卖淫，赚了二万多元，当公安人员抓获她时，她就说过这样的话：“他出钱我卖身，我们合作得很愉快，对谁也没有损害。”

2．在开放、搞活的新形势下，人口的大量流动，不仅形成了较大的潜在的买淫队伍，而且导致流动女性在异常环境中自我道德约束的丧失。从总体上说，买淫的嫖客群和卖淫的妓女群是相辅相成、同时产生的，但在沿海开放城市则是由于人口的大量流入先形成了较大的潜在的买淫队伍，再诱发妇女卖淫为娼的。这个潜在的买淫队伍，主要是由进入中国境内经商或旅游的外国人、华侨、港澳台人士和国内一时间暴富起来的

①张卫华《广东卖淫嫖娼活动调查纪实》。

个体户、包工头、司机、流通领域人员以及一些单身的合同工、临时工等所组成。他们一是有“性”趣，想玩女人；二是有钱，玩得起女人。于是，重金之下，必有淫女。当潜在的买淫队伍凭藉金钱的魔力而变成现实的嫖客群的时候，就意味着妓女群也同时产生了。这些妓女中虽不乏本地人，但大部分是从外地来的。“据广东省的统计，该省卖淫妇女80%来自内地除西藏以外的各省、市、自治区。这些外来户一般集中在广州、各经济特区等经济繁荣、人口稠密的城市及旅游区。当地人则是少数，常常活动于县城和乡镇。卖淫妇女中有各种职业的人。不但有农民、工人、个体户、无业者，也有干部、机关人员和医生。某市公安局一位从事宣传工作的女警官，在宾馆卖淫，被开除公职。另一起使人吃惊的案例，是某地区汉剧团著名的主要演员，在一个月内连续卖淫，获利两万元。1980年前后，卖淫妇女主要是城市无业者和农民。不过，今天在各类卖淫妇女中所占的绝对数和每人接客的平均数，仍以农妇村姑为主”。①这些从内地城市或农村进入沿海开放城市的女子中，虽然也有一部分人是直接为卖淫赚钱而来，但大部分人的初衷是来找工作或做生意的，也有的是来出公差或旅游观光的，结果在这个异地环境中，由于远离了本地环境的舆论监督，她们以往形成的自我道德约束的堤坝终于因经不住金钱的诱惑而逐渐崩溃。例如在深圳的50多万临时工中，就有不少来自内地的女青年，坚持上班时间做工，下班时间卖淫。甚至“来自北京的一些女

① 张卫华《广东卖淫嫖娼活动调查纪实》。

干部，在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出差期间，不顾廉耻地小打小闹地干着卖淫的买卖。……上海大胆的大学生，利用寒暑假，到广东等地边旅游观光，边卖身赚钱”。①

3．西方性解放运动的影响和黄色文化的冲击，不仅导致了人们（尤其是青少年）性观念的混乱，而且直接诱发着性行为的放纵与淫乱。如前所述，近十年大量出现的暗娼并不是从西方进口的，但它与西方性文化的冲击仍然有着一定的联系。从历史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性解放运动的产生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它是西方社会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所产生的个性解放、个性自由运动在性问题上的扩展。性解放不单单指性行为方面的自由化，还包括重视性教育、破除性神秘感、反对禁欲主义、强调男女两性在性问题上的平等权利以及反对封建的观念、模式，追求性行为方面的心理和谐等合理成分。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奉行的个人主义的基本生活准则和私有制造成的生存竞争，使性解放运动出现极端性发展，在性满足方式上的反社会状态开始普及。性解放运动中的性自由倡导者认为，性解放是人类个性解放的一部分，要求完全的、无限的甚至无条件的满足，在性的问题上只存在人性的体现问题，而不需要法律和道德的羁绊。这实际上是从性解放走向了性放纵。这种观念反映在行为上是各类性行为越轨的出现，反映在传媒上是淫秽宣传品的泛滥。② 1979年实行开放政策以来，西方的性解放、

① 张卫华《广东卖淫嫖娼活动调查纪实》。　② 参见马皑《黄色的冲击》，见《青少年犯罪研究》1989年第1期。

性放纵观念及其淫秽宣传品，也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给中国传统的性文化以极大的冲击，一方面国民（尤其是青少年）在从性的禁锢走向性的开放的过程中，把传统性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抛弃殆尽，把西方性文化中的消极成分（如性放纵观念与黄色文化）全盘吸收，甚至把中国封建主义的腐朽性文化也从坟墓中挖掘出来，结果导致早恋、婚前性行为、未婚先孕、婚外恋和通奸、纳妾等现象越来越多地发生，离婚率逐年上升，人们对这一切都采取了从未有过的松劲和宽容态度，社会舆论的约束和当事人的羞耻心相对减弱，这种性文化环境，无疑有利于卖淫嫖娼现象的发展与蔓延。一方面我们的舆论宣传教育也存在着某些偏差和失误，官方的舆论传媒往往把“性解放”和“性放纵”混为一谈，对于西方性解放运动的积极的合理的成分，不敢予以肯定和吸收，而是笼统地把它作为“性放纵”加以批判。因而有些妓女也以“性解放”者自居，甚至说：“西方那么先进，能‘性解放’，我们与多个男人睡觉，说不定还是中国的先进分子。”真让人啼笑皆非。学校老师和家长大多都不敢以科学的态度向青少年介绍性知识、进行性教育，结果是泛滥于街头巷尾的黄色书刊成了他们的“启蒙老师”。这些正处于青春骚动期并且缺乏自控能力的青少年，有不少人就是在黄色书刊的诱导下偷尝禁果乃至走向犯罪的。尤其是淫秽录像的广泛传播，不仅对青少年会产生巨大的毒害，即使成年人看多了，也会在性观念、性行为、性欲求方面或多或少受到影响。有不少流氓团伙或以营利为目的的卖淫团伙，往往就是以播放淫秽录像来引诱少女上钩，结果这类女子十有八九会在淫秽录

像的强烈刺激下而失身，乃至走上性放纵、性淫乱的道路。当然，黄色文化并非全部是从西方进口的，其中也有一部分是旧中国黄色文化的起死回生，也有一部分是当代国人炮制出来的。各级政府也曾多次组织力量扫黄，只要是黄货，无论是中国土产的，还是西方进口的，都在扫除之列。但由于黄色文化传播渠道较为隐蔽，并且容易制作复本，仍然难以彻底扫除干净。

4．历史遗留下来的城乡差别和因分配不公而形成的贫富差别，不仅普遍形成了趋富慕荣的社会心理，而且诱发了妇女卖淫致富的投机心理。十年改革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吃大锅饭的绝对平均主义格局，但由于制度还不完善，改革还不配套，在利益的重新调整中，又出现了畸形的贫富差别；流通领域人员、个体户、包工头、司机以及高干子女中的一部分人靠钻国家的空子或剥削他人一下子暴富起来，吃喝玩乐，嫖赌逍遥，皆挥金如土；而相当部分的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则成了被相对剥夺的阶层，他们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近几年大量出现的弃文经商、弃学经商、弃农经商，正是由于分配不公所导致的恶果。此外，沿海开放城市和内地城市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别也越来越大。有相当数量的人为了改变自己的低收入状况，几乎达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在许多领域的竞争中，无论城市妇女还是农村妇女，与男人相较，大多都明显地处于劣势。但她们趋富慕荣的急切心理比起男人们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因为她们既渴望发迹变泰又觉得靠勤劳致富太慢太难，便想投机取巧走捷径。于是，许多青年女子都希望嫁给有钱的港商或国内的暴发户坐享荣华富贵。1979年广州刮起一股外嫁

风，有些十七八岁的少女也自愿嫁给了五六十岁的香港老板。还有不少女子甘愿冒风险做有钱男人的妾或姘妇，贾鲁生的《当代纳妾现象曝光》一书对此做过详细的描述与深入的分析。而数以万计的女子则干脆走上了卖淫致富的道路。据朱再江和李青对贵州300名妓女的调查，有198人来自农村，占总数的66%；102名生长在城市，占 34%，其中82名是无业者。① 至1987年初，广州妇女教养所共收容暗娼1060名，其中农民占30%，职工占23%，无业人员占40%，个体户占6%，在校生占1%。② 由于卖淫收入往往高出于其他职业工资收入的数倍乃至数十倍，并且比其他职业的工作轻松、快乐，因而不仅城市无业女青年和农村妇女以卖淫来赚钱，即使在职女工或干部也有不少人以卖淫为第二职业。正如有的暗娼所说："裤带松一松，能顶半年工。""据公安部门1988年12月份的不完全统计，在抓获的女青年中，来深圳卖淫的时间最多不超过四年，然而存款数目从10000～40000元不等。为了金钱，她们真可谓不分昼夜，不辞劳苦，连续作战，因而在短短的时间内她们变成了名符其实的暴发户"。③ 有些妓女甚至说："那些个体老板，跑运输的，流通倒卖人员的钱来得太容易了，拔他们身上的一根毛，算不得什么。"湖南桃江县王家村乡妇女外出卖淫现象严重，有二个村外出卖淫的占女劳力的80%以上。群众反映这些妇女"外出一条烂裤子，回来穿着呢料子，手上戴着金戒指，袋里兜着新票

①朱再江、李青《对贵州卖淫问题的初步调查分析报告》，见《社会》1989年第7期。　②钮海津《广州卖淫扫黄纪实》。　③邹素芹《深圳市女青年卖淫现象的考察》。

子，家里盖了新房子，务农不如当婊子”。

5．不良家庭环境或不幸婚姻的影响。据朱再江和李青对贵州300名妓女所作的调查，未婚者占71%，已婚者占29%。钮海津也曾对广州妇女教养所收容的1060名妓女进行过统计，未婚者占77%，已婚者占21%。未婚女性下海为娼往往与不良家庭环境的影响有关。她们中有的是由于父母离异、父母双亡或一方死亡，从小缺乏爱的温暖和保护，因而很容易被人引诱失身乃至卖淫。有的则是由于家庭成员中有人作风不正甚至有犯罪行为，从小受到不良品行的影响，因而更容易走上卖淫道路。那些已婚女性下海为娼，则往往与不幸婚姻（包括买卖婚姻、异化婚姻）有关，她们有的是丧夫或离异后为生计所迫而卖淫，有的是夫妻不和离家出走而下海为娼，有的则是在丈夫的带领和保护下充当暗娼。

6．工作单位不良环境的影响。为了讲求“经济效益”，许多新办的商场、书店、服务单位（如宾馆、旅社、饭店、酒吧、咖啡馆、美容店、按摩院等）和娱乐场所（如舞厅、音乐茶座、娱乐中心等）大都招收年轻漂亮的女性来招徕顾客，其中有些单位（尤其是中外合资、私人承包和个体经营的单位）的经理或老板，不仅利用职权经常勾引女服务员，而且指使、纵容甚至胁迫她们卖弄风骚，以色情挑逗、笼络顾客。湛江市“花记饭店”店主黄某，就先后将十多名女服务员奸污，随后又强迫她们向顾客“放电”，招揽生意，并专门在饭店后座空出一间房子，供嫖客淫乐。“据公安部门1989年1月25日的统计，仅深圳市罗湖区就有267间宾馆、旅店、招待所，68间咖啡厅，42间舞

厅，有暗娼的占65%。全深圳市有30多家按摩室、芬兰浴室，而经市政府批准并经工商局登记的仅有19家，大多数都采用色情招揽生意，而且许多卖淫嫖娼案件就发生在这些场所”。①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女服务员是很容易受到污染的。

7．不良交往的影响和不法之徒的诱骗或教唆，也是导致女性卖淫的重要原因之一。许多妓女最初并无卖淫动机，后来由于受到同性朋友或异性朋友的影响、引诱、教唆才决意卖淫的；有的则是在流氓、龟鸨、人口贩子的诱骗之下沦为娼妓的。这种卖淫行为的传染性很强，她们之间互相勾结，传递信息，往往是一个卖淫，带坏一片。如湖南桃江县王家村乡龙形山村党员王月明，从1988年12月开始，先是带其妻到广州卖淫，后来又先后引诱同村22名妇女去广州为娼，他从中收取介绍费达二万元。山东老鸨吴寿刚，从大连市拐骗女青年三人前往广州，住进北城大酒店，然后以她们每人归还300元路费为名，胁迫她们接客，三位女子稍有不从，便会遭到吴的拳打脚踢。

二、当代暗娼卖淫的主观原因

1．基本素质偏低。尽管暗娼中也有大学生、教师、演员、干部，但大多数妓女文化水平较低，缺少知识技能。例如广州市妇女教养所收容的1060名妓女中，文盲占 4%，小学文化占27%，初中占53%，高中占15%，中专以上占 1%。朱再江和李青所调查的贵州300名妓女中，文盲占37%，小学文化占40%，

①邹素芹《深圳市女青年卖淫现象的考察》。

初中占18%，高中以上占2%。张蜀对四川188名妓女进行统计，文盲和小学文化占39%，初中占46%，高中以上占15%。由此可见，繁华大城市的暗娼中文盲的比例要比一般城市小得多，但各地暗娼在初中文化以下的比例较为接近，大致在90%左右。与近现代妓女比，当代暗娼的文化程度普遍要高一些，这是因为新社会所有青少年的文化水平都提高了的缘故，实际上与同龄女性相比，她们的文化水平都比较低，与之相应的思维能力、认识能力也较低，这就很容易导致她们道德规范的模糊和法制观念的缺失。例如贵州有些妓女被抓起来送进妇教所时，竟还未弄明白“为什么和男人睡觉也犯法”？

2．仰慕虚荣，贪图钱财。当代暗娼中虽然有因生计所迫而卖淫者，但大部分妓女家中都基本上具备了起码的生活条件，只是由于城乡差别、贫富差别刺激了这些女子的虚荣心理，使她们不甘于过仅仅能够蔽体果腹的低水平生活，而希望能够发财致富，赶上高消费的时髦，因而投机取巧，走卖淫致富的道路。有的女子打算利用年轻美丽的灿烂年华多赚点钱，然后“衣锦还乡”，结婚成家，做贤妻良母。

3．追求刺激与享乐。这类妓女往往是从“性解放”走向“性放纵”的，她们并不企求通过卖淫发财致富，而是把追求瞬间刺激、眼前快乐放在首位。如武汉市李某，就是怀揣6000元人民币南下广州，寻求刺激的。她接客是有选择的，只要是看得上的嫖客，给不给钱无所谓，给多给少没关系。四川有名女教师梅某，丈夫是某大学讲师兼教研室主任，生活处中等水平。在夫妻生活上，她可以满足丈夫，但丈夫不能满足她。因

而她便有选择地向一些机关干部卖淫。她说："身体是我自己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并且坚持做到四不卖：即工作忙了不卖，身体不舒服不卖，心情不好时不卖，看不上的不卖。当然，在当代暗娼中，象这类把追求刺激与享乐放在首位的女子并不很多，大部分妇女卖淫首先是为了赚钱，其次才是为了追求刺激与享乐。

4．出于报复心理。未婚妓女大多是被男人引诱欺骗甚至强迫而失去贞操的，因而在她们的心灵深处，充满了对男人的仇恨。但由于生理条件的局限不可能以暴力形式表现出来，于是干脆以牺牲自己的肉体为代价来坑害男人，报复男人。她们凭借自己的美貌，千方百计勾引男人下水，黑起心肠漫天要价，甚至一边卖淫，一边进行诈骗、偷窃活动。如果得了性病，就以更快的速度拉客，让男人也跟着遭殃。

5．淫荡成性，积习难改。这类妓女由于长期滥交，以致性分泌增加，性欲亢进，形成淫荡习性，无法控制自己的性冲动，没有强烈的性刺激便难以忍受。有不少妓女从妇教所放出来以后，马上又艳帜高张，因此，各地二进宫、三进宫的往往不乏其人。例如广州市妇女教养所每年收容的妓女大约有十分之一是重犯者。

三、近十年来暗娼活动的特点

1．暗娼分布面广，流动性大。前几年，暗娼主要在沿海一些城市活动，现在已蔓延到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并且从大城市扩展到中小城市和县城集镇甚至公路干线的沿途乡村。

凡大中城市的妓女除了一部分就近活动的本地人外，大多为外地流动女性。哪里有钱的嫖客多，她们就流向哪里，并且在某一城市之内或在城市与城市之间经常转移。原因在于许多嫖客宿娼也喜新厌旧，一个妓女在某个地方活动过久就会跌价。另外，妓女经常在一个地方出入，也容易成为警察注意的对象。经常流动，既有利于保护自己，又能稳定卖淫价格。

2．活动形式多样化。最常见的有如下七种：一是单个暗娼在车站、码头、舞厅、影剧院、公园、商场、街头等公共场所，以谈生意、找工作、找亲友、交朋友、找舞伴、谈恋爱为借口，勾引嫖客到家中或到旅馆甚至到野外淫宿。二是暗娼与城市旅店、宾馆人员勾结，由他们向住宿的旅客介绍，他们从中收取“介绍费”、“床铺费”；也有的只利用宾馆、旅社的电话，直接和旅客通话谈生意。三是地下妓院老板、卖淫团伙提供嫖宿场所，通过各种关系介绍嫖客，收入双方分成。四是出租车司机与暗娼勾结，或是起介绍作用，或是将妓女和嫖客拉到郊外，以车代屋，甚至还有将出租车作为“流动妓院”的，车子四周封得严不漏光，妓女和嫖客上车后成交，兴尽下车，司机与妓女分成。五是定期包租给外商、港商或国内暴发户，妓女陪宿、陪饮、陪游、陪舞，悉听主顾所便。六是妓女进入某些男工厂矿和煤矿，公开活动，轮流陪宿，厂矿领导往往也听之任之。七是公路干线沿途的小酒店、小饭铺、小旅社以招收“拉客妹”的形式从事卖淫活动，或者是附近的村姑与这些小老板搭成默契，勾搭歇脚和住宿的过往司机、客商和外出人员等，还有一类单干户的“公路女郎”，经常搭乘货运司机的便

车，搞有偿旅游。

3．半公开半隐蔽的经营方式。由于我国的法律对卖淫嫖娼活动是取缔和打击的，妓女为了躲避警方的搜捕，不能不采取隐蔽的、巧妙的方式从事卖淫活动（例如白天在旅馆或家中接客，被抓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但她们为了赚钱，又不能不公开活动，勾引男人，甚至在一些大城市，妓女们还按原籍组成帮派、团伙，在公共场所明目张胆地拉客。

4．卖淫是当代暗娼向嫖客提供服务的全部内容，双方之间纯粹是一种赤裸裸的肉欲与金钱的交易。如上有关章节所述，近代妓女相对于古代官妓来说是一种蜕变。但其中毕竟还有一部分妓女能歌善弹，甚至仍有人坚持卖艺不卖身。而当代暗娼则彻底堕落了，她们中的绝大部分根本不懂艺术为何物，唯以卖肉为业，即使有极少数演员、歌手兼充暗娼，也不是以卖艺而是以卖肉赚钱。

5．卖淫活动逐渐向综合犯罪发展。有些暗娼与流氓团伙群奸群宿，实际已发展成为流氓活动；有的借卖淫之机进行诈骗、偷窃活动；有的和妓院老板、皮条客或丈夫相互勾结，先预设陷阱，然后以捉奸的名义来敲诈嫖客；有的故意逗引嫖客争风吃醋以坐收渔利，结果导致斗殴伤人乃至杀人。

综上所述，当代暗娼是在政府取缔娼妓的社会背景下展开活动的，她们千方百计逃避警方的搜捕，从事卑鄙而肮脏的交易，给社会播种的是百分之百的丑恶与罪孽，因而不管她们是出于何种目的与原因为娼，人们都决不应该熟视无睹，甚至予以宽容和同情。即使从中国妓女生活史的角度而言，在当代暗

娼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也是旧时代娼妓文化中最腐朽、最卑劣的成分，她们身上所保留的文化因子，除了丑恶以外，一无所有。但愿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能够齐心协力，继续深入开展扫除暗娼的斗争，迅速把腐朽、丑恶的娼妓文化再度送入坟墓，彻底埋葬，永远埋葬！

1989年12月31日写毕
1990年元月24日改定

后　记

近几年来国内学术界兴起的文化学热和妇女学热，已经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但却忽视了对中国女性文化（尤其是传统女性文化）作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实际上，女性的存在，就是一种文化存在；女性的历史，就是一种文化的历史；无论是女性存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女性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在不同文化时序中的展开过程和显现过程。纵观中国女性文化发展的历史，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主要是以守贞型的淑女文化、越轨型的逆女文化和病态型的妓女文化三种基本模式并行发展。本书的写作正是基于笔者对中国女性文化（尤其是传统女性文化）的总体认识所进行的尝试性研究。

笔者之所以首先选择妓女文化作为研究的对象，原因之一是，在中国女性文化的三种基本模式中，妓女文化作为一种病态型文化是最复杂、最令人费解的文化现象，以前学术界很少有人对此作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仅有王书奴先生编著过一本《中国娼妓史》，于1934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但该书限于编著体例，论述较少，多为资料汇编，并且占有的资料也很不完全。加之近十年来暗娼又出现发展与蔓延的现象，有不少人对此困惑不解，甚至误以为它是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其实，当代出

现的暗娼，既不是门户开放后从外国直接引进的“洋货”，也不是在改革过程中直接创造出来的“新产品”，而是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娼妓文化残余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复活与蔓延。因此，在这个时候写作一部《中国妓女生活史》，不仅具有它本身的学术价值，而且有助于人们充分认识旧时代娼妓制度的罪恶和大陆解放后取缔娼妓制度的深远历史意义，从而坚定我们彻底消灭娼妓现象和彻底铲除娼妓文化残余的信心。

原因之二是，妓女文化与中国的艺术（主要指音乐、舞蹈、杂技、曲艺、戏曲等）和文学（主要指合乐的文学如诗、词、散曲等）关系最为密切。在大学讲坛上，我主要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戏曲史两门课程，根据教学需要，我不能不经常提到一些名妓，诸如苏小小、薛涛、刘采春、李娃、李师师、严蕊、朱帘秀、赵盼儿、杜十娘、陈圆圆、李香君、柳如是、董小宛、赛金花等人的名字，并且试图说清妓女与唐诗、宋词、元明清戏曲、散曲之间的关系。因此，首先选择妓女文化进行研究，这无疑有助于我的教学工作。同时，还可为我们从总体上研究和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古代艺术与文学）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从《中国妓女生活史》的体例出发，本书侧重于论述妓女和娼妓制度产生、发展与消亡的历史过程，关于妓女与礼教的关系，妓女文化与淑女文化、逆女文化的关系，妓女与音乐、舞蹈、杂技、曲艺、戏曲、诗词、散曲、小说的关系，均只点到为止，笔者另有《妓女与中国文化》作专门论述。

妓女现象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在西方国家中，妓女（Prostitute）总是和卖淫（Prostitution）联系在一起的，

但在中国，妓女却可以明显地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事艺术表演活动的女艺人（即艺妓），她们并不从事卖淫活动（尽管统治她们的男人可以随意占有她们），一类是向男人提供性服务的卖淫女（即色妓），其中一部分受艺妓的影响而实行色艺兼售。本书以妓女为研究对象，虽然不得不涉及卖淫问题，但它并不是一部中国淫业史。这不仅表现在书中以较大篇幅论述的官妓、家妓和地方官妓中的大部分，市井艺妓中的大部分都是不卖淫的，即使是卖淫的男妓（古代称为男色）也略而不论，这是由作为中国女性文化模式之一的妓女文化的特定内容所决定的。

本书的写作自始至终都得到了我国著名教授马积高先生的悉心指教。在构思和写作过程中，他从百忙中抽空审读了我的写作提纲和大部分初稿，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全书竣稿后，他又为本书作序，使拙作增添了光彩，对此我深表感激。与此同时，还曾得到许多专家、教授和学林师友的鼓励和支持，如湖南师大唐凯麟先生、谭承耕先生、吴容甫先生、黄钧先生、彭丙成先生、汪华藻先生、武汉大学何天齐先生、上海师大孙国群先生以及复旦大学钱振民学兄等；此外，湖南省公安厅的有关同志曾为本书提供过有关材料，在此一并深表谢忱。

作　者

1990年1月于湖南师范大学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国妓女生活史
作者=武舟著
页数=422
出版社=长沙市：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08
SS号=11450400
DX号=000000246798
URL=http://book.szdnet.org.cn/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0246798&d=22BD0D86E74A842B5889769C7837F668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第一编　妓女的产生与发展（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一章　妓女的起源与发展
第二章　早期妓女生活概况
第三章　官妓史叙论（上）
第四章　官妓史叙论（下）
第五章　家妓史叙论
第六章　私妓史叙论
第七章　近、现代妓女的复兴与蜕变
第八章　娼妓的取缔与残余
后记